日本政治史

第一册

〔日〕升味准之辅 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政治史

第一册

幕末维新　明治国家之成立

〔日〕升味准之辅 著
董果良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政治史/(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郭洪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ISBN 7-100-01970-2

Ⅰ.日… Ⅱ.①升… ②董… ③郭… Ⅲ.政治制度-历史-日本 Ⅳ.D7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2583号

RÌBĚN ZHÈNGZHÌSHǏ

日本政治史

(全四册)

〔日〕升味准之辅 著

董果良 郭洪茂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照排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970-2/D·159

1997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970千
印数5 000册 印张41¼

定价:55.60元

译 者 序 言

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政治编辑室计划组译出版一套外国政治史丛书。当时请我寻觅一部较好的日本政治史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经我的友人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小林一美先生介绍，我结识了本书作者升味准之辅教授。1993年3月，我在东京与升味先生见面，经他斡旋，同东京大学出版会第二编辑部(社会科学编辑部)部长竹中英俊先生洽商，达成关于东京大学出版会给予商务印书馆以《日本政治史》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的协议。此书已在1992年由李庆熹开始译成朝文，由韩国萤雪出版社出版。

升味准之辅教授1926年出生于长崎，194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到美国加州大学进修，归国后一直在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任教，其间又数次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等处讲学，现已退休为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在职期间，曾任日本政治学会理事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升味先生在大学讲授“政治学”和“日本政治”，著作颇丰，且皆为日本的著名出版社出版。据他对我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日本开拓“比较政治”的研究。为此，他由60年代至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为研究“比较政治”打基础的著作。比如：《现代日本的政党与政治》(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合著，岩波书店1962年出版)，《现代政治与政治学》(岩波书店1964年出版)，《日本政党史论》(共七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1968年陆续出版。这是一部研究日本政党及其历史的巨著，所引资料极为丰富)，《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岩波书店1969年出版)，《政治学讲义》(上、下，岩波书店1974年出版，曾多次再版)，《战后政治》(上、下，东京大学出版

会 1983 年出版），《现代政治》（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5 年出版；朝文版李庆熹译，韩国大光文化社 1990 年出版），《乌托邦与权力》（增订版，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6 年出版），等等。在这之后，他的三部关于“比较政治”的专著，在 90 年代初相继出版：《比较政治Ⅰ·西欧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0 年出版），《比较政治Ⅱ·美国与俄国》（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 年出版），《比较政治Ⅲ·东亚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 年出版）。

如作者在《日本政治史》的后记所述，本书除了幕藩体制（即第一册的《绪论》和幕末维新（即第一册的第一章）以及 80 年代部分（即第四册第四章之三、四）是新写的以外，其余都是根据其《日本政党史论》、《战后政治》和《现代政治》缩写的，但也作了增补和修订。由 600 多万字（按译成汉字估算）缩写成现在这样一部日本政治史，确实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有些地方缩写得过于简略或承接关系不易理解。经与作者磋商，对这些地方由作者作了若干补充（如对三国干涉还辽问题等），或由译者加注作了说明（如对大正政变问题等）。

根据我的体会，本书史料丰富、论点明确、方法独特、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和研究日本政治史很有裨益。

没有史料就写不了历史，所以历史学家必须大量占有史料。根据我的统计，本书所用的参考资料，其中包括通史、断代史、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档案等资料达 500 余种，而且不是列出大量的书目吓人，几乎全在书中有所引用。有些史料对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可起引路作用，故参考文献全按日文照排，以利这方面的专家使用。

但是，“只占有史料也写不了历史，因为史料所提供的只是个别的事实。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对史料进行整理，从大量的史料中筛出特定的事实，对它们进行组合，使历史的

事件和行为回复其原貌。”(见《比较政治Ⅱ·美国与俄国》的后记)作者就是这样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财阀的作用、政党的明争暗斗、金权政治、民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变化、战后的经济复兴、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行分析和评论的,并时有警句出现。比如,他说日本“形成了官民一体的侵略集团”(见第一册 48 页),认为包括民权派在内的来华“国士和浪人是凌弱的侵略爪牙”(见第二册 416 页)。这比那些把责任完全推给军国主义分子,强调要把侵略分子与日本人民分开,过分颂扬某些人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说法,就深刻得多,而且更合乎实际。

作者还不以这种“在史料上爬行”的方法为满足,他要“翱翔太空,俯瞰世界史的全景”(引文见同上书),即用“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探讨日本政治史,以作者注的形式表述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拿日本的政治与中国的政治对比时,作者的一些论点也是颇有见地的。比如,他认为清末的洋务运动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在权力分散化之中进行,又促进了权力的分散化”(见第二册 290 页),甲午战争实际上是日本与直隶之战,南洋舰队坐视不动(见第二册 290 页)。可以说这种中央失去权威和地方势力壮大(也就是后来的军阀割据)的现象,在我国一直继续到新中国的成立。

作者在叙述政党的斗争,描述政治人物的性格时,多半引用当事人或有关人员的日记和回顾录等材料,比如藤山爱一郎的《政治:我之道》,佐藤荣作夫人的《宰相夫人秘录》,读起来生动有趣,不觉得干燥无味。当然,这些私人史料可能有些水份,但细心琢磨之后,也可以从水份之中析出真实。因此,我说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

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受侵略的历史,而日本又是我们的最大、最残暴的侵略者。因此,我们要研究日本的近代政治史,而这部《日本政治史》,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日本,当会有所帮助。

当然，本书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作者认为日本的战后民主是美国占领军给带来的，就有历史客观主义之嫌，即重视外因而轻视了内因。

最后，谈一谈本书的翻译问题。对于专有名词，基本上照录了日文原词（汉字）。比如，“太政官”、“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等；但对从汉字上无法理解原意者，初见时加译注，比如，对“关白”、“大名”、“老中”等。关于文献的篇名和书名的翻译，为了便于读者利用原著和阅读中进行核对，基本上按日文原著的汉字译出，比如“回想录”、“回顾录”等，均照录原来的汉字，而未译为“回忆录”。有些同一地名，日文的读音相同，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汉字表示，比如，大坂和大阪，箱馆和函馆。遇到这种情形，原汉字是什么就写什么。

原文中的误植和数字错误，经与作者核对，均一一作了修改。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第一册加进了《中央机构变迁》（表）和《日本旧国别地图》。

引文中所指的参见页数，均系原文页码，请见边码。

为了翻译此书，升味准之辅教授把他的著作几乎全部寄赠给我，并多次通信为我解释疑难；小林一美教授为我送来了几部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辞书，并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东京大学出版会的竹中英俊部长和高柳光男先生给了我以大力支持，并在东京热情款待了我；商务印书馆政治编辑室为中文版的出版作了周密的安排，陈森同志作为责任编辑为我做了嫁衣。在此谨向以上各位表示深厚的谢意。

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限于水平，译错或译得不确之处一定不少。我恳切地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董果良

一九九五年二月于北京

致中国读者

拙著《日本政治史》现由著名的译者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使我感到无上荣幸。本书引用了大量的战前文献，而且引用时可能有不少误解之处，译者为此一定费尽了心血，故向董果良教授致以由衷的感谢。在此，我也要向中文版的出版者商务印书馆表示深厚的谢意。

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经历。我1926年出生于长崎，1945年4月进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法学部学习，但在同年6月末即应征入伍，作为陆军船舶二等兵在濑户内海的一个小岛的断崖挖掘船舶隐蔽洞。8月日本战败，9月复员。我背着背包到已是一片残垣断壁的东京去复学，已是10月末了。1948年3月由东京大学毕业，接着入该校研究室，进行了四年的研究工作。由研究室毕业后，到东京都立大学任教，一干就是37年，1989年退休。至今仍在家中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现年69岁。

我最初的研究专业是政治学，具体地说，是研究欧洲的政治思想和美国的政治理论，但到后来，我的兴趣逐渐转向了西欧、美国、俄国的近现代政治史。对于日本近现代政治史的研究，始于我30岁以后。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跨时近百年、由明治初年至战败时止的《日本政党史论》(共7卷)，以及《战后政治》(1945—1955年，共二卷)和《现代政治》(1955年以后，共二卷)。退休之前，根据以上著作写成了现被译成中文出版的《日本政治史》。

写日本的近现代史时，就必须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因为正如读者诸君所知悉的，日中两国的近现代史有时是无法分开的。我着

手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是在1959年首次留学美国时期，而从那以后，便在写日本的政治史的过程中，不断地阅读有关中国问题的书刊。本书也有不少地方谈到中国，但我所引用的书都是用日文或英文出版的，没有直接引用中国方面的史料和文献，所以我也有隔靴搔痒之感，而且感到极不全面。对于史实的叙述和解释，也一定有很多不妥或错误之处，希望中国的专家见谅，予以指正。

最后，由衷地向阅读本书的中国读者诸君表示感谢。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历史和经验互不相同，而且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条件方面也不一样，所以也许有的读者会对本书的一些论点表示怀疑和持不同意见。我一方面怀着不安的心情在等待着中国读者对本书的反应，另一方面又十分希望我对日本政治史所作的这样叙述和解释能被中国接受。不管怎样，我由衷地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为两国的历史研究的交流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书作者　升味准之辅　识

1995年6月于日本国东京都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 1

绪论　幕藩体制 ………………………………………… 1

一　被冻结起来的三个要素 ………………………… 2

朝廷　外样大名　锁国

二　幕藩体制之建立 ………………………………… 10

幕府官僚制　亲信政治　武家与百姓　城市与町人

三　18世纪:变动与改革 …………………………… 20

人在旅途　享保改革　田沼时代　宽政改革

四　天保改革 ………………………………………… 32

幕政改革　长州藩　萨摩藩　鸦片战争

第　一　部

明治国家之成立——由幕末维新到颁布宪法

前言 ………………………………………………… 41

第一章　幕末十五年　王政复古 ……………………… 50

一　开国　日美通商条约 …………………………… 50

柏利来航　日美和睦条约　哈利斯、日美通商条约　违敕签字、将军继嗣

二　公武合体　尊王攘夷 …………………………… 66

公武合体、朝幕修好　攘夷亲征、八月十八日政变　征伐长州、下关战争

三　萨长协约　尊王讨幕 …………………………… 77

罗歇、帕克斯　萨长协约　幕法同盟

四　大政奉还　王政复古 …………………………… 88

大政奉还　武力讨幕　戊辰战争
第二章　维新政府　萨长土肥……102
一　中央集权　藩阀与旧藩……102
太政官制、版藩奉还　藩阀与旧藩　三藩献兵　废藩置县
二　岩仓遣外使团　征韩论争……114
派遣事由　英国、德国、俄国　留守政府　征韩问题　庙堂分裂
三　大久保政权……129
征韩派、民权派　清理秩禄、改革田赋　木户与大久保
四　西南战争……138
私学校蜂起　政府派出讨伐军　立志社动向　大久保与西乡
第三章　自由民权运动……153
一　自由党的成立……153
爱国社复兴　农民占八成社会、文明开化　国会开设请愿运动
自由党的成立
二　新闻与游说　府县会形势……163
党干部与党员　新闻与游说　府县会、地方政治
三　自由党解散　府县会党派……173
镇压与怀柔　资金枯竭　过激举动、解散党　府县会党派、
企业勃兴
四　朝鲜问题……184
壬午军乱　渡韩计划　甲申事变　大阪事件
第四章　完善体制　制定宪法……195
一　明治十四年政变……195
积极财政、紧缩财政　宪法问题、大隈密奏　向民间出售官产
问题、舆论沸腾　政商、三井与三菱
二　内阁制度　培训官僚……212
内阁职权、内阁官制　官员与藩阀　培训官僚、任用制度
三　帝国议会　地方自治制……222
帝国议会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地方自治制
四　修改条约问题　大同团结运动……230

井上修改案　大同团结运动　大限修改案
参考文献 …………………………………………………………………… 238
附录 ……………………………………………………………………… 243
表 1　产业人口中农林水产人口比率(1841—1971)
表 2　铁道营业公里数(单位:公里)
表 3　由太政官制到内阁制的中央机构变迁
附图　日本旧国别全图 ……………………………………………… 246—247
人名索引 …………………………………………………………………… 247

绪论　幕藩体制 3

亚洲的近代史始于西洋的冲击。当冲击于19世纪中叶到达日本时，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德川幕藩体制，已经出现崩溃的征兆。这个孤立的因果系统遇到扩大的国际因果系统后，开始动摇并被裹挟进去。这个变动便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幕末维新。首先要从两个方面概观幕藩体制。

第一，幕藩体制自柏利来航[①]后，挣扎了15年终于崩溃[②]，但在这个崩溃过程中发生重要作用的外国、西南外样雄藩[③]和朝廷这三个因素，在17世纪前半期建立幕藩体制之际原是这个体制的陪衬而被冻结起来。就是说，在建立幕藩体制时就被死化的三个要素，以黑船[④]来航为契机而活化起来，并导致幕藩体制走向崩溃。

第二，以三个要素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幕藩体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培养装置。受到这个发展的影响而不断变动，并因应发展而改革的幕藩体制，通过发展、变动和改革的循环而进入18世纪时，便已出现破绽。这时幕藩体制处于什么状态，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到 4
什么地步，这两者与活化起来的三个要素是怎样结合的——这就是幕末维新这出历史戏的情节。

---

① 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柏利(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1853年6月率4艘军舰到日本的浦贺，史称柏利来航。——译者

② 幕藩体制随庆应3(1867)年6月实行大政奉还而解体，从1853年到1867年正好15个年头。——译者

③ 西南外样雄藩，主要指长州藩、萨摩藩和土佐藩。日本语的外样，是非嫡系的意思。在关原之战后归服德川家康的大名(是诸侯的意思)称外样大名。——译者

④ 黑船，日本称当时到日本的欧美船只为黑船，因船体色黑而得名。——译者

5 # 一　被冻结起来的三个要素

朝廷　在16世纪战国时期，下克上的武士界流行着“天道”观念。就是说，适于人智难测的“天道”者获得权力（统治权），而被“天道”遗弃者则没落。这个观念在于激励强者的功名心，向胜者祝福，使胜者的统治正统化。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声称，就是因为自己是适于“天道”的“天下人”，所以才掌握了统治权。只要这个正统化为人人所接受，统治权就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加强。但“天道”也在刺激另外的正在兴起的强者的功名心，祝福他的胜利。他亦可用“天道”使其获得的统治权正统化。另一方面，相继被遗弃的败者，亦能用“天道”安慰自己和静观形势。但是，“天道”说明不了优胜劣败的原因与理由。它什么也不预言，什么也不指示。它默默不言，既拥抱胜者，又拥抱败者。它的沉默只说明世界是嬗变的。在残酷的下克上中沉浮的人们，也都感到是如此。所谓“天道”，不过是对人智所不及的嬗变的叹息、人世无常的感慨而已。

在“天道”流行的同时，传统的权威依然残存。朝廷和将军虽
6 已衰落，但使统治正统化的制度的权威却被保存下来。战国大名一旦以武力获得领土，便为使自己对领土的统治比其他大名正统化，而要求取得守护职①等地方官职。于是，志在统一国家的战国大名，又想通过取得中央官职，使其比其他战国大名的军事优势正统化。织田信长在进入京都前后就以弹正忠在对阵中自称，他在天正10(1582)年死于本能寺②时，已是正二位、右大臣、右近卫大将了。

① 守护职，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由幕府设于诸侯国的地方官职，初以主管刑名为职司，后兼及军事、交通和寺院的管理，在室町时代发展成为强大的守护大名。简称守护。——译者

② 本能寺，原址在京都油小路高辻和五条坊门之间，原名为本应寺，后迁至四条

丰臣秀吉在天正14(1586)年着手平定九州、关东、东北时，被任命为从一位、关白[①]兼太政大臣，并强调摆脱战国状态而跟随关白秀吉为天皇的“睿虑”。庆长5(1600)年以关原会战[②]而确立军事优势的德川家康，于庆长8(1608)年补任为征夷大将军。这些官职的补任与“天道”并无矛盾。他们被任命为右大臣、太政大臣、征夷大将军，是因为他们适于“天道”。

德川家康于元和元(1615)年以大坂夏之阵[③]消灭丰臣氏后，立即制定《禁中并公家诸法度》[④]17条，禁止朝廷参与政治，从而牢固地掌握了幕府干预朝廷内部事务的手段。留给朝廷的，只是任官叙位、规定历法和改元等有名无实的权限。于是，朝廷被冻结于凄凉的京都御所之中，幕府在政治上独断专横，不向朝廷奏禀施政。朝廷就像“天道”那样有名无实，虚弱无力，苟延残喘。石沉而枯叶浮流。朝廷以不问政治而苟安。

幕府一方面把朝廷作为陪衬而加以冻结，另一方面又利用朝廷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宽永12(1634)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率30万大军进京，在二条城[⑤]向年禄5万石以上的所有大名颁发《领

西洞院油小路而改为现名。天正10(1582)年织田信长在与四国的毛利氏的对战中驻于此，被叛军倒戈袭击而自杀，本能寺被焚，史称“本能寺之变”。天正17年在现址京都市中京区寺町重建，寺内有织田信吉的供养塔。——译者

① 关白，辅助天皇的大臣，位在太政大臣之上。——译者

② 关原会战，亦称关原之战，发生于1600年9月，战场在美浓的关原，故名。这是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由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与以石田三成为中心的西军对阵，结果德川家康胜利。——译者

③ 庆长19(1614)年11月德川家康召集全国大名围攻龟缩在大坂城内的丰臣氏之战，史称“大坂冬之阵”。12月，以填平外壕为条件达成停火协议。元和元(1615)年4月，丰臣氏违反协议亦把内壕填平，因而战事再开。5月丰臣秀赖母子自杀，大坂城陷落，史称“大坂夏之阵”。两次战事合称“大坂之阵”。——译者

④ 元和元年7月颁布。其主要内容为：天皇的本分，摄政和三公的席次与任免，改元，刑罚，僧侣的官位等。——译者

⑤ 二条城，德川家康建于京都的城廓，为京都守护和将军进京时的驻所。现为京都市的重点文物。——译者

7 知宛行状》[1]。于是，北起松前氏南至岛津氏[2]，至少在建制上使全国处于将军的主从制统治之下。将军进京受命，除幕府末期外，这是最后一次。庆安 4(1615)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是驻在江户城中接受天皇的任命的。宽文 3(1663)年，家纲率众大名举行日光社参[3]，改订《武家诸法度》[4]；第二年向全体大名颁发《领知宛行状》。这一切表明朝廷的权威更加有名无实，而幕府自身对大名的统治却加强了。以后历代将军实施的尊王活动，比如恢复大尝祭[5]，增加宫内费用，调查和修复天皇陵寝等，愈使幕府对朝廷的垄断控制加强了。

强者的统治与朝廷的权威，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家纲时期，确立了显示大名的家格和幕府大员的地位的武家官位制。比如，由将军家出任正二位淳和奖学两院[6]院长、近卫大将，尾张、纪伊德川家[7]出任从二位大纳言，水户德川家出任从三位中纳言[8]，前田家(外样)[9]出任从三位参议，井伊家(谱

---

① 《领知宛行状》，是大名的领地、年禄、职权的执照。——译者。

② 松前氏是福山藩藩主，福山藩大致相当于今青森县。岛津氏为鹿儿岛藩藩主。——译者

③ 日光社参，亦称日光社御参，系江户时代将军每年 4 月参诣日光东照宫的大祭。——译者

④ 《武家诸法度》是江户幕府元和元(1615)年颁布的武家守则，后经多次修订。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幕府武官的筑城、婚姻、勤务、造船等的规定。新一代将军受命时，依例向部下的武官宣读《武家诸法度》。——译者

⑤ 大尝祭，亦称大尝会、大新尝。旧历 11 月最后一个卯日(如有三个卯日，则为中间的卯日)为新尝祭，庆祝丰收。现在，已规定为公历 11 月 23 日为新尝祭。新天皇登极的第一年亲自举行的新尝祭为大尝祭。——译者

⑥ 淳和院和奖学院，均是教育皇族的机构。——译者

⑦ 尾张相当于今爱知县西半部，尾张德川家的家祖为德川家康的第九子德川义直。纪伊相当于今和歌山县和三重县南部，纪伊德川家的家祖为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宣。——译者

⑧ 大纳言，太政官的次官，相当于今副首相。中纳言，低于大纳言，主管奏呈和宣诏。——译者

⑨ 前田家，古老的名门大族，据说出自平氏和源氏，始祖为菅原道真。这里指加贺、能登、越中三国的外样大名的后裔。——译者

代)①出任正四位上中将，会津松平家(一门)、越前松平家(一门)②出任正四位下中将。从四位以下的少将，由上述以外的众多外样国持大名、国持并大名③(年禄均在10石以上)担任。从五位以下的国司(守)④、八省次官(大辅、少辅)，由年禄10石以下的外样大名和谱代大名担任。至于幕府的官职，正四位的有老中、高家、京都所司代、大坂城代⑤，从五位以下的有大目付、若年寄，以及奉行、番头、组头等⑥。

强者的统治与朝廷的权威虽然结合得如此巩固，但也要防止强者更迭的可能性。担当这项任务的，是朱子学。按照朱子学的说法，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世间，均受“理”的统御。“理”内在于万物，寓于万物而使万物存在。在“理”的作用下产生的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际关系(五 8
伦)，人必须根据这个规律行动。这个“理”同那个“天道”一结合，“天道”就发生了变质。即开始否定和排斥下克上的无秩序行为，认为顺应五伦的秩序的行为才合乎正统。在想要克服下克上的行为从而巩固已经安定的统治的幕藩体制创始人看来，朱子学无疑是最靠得住的学说。但是，朱子学能够阻止强者的更迭吗？

---

① 井伊家，德川的家臣井伊直政的后代，由其子直胜开始为谱代大名。谱代是世世服务于将军的意思。——译者

② 松平家，日本的名门豪族，德川家康即出于此家。会津松平家的主要人物为松平容保，越前松平家的主要人物为松平庆永。一门为同一家族之意，在与将军的血缘关系上，比谱代更近。——译者

③ 国持大名，在江户时代，称领有一国以上的大名为国持大名，称领有的土地不到一国但家格高的大名为国持并大名．——译者

④ 国司是由朝廷或幕府指派的地方官，隶属于一国的国宰，分为四个等级：守、介、掾、目。——译者

⑤ 老中，江户幕府的官名，隶属于将军，总管幕府的事务。高家，江户幕府的官名，隶属于老中，主管接待、礼仪等事务。京都所司代和大坂城代，相当于今市长。——译者

⑥ 大目付，监察大名活动和官吏工作的官员，隶属于老中。若年寄，监督和管理旗本(高级)武士的官吏。奉行、番头和组头均是管理一定事务的官名。可以译为“长”、“主任”之类。——译者

朱子学把天皇与将军解释为君臣关系，认为将军是天皇的代理人，受委主持大政。这不是历史事实。天皇从来没有发委的权力，只是赋予最强大的战国大名以统治的正统性而已。但是，为了解释在遥远的王朝时代朝廷曾经有过的权力现在旁落于幕府手中这个事实，虚拟了一个“大政御委任”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既然将军是受委之后掌握全权的，所以将军的统治是正统的，应当排斥威胁这一统治的人。但是，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即出现幕府不是足以完全控制朝廷的强者，而进行反抗的强者又要拥立朝廷的情况时，就会出现强者的更迭。

在享保年间，荻生徂徕[1]或许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他在《政谈》中说：“天下的诸大名虽为将军阁下的家臣，但他们的官位均由京都的诏书和任命状下达，所以在大名当中，不能说没有心里认为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君主的人。他们之所以服从幕府，主要因为暂时还畏惧幕府的权势，其次是觉得一到末世，就会出现使幕府不得
9 安宁的事态。”(第 457 页)[2]

外样大名　关原会战获胜的德川家康，立即着手论功行赏，改易[3]年禄 438 万石，减封年禄 221.5 万石(两者合计占全国年禄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授予德川家一门和谱代的武将以 110 万石年禄，从而形成年禄总数达 700 万石的德川领国。为了监视外样大名，把一门和谱代转封到关东、东海道、中山道和畿内以外的全国要冲，又把外样大名改封到奥羽、四国、九州等地的僻壤，使亲疏相间，互相牵制，形成阻止他们联合的政治地图。

改易和转封，后来又多次进行，但主要集中于家康、秀忠和家

---

① 荻生徂徕(1666—1782)，江户时期儒者。——译者

② 《政谈》是用江户时期的文体写的，版本很多，且有出入。本书作者用的是尾藤正英的现代日语译本，见本卷末所列参考文献。——译者

③ 改易是江户时代对武士的一种惩罚，比切腹轻，而重于蛰居。受改易惩罚者，免去武士的称号降为平民，并没收其领地、房产和家禄。——译者

光时代。在家康时代有 40 家，秀忠时代有 39 家，家光时代有 40 家，共有 123 家受到改易或转封，其中外样 76 家，一门和谱代 47 家。另外，又新立一些一门和谱代大名。据载，在家康时代有 68 家，秀忠时代有 37 家，家光时代有 39 家，家纲时代有 27 家。改易和转封，与后述的兵农分离，均是控制大名的最重要手段，但也频仍实行赐姓（赐以松平姓）和政略联姻等怀柔政策。

这样，便形成由德川领国和外样国持大名领国组成的复合国家。外样大名原来与德川家处于同等地位，但至少在名义上同德川将军家结成主从关系而独立形成和经营的领国，则受将军家的支配。家康尚未强大到足以用武力征服他们的地步，所以还要借用朝廷的权威使自己的优势地位正统化；而外样大名也没有强大到可以用武力抵抗的程度，所以接受了将军的支配。因此，幕府与外样大名的主从关系具有很强的假象。

关原之战虽使抵抗德川氏的不少大名没落，但仍有很多外样 10
大名残存下来。其中就有在 16 世纪中叶曾领有中国 10 国的毛利氏，他跟随丰臣氏参加了西军，所以战后失去（削封）周防和长门两国，年禄由 113 万石减为 36 万石；岛津氏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是守护大名而统治九州一带，但后来被丰臣秀吉削去其萨摩、大隅和日向诸郡，因在关原之战中参加了西军，结果年禄减为 60.5 万石。幕府的权力，如以后所述，被将军、一门、谱代所垄断，外样大名被排斥出去。战国时期西国诸大名独自积极经营的外交和外贸，先后逐渐集中于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手里，并以宽永年间（1624－1644）的一系列锁国禁令被幕府垄断。宽永《武家诸法度》禁止大名之间私战，并对大名间的联姻作出规定。幕府还对大名规定了军役、普请役、国役、参勤交代等名目繁多的义务[1]。设立国目付、巡

① 普请役，出劳工做土木建筑工程；国役，临时出劳工；参勤交代，大名按期到幕府去执勤。——译者

见使、惣目付[①]以监视大名，大名如严重违反法度，则给以改易和改封的处分。

战国大名与将军的统治妥协而挤进幕藩体制，但威压和怀柔均未能使他们忘却对将军的怀恨。时机一到——幕府的改革使各领国的经济力加强，大名取得可以对抗幕府的军事力量，他们就会想起250年前的旧恨。家康就曾担心有这种可能。元和2(1616)年他75岁时，因吃天麸罗[②]过量而病倒，他对前来探视的大名们说："天下是应轮流掌管的，所以秀忠如果不肖，你们大家谁都可取而代之坐天下"(这是"天道"观)，而且说话的表情好像他真相信是如此，但他又密令亲信："关东大名都是谱代，不必担心，使我挂念的，
11 是西国大名的动向。为了镇护西国，要在我的久能山[③]墓地上树立一座面西的神像。"(北岛正元《江户时代》第24页)

锁国　16世纪下半叶，葡萄牙商船在日中之间进行中转贸易：由日本向中国输出白银，由中国向日本输出生丝和丝织品。丰臣秀吉为控制这种中转贸易，在平定九州后便于天正17(1589)年颁布《伴天连(ベテレン)追放令》[④]，改长崎为直辖城市。天正8(1580)年，长崎曾被大村氏[⑤]施舍给耶稣会作教会领地，成了葡萄牙中转贸易的根据地。

家康也想垄断南蛮贸易。由幕府发给朱印状而被承认为正式

---

① 国目付，在大名年幼受教育时期幕府派在大名领国的监督政务的官员，巡见使为每三年派往各领国的视察官员；惣目付，亦写为总目付，老中下属的监视大名行动的官员。——译者

② 天麸罗，一种油炸菜名，把虾、鱼、蔬菜用面裹起油炸。——译者

③ 久能山，在静冈市东南，山上建有供奉德川家康的东照宫。元和元年，家康的遗骨埋葬于此，次年改埋于日光。——译者

④ 伴天连是葡萄牙语Padre(神甫)的译音，《伴天连追放令》即驱逐神甫令。——译者

⑤ 大村纯忠(1533—1587)，战国大名，肥前藩主。他是最早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使长崎对外开放并向罗马教廷派遣使节。——译者

贸易船的朱印船，开往东南亚进行贸易。乘朱印船出国进行贸易的累计达 7 万人，其中有一万人长期住在南洋群岛，在那里建起日本人街。家康还令直辖领京都、堺、长崎的商人组成生丝购买同业公会，授权他们统一购买葡萄牙船运来的生丝，建立由同业公会代征税的制度。后来，大坂和江户的商人也参加进来，结果形成在确保“公方生丝”优先的条件下按一定比例向五个城市商人分配生丝的制度。

由于家康热心于可以带来巨大利益的南蛮贸易，所以允许基督教在日本传教，但他对基督教的教义持有疑义，时时警惕传教的背后藏有的领土野心。因此，在打倒丰臣氏以前，他就感到有必要打击各派基督教。据传教士的报告，庆长 10(1605)年，日本人信徒已达 70—75 万人，其中也有不少基督教牢人[①]，他们可能同丰臣氏和西国大名勾结起来而形成反幕势力。庆长 18(1613)年，颁布了驱逐幕领传教士的命令，第二年这项命令及于全国。另一方面， 12
又对不进行宗教活动的荷兰人和英国人的贸易大加欢迎，英国的亚当斯和荷兰的约斯丁[②]甚至担任了家康的外交贸易顾问。庆长 14(1609)年，在平户设立荷兰商馆；庆长 18(1613)年，在平户设立英国商馆。后来，这些商馆又在江户、大坂、浦贺、骏府、京都、堺、长崎等地开设了支店或代理店。

丰臣氏灭亡、德川家康死后，禁教和迫害更加残酷起来，从庆长 19(1614)年到宽永 12(1635)年间，据称约有 28 万日本人信徒被判刑。在进行镇压的同时还加强了贸易限制，元和 2(1616)年连与禁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英、荷两国商船也禁止到长崎和平户以外的港口停泊，内地通商杜绝，七年之后英国人由日本撤走。对朱印

---

① 牢人，指无业游民，在江户时代，有时专指无职的武士。——译者

② 亚当斯的日本名叫三浦按针，约斯丁的日本名叫耶扬。——译者

船贸易和生丝按比例统一购买也加以限制，宽永12(1635)年以死刑禁止所有的日本船和日本人出航海外和不准居住外国的日本人回国，第二年在长崎将葡萄牙人移到出岛上隔离起来，禁止他们除贸易以外的任何往来。

宽永14(1637)年的岛原之乱[①]，是反抗藩主的横征暴敛的农民与基督教牢人的暴动，终于将暴动镇压下去的幕府重新感到基督教的威胁。于是，宽永17(1640)年在幕领和各藩彻底实施宗门改[②]，宽永16年全面禁止葡萄牙船来日，宽永18年也将荷兰人集中出岛。至此完成了锁国体制。世界与日本隔离开来，只有通过长崎发生联系了。在幕府垄断的基础上，受到严格限制的日荷间的和日中间的国际贸易和情报交流，只是在这里进行了。

13 二　幕藩体制之建立

幕府官僚制　初期的幕府统治组织，是充实而加强了的战国大名时代的军事组织的应急措施。特别是家康亲信的武将都是开幕后新提升的家臣，而谱代家臣均被斥出中枢。天海、崇传、林罗山[③]这样的僧侣和学者，被提升为高官的豪商，三浦按针(亚当斯)之流这样的外国顾问，出身不明的暴发户等，构成了幕府的五彩斑斓的班底。但在家康退隐骏府于幕后指导政治期间，在驻于江户的

---

① 从宽永14年11月到第二年2月，益田时贞(俗称天草四郎)在肥前国高来郡原岛发起的暴动，参加者全被镇压，无一幸免。亦称"天草一揆"。——译者

② 宗门改是江户时代为禁止和杜绝基督教的传播而设立的制度。为此设立宗门改役(官员名称)，调查和识别基督教信徒，强令信徒改奉佛教，每年定期造册向藩主报告。——译者

③ 天海(1536－1643)，号南光坊，敕谥慈眼大师，天台宗和尚，德川三代政治顾问；崇传(1569－1633)，字以心，敕号圆照本光国师，临清宗和尚，家康外交、政治和立法方面的谋士；林罗山(1583－1657)，名忠，又名信胜，字子信，朱子学家，家康的顾问，后又仕于秀忠、家光和家纲。——译者

第二代将军秀忠的治下，开始产生谱代家臣的官僚制，于庆长末年设置年寄（后来的老中）、老中（后来的若年寄）、江户町奉行等官职，成立以合议原则审判重大案件的评定所。

元和元（1615）年夏丰臣氏灭亡后，家康随即根据《一国一城令》命令大名除本城外将一切支城拆除，并制定《武家诸法度》13条。参勤交代制始于宽永12（1635）年，当时只限于外样，宽永19年开始及于德川一门和谱代。元和、宽永和庆安年间颁布的军役令，又使军役体系完备起来。幕府的城“普请役”和治理河川道路的“助役”亦作为军役的一环广泛实施，并被多次用来搜刮大名的财力。

在第三代将军家光时期（1623－1651），建立起由德川一门、谱 14
代和旗本[①]垄断的大公义权力。宽永12（1635）年，基本上确立了老中、若年寄、大目付、目付、三奉行（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等幕阁职制和职务范围。老中4名，总管政务，以笔头为首席。若年寄4名，统辖老中以外的所有官员，而主要是统辖旗本。大目付4—5名，在老中的指挥下监察各大名。目付16名，在若年寄的指挥下监察旗本。寺社奉行4名，管理寺社、僧侣和神官，执掌关八州[②]以外的诉讼。江户町奉行2名，掌管江户的市政、警察和司法。勘定奉行4名，监管幕府的直辖领地（天领），执掌财政和关八州的诉讼。在幕府直辖领地设郡代4名、代官[③]40—50名。又，京都所司代，主管京城的警卫和有关朝廷的政务，监督西国的各大名。在大坂、骏府和二条城各设城代，在长崎、山田、日光、奈良、佐渡等幕

① 旗本，将军或大名的家臣，为武士的一个等级。在江户时代，可在幕府中侍从将军，年禄在1万石以上。——译者

② 关东八国的总称，亦称关东八州，即武藏、相模、上野、下野、上总、下总、安房、常陆的总称。——译者

③ 郡代，勘定奉行的部下；代官，郡代的部下，分管年贡、司法、行政等事务。——译者

府直辖要冲各设奉行。老中从年禄5万石以上的一门和谱代大名当中任用(10万石以上者称大老),若年寄以下,从旗本当中任命。外样大名全被排斥于统治体系之外。

在第四代将军家纲时期(1651－1680),大名之改易和转封,德川一门和谱代之提升为大名,均有所减少。宽文4(1664)年准许各大名颁发朱印状,表明幕藩体制已基本确立。大名的等级制度也确定下来。第一,根据与将军的亲疏,依次分三家[1]、一门、谱代和外样;第二,根据领国和居城,依次分国主(国持)、准国主、城主、城主格、无城;第三,根据在江户城中的参勤居所,依次分为大廊下、大广间、溜间、帝鑑间、雁间、柳间、菊间;第四,根据官位,依次分为侍从以上、四品(四位)、诸大夫(五位);第五,根据领地和年禄,依次分为10万石以上、10万石以下。由此形成了复杂的身分等级序列。

随着幕政机构的日臻完善,遂要求官僚具备关于行政规章和惯例的知识,具有理财和使用算盘的能力。自元和偃武[2]以来,除岛原之乱,没有发生过激烈的武装斗争,进入不凭武勇而全靠修文和算盘的时代。同时,家格与官职分离(合理化)也成为必要。各藩出现代代担任家老[3]的家庭,产生官职家产化的趋势;但在幕府,罢免土豪化代官、新任或调转代官亦为常规,建立起完备的晋升制。上司与部下的关系,开始由身分的主从关系变为职务关系。

亲信政治　在第四代将军家纲时期,虽然幕政交由大老、老中、若年寄、三奉行等考绩,而将军的人事支配权也只在这方面作出让步。但将军的权力是强大的,只要他想回复人事支配权(当然

---

① 三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这里,是指德川的三家:尾州、纪州、水户三家。尾州(尾张)的德川家始于家康的第九子义直,纪州(纪伊)的德川家始于家康的第十子赖宣,水户的德川家始于家康的第十一子赖房。——译者

② 指德川家康经大坂夏之阵消灭丰臣氏。——译者

③ 家老,在江户时代,各藩置数名家老,协助藩主施政。——译者

要看能力和情况)，那是容易独自行使专制的权力和提拔及重用人材的。因此，将军的人事支配权，就成为促进和实现官职与家格分离以及幕政机制改革的机遇条件和手段。但是，这与幕阁内部的权力斗争是不可分的，所以运用这项权力并不简单。一方面是将军恣意提拔和任用没有家格的亲信，而亲信为了保持权力则竞相争取君宠和迎合将军；另一方面是门阀谱代派攻击将军亲信派搅乱幕政，伺机挽回权力。这样的权力斗争，每当老将军逝世、新将军上任时便表面化和激烈化。特别是当将军没有嗣子时，选嗣(因为能够选)往往发展为萧墙骚乱。不仅幕府的将军选嗣如此，各藩的藩主选嗣亦如此。

第四代将军家纲没有亲生子，其弟纲吉由馆林藩主入主幕府
继任将军职后，立即罢免大老酒井忠清，给予门阀势力以一击，宠 16
信老中(后升为大老)堀田正俊，着手实行弘扬儒学理想的改革。以“赏罚严明”的名义进行的改易减封，在其执政的 29 年间达 46 件 161 万石(在家纲执政的 29 年间为 26 件 80 万石)，其中外样 17 件，一门和谱代 29 件。旗本的改易减封达 100 余件，闭门、逼塞、役仪罢免[①]的处分件数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又新立 41 家一门和谱代大名(家纲时期为 27 家)，而其中按新规定提拔和晋升的，比从一门和谱代分封的为多。还肃清不法代官，总数 40 至 50 人的代官被处分的高达 34 人，其半数为土豪和豪商式世袭代官。总的说来，纲吉的改革在于打倒门阀政治，建立将军专制，实行亲信政治和强化官僚统治。

第五代将军纲吉于天和元(1682)年设侧用人[②]职，重用馆林

---

① 闭门，惩罚犯错误的武士、僧侣、神官等闭门思过 50—100 天；逼塞，比闭门轻，分 30 天和 50 天两种；役仪罢免，即免职。——译者

② 侧用人，将军的侧用人负责向老中传达将军的命令；大名和旗本的侧用人主管家主的庶务和会计工作。——译者

时代的近习[1]牧野成贞等人。侧用人是将军的亲信，参与政务的策划，负责向老中传达将军的命令。贞享元(1648)年堀田正俊在江户城中被人刺死后，牧野成贞作为将军的宠臣便主管政务，权势日增，升为大名，晋为老中格[2]。元禄元(1688)年，又一个近习柳泽吉保成为侧用人，后升为大名，晋为大老格。他们为了保持将军对他们的宠爱，便迎合将军的恣意妄为并使其发展。因此，将军专制同侧用人结合，便产生了可怕的虐政。纲吉不但耽于儒学，而且以同样的热情溺于迷信。他从贞享2年以后接连颁发不杀生令，对杀伤从狗到鸟者处以死刑或流放于荒岛。结果无人养狗，野狗成群。为了收容野狗，又在中野和大久保设立狗房。而为了喂养这些狗，便向幕领农民和江户町人[3]课税。

17 元禄期间(1688—1703)幕府财政急剧恶化。除纲吉的儒学和迷信造成的无止境的糜费及其生母桂昌院的无端浪费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支出也大增。匮乏的幕府只好削减行政费，将负担转嫁给旗本和农民，增加贡赋，新设杂税，但仍应付不了日益增加的开支。于是接受金座银座[4]商人的建议，从元禄8(1695)年开始大量铸造劣币。到宝永年间(1704—1710)，幕府由此得到的收益达500万两，但物价高涨，经济陷入混乱，武士和庶民均大遭其殃。加上奥羽地方两年大歉收、江户大火、南关东大地震、富士山喷火等天灾地祸接连发生，至宝永6(1709)年纲吉逝世时，强烈的社会动荡已遍及全国。但他临终仍然遗言：一定要把不杀生令推行到100年以后！

---

① 近习，将军外出时的警卫，在纲吉时期亦负责府内的警卫。——译者

② 老中格，编制外的老中，以老中资格处理政务，亦称老中并。——译者

③ 町人，指工商业者，有时专指商人。在江户时代，狭义的町人，指在城市有住房的城里人。——译者

④ 金座，江户时代的造币机构，专造金币；银座，江户时代的官准私营造币机构，只造银币。——译者

纲吉没有得到不杀生的善报，而且无亲生儿子，作为嗣子由甲府藩主入主幕府的德川家宣继任将军。家宣令柳泽吉保隐退，回复由老中、若年寄直接向将军进谏的办法，但又将甲府时代的近习、能乐[1]演员出身的间部诠房作为侧用人，升为大名，晋为老中格；任牢人儒者之子、从甲府时代就被宠信的新井白石为侍讲，从而继承了亲信政治。根据白石的建议，废除不杀生令，赦免因违令而治罪者 8 831 人。臭名远扬的劣币铸造负责人勘定奉行荻原秀重被免职，正德 4(1714)年决定复古改发行正德金银[2]。另外，还实行了其他一些政策，但在正德 2 年家宣死去其子家继 4 岁即将军职后，一些能乐演员和牢人出身的一门和谱代受到将军的信任。如果说这时的幕府也有“仁政”，那就是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如果说它也有“礼乐”，那就是它对改变惯例的诠房和白石开始公开表示反感。
家继在位三年夭折，纪州藩主德川吉宗在人们期待他再展其藩政 18
改革的本领之下，于享保元(1716)年就任第八代将军，从此开始享保改革。关于享保改革，将在下节叙述。

武家与百姓　幕藩体制的最重要基础是**兵农分离**。兵农分离在信长时代即已开始。织田军团战胜其他战国大名军团的秘密之一，是作为军团的核心的畿内近国[3]最先进地区的土豪层比后进地区的土豪层依靠自耕的程度低，他们是向小自耕农收租的寄生地主，所以能够组成专业军团离开根据地从事长期的征服战争(加上信长的军事指挥能力和神机妙算，堺等地的富庶，火枪、大炮等新式武器的使用)。信长所以禁止他的身为家臣的领主与领民形成主从关系，是因为这种关系妨碍他的统治权力。另外，他之所以特

① 能乐，一种载歌载舞的歌剧，演员多带面具。——译者

② 正德金银，有“正德一分金”金币、“正德小判”金币、“正德豆板银”银币。——译者

③ 畿内，亦称五畿，包括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 5 国；近国，指畿内附近的各国。——译者

别鼓励他与家臣之间的主从结合，是因为这能比以职务关系结合起来的军团发挥更为强大的军事力。

丰臣秀吉把兵农分离体制扩大到全国。结果，领主失去祖传的领地，由秀吉授以恩地，而作为对受领恩地承担的义务，他们变成负担军役的给人①。按天正 10(1582)年开始实施的所谓太阁检地②为知行地③规定的年禄标准，每 160 石出军役 5 人。禁止领主对领民有个人从属关系和对领地有直接支配权，使领主与农村、农民和农业分离，只从知行地征收年贡。另一方面，又禁止农民迁往邻国他乡，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

19 天正 11－14(1583－1586)年修筑的规模巨大的大坂城，就是把战国时期的在地领主、土豪等土著武士团的无数小城馆摧毁而使全国统一的意志表现。到天正 18 年，中国的毛利氏，四国的长曾我部氏，北陆的上杉氏，东海的德川氏，九州的岛津氏，关东的后北条氏，奥州的伊达氏，先后臣服于秀吉。后进地区土著武士团对兵农分离的反抗也被粉碎，于是在秀吉领导下组成为单一军团的全国领主阶级，在不断完善兵农分离体制之后，便将矛头指向大陆。七年多的侵略战争，在庆长 3(1598)年随秀吉死去而停止。

德川幕府将兵农分离作为平时的统治体制推行于全国，并获得成功。家康本人就是在天正 18(1590)年被秀吉由东海改封于关东的。17 世纪前半期的大量诸侯改封，只是实行了兵农分离才得以实现的，而改封又促进了兵农分离。在此期间，幕府统治的加强

---

① 给人，依靠禄米维持生活的一般武士。——译者

② 太阁检地，丰臣秀吉下令进行的全国土地丈量，从此定下统一的计量尺度(土地面积和容量的计量标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施政，为以农业为基础的近世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译者

③ 知行地，亦称知行所。知行是办公和执勤的意思，而办公人或执勤人所管辖的地盘就是知行地。知行地没有领地的性质。——译者

使旗本对其知行所的统治变得有名无实，而到宽永末年(16世纪40年代)还加速将旗本集中移居于江户城下町，甚至禁止旗本自由赴其知行所。不给知行所而只给禄米的按期领切米①的旗本也在增加。在各大名处亦是如此，他们的家臣被集中居住于大名所在城的城下町，领切米的家臣增加。据记载，元禄3(1690)年时，仍在实行知行所制的藩只占总数的17%。

于是，随着武士与农村分离，至18世纪初期，在畿内近国的农村，出现了以进行自立的小农经营、拥有作为年贡的征收对象的高请地的高持百姓(本百姓)②为主体的村，随后在后进地区也相继出现了这样的村。村的最高机关村会议是村民(户主)的全体集会，由它执掌村法的制定、村官员的选用、村财政的管理等全部村政。20
村会议下设一名名主(庄屋)和辅佐名主的数名组头，是管理由村财政支付俸禄用米的官员，而百姓代则是对名主和组头进行监察的机关。年贡和徭役以村为单位计征，由名主和组头分摊给各户并负责计征。此外，由于领主和家臣大部分住在江户或城下町，知行所的管理极其松弛，所以知行所的经营不得不依靠村方，以致在18世纪时土著的豪门大户成为代官等，甚至出任知行所的在职管理官员。

但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灌溉和垦殖日益发展，肥料和农具等农业技术也在进步，农村呈现出显著繁荣的景象。耕地面积由庆长年间(1596—1614)的164万町步③增至享保年间(1716—1735)的297万町步。米产量文禄元(1592)年为1 846万石，元禄年间(1688—1703年)增加到3 040万石。又据史料记载，元禄年间的

① 切米，是领主每年分三季给其家臣的扶持米：春季给全年量的1/4，夏季再给1/4，其余1/2在冬季补齐。所谓扶持米，是供生活消费的禄米。——译者

② 请高地，按面积计征年贡和徭役的土地；高持百姓，拥有请高地的农户；本百姓，基干农户。——译者

③ 町步，面积单位，一町步约等于99.2公亩，现在一般说町。——译者

全国年平均产量为 2 576 万石，其中幕府直辖领地约为 400 万石(15.6%)，旗本领为 275 万石(10.7%)，大名领 243 家为 1 854 万石(72%)，天皇、公家、寺社领合计为 40 万石(1.7%)。

年贡当然以贡米为主。除贡米外，尚有各式各样的附加米。有时也用其他农产品代替或以现金交纳。还有对农民手工业产品以外的小秋收获、工商业、渔业课收的运上、冥加[1]等杂税，以及五街道驿站的助乡役[2]。水田以外土地上的产品，在 17 世纪前半期，只有漆、纸、盐等少数特产品。这些产品也要作为准贡品由领主征收，所以农民用这些产品换取现金的机会不多。但到 17 世纪后半期，
21 随着米的增产，这些产品也日趋多样化和商品化，棉、菸、油料作物、蓝靛、席草、蜡、纸等和它们的加工品，也开始用于满足城下町和其他城市的需要，特别是在畿内近国，商品化农业迅速发展。幕府和各藩也放宽以前对这些产品生产所加的限制，奖励商品作物的栽培，准许特产品运到中央市场去出售。

城市与町人　秀吉在修筑大坂城的同时，就着手建设城下町以招徕商人和手艺人，对京都、堺、奈良等地的行会解禁，并赋予军事上政治上必要的产业的手艺人和商人以特权，但加以控制。而且任命豪商为在各地设立的直辖领的代官，从而把豪商拉进他的统治系统之内。还废除公家、寺社为征收通行税而在畿内近国设立的关卡以及领主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设立的关卡，并整顿驿站和增设驿马。在出兵朝鲜时于大坂和名古屋之间配置驿马，使连结畿内与九州的濑户内水运统一起来。总之，全国统一和向大陆侵略，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

---

① 运上，原来指运费，后来变为按一定税率计征的杂税；冥加是没有固定税率的杂税。——译者

② 五街道，指江户通向四方的五条大路：东海道、中山道、甲州街道、日光街道和奥州街道。助乡役，指无偿出人马协助驿站工作。——译者

全国市场形成于17世纪后半期。连结大坂和江户的南海航路早在元和5(1619)年就已开通，而宽文12(1672)年开辟的西绕航路，则可顺日本海沿岸下西南，经下关进濑户内到大坂。于是，大坂除原来与濑户内、四国和九州的交通外，又与北陆和奥羽地方接连起来，将各藩米仓的藏米和特产品集中于大坂。在江户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宽文11年开辟了东绕航路。幕府还开发金银铜矿而试图统一币制，遂于宽永13(1636)年铸造了宽永通宝。宽文8(1668)年着手统一衡器，次年又开始统一升斗。

全国市场以大坂为中心辐射各领国市场而形成。领国的藏米
一部分作为家臣的禄米付出，其余运往大坂的米批发商行卖成现 22
金，供藩政费、军事费、参勤交代费、江户驻在费支出。纳屋米[①]和特产品也运往大坂。在近畿近国，商品作物及其加工品的生产大为发展；在大坂周围，地方城市日益繁荣。大坂的人口在元禄16(1703)年达到35万余人，以中之岛的新兴批发行街区为中心的市面热闹非凡。(京都的人口30万人以上，堺的人口5万人以上)正德4(1714)年运到大坂的各类产品达119种，值银29万贯[②]。由大坂外运的商品91种。最主要的大宗商品米，每年有400万俵[③]在大坂卖成现金。大坂成了“天下的厨房”，大坂商人成了“天下的町人”。鸿池、住友、三井都是当时专门经营商品销售的巨商，并兼营钱庄。许多商人兼营批发、经纪和零售，到17世纪后半期，三者的机能开始明确分开，形成生产者→经纪人→批发业→经纪人→小卖业→消费者这样的流通渠道。这时，专门经营特定商品的专业批发行，开始比只收售领国的各种产品的地方批发行占居优势。经纪

---

① 纳屋米，指商人在地方采购的米，以及领主、旗本等未交地方米仓的米。——译者

② 每贯等于1文铜钱1 000枚，在江户时代等于960枚。——译者

③ 俵，装米的草袋，盛米的重量不固定，一般是100日斤，约合120市斤。——译者

人日益增加，到正德年间(1711—1716)已达到数十种，总户数近一万家。他们结伙组成同业公会，幕府为了便于行政管理，使商品交易畅通，也承认了他们的结社。

江户是大坂商人的最大顾客。江户的町方人口，宽文元(1661)年为30万人，享保6(1721)年达到50万人。武家人口，即旗本和旗本家臣以及他们的家属和佣人，在20至30万人之间。大名住区人口为40至50万人。还有僧侣、神官、贱民4—5万人。总人口远远超过100万人。近江、伊势、京都、大坂的商人竞相到江户开设分支号，将畿内、西国甚至东北地方的特产品运到江户销售。但是，各藩为销售每年的贡米和特产品而设立的货栈数，大坂方面
23 遥遥领先。保管货栈货款的御用商人向各藩大名放出的贷款，其规模之大，是向旗本及其佣人放高利贷的小商人无法比拟的。元禄的文化中心是大坂。

在各藩的城下町，除有武家街外，还修建有供生产武器和生活用品的各种手艺人以及谷物批发商人往来的町人街。城下町的人口一般与大名的年禄成正比，但人口5万以上的城下町，只见于金泽、名古屋、鹿儿岛等地。大的城下町也不过有一两万人口。(参阅水林彪《封建制的改组与日本式社会的形成》第4—11章)

24 三　18世纪：变动与改革

人在旅途　荻生徂徕秘密献给德川吉宗的《政谈》(享保12[1727]年写成)，对元禄时期的世态作过精细的描写。据他说，当时社会的总动向犹如“人在旅途”(“旅宿途中”)。这不外是说社会秩序日益动摇，人口流动日益加速，社会日益失范(anomie)。江户由各藩不断流入农民，人口急剧膨胀。如前所述町方人口在宽文元(1661)年为30万人，而到享保6(1721)年已超过50万人。临时工

和沿街叫卖小贩等贫民由元禄时期开始激增，进入18世纪武家的半年或一年定期佣工也增加了。占町方人口半数以上的依靠劳动餬口的贫民，虽然失业找不到工作，也不想离开江户。留在江户，不管怎样，总能活下去，何况也无家可归。徂徕这样写道：

……可以自由迁居，自由去他地，也可以自由由他地迁来居住，所以在日本国内人们可以任意流荡，混杂相处，到处暂住，谁也没有在一地长期居住下去的打算。因此，既不管别人的事，又不叫别人管自己的事。既然不知道别人的来历，那就不知道下去好了。既然不知道今后打算怎样生活，那就不管是谁，即便是名君英主，也与自己没有关系，所以人人随随便便，为所欲为（第379页）。

乞丐也增多了，但乞丐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平民完全不知。25
“与一般平民隔开而居住在另一种世界的人多了起来。这就像来了一大帮外国人，被安置在江户的城下町，所以甚为危险。这样下来，时间越久，乞丐的人数也会越多。到了乱世，实难预料乞丐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第392页）过些时候，也许会发生抢米风潮。

现今江户的城下町聚集数百（原文如此）万人，各地都运米到江户来供食用。这在眼前看来似乎是繁荣昌盛，可喜可庆，但如奥州方面出事，仙台的米就进不来了。再如西国方面出事，上方①的米也会进不来了。这样，江户的人民就会因饥饿而暴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平息，都甚困难。特别是迫于饥饿，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第383页）

为了改变这种事态，首先必须“人附于地”。其办法有二：建立“户籍”，出门开“路条”（旅行证明书）。“这样，世上就不会有身分不

---

① 在江户时代，指三河（在爱知县东部）以西以及中国、四国和九州。——译者

明的人，也可以管束人在世上的行动，所以这是使世上的万民接受阁下的管理，按阁下之所想行动的良方。不采取这个办法，日本国内的人就将七零八散，人人自行其事，从而不接受阁下的管理。”(第376－377页)“正确施政虽有各种问题，但撮其要点，根本问题在
26 于：要使农村无一人不勤于农业，城市无一人不勤于工商业。如无一人不勤于家业，则人人均将回复其诚实，而一切坏事便将由此消失。”(第379－380页)而今城市里的家境中落户和浪荡公子等，都把房屋或土地租出去由管家管理，自己游手好闲，生活奢侈，出入妓馆，邂逅烟花；在农村，自己不经营农业、把土地租给佃户、学习江户的浪荡公子的人，也显著多了起来。这些均须严禁。

其次，必须“上下有别”，即必须“按身分定出限度”。

……一切物品，产量均有限度，且其中优质者少，粗劣者多。因此，定出从衣着到食住，让贵人使用好的，贱人使用坏的；而如定出这种制度，则因贵人本来就少，贱人本来众多，所以让人数少的人使用产量少的东西，让人数多的人使用产量多的东西，完全合理，并无不可，且能使日本国内生产的物品用于日本国内的人而满足需要。

不建立这种制度，则由于人数多的贱人使用数量少的优质物品，而使必要的物品不足，物价上涨。而且因为要让那些人数多的贱人任意获得优质物品，优质物品也将逐渐降低质量。加之没有上述的上下之别，则必将上下混乱，互相争斗，从而发生种种坏事。如事先定出制度并责令遵守，则人人都将知道按自己的身分定出的限度，逐渐消灭过分的奢侈，使世间没有浪费。(第422－423页)

27 武家也处于“旅宿途中”。各大名每隔一年要去江户生活一段时期，以致认为江户是摆阔的地方，将领地的年贡米全部换成现金，在江户把它们花光。他们的家臣也是一样，将知行米换成现金，

从衣食住到一根筷子都用现金购买。即使不如此奢华，但物价已经够高，因而开销大增。办事是便利了，但年贡和俸禄的收入，全进了商人的腰包。岂但如此，最近谱代也没有常年佣人了，而武家用钱雇临时仆人亦极为罕见。跟随主人从军役的仆人，连一个也没有了。即使有这样的仆人跟主人去了，到达碓冰峠下或箱根峠[1]也会开小差逃掉。怎么办呢？让武士全都回知行所居住即可。武士也必须“附于地”。

如武士居住于知行所，则可砍伐当地的树木建造住宅，食用军贡米，用当地生产的大豆制造豆酱，自家织布做衣，从而衣食住全都不必花钱。用米支付佣人的工钱。如准许仆人佩带武士用刀，着用武士的服装，则富裕的百姓都将争当仆人。一俟遣返城市里的人回乡，不许回乡的佣人迁居他处，则他们全将成为当地领主的仆人、谱代的佣人。达到这种状态后，就不必有货币了，因而也不会卖米去换钱了。……因为现在是处于“旅宿途中”，没有钱不行；要把米卖成钱，要从商人处买东西度日，所以商人为“主”，而武家为“客”了。因此，物价不能如武家之所想涨落。而如让武家都居住于知行所，则不必卖米了，而商人却想得到米，于是武家为“主”，而商人为“客”了。这样，物价就会如武家之所 28
想涨落，而且这全是出自古代圣人的远大精深智慧的万古不易的法则。

……商人均以追求高利处世，所以他们现在可以一夜之间发了大财，一日之间又可变成穷光蛋，但从根本说来，他们的生活基础是不稳定的。至于武家和百姓，他们除田地以外别无其他生活手段，是生活安定的人，所以唯有使武家和百姓生活方

---

① 碓冰峠，群马县与长野县交界上的隘口，古中山道上的第一险要。箱根峠，神奈川县与静冈县交界上的隘口，古东海道上的第一险要。——译者

> 便，才是政治的根本。商人是过着不安定的生活的，他们的善恶已如上述。因此，完全不必关心商人的破产。应当知道，这也是为政之道的基本经验。(第454—455页)

幕府的经济也进入“旅宿的结构”。这是因为什么东西都得用钱购买，用什么就买什么。不对此进行改革，幕府的财政就好转不了。至于说如何改革，那就是停止“购买”活动。“大名离开本国到江户参勤是旅宿生活，所以购买东西也是当然的。但是，既已统治天下，则日本国土全应为将军大人的领地。任何东西，只要需要，直接征用即可，何必购买。”年贡和夫役是领主的收入，而除此以外的产品，征收即可。比如，可从越前藩征收公文用纸，从会津藩征收蜡烛和漆，从南部藩或相马藩征收马匹，从上州诸藩或加贺藩征收绢，从仙台藩或长州藩征收纸张。山林和矿山亦应为幕领。将木曾的山林交给尾张藩，将熊野的山林交给纪州藩之类的办法，并非古法。铫子或小田原的海岸，不是应交给大名的土地。蔬菜应由江户附近的百姓以代替年贡交纳。各种物品不必购买，以付给生活用米和出料加工方式由工匠们制作即可。脚夫也不用钱雇。担任脚夫
29 应是旗本的仆人和江户的町人的义务。

> 既然万事已如上所述，所以如果好好安排，使购买物品的现象消失，则既合统治天下之古法，又会使幕府财政窘迫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官吏们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算盘不离手，即使高高在上，也能很好解决问题，出现升平世界。以前算盘等物并非武士亲手摆弄之物，但自流行所谓俭约以来，却出现了以利益或算帐为第一的世界。(第430页)

为了根绝“旅宿途中”的恶弊，徂徕进言吉宗建立“礼法制度”。古代圣人无不定礼法以节制社会。“礼法制度”是“圣人的良术”，它是“在回顾过去的历史、预测未来的基础上，而主要是根据欲使世间永远富裕的君主的意图制定出来的”。但由于家康公在大乱之后

迅即死去，没有定出制度，“而使现在成为任何事情都无制度，上下各行其事的世界”。

> ……在今日之世中，似乎各种人都有各自使用的规范，所以不明事理的人也许认为存在着制度，但今日世间存在的所谓规范，既非古传的礼法，又非幕府明确规定的规范。其中虽然有些时常是幕府规定的，但都是作为世间的风俗而自然形成的东西，一旦世间的风俗有变，这些规范也会随之变化，一切又听任老百姓自行其是。其中一些看来还可以成为礼法的规矩，幕府也任其自然发展，只是不时地补令承认其采用的办法，所以不是真正的礼法制度。（第420－421页）

《政谈》的末尾这样写道： 30

> 所谓政治之道，决非是使各项措施自行其是，而主要的是通观世间的变化和社会的全局。其致命之处有二：一是世间处于旅宿途中，二是万事没有礼法制度。因此，应当建立户籍，使万民永久住于其居住地，在町人、百姓、武家之间定出礼法上的差别，建立大名之家的礼法制度，不采取购买物品的办法。这样，就大致可以使世间纯真和富裕。其他事情将会随之自行变好。只让将军大人俭约，使幕府的财政状况变好，而万民依然穷困，也不能算好。上下全都丰富，世间长治久安，才是人之所愿。

徂徕的政治经济学的骨架[①]是十分清楚的。处于“旅宿途中”的武家和百姓，被货币和商人所压迫。为推翻这种压迫，将军吉宗应遵“圣人之道”建立“礼法制度”，使武家和百姓“附于土地”。吉宗是不是受到了徂徕献策的鼓舞，不得而知。但是，享保改革（还有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只不过回到“权现样”[②]的复古主义，对变动加

---

① 可以放在拙著《乌托邦与权力》序论所述的政治思想的框架内加以考察。

② “权现样”，是对德川家康的尊称。意思是德川家康为佛的化身，让他来拯救日本的众生。——译者

以规制而已。而现实的发展，正如徂徕最精确记述的那样，“旅宿途中”的现状不断扩大，货币和商人照旧跋扈。

享保改革　第八代将军吉宗(1716－45)，以“诸事按权现样的规定办理”为准则着手实施幕藩体制的复兴。他罢免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优遇门阀谱代，并设法以财政为中心启用人材，定出无
31 视家格、家禄、官职间的差别的“足高制”[①]，即将家禄作为职务工资以职位禄和附加禄形式支付。例如，勘定奉行是职位禄 3 000 石、附加禄 700 俵之职，现由家禄 2 000 石的人担任，则应另向他支付不足的差额：职位禄 1 000 石和附加禄 700 俵。而且，执行职务所需的办公地点和用具，均用公款筹办。同时，还对土豪式代官进行大规模整顿，使代官所机构日臻完善。于是，建立起以门阀谱代为支柱、以幕府官僚为股肱的将军专制。但是，幕府的财政能够重建起来吗？

缓解财政拮据的办法，主要是削减开支和增加收入；而吉宗只是奖励节俭，禁止兴办新事业，抑制开支。对家臣们进行了冗员整顿、减禄和欠禄待补，命各大名每一万石年禄献米 100 石。为了抑制消费和统制物价，令商人成立约 100 种行业的同业公会。对农民，除保护本百姓保有土地，奖励町人承包开发新田外，又提高贡租率，施行“有毛检见制”和“定免制”[②]，奖励种植棉花、油料等商品作物。

享保年间的最大问题是物价，即米价下跌而一般商品价格却居高不下的所谓“米价廉而诸货贵”的问题。虽令 22 种日常生活用品的批发商、经纪商、小卖商建立了同业公会，以期调节物价，但并

① 足高制：年禄低的人就任高级职位时，在职期间按高级职位的标准发放禄米。——译者

② 有毛检见制：调查稻谷的长势以定当年的产量，秋后按这个估定的产量征收贡米；定免制：根据以往 5－10 年的平均年产量定出贡租率，在一定的年限内采用，在此期限内如遇歉收，亦不减征免征。遇特大天灾，可按“定免制”减免。——译者

未能抑制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另一方面，米价从享保 8(1723)年前后开始下跌，至享保 16 年跌到将近最高价格的 1/4。跌价的直接原因是大坂市场的米供过于求。武家贫困，自不待言；幕府虽然增征年贡成功，但年贡收入金额却减少了。“米价廉而诸货贵”，动摇了以“纳米年贡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 32

但是，享保 17(1732)年濑户内沿岸突发蝗灾，二百几十万人忍饥挨饿，一万几千人饿死，大坂中断向江户运米，江户的米价猛涨，在各町名主向町奉行所请愿降低米价期间，发生了规模虽小但为首次的打砸暴动。1 700—2 000 名群众袭击了日本桥的米谷御用商人，捣毁了他们的家产器具，撕毁扔掉了他们的帐簿。但第二年丰收，其下一年米价又暴跌了。幕府虽然设法加强管理大坂堂岛米市场的经纪人，并于享保 20 年欲以官定价格强行统制米价，但遭到投机性很强的米商的抵制而未能实现。米价对策失灵，财政困难更为加深。

元文元(1736)年，幕府改变通货政策。在这以前，幕府实行的是用新井白石开始改铸的良质的少量的正德金银统一通货以期收缩通货的方针，而现在改用成色下降二分之一的大量的文字金银①，同时铸造了大量的铜钱和铁钱。主要目的是获取改铸造成的差价和使米价上涨。但到延享元(1744)年，米价又暴跌了。同天气一样，米价成了难以控制的自然现象。

田沼时代　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农村到处出现新的变动。在畿内近国，木棉、油料作物、酿酒等商品作物栽培和农村加工业显著发达起来。除让本百姓自己从事栽培和加工外，还鼓励周围的农民参加，将产品运到市上交易，向农村商人和高利贷发展，并对抗大坂及其周围乡镇的拥有特权的同业公会，而要求自由交易。

---

① 文字金银，指铸币背面铸有年号的金银硬币。比如，元文元年发行的背面铸有“文”字的文元小判即所谓的“文金”，便是其中的一种。——译者

33 在比较后进的地区出现了典地地主。即村役人[1]替交不起贡租的农民代纳贡租，向需要钱谷的农民放贷，但代纳和放贷要以农民的土地作抵押，押期一过土地便为债主所有，债主将这种土地租给佃农而成为典地地主。这样，进入18世纪时，在本百姓的村里，本百姓分化为典地地主与佃农，而贫困的水吞百姓[2]则成为打短工的雇工而变成流民。另一方面，在18世纪中叶，反对增征年贡和要求减免年贡的百姓起义也屡屡发生。以村役人为代表的越诉减少，而农民聚众提出的强诉增加[3]，并伴之以暴力和打砸行动。到18世纪后半期，为追查村役人在年贡米和徭役代金方面的不法行为而发生的农村骚动增加，因而换掉了一批村役人。但这还不是农村秩序的崩溃。尚无人要求返还抵押出去的土地和解除租佃关系。

在18世纪后半期，围绕江户的经济圈发展起来，江户附近的蔬菜栽培和杂粮生产、北关东的丝纺业、东关东的棉纺业日益兴盛，但这个繁荣的核心力量应该说是典地地主。而后进地区的各藩，为了摆脱藩财政的窘境，则奖励特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在藩统制之下将产品运往大坂市场，同时各藩之间也进行相互交易。因此，随着大坂市场的米交易量的相对减少，大坂市场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也开始下降。

田沼意次之成为第十代将军家治（1760－1787）的侧用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他从第九代将军家重的侍童升为年禄1万石的大名，到明和4（1767）年成为家治的侧用人，不久升为正规的老

① 村役人，即村方役人，或称村方三役：名主、组头和百姓代，其中除百姓代，均为有禄的世袭职。他们管理村的一般行政。——译者

② 水吞百姓，指没有土地也不负担贡租的百姓。——译者

③ 越诉，原指不按规定的程序越级提出的诉讼，在这里是指武家诉讼中败诉一方的上诉；强诉，原指僧侣、神官等以佛威神力为名向朝廷或幕府集体请愿或示威，在这里是指百姓结伙向领主、代官提出改善处境的诉求。——译者

中，同其已任若年寄的儿子意知一起权势盛极一时。他对享保年间以来开设的各专业同业公会进行整顿并新设一些公会，把主要的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几乎都组织起来，并设置左株、改所①等机构，34
以期管制豪农、豪商和各地特产品。即想通过当时勃兴的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的组织化，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统制，并增征冥加金和运上金。为了扩大市场和使市场组织化，甚至把一部分藩领划入幕领。（山口启二、佐佐木润之介《幕藩体制》第186－211页）

意次是贪污受贿的高手。他所以在这方面突出，是因为他使腐败公开化和合法化了。他说："金银为人命亦难换之宝。凡愿赠其宝而为国效劳者，均表明其志忠。志之强弱应表现为献品之多少……予日日登朝为国操劳，无一刻心安。只是退朝后见到我邸之长廊下堆满诸家之赠品，心里才觉得安慰。"（北岛正元《江户时代》，第167－168页）

宽政改革　天明7(1787)年5月，从江户、京都、大坂到西国的主要城市突然爆发极大规模的打砸运动。仅这年5月骚乱即达37起。其原因是天明2年以来连年歉收造成市场缺米，但天明5年正月江户大火，再加上夏季大洪水，更使米价暴涨，饥民冲进町奉行所。在研究应急措施期间，本所、深川的米行在5月18日已有许多家被抢一空，由此骚乱席卷整个江户，随后波及周围地区，一直延续到24日左右。除980家米行被捣毁外，还有8 000余家商店，其中包括酒店、当铺、点心铺、棉花店、染坊、油坊、酱园、荞麦条铺，也被认为哄抬物价发财而遭袭击。

只要少数人有计划地带头，群众便马上蜂拥而来。"起初只抢粮食，后来盗贼参加进来，连金银衣服等物品，也一律遭抢。"最初 35
只是黎明和深夜，但因町奉行所完全失去控制能力，以致在大白天

① 左株：小城镇的同业公会；改所：小城镇的工商会所。——译者

也公然抢劫起来。“此时，西渊甲斐守与山村信浓守为町奉行[1]，欲巡视街区，但见人山人海，三、五百名游民列队于西岸河边，堆起砖瓦等物。无事之时，他们惧怕奉行，但在此时，有何可惧！靠近则必被打杀，遭到连声叫骂，故二奉行自得怅然离去。”因町奉行所无能为力而惊慌失措的幕府，于 23 日开始用武力镇压。（参阅南和男《幕末江户社会之研究》第二编第二章）

打砸运动使幕府受到了极大冲击。意次在前年将军家治病殁后，因其田沼政治受到批判而随即垮台，但田沼派仍据要职，第十一代将军家齐的幕阁前途未卜。打砸运动为打开这个局面提供了机会，松平定信依其任白河藩主的治绩被御三家推举出来，在谱代和旗本的欢迎之下就任了首席老中（1787 年，即天明 7 年）。

改革的主要着眼处，是复兴因天明大饥馑而荒废的以关东和东北为中心的农村地区。面对本百姓没落、贫农离乡和弃耕地增加的形势，首先要确保农村有足够的人口和减少江户的人口，所以颁布了限制农民外流的《他国出稼制限令》[2]和鼓励流入江户的农民回乡的《旧里归农令》。禁止弃婴，发放儿童营养费和主食津贴，支付医药费，也都是为了确保农村人口。

《弃捐令》规定御用商人对旗本的放款，6 年以前者一笔勾销，以后者每年按规定的数额偿还，因而 56 名御用商人一下子失去 119 万两。然而幕府并没有对特权商人实施压制政策。虽然下令解
36 散了一些对商品的供需并不重要的同业公会，但为了统制物价，仍让江户、京都和大坂的同业公会存在下去。同时，任用江户的货币兑换商为勘定所的御用达[3]，使他们担起低利放款、调节米价和支

① 甲斐守是甲斐长官之意，信浓守是信浓国长官之意。此时，西渊和山村出任江户的町奉行（市长），仍保持原衔。——译者

② 出稼，是到外面打工的意思。——译者

③ 勘定所，这里指各大名的财务机构；御用达，意为御用商人。——译者

援幕府财政等多种任务。因此，幕政比田沼时代更金权化和商人化了。

另一方面，还进行了严厉的风俗管束和纲纪整顿。严令禁止贩卖奢侈品、妇女梳髻、私娼、男女混浴、赌博、出版黄色书等，并为贯彻各项法令而派出密探进行监督。以不法贷出公款和不当任用下属（代官任用农民为下属）等由处分大批代官，回复设置意见箱的举报制度，设立武家学艺考核和在职官吏考试制度，把朱子学定为国学（禁止宽政异学）。宽政时期，对所有阶层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窒息难忍的时代。

松平定信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海防问题。宽政4(1792)年，俄国特使拉克斯曼[①]率船队到根室，送还漂失的日本船员，同时要求通商。幕府立即让他率船队驶往长崎，随后便专心致力于海防。幕府决定设置北国郡代，拟定北方防备计划和洋式军船建造计划，并令各藩提出兵备报告和拟出海防计划。在江户湾防务方面，强制调整伊豆、安房、上总、下总四国的知行所，把谱代大名调到这四国，向当地部署常驻的旗本，计划在伊豆和相模构筑要塞。在谱代和旗本反对这些措施，得知拉克斯曼未去长崎而回国的消息后，便立即集中力量非难热衷于海防的定信。昔日同田沼的关系密切而一直对定信表示反感的大奥[②]，鼓动已经成年的将军家齐等人，把定信从其高位上拉了下来。宽政5年，定信辞去老中职。（参阅水林彪《封建制的重建与日本式社会的建成》第13－15章）

---

① 拉克斯曼（Адам Лаксман，1766—1796以后），瑞典裔俄国人，西伯利亚探险家。他向幕府提出西伯利亚总督要求通商的文书，幕府没有接受，令他开往长崎。——译者

② 大奥，本指江户城中将军夫人与侧室的住所，这里指与将军夫人或侧室关系密切的高官显贵。——译者

37 # 四　天保改革

幕政改革　天保 4(1833)年开始的大饥馑,呈现出不亚于天明大饥馑的惨状,幕府和各藩自天明以来积存的粮食储备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从大坂开始,各地相继发生打砸运动,使丧心病狂地囤积居奇的米商、木棉商等特权商人受到袭击。百姓暴动和农村骚动也频频发生。天保 7 年,幕领甲斐境内发生骚动,总数近两万人的饥民捣毁甲府的米店、当铺、绸缎庄并付之一炬。代官所得到邻近的诹访、治津两藩支援才将聚众驱散。

使幕府产生危机感的是下一年大坂爆发的大盐平八平郎之乱。大盐原为大坂町奉行所与力[①],以阳明学者而知名。当时大坂米价高涨,有人饿死,町奉行奔赴江户调米,而商人却拼命囤积。大盐建议町奉行和豪商救济饥民,遭到拒绝。于是,他怒火冲天,决心崛起,准备大炮、火药和铁砂,招集同志,卖掉自己的藏书五万卷,将售书款分给一万多贫民。但被同志密告事发,他立即散发檄文,揭竿而起。起义以“汤武之势、孔孟之德”为理想,以宽政改策为旗帜。大坂的城市贫民和附近的贫农约 3 000 人,鸣放大炮和引火箭头,敲打着铁锅铜盆向大坂城进发,但由于桥梁被拆除而改变前进
38 的方向,约有 500 人来到埠头,火烧三井、住友、鸿池等豪商的货栈。据说,大坂约有五分之一被烧光。起义在半日内被镇压下去,但受此影响而发生的暴动,在备后的三原、越前的崎、摄津的能势等地继续出现。

另一方面,第十一代将军(1787—1837)家齐生活奢侈,只顾享乐,淫乱放荡,一生纳妾数十人,据说其中有 28 男和 27 女。他在天

① 与力,本为协助主官工作之意。在江户时代,是协助奉行、城代等的主管刑名、消防等事务的官员,类似我国旧时的师爷。——译者

保 8(1837)年让将军职与其嗣子家庆，退隐于西丸，但被尊为“大御所”继续掌权，而他的宠臣们也未减余威。滨松藩主水野忠邦在天保 5 年出任老中，但受“西丸御政事”的钳制，处于暂时无可奈何的状态。

天保 12(1841)年家齐死后，忠邦升为首席老中，随即清洗家齐的亲信和宠妾，建议将军家庆宣布：坚决实行“不违享保宽政之御趣意”的政治改革。由此开始彻底的整顿纲纪、励行俭约和管束风俗。为增加年贡，采取了禁止农民从事副业、鼓励农民返乡等具体措施，并着手实施排干印幡沼造田的巨大工程。在物价政策方面，颁发了禁止同业公会的法令，解散了已有的同业公会。这是因为忠邦认为，同业公会不但发挥不了安定物价的作用，反而由于囤积和垄断而使物价上涨，而若把同业公会解散，则进入大坂、江户的商品反会增加，使物价下落。天保 13 年又下令禁止各藩专卖。但改革却使市场混乱，市场的进货量反而减少了。于是幕府采取公定物价等直接干预手段。物价的上涨虽然渐渐平抑下来，但并未使供需关系好转。

天保 14(1843)年忠邦发布上知令①，拟将江户四周 10 里②以 39
内和大坂周围 5 里以内的大名领和旗本领划为幕领，但不仅立即遭到大名和旗本的强烈反对，而且遭到豪商、豪农和农民的强烈反抗，于是忠邦在幕阁内陷于孤立，其老中职被罢免，而改革也就短命夭折。上知令的失败说明，幕府在德川领国内也失去治理和调整知行地的能力。③

---

① 上知令：上知，亦写作上地，即没收土地之意。——译者

② 这是日本的里，每日里合 3.9 公里强。——译者

③ 18 世纪末以来，货币和商人的势力不断增强，而社会的人口流动、社会的失范更为扩大，城市居民骚动和百姓暴动继续发生，但享保时期以来的社会应该说是停滞的。耕地面积在享保时期已为 297 万町步，而明治 7(1874)年才升到 304 万町步。从享保 6(1721)年到元治元(1864)年，幕府进行过 25 次人口调查，人口总是在 2 600 万人上下摆动。江户的町方人口，享保 18(1733)年和庆应 3(1867)年均为 54 万人左右，其间几乎没有增减。

长州藩 和幕府同样苦于财政匮乏的诸藩也进行了藩政改革。在各藩的藩政改革中,首先应当谈一谈后来发展成讨幕主力的长州藩和萨摩藩。长州藩濒临濑户内沿岸继畿内近国之后使商品作物的栽培大为发展,它通过豪农豪商垄断米、纸、蜡、靛蓝、棉花、油料产品等本地产品的购销,对产品实行藩专卖,而农民则要求减免税贡、废除产物会所[①]、实行自由买卖、罢免村官员等,并因此经常发生暴动。从天保元(1830)年到天保 8 年几乎暴动连年,起义者袭击产物会所、特权商人、村官员和豪农,特别是天保二年大暴动,据说参加者一时达 10 万人之多,持续三个多月,使藩陷入混乱状态。

藩的财政陷于困境。藩的负债总额在天保 3(1832)年达 8 万
40 贯,天保 9 年升到 92 000 贯,为此每年应偿还的本金和利息为 12 000 贯。负债总额为经常岁入额的 24 倍,仅每年应偿还的本金和利息即为经常岁入额的 3 倍强。真可谓“国家厄运之期”。这一年由中级家臣提拔起来的村田清风成了藩的实际领导人,由此开始天保的藩政改革。

不得不改革藩专卖制了。虽然想维持专卖制,但因为商品经济已经渗入农民中间,藩已无力控制专卖制了。结果废除盐、纸、漆以外的产品的专卖制。但与此同时开始征收运上银或口钱[②],以期增加藩的收入和使收入固定。另一方面,对造酒厂、当铺、油坊以及米店、蜡烛店、豆腐坊等营业分别实行营业执照制,扩大了藩对各业的统制。还把救济米基金等藩内贷米基金转作他用,扩大过境贸易,以西绕航路的船载货物为抵押品对他藩的批发商开展金融业

① 产物会所本是各大名在领内设立的特产品生产奖励机构,但实际上是由特权商人控制的生产和销售统制机构。——译者

② 运上银、口钱,大名指定的批发商和经纪人向生产者或贩运者收取的手续费。——译者

务。于是，长州藩在商人化的过程中使财政状况好转起来。天保13年偿还3万贯债务，到弘化3(1846)年负债已清理过半。

清风原来的改革目标，是一方面把藩和家臣团从商人资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清理藩的庞大负债，使家臣“清廉刚毅”，另一方面也使农民与商品经济“隔离”而“土著”“力田”，保护和培养本百姓；从而改组和强化藩体制。但是，没有顶住商品经济的渗透和资本威力的反抗，维护本百姓的政策也几乎没有取得成果。因此，专为豪农和村官员的利益服务而使农民负担加重的修复制度的改革，也未及出台便停止了。还有，为了清理家臣团的负债，藩把这项债务承担起来，分21年逐年偿还。但这个与弃捐令类似的所谓“年赋皆济仕法”①，也由于特权商人的强烈抵制而告失败。

清风在天保15(1844)年下台，是因为前年实施的分21年清 41
理家臣负债的“年赋皆济仕法”遭到以城下町萩为中心的特权商人的反抗。江户已于前年罢免老中水野忠邦。取代清风上台的门阀派坪井九右门卫，废除分21年清债的“年赋皆济仕法”，下令发行“公内借捌”②而向商人让步。为此需要向大坂商人借款5 000贯。

在这以后，村田派(后来是周布政之助派)和坪井派(椋梨藤太派)就藩政改革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党派斗争，但两派在维护本百姓和抑制商人以再建和加强藩体制这个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在这样的改革日益难于执行而又要强制实行的过程中，两派互相对抗但又时而彼此交融，一直继续到改革垮台和藩体制土崩瓦解。这时产生了尊攘派。尊攘派的产生是幕藩体制的最终阶段。按尊攘派观点写成的《防长回天史》③认为“正论”派起源于村田派，但两者

① “年赋皆济仕法”定出偿还的年限，再将债务总额按年数均摊，以后每年偿还其年摊额。——译者

② 公内借捌是藩发行的公债。——译者

③ 此书编者为末松谦澄；防为周防，长为长州，防长连称指长州藩。——译者

之间具有重大差别。村田派志在维护藩体制，而"正论"派一心要打倒藩体制。另外，该书把坪井派视为"俗论"派，说他们是坏人，但在以维护藩体制为目的这一点上，坪井派与村田派并没有不同之处。（参阅田中彰《幕末的藩政改革》、《幕末的长州》）

萨摩藩　与长州藩相比，萨摩藩保存的战国大名的痕迹较多，它的各村之长（庄屋）作为乡士从属于乡（外城），庄屋之下的各村落（方限）之长（名主）是百姓。年贡为七公三民，税率甚高；还要缴纳其他实物和服兵役。这种军事组织的藩体制直到幕末没有改变；藩内既无豪农又无乡村商人，既未发生乡村骚动又未发生百姓
42 暴动。但是，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剥削残酷，农民逃亡情况严重，耕田荒废，年贡收入减少。尽管如此，藩主岛津重豪仍富于进取精神，崇尚华丽堂皇，以致藩财政陷入极端穷困的境地，甚至参勤交代的费用也难于筹措。藩债在宝历 3（1754）年为 66 万两，享和元（1801）年达 117 万两，文政 10（1827）年升到 500 万两[①]。藩财政每年支付的利息高达 60 万两，而藩的全年经常收入才不过十数万两。

文政 10（1827）年，年高 83 岁的重豪[②]将财政改革的重任交给茶童出身的近臣调所笑左卫门。23 岁起就被宠信的笑左卫门，代理重豪开始致力改革。他从踌躇满志的大坂商人中间找到援助者，筹集到改革资金。改革方法是强行赖帐、增产地方产品和进行走私。天保 6（1835）年定出在 250 年内逐年偿还藩债这样的赖帐办法，并强制执行（直到 1871 年废藩置县时每年都在偿还），结果使大坂商人不断破产；而对本藩商人的借款，则用使商人取得武士身分的办法一笔勾销。另外，又通过奖励乡士、广招人才、动员特权商

---

① 这里的两是银的计量单位，日本的两约合 16 克。——译者

② 重豪于 1755 年 11 岁时袭藩主职，1787 年 43 岁隐退，但隐退后身心健壮，直到 1833 年以 89 岁高龄逝世为止，掌握藩政的实权达 70 余年。他一生所以能傍若无人，为所欲为，除生来豪迈外，还因为他有 77 万石雄藩的地位，是第十一代将军家齐的岳父（二女茂姬是家齐的理财夫人）而有恃无恐。

人等办法，来促进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改良，防止农民离乡，加强农耕监督，确立定产免产制，奖励地方产品，加强藩专卖制等。

开发地方产品方面的一项最重要措施，是对奄美诸岛生产的 43
红糖实行统购制。天保元(1830)年，向岛民强制摊派甘蔗种植任务，严禁私卖私买红糖，违者处以死刑，令交纳贡糖后的余糖换成米券。把这样统购上来的红糖运到大坂出售，天保元年至10年，售糖收益达235万两，比改革前10年间增收100万两。其实，大坂市场上的萨摩糖，有80－90%是从琉球收来的贡糖或购进的糖。

从琉球来的走私糖也很重要。文化7(1810)年，准许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同琉球进行贸易，但可以认为这是在官准的掩盖下进行的大规模藩营走私贸易。然而在嘉永元(1848)年，藩营走私贸易的事实出人意料地被齐彬密告于老中阿部正弘，由此案而被阿部查问的笑左卫门，为保护藩主齐兴而服毒自尽。其实，齐彬和阿部之间早已达成谅解：不以走私贸易追究藩主。

事实上，这是一场萧墙内讧。嘉永元年齐兴58岁，其嗣子齐彬已40岁，早该继承津岛家的大权而出任藩主，但齐兴就是不让位，据说这完全是侧室由罗和笑左卫门从中作祟。由罗原是一位江户町人的姑娘，想使自己在岛津家服务期间被齐兴看中而生下的久光袭承家业。至于笑左卫门，虽然认为齐彬英明，但他也许担心满身洋气的齐彬会走上糜费的道路。重豪对花钱如泼水的文明开化是怀有戒心的。但幕阁和诸侯都希望齐彬继任藩主，藩内对笑左卫门的改订知行地标准和实行洋式军备表示反感的不满分子也拥戴齐彬。齐兴发觉齐彬派的阴谋后大怒，对40多名阴谋分子处以酷 44
刑，但有数名脱险，逃到福冈黑田藩，向幕府提出了控诉。结果，幕府下内谕令齐兴隐退，于嘉永4(1851)年袭封齐彬为藩主。齐彬提拔的西乡吉之助(隆盛)和大久保一藏(利通)与久光之间的隔阂，大概与由罗闹事不无关系。笑左卫门死后虽被说成是大坏人，但萨

摩藩之能对幕末维新的政局发生领导作用，应该说是他的财政改革所使然。（参阅原口虎雄《幕末的萨摩》）

鸦片战争 欧洲传来的扩大的国际政治系统与远东的孤立的政治系统的接触，始于18世纪末宽政年间。最初，是与从西伯利亚侵入蝦夷地的俄国发生接触。前面说过，宽政4(1792)年，俄国使节拉克斯曼来航根室要求通商，而老中松平定信则由此致力于海防。后来，俄国使节烈扎诺夫①，又于文化元(1804)年来长崎要求通商。幕府拒绝他的要求，而他的一部分人随即袭击捉择岛等地，火烧松前藩的船只，并进行了其他一些骚扰。幕府放宽了宽政年间的禁令，颁布关于向漂流到海滩的外国船只供给水、薪材、食物，然后令其开走的《抚恤令》(1806年)，并于第二年将全蝦夷地划为直辖地，命令南部、津轻两藩对蝦夷地进行长期警备。以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北部边区是比较平静的。

在西南方面，文化5(1806)年英国军舰费通号(Phaeton)挂着荷兰国旗侵入长崎，将骗到船上去的荷兰商馆人员作为人质，得到补给饮用水和食物后离去。长崎奉行因对这次事件负有责任而自杀。当时的荷兰因拿破仑战争被法国合并，因而与英国处于战时关系。文政年间(1818－1829)，出没于日本沿海的英美捕鲸船开始增加。以文政8(1824)年在萨摩藩所属的宝岛突然发生的英国捕鲸
45 船暴行事件为契机，第二年颁布了关于发现外国船即行赶走的十分粗暴的《异国船打拂令》。但在天保8(1837)年将一只出现于江户湾的外国船撵走后，从《和兰风说书》②上得知，这只船是为送还漂失的7名日本人而来的英国(实际上是美国)非武装船莫理逊号

① 烈扎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Резанов，1764－1807)，原为俄国商人，后被俄国政府派到日本要求通商。——译者

② 《和兰风说书》是一种情报汇编，由在长崎的荷兰商人根据他们收集的有关海外的情报编写，译成日文后，经长崎奉行送给幕府。——译者

(Morison)，遂在幕阁内产生立即赶走和稳妥处理两种意见的对立，并由于一部分情报外泄和流传开来，而使是识者的开国还是愚者的锁国的议论在社会上沸腾起来。

鸦片战争的情报传到了幕府。最初的情报是《和兰风说书》(1839 年 8 月)所载战争的起因为没收鸦片事件(1839 年 5 月)。由开战至 1841 年的战争经过，载于《唐风说书》[1]。情报之间有差异，而且很大，但所说由 78 只或 40 只船组成的英国大舰队以强烈的炮击使清国大败，却是确实的。

老中水野忠邦在写给他的心腹川路圣谟佐渡奉行的信(天保 12 年 1 月 29 日)中说："此次来舶人称：清国严禁鸦片通商不当，引起英国人不满，派军舰 40 余艘到宁波府发动战争，现已占领宁波县之一部。此虽他国之事，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今浦贺防御之议未定，实不周之事也。"(加藤祐三《黑船前后的世界》第 283 页)忠邦于天保 13 年废除《异国船打拂令》，恢复《抚恤令》，并颁布了《薪水给与令》[2]。还着手加强江户湾防御，准许高岛秋帆和江川太郎左卫门教授炮术与铸造大炮火枪。第二年的《上知令》，似亦与大坂湾防务有关。但忠邦却因《上知令》而下台。

后任首席老中为福山藩主阿部正弘。弘化元(1844)年荷兰国 46
王的亲笔信向幕府建议说：中国抗战无功而败北，结果改变古来的政策，开五港，付巨额赔款(《南京条约》)；而如果英国来日本要求通商，引起日本人民反对，由此发展成兵乱，则会导致严重的事态，故望日本采取坚定的政策：不要停留在只向漂失者提供燃料和用水的阶段，而应开放"交易"以避免兵灾。在对荷兰国王亲笔信的复信中，幕府说："通信"国只限于朝鲜与琉球，"通商"国只限于荷兰与中国，其理由是"祖宗之严"不可破。嘉永5(1852)年，长崎的荷

① 《唐风说书》，与《和兰风说书》类似，只是材料来自中国商人。——译者

② 《薪水给与令》，是关于向外国船补给燃料和用水的法令。——译者

兰商馆馆长传来美国船队要来日本的情报。阿部认为这是“照例的恫吓，否则只是传闻而已”，而未予重视。但第二年 6 月，黑船便于浦贺海面现其威容。由此揭开幕末维新史的篇章。（参阅加滕祐三《黑船前后的世界》第 7 页）

第一部

明治国家之成立——由幕末维新到颁布宪法 49

前　言

日本近代史随西洋的冲击而开幕。以英国为首的西洋列强的压力，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袭击中国，继而在50年代及于日本，支持幕藩体制的对外冻结、即锁国体制由此开始解体。在这以前，日本是在与西洋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隔绝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1853年7月，耀武扬威于浦贺海面的柏利舰队，是扩大的国际因果系统的前锋，但它出现于嘉永6年6月（阴历），则表明因果系统的隔绝开始化解。同隔绝的因果系统的接触，在双方都是偶然的。在柏利来说，他在日本碰到的是崩溃时期的幕藩体制，这是偶然。而在幕府来说，如果柏利在1800年来到日本，则幕府也许利用这个机会集中权力，使自己成为推进西洋化的权力。但在19世纪50年代，幕府已经没有对外压应战以期强化自己的能力。而如果外压再晚来一些时候，幕府也可能在这段期间苟延残喘下去。幕藩体制虽已现出崩溃的征兆，但还没有陷入崩溃的危机。

用几句话概括盘根错节的幕末维新史并不容易，但从政局的扩大和多极化方面来概括，可把幕末维新史分成四个阶段和一个大团圆。1853年被迫开国的幕府，随后开始向公武合体、联合雄藩 50
方面推进。其间虽稍有动摇，但没有发生倾轧。如果把这个期间算

作第一阶段，则第二阶段由1858年开始，以这一年的安政条约[①]签署问题和将军继嗣问题为契机，使朝廷解冻而政治化，政局开始扩大和两极化，最后发展成安政大狱[②]和暗杀大老[③]这样名符其实的死斗。在第三阶段，处于两极对立的朝廷和幕府之间的两个西南雄藩，即已经解冻的萨摩藩和长州藩，于1861年打着在朝廷和幕府之间进行斡旋的旗号加紧活动。于是，政界更加扩大和两极化。长州藩激进到攘夷亲征的地步，但受到挫折；萨摩藩想要召开雄藩会议，但也失败了。最后，两藩都转而实行藩地割据，放弃攘夷而主张开国。在第四阶段，英法对立与日本国内政局联系起来，因而政局国际化和复杂化了。英国支援萨长两藩，法国与幕府携手。最后，出现大团圆的结局。1867年萨长两藩决心举兵讨幕，而幕府则先发制人，断然实行大政奉还。在两条路线互相斗争之中，1868年1月(庆应3年12月)王政复古的政变成功。

维新政府动员反幕派诸藩征服佐幕派诸藩，遂收回诸藩的权力，并建立起新的军事、行政和财政体系。1868－1869年戊辰战争[④]、1869年版籍奉还、1871年废藩置县、1872年征兵制度、1873年地租改革、1875年秩禄处分等明治初年的改革大事，绘出了这个政府的中央集权的轨迹。但是，中央集权的推进力量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连称萨长土肥)的下级士族出身者，他们之间在中原逐鹿当中养成的猜疑心理和对抗意识甚强。大久保利通(萨摩藩出身)和木户孝允(长州藩出身)受到各自的藩阀的拥戴，彼此性格

---

① 安政条约，是安政5(1858)年与美、荷、俄、英、法五国相继签订的友好通商条约的总称。首签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858年7月)是以后四个条约的蓝本。——译者

② 安政大狱是安政5－6(1858－1859)年间大老井伊直弼对一桥派(德川庆喜派)和尊王攘夷派的大镇压，被捕者百余名，吉田松荫等八人被处死。——译者

③ 指安政7年井伊直弼被水户、萨摩两藩的志士暗杀。——译者

④ 庆应4(1868)年(戊辰)1月开始的新政府与旧幕府之间的战争，其间发生多次大的战役，明治2(1869)年以旧幕府败北而告终。——译者

不同，再加上藩地的情况悬殊，所以双方意向不合，难于同心合力。但是，作为维新主力的萨长两藩如不提携，维新政府便会立即垮台。于是，萨长两藩的合作便成为第一必要。 51

另一方面，其他各藩对政府的中央集权持有疑心，对萨长两藩的统治表示反感，期待风云再起，因而采取割据藩地而观望政局的态度。一般说来，门阀守旧派占居优势，与要求改革的戊辰凯旋兵发生纷争，而且人们又把到新政府中去做官视为对旧藩的叛变，所以政府难于动员人材。在这种不稳定的气氛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率领凯旋兵返回鹿儿岛的西乡隆盛通过大规模的藩制改革而建立的军团，便成为对政府的重大威胁。西乡对政府失望，期待新的政府改革。一旦有人在南方一隅拥立西乡，则弥漫于诸藩的不稳定气氛就会随风云而变，而政府亦将立即动摇。

说穿了，政府中的藩阀对立和政府与诸藩的隔阂，不外是大久保、木户和西乡三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三人是政局棋盘上的"眼"。可以称此为三杰构造。当三人的意见沟通而三杰合作被人了解时，才使萨、长、土三藩的献兵得以实现，并以此作为武力背景使萨、长的废藩置县政变得以成功。经太政官制改革，将迄今占据最高官职的公卿和大名排除，除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仍保留大臣职外，参议、卿几乎全由藩阀出身的人所占据。

但是，三杰合作因 1873 年征韩问题而瓦解。西乡、板垣退助(土佐藩出身)等留守派下野，岩仓、大久保等外游派掌握了政权。回到故乡的西乡和板垣，为培训和教导本土的士族，各自开设私学校和立志社。鹿儿岛又成为威胁政府的地方势力，各地的愤愤不平的士族自然响应私学校，注视它的动向。推进中央集权的大久保，对私学校的勃兴怀有戒心，而为了对此采取怀柔政策，又不得不对鹿儿岛实行例外措施。另一方面，木户是对大久保的统治权的最激 52
烈批判者。他从公正施政的立场出发，对大久保在鹿儿岛实行的特

惠措施进行严厉的谴责，并主张逐渐整顿而反对大久保的急进改革。于是出现三杰疏远的形势。1877 年西南战争，从对政府威胁最大的西乡军团的溃灭和政府的军事统治权的确立这点来看，是划时代的事件。还不仅如此。从在这前后木户病死、西乡战死、大久保被暗杀和三杰结构逐渐解体这点来看，此次战争也是转折点。

于是，中央集权不得不扩大它的基础。社会舆论支持维新政府成立当初宣布的最高施政方针。政府以此平息诸藩的疑心和反感，并认为有必要扩大来自它们的支持。诸藩也批判藩阀政府的专制，向社会舆论呼吁它们亦应挤进政府里去。最初的内容只是要求延长幕末的雄藩联合和列藩会议，但 1873 年下野的征韩派的土、肥出身的领导者们提出在第二年成立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并在这第二年当大久保请木户、板垣出任参议时，根据他们的要求颁布了逐步建立宪政体制的诏书。于是，社会舆论承担起两项任务：一方面帮助政府对反政府派进行绥靖和把他们拉进政府里来；另一方面帮助反政府派批判政府和使他们挤进政府里去。

在 1877 年夏西南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时，动摇于响应起义和建白运动之间的立志社，打着自由民权的旗号纠合征韩派士族，开展了要求成立国会的请愿运动。随着运动的扩大，运动的基础开始由西南的征韩派士族层转向关东及其周围的豪农豪商层，运动的干部有律师和报界人士加入进来。运动的武器是新闻和游说。

53 19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是农民占八成社会。大久保内务卿的殖产兴业政策，碍于内外多事而受挫，但在西南战争后，社会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动。第一产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 1872 年为 84.9%，1880 年降为 82.3%，1890 年又降到 76.2%。这是“起飞”(take-off)期的社会。大部分地区仍是农村，处于豪农、豪商、地方望族层的影响之下，但东京、大阪的人口急剧增加，铁路、邮政等交通通讯网开始从这两个地方伸向地方。新闻发达起来，政治评论和

政界情报在豪农、豪商和知识界流传。游说活动把他们同中央政界和中央政客联系起来。他们分别在地方结社，然后进京开展联合运动。这些豪农、豪商和知识界以及他们在地方的结社，是当时的国事评论的基层力量。他们的动员网不密，基础不深，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对评论和情报作出敏感的反应，易被记者和说客的悲愤慷慨陈词所激奋，使国事议论立即沸腾起来。

促使豪农、豪商、知识界参加政治运动的，并不只是新闻和游说。1878 年和 1879 年为征收民费①而新设的府县会②，引起他们对政治的关心。府县会议员为使民力休养生息，对府知事和县令进行弹劾。府县会的这种反府知事、反县令的风潮，扩大了自由民权运动在地方的阵地。再者，这一时期的米价腾贵虽使民权派士族贫穷化了，但豪农、豪商却富裕起来，使运动的资金有了丰富的来源。

1881 年，因开拓北海道出售公有财产问题掀起了非难政府的国事议论。政府为此下令中止出售，罢免大隈重信，同时不得不宣布九年后成立国会。明治 14 年的这次政变，在许多点上也是划时代的。

第一，利用这一机会，板垣的自由党建成，大隈的改进党开建。54
于是，形成萨长政府和土肥民党对抗的局面。政府采取坚决镇压的手段。但在这两者对打舞台的背后，却交叉地进行着把土肥领导者拉进政府和使民党挤进政府的工作。自维新以来就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这些人，虽然彼此对立和各持己见，但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也不是不能互相妥协和讲价还价的伙伴。也有一些从中为他们进行调解的策士。因此，正当壮士在舞台上对打而观众看得正酣的

---

① 民费是一种地方杂税，供当地政府行政开支，由府县会审议批准实施。——译者

② 府县会，指府和县的民意机构。实施议会政治后，指地方议会。当时日本尚无道、都的建制，设立北海道、东京都行政区后，便连称都道府县。——译者

时候双方突然宣布妥协，而剧情便在舞台上的壮士和席间的观众呆然、哑然之中立即改变。我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这出戏中既有决裂的场面，又有骚扰的情节，而且还有弹压的行动。然而，明治政府不就是依靠在这种波澜壮阔的舞台后面发生作用的拉进来和挤进去的机制而得以维持的吗！

第二，明治14年的政变，在经济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继续推行大久保的殖产兴业政策的大隈积极财政，由于行不通而被迫改用紧缩政策，而作为这一政策的一环出售公有财产的措施，却引起强烈的国事议论。结果，当时就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实行的彻底的紧缩财政，带来了深刻的经济萧条。特别是米价暴跌，许多地主破落，农民骚动扩大，而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利用这一良机积聚土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即发生了豪农、豪商和地方望族阶层的改组。

结果，导致自由党在1884年解散。不仅豪农、豪商阶层的收入锐减，党的地方活动停滞，党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且有自由党员参加的农民骚乱频发，闭塞而激进的青年党员又企图在各地闹事，于是无力控制这些活动的自由党决定立即解散。另一方面，豪农、豪
55 商、府县会议员的关心和活动，也由天下国家的政治运动转向维护地方利益和争夺府县会议员职位的运动，府县会的反政府气氛随之消失。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末使地方铁道建设和地方棉纺业兴起的，可以说是由这些人改组形成的豪农豪商阶层起的作用。1887年开始的大同团结运动，从系谱上来说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复活，但使运动高涨起来的，应该说是改组形成的豪农、豪商、地方望族阶层要求成立国会的上升气势。

还有三井、三菱等政商，各自与政府要员勾结，为获得政府的援助和特权而反复进行激烈的斗争。三井与井上馨的关系，三菱与大隈重信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开拓北海道出售公有财产事件，

就是这一斗争的一幕。出售虽被立即下令中止，但出售政策并没有中止。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些工厂、矿山等官营产业相继售给私人；90年代，三井、三菱建立起使它们后来发展成财阀的基础。殖产兴业政策与其说是为了振兴地方产业，不如说是为了扶植财阀产业。明治政府就是这样的“起飞”装置。

第三，宣布9年后成立国会的政府，虽然早已确定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方针，但随着期限的临近，必须赶快完备体制。1885年创设内阁制度。废止维新以来的太政官制，以伊藤博文为第一任总理大臣的萨长藩阀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政权。在藩阀政府之下，逐渐形成国会与政党必然对峙的封闭的国家官僚制。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开始培养官僚，谈论天下国家大事的政治青年一心进入官场立身处世。文明开化，新闻和铁路的普及和扩展，是自由民权运动发展和高涨的条件，但它们似乎也产生了促进政府的统治和权威向地方浸透的效果。 56

政府最忧虑的，是如何抑制业已开始向设立国会进军的自由民权派（大同团结运动）进入众议院，如何同民党代议士进行斗争。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为戒备国会的政治斗争波及地方议会而采取了直接选举制，对选举权附上交纳国税15日元以上的纳税资格。宪法给予国会以受到很大限制的协赞权。作为成立国会的准备而急忙实施的地方自治制的目标，也是阻止中央的政治斗争波及地方政治，为此地方选举采取复选制和等级选举制。在藩阀政府这样设立的帝国议会上，民党联合军起哄呐喊。其结果如何，这是第二册叙述的问题。

最后，还应当考察一下这个时期的对外问题。明治政府的夙愿，是修改1858年的不平等条约，以实现与西洋诸国对等。但是，岩仓使节团的修改条约交涉立即受挫，寺岛宗则外务卿收回关税权的努力也全无成果。后来，井上馨外相的修改案和大限外相的修

改案，虽有民权派和国权派掀起运动予以支持，也在国事议论的沸腾中化为乌有。为何未能实现条约的对等化？何时才能实现？这要到日本成为东亚的强国，东亚的局势发生变化而使英国需要日本的时候。与西洋诸国对等化，是与东亚的日本强国化不可分的。

日本对东亚一直怀有强烈的扩张意欲。不平的士族梦想在大陆上雄飞，渴望对外战争，攻击总想回避战争的政府。政府为戒备不平士族的愤懑喷向政府，而设法把他们放散于海外。在 1873 年
57 的征韩论、1874 年的台湾征讨、1875 年的江华岛事件中，扩张的压力确实发生了作用。自由民权运动也继承了征韩派士族的扩张意欲。民权派和国权派混水摸鱼，一面向政府挥舞批判的鞭子，一面私下拟定赴朝、赴清的计划。但是，政府所以犹豫不敢发动战争，是因为国力不足。正因为如此，才埋头于富国强兵。因此，当政府决心开始侵略的时机一到，无论是国权派还是民权派，都将欣喜雀跃，欢迎政府的决定，渴望成为侵略的爪牙。这样就形成了官民一体的侵略集团。

亚洲联合是侵略的招牌。所谓亚洲联合，就是日本援助清、韩进行改革，与清、韩提携，日本做盟主同西洋对抗。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立场的不同，提出过各式各样的主张，但难以去掉的核心是先觉和盟主意识。随着日本强国化，援助改革变成强制改革，即成为事实上的掠夺。因此，排除西洋列强、使日本可以独自掠夺的招牌，就是亚洲联合。

1884 年末的甲申事变，是日本谋取朝鲜的开端。即日本公使支援朝鲜的改革派（独立派、亲日派），通过政变树立改革派政权，以期排除中国清朝政府在朝鲜的支配权。同一时期，行将解散的自由党的首脑也在制定计划：拟从法国筹借资金，派自由党的壮士去韩，树立改革派政权，以期断然实行改革。第二年，又发生徒手空拳渡韩协助进行改革的所谓自由党急进派的大阪事件。这些活动均

以完全失败而告终。结果，朝鲜的改革派溃灭，中国的支配权加强。从这里可以看到以后在大陆进行的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谋略的滥觞。

58 # 第一章 幕末十五年 王政复古

一 开国 日美通商条约

柏利来航 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柏利(Matthew Perry)海军少将,被任命为遣日使节,乘军舰密西西比号,于1852年11月由美国东海岸诺福克出发。他的任务是开辟横渡太平洋航路和使日本开国。他在《日本远征记》第一章的开头描写远征的动机说:“根据美国和墨西哥缔结的停战条约,加利福尼亚地方割给美国。人们看到这个地方濒临太平洋,油然产生扩大商业活动范围的想法。”与亚洲直接进行贸易,必须在途中为轮船补给煤。“由加利福尼亚到亚洲路途甚长,从何处可以得到煤呢?”“在遥远的东方诸国中,我们应与哪个国家通商呢?”“中国只开放到一定程度,但另处有一个叫做日本的未开放国。这个国家既在刺激人们的好奇心。又有诱惑商业经营者的吸引力。”(第1卷,第205—206页)

59 横渡太平洋的航路开通后,从美国西海岸到香港约需18天。经过好望角约需120天才能到达的最远国家日本,可以立即变成距离美国最近的国家。然而什么是使日本开国的“最佳手段”呢?它不是英国和俄国迄今屡试而未成功的威吓和谋略,而是说服和诚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迄今“未与日本发生过可以引起不愉快的联想的接触”的美国。柏利就是这样认为的,并依此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这个建议被愉快地接受,随后决定在他的指挥下,带着务必努力打开与日本的友好通商关系这样的和平使命,派遣一只舰队去日本。”(第209—210页)

根据国务卿以信函形式下达给海军部长的训令,远航日本的

任务，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为保护在日本列岛周围遇难或因狂风巨浪而不得不进日本港湾避难的美国船员及其财产，必须采取相当长久而固定的措施。

（二）为给美国船舶补给粮食、饮用水和燃料，或遇海难而接受继续航行所必要的修理，日本得准许美国船舶进入其列岛的一个或数个港口。

尤其希望日本准许在其主要岛中之某一岛上新建贮煤场。但在不可能时，至少在日本列岛附近确实存在的无人诸岛中之一岛上设立亦可。

（三）为使美国船舶出售其运来的货物或进行易货贸易，日本得准许美国船舶进入日本列岛之一个或数个港口。（曾村保信《柏利为何来日本？》第154页）

当时进出于北太平洋的美国捕鲸船的海难救助，无疑是一个 60
重要问题。但对开通横渡太平洋的航路和使日本开国这个未知世界的挑战，恐怕也在鼓舞他们的探险家的热情。由诺福克港出发的柏利，南下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4月到达香港，其间用了134天。他无暇考虑因太平天国之乱而风雨飘摇的中国，5月下旬到达冲绳，进行港湾测量和上陆调查；6月，为查明是否适用于海军基地和贮煤地，对小笠原群岛进行了调查。由此再北上，在（1853年）7月7日临时停泊于距伊豆半岛约40英里的海面；第二天，排成单列纵队，全体船员做好战斗准备，以每小时平均约8海里的速度，沿相模湾的陆岸开航，午后5时许到达浦贺海面投锚。共4只船。

柏利分两次来日，第二次来日时是要求缔结条约。他在6月2日于那霸写给海军部长的公函中说："他们[日本]将不得不放宽锁国政策，我拟在[第一次]访日期间证实：我们能否以和平方式促其

开放几个港口，或他们是否仍固执于不友好的行动。如果能够证实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拥有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柏利出国时与政府约定的'由 12 只船组成的威风凛凛的舰队'，就会于下半年到达，所以]我在来春将能更加慎重地而且坚决地行动。"如果同日本的交涉以失败而告终，则可同琉球缔结条约，在小笠原群岛的父岛上设贮煤场。"这个美丽的岛[冲绳]是日本的属国，以与日本相同的法律治理。住民勤劳温存。我已使他们解除恐怖心，相当成功地得到友好相待。拟将那霸作为舰队的集合基地，可望不久全岛居民即将对我完全友好。"（加藤祐三《黑船来航前后的世界》第 13—
61 15 页。）

幕府虽在前年就从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处获悉美国舰队即将来航，但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以为是"照例的恫吓，否则只是风闻而已"，而没有采取专门对策。接到浦贺奉行急报黑船于嘉永 6 年 6 月 3 日（1853 年 7 月 8 日）侵入江户湾的消息后，幕府立即慌作一团，暂时指示浦贺奉行："但望不失国体，尽量慎重出帆"，随后紧急召集有司讨论，但在稳健派和强硬派就接受国书还是拒绝接受，是放弃祖法（开国）还是开战的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传来了关于美舰已侵入江户湾进行测量的急报，争论马上软化，决定接受国书。9 日，柏利率领高举星条旗的军官、陆战队、军乐队等 300 余人登陆，将美国总统的亲笔信交与浦贺奉行，约定明春再来，于 12 日离去，驶向已经作为基地的那霸。他达到了第一次来日的目的，即没有放一枪，就与日本人接触，使他们受理了总统的国书。

对黑船来航表示惊慌失措的并不只是幕府，做过德川喜庆府内小佣人的村山镇，后来这样说道：

……嘉永 6[癸丑]年 6 月 3 日，美国军舰 5[4]艘来到该港，老爷虽在垂髫之年，但其惊慌之状亦笔墨难以形容。犹如 300 年来之梦方醒，虽说是幕府之事，但岂止幕府，天下 300 多名全体

诸侯，亦悉数惊慌不已。于是，一些大藩忙乱起来，因为他们是从浦贺到品川的各大诸侯的守护者，而浦贺则是会津和熊本藩的前沿阵地。但在美国人到来之前，诸大名和旗本就已把甲胄束之高阁，只是在正月十一日拿出来摆摆样子，到暑天六月拿出来晾 62
晒。而有随身武士者，可谓屈指可数。因而一俟出阵，即刻感到缺乏装备，以致张皇失措。即使尚有祖上传下的甲胄，亦破损不堪，而战袍则被虫子蛀蚀得百孔千疮，无法穿上出阵，所以不仅要找江户的甲胄匠、武具匠、马具匠，而且要找附近各国的工匠前来江户，让他们赶快修理旧的或制作新的，忙得不可开交，当时的首席老中似为阿部伊势守大人，他紧急通知各谱代大名和旗本：如现在甲胄等物不全，可用消火装具。因为都有消防短袍，所以慌乱稍减，但仍然令人吃不消，因为 5 000 石以下的旗本，要每百石献银 10 两。因此，可以说甲胄匠们发了大财。不久以后，人们创造出一首川柳[①]："人们公开说，我们武具马具匠，感谢大老美。"(柴田宵曲编《幕末的武家》第 75 页)

江户市民并没有怎么张皇。明治初期的外交家田边太一说过："虽然有人赶忙藏匿家财，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混乱。""实事求是地说，如果说出现了非常的混乱，那也是因为我们关于外国的知识太落后了。当然也有些轻微的张皇，但并不像附近失火时表现的惊恐。"(同上书第 207 页)勿宁说是人们喜欢看热闹。例如，《日本远征记》就这样写道："[7 月 10 日]同往日一样，日本帆船终日辐辏于湾内，来来往往。看来好像在忙于做买卖，舰队的存在对他们没有造成一点妨碍。实际上，有时也有几只渔船或其他小船想要驶到舰队的近处看看，但十分明显，这只是出于满足好奇心。何以这样

① 川柳：一种由 17 个假名组成的讽刺短诗，产生于江户中期，因这种诗的著名作家柄井川柳而得名。——译者

说，因为日本船员们都站在船上，向我们这边凝视，既无戒备的样
63 子，又没有敌意的表示。”(第2卷，第208页。)

日美和睦条约　幕府通过京都所司代将柏利来航一事上奏，接着将美国总统的亲笔信的日译本呈给朝廷。在这以前，弘化3(1846)年朝廷下令幕府加强海防，已是破坏“大政御委任”所定的朝幕关系的事件，而这次关于柏利来航的上奏，则是促使朝廷介入政治的诱因。阿部老中还命驻在幕府的诸侯到府内去看美国总统亲笔信的日译本，向他们征求率直的意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幕府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正如福地源一郎所评，是“因为已欲和而不敢首倡，令他人先说为妙”。

> [幕阁的]主意虽为万不可言战，但以幕议决定和睦又恐有背时论，故宜首使诸大名、诸官员主唱议和，然后再由幕府布告天下，说幕府虽本意主战，但不得不屈从众议，放弃开战，而暂时采取和睦的方针，其实是其内心包藏着企图欺骗内外的权谋。于是，在7月朔日向大小名①、诸官员征求是和是战的意见。
>
> 然而，大小名与诸官员早已识破此权谋，其中高唱主战论者多得出人意料，出现多数认为和睦不可的趋势。因此，阁老及参与此机密的幕吏大惊，感到如此下去，形势必将严重，于是玩弄权术，内谕大小名提出和睦说。
>
> 但是，大藩的态度不仅不服从内谕，而且一反250年来钳口不谈天下政治的常规，认为今日正是冲破此种缄默的良机，何须听从阁老的内谕。而在诸侯当中，有的认为应在今日施展自己的英才，发表主战论以在世间博得武勇的美名，因而力排和议而主张拒绝；有的虽知自己的藩主与藩士内心也认为不可言
> 64 战，但不可之言不能首出于己口，唯恐被视为卑鄙，因而相互戒

① 这里的大小名，指大名和小名；年禄一万石以上但无领地的大名为小名。——译者

惧而不敢言和，证诸当年7月至10月各大小名、诸官员和旗本呈给幕府之意见书，足以察知此种观点是他们坚信不移的定见。（《幕府衰亡论》第31—32页。）

福地又评述说："在嘉永6年美使来日之际，如幕府不就此事上奏朝廷、不告知诸侯，不在水户殿上讨论，而全以御老中御用部屋[幕阁]的议决处理，毅然约定允许通信通商，甚至决定缔结开港条约，则无论是朝廷还是诸大名，均会认为此乃幕府大权之内的事，丝毫不会对此提出异议。"为何没有如此呢？"其一大原因为何？吾曰在于德川氏当初学得之汉学。"汉学教导说："德川氏霸者也，朝廷天子也，霸者率诸侯以朝天子者也。""家康公奖励之文学[汉学]，成为反对家康公政略之学派。""岂有他日不因此学而遭政体破灭之祸哉！"（同上书，第24—26页）

然而，阿部老中在柏利离去后，整整忙碌三个月研究对付办法，终于11月在江户城中向诸侯传达了基本方针：总之，应全力备战，还决不能说海防已经充分，所以如柏利按约再来，则我方务必尽量慎重对待，只有对方首先行使暴力，我方才可下决心应战。这完全是对回避开战和加强海防进行折衷的不得要领的结论。

柏利的舰队离去后，嘉永6年7月，俄国使节普嘉廷[①]也率军舰4只来长崎，提交国书要求划定日俄两国国界与开国。俄国是 65
获悉美国派遣柏利来日后，不顾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它与英法的关系的恶化，而立即派遣普嘉廷来日的。在幕府拖延答复期间，俄国与英法的关系更加紧张，普嘉廷才不得不于10月从长崎拔锚，离开英法海军力量占优势的远东海面，退避到阿穆尔河[黑龙江]口。然而，他于12月又来长崎，第二年即嘉永7年1月离去。双方进行了谈判，但未达成协议。而离开浦贺的柏利，从琉球到了中国，在负

① 普嘉廷（Евфим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утятин，1803—1883），除与日本进行交外活动，还曾任驻英使馆武官等。——译者

责保护居住在陷入太平天国战乱旋涡中的通商口岸的美国人期间，获悉俄国舰队驶入长崎港向日本要求开国后，立即决定急速去日本，于俄国舰队驶出长崎港后数日，在 1 月 16 日率 7 只军舰驶入江户湾，投锚于靠近小柴的海面。后来又有两只军舰驶来，柏利便以 9 只黑船为后盾，迫使幕府答应前年提出的开国要求。

幕府自知有明年再来的约定，但对来得如此之早表示惊异，于是觉得为了避免战争只好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幕府对柏利舰队的武力也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柏利还威胁说：如果开战，他还有 50 只军舰在近海待机，另在加利福尼亚的 50 只军舰，亦将在 20 天内到达。这种有武力支持的说服与诚意，使自己深知优劣差距的强者与弱者的呼吸完全合拍，于是缔结了《日美和睦条约》(《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为向船只供给薪材、水、食品、煤、船中不足品而开下田和箱馆[1]两港；美国船只因海难破损时，将船员和货物转运到这两个港口，然后交给美方，不得对船员有监禁之类的举动；美国政府得派其代表驻在下田。对加重点部分，后因双方的解释不同而
66 发生过争议。没有通商关系的条款。随后，在同年 8 月，又与英国缔结了类似的和睦条约。

普嘉廷获悉日美缔结和睦条约后，不顾优势的英国舰队在远东水域游弋，立即于当年 12 月率军舰来航，在下田缔结了和睦条约。根据这项条约，除下田、箱馆外，长崎亦被定为对外开放口岸。因此，根据最惠国条款，长崎亦对美英开放了。另外，在千岛群岛方面，规定日俄两国的国界划在得抚岛与择捉岛[2]之间；桦太[3]的归属问题，作为悬案留待以后解决。翌年 12 月，与荷兰的和睦条约也

---

① 即今函馆，当时写成箱馆，日语读法两者相同。——译者

② 择捉岛是北方四岛中最北的一个岛，苏联曾根据这个条约主张北方四岛原来是它的。但日本说朴次茅斯条约才算数。——译者

③ 桦太，俄国叫萨哈林，中国叫库页岛。——译者

签字盖印。

幕府同美英俄缔结和睦条约后，于安政 2 年（1855 年）9 月将条约副本提交给朝廷，并上奏缔结的原委。朝廷对幕府的措置表示满意。另外，阿部又任一直倡导攘夷论、幕府改革论和军备充实论的德川齐昭为幕府参与，并开始与在大廊下值班[1] 的一门大名的代表人物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和在大广间值班的外样国持大名的中心人物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紧密接触。由此可见，幕府欲走幕朝协调和雄藩联合的路线。阿部还提拔使用非门阀出身的筒井政宪、川路圣谟、岩濑忠震、永井尚忠、胜麟太郎等许多人材。这些人同“与德川家的君恩薄而身居高官的人一起”效忠幕府，成为当时门阀人事的补充力量，但不久就作为对抗门阀官僚的幕府官僚扩大起自己的势力。还提拔一些精通外国事情的藩士，建立翻译洋书和培养翻译的洋学所（以后的蕃书取调所）以及进行洋式军训和学习炮术的讲武所。

哈利斯、日美通商条约　安政 3 年（1856 年）7 月，汤森·哈利斯[2]作为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带着要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
的使命到下田上任，随后上江户，一再要求幕府收下皮尔斯[3]总统 67
写给将军的书简。幕府害怕再三拒绝这项要求会使美日之间发生纠纷，于是作了让步。哈利斯一行约 350 人，是 10 月末由下田出发，经过天城京都，历时一周到达江户的。他在自己的日记（1857 年 11 月 30 日）里写道：

今天是我到江户之日。这在我的一生中开始了一个重要的

---

① 在江户幕府时代，实行由大名到江户轮流参勤值班的制度，而且要把妻子或儿子作为人质留在江户居住。按大名的家格和等极，分别为他们在江户城内设有值班场所，即大廊下、大广间、溜间、雁间、柳间等。

② 汤森·哈利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汉名为虾厘士，1854 年曾任驻宁波领事。——译者

③ 皮尔斯（Franklin Pierce，1804—1869），美国第 14 任总统。——译者

时代，而且在日本的历史上也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新纪元。我是这个将军驻地迎来的最初的外国代表。我拟进行的谈判，不管成败，都将作为一个重大的事实永远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因为我在后来的谈判中使这个奇异的国家确认了外交使节的职权。我又为我能在从伊豆半岛的南端到江户市中的江户城的日本土地上举着美国国旗前进，而感到相当大的自豪。（《哈利斯日记》下第35—36页①）

哈利斯一再劝说幕府缔结通商条约。据他的日记（1857年12月12日）称：

我告诉他们，蒸汽机的利用，已使世界的形势为之一变。日本将一定抛弃锁国政策。日本国民，如果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勉得到发挥，在不远的将来，就会使日本成为伟大的、强大的国家。

对贸易适当课税，很快会给日本带来很大收益，由此可以维持强大的海军，而如果自由的贸易活动使日本的资源得到开发，则将带来莫大的交换价值。这种生产活动对国民必需的食品的生产一点没有妨碍，可以依靠使用日本现有的过剩劳动而振兴起来。各外国将争先恐后向日本派遣强大的舰队要求日本开国。日本不是屈服，就是要遭受战争的惨苦。即使不发生战争，日本也一定要不断受到外国大舰队来航的威胁。即使想做出某些让
68 步，也要有适当的时机。舰队所要求的条件，决不如我这样地位的人所要求的温和。我说，把拒绝给予和平的外交使节的东西屈从地让给舰队，会在日本的全体国民面前丧失政府的威信，而且实际上也在减弱政府的力量。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以中国为例，即以1839年至1841年的（鸦片）战争和这次战争后相继发生的

① 哈利斯日记英文名为 The complete journal of T. Harris. 日译本名为《日本滞在记》，页数是日译本的。——译者

一些事件以及现在的战争[1]为例做了说明。

我对它的外国事务相说：同未带一只军舰而且特别是单人来到江户的我谈判，可以挽救日本的名誉；凡是提出来的问题，都可以慎重讨论；日本应逐渐实行开国。随后，我提出以下三大问题。

一、要接待外国公使来江户居住；二、要不经幕府官员的仲介而自由同日本人进行贸易；三、要增加开放口岸的数目。

我要附带指出，我并非只为美国人要求特权，能使美国总统满意的条约，会立即得到西洋各大国的承认。我强调指出，存在着外国到日本强行出售鸦片的危险。接着，我表示希望禁止鸦片进入日本。我说我的使命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友好的，我不使用任何威胁，总统令我只向日本人指出正在威胁日本的危险，希望日本能够避开这些危险，并提出可使日本成为繁荣、强大和幸福的国家的方法。我的话到此结束。（同上书，第87—88页）

哈利斯说："我的讲话达两小时以上。"但是，幕府没有轻易表态。于是，哈利斯开始威胁。他在日记（1858年1月9日）中这样写道：

今天，信浓守经过3天考虑之后初次来访。我下定决心，要使他产生一种危机感。因此，我一开口就说，我向外国事务相极
其认真地讲述了我的意见以后，至今已经29天了，但尚未接到 69
任何正式答复。我何时才能得到答复？连答复的日期也不告诉我。这样的做法不能忍受……

10天以前我就提议，凡是日本人需要知道的问题，我都愿意向他们解答。然而，日本人对我的态度表明，如果全权委员不以舰队作后盾，不对日本人挥舞炮弹以代替商谈，跟他们是什么

① 指第二次鸦片战争。——译者

> 也谈不成的。我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他们以后，立刻把话停住。我最后的一句话是：如果任何协议也达不成，我就回下田去了。也真令人可怜，信浓守浑身哆哆嗦嗦地倾听完后，指天划地向我发誓，决没有轻视总统和侮辱我的意思。明日是星期天，我不办公，所以不能在第二天得到答复，但他却向我保证，一定在明天作出使我满意的答复。
>
> 这在我看来显然是蛮横的措置，但我又认为，根据这个国家的人民对我的认识，用这种方法同他们谈判，我决不会遭致使谈判破裂的危险，而我越是屈服，越是默从，他们就越会欺负我，但一采取蛮横的态度，使用威吓的口吻，他们就会马上服从我（同上书，第104—105页）

2月末谈判顺利结束。这项条约的草案承认日美两国人民贸易自由，规定新开神奈川、新潟、兵库等为开放口岸，准许美国人长期居住在江户、大坂做生意。而不懂外交事务的幕府，没有对哈利斯的要求表示反对，就承认了单务的治外法权。还有一点，日本的关税税率，对出口货一律定为从价5%，对进口货原则上定为从价20%，再根据商品的不同设立几个等级。这就放弃了关税自主权。

幕府为在条约签字前得到朝廷的敕准，要求哈利斯宽限签字
70 日期。为了防止朝野可能提出异议，朝廷的敕准是必要的。哈利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时为何还需要天皇的裁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幕府高官]在谈到天皇时，无不使用近乎轻蔑的口吻，而当我使用日本人对天皇表示尊敬的某些词句时，他们哈哈大笑起来。据他们说，天皇既没有钱，又没有政治权力，在日本受到尊重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他不过是个一文不名之士。"（1月28日，同上书，第135页）。"日本人谈到这个君主的事情时表示出的近乎轻蔑的态度，[同他们要求敕准的做法]也太不一致了。"（2月20日，同上书，第180页）

违敕签字、将军继嗣　幕府本以为很容易就能得到朝廷敕准条约的签字。但是，安政 3 年 12 月幕府派去的使者，出乎意外地未能得到朝廷的批准，翌年 2 月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上京亲自请求。他原为佐仓藩主，安政 2 年 10 月出任首席老中，3 年 10 月被任命为最初的外国事务取扱①。他无论怎样说服和馈赠，都未能劝动朝廷，反而在 2 月 23 日接到朝廷以通商条约的签字为不得随意决定的“国家之重事”为由下达的“犹应由将军饬令三家以下诸大名众议后再奏”这样保留敕准的圣旨。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幕朝疏远呢？

堀田是由彦根藩主井伊直弼等在溜间值班的谱代大名推荐而出任首席老中的，但他是一个像他的绰号“兰癖”②所表示的那种喜爱西洋文物的开国论者。一些在溜间值班的谱代大名也反对强行攘夷。一些知道财政匮乏和海防薄弱实情的人认为，攘夷开战无非是卤莽无谋的行动。而齐昭等三家、松平庆永等大廊下级一门大名和大广间级外样大名，则非难幕府的方针软弱。齐昭主张，使国是一决于攘夷，以振奋士气，扩充武备，利用对外危机收拾叛离的 71
民心。他也知道开战有困难，但他不向幕府当局明说，而采取表面上高喊主战攘夷而实质是“内战外和论”的立场。这个外交路线的对立，还与幕政改革主导权的争夺结合在一起，即利用阿部老中的联合雄藩路线进入幕阁的一门、外样大名，拟联合雄藩以抑制幕阁专制；而阿部辞职（安政 2 年辞去首席老中职，4 年死去）后以井伊直弼为首的收回了失去的权力的谱代大名，则想排除雄藩的介入以强化幕阁专制。

这个对立发展到京都，把朝廷卷了进去。齐昭看到幕阁没有采取他的自相矛盾的非现实的主张，便大力煽动激昂慷慨的攘夷论，并为感动朝廷而努力“进京修好”。于是，尊王与攘夷结合起来了。

---

① 外国事务取扱，可译为办理外国事务专员。——译者

② “兰癖”即兰学癖或荷兰癖，可以译为“荷兰迷”。——译者

关于这一点，福地樱痴(即福地源一郎)评论说："攘夷是睿虑，奉睿虑而攘夷是尊王，而以攘夷为非则是违背尊王之大义。经议论而确立这一大法则之后，则树立起以尊攘为大义的旌旗。"他又说道：

> 武士亲近公卿本为幕府法令所禁，而为防止诸大名敢于违犯此禁，也采取了断其交通之路的措施。但今所谓尊攘之大义名分，正是破此法禁而开了进京之通路。而无水户老公[①]协助，则无法开此通路。盖水户为幕府的亲藩，自义公[光圀]时开始，就已与京都公卿亲密来往，所以到老公时，出现基于此种因缘向京都上表之事。……说安政五年进京修好之事，已在此表中呈现其征兆，并无不可。(《幕府衰亡论》第68—70页)

72 另一方面，至今一直被冻结于政治圈外的朝廷，自阿部老中奏闻外交事务以来便开始活化了。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完全追随幕府或主张单纯而孤陋的攘夷论，但后者已逐渐把眼睛转向批判不能实行攘夷的幕府。煽起这种批判的，是以水户为首的攘夷派的各藩或浪人的进言。于是，留恋昔日的王政和梦想再掌政权的公卿，和欲以敕命的权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幕阁(或欲使幕阁陷入困境)的反幕阁派，通过阴谋和贿赂结合起来，使京都成了尊王攘夷运动的策源地。为了反抗，幕阁也进行了把朝廷拉进自己行列的策动。朝廷或睿虑，由于卷入两派的斗争，而开始被赋予政治任务。前述的保留敕准条约签字的做法，不外是朝廷在政治上活化的表现。

更使事态复杂化和深刻化的是将军继嗣问题。将军家定病弱无能，且无嗣子。企图抑制幕阁专制的改革派(一门与外样雄藩，即齐昭、松平庆永、岛津齐彬等人)，在开国还是锁国的问题上虽然意见不一，但为了解除危机，在主张推举英明之誉颇高的一桥庆喜(齐昭的第七子，当时17岁)继任将军的问题上却采取了联合行

---

① 对水户藩主的敬称。——译者

动。从安政 3 年秋开始，推举运动公开化了，幕府有司的开明派也支持这个运动。这个一桥派虽因支持这一派的阿部在安政 4 年病死而受到打击，但齐彬（安政 5 年 7 月死去）、庆永等人却继续向朝廷进言，几乎达到在安政 5 年春下达内敕落实继嗣问题（由庆喜继嗣）和敕准条约签字的地步。这样，朝廷的意见开始倾向一桥派，但为敕准条约签字而说服和贿赠堀田老中一事没有收效。

同一桥派对抗而欲维持幕阁专制的井伊直弼等保守派，为要 73
拥立与现任将军血统最近的八岁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而团结起来，被他们推荐而当上首席老中的堀田也参加进来。但是，深知朝廷倾向于一桥派的堀田，感到要想打开幕府的困境只有拥立庆喜。他于 4 月回到幕府后立即与庆永联系，有意让庆永出任大老，但反齐昭派的老中格松平忠优（忠固），在堀田上京期间与南纪派[1]勾结，向唯恐齐昭介入幕政和干预将军内府的内府进言，并在堀田回到幕府后第三天，即 4 月 23 日，突然让井伊出任了大老。不用说，他的任务是解决通商条约签字和将军继嗣（以庆福为嗣子）问题。

于是，井伊大老决定擅自在通商条约上签字。不，是被逼决定的。回到下田后焦急地等待敕准签字的日期（7 月 27 日）到来的哈利斯，听到 6 月 13 日在下田进港的美国轮船传来的英国已将印度的叛乱镇压下去、英法联军已使中国完全屈服（签订《天津条约》）并乘其强势编成联合舰队正向日本开来、俄国舰队也继其后开来的消息（这个消息不过是传闻）后，断定这正是迫使日本在条约上签字的大好时机，同时认为即使犹豫片刻，也会使至今所作的努力化为泡影，遂乘正好在此时驶来的美国军舰“波瓦坦号”（Powhatan）离下田来到小柴附近海面，要求幕府的高官到舰上来会谈。来到美舰上的幕府谈判代表，告以不能在约定的日期前签

① 南纪派、即主张拥立庆福的纪州派。——译者

字，但哈利斯威胁说，要想避免战祸和不幸，在灾祸到来之前完成“最公正而妥善的条约”的缔结手续并使列强亦仿效之，方为贤明，
74 而如有提出不法要求的国家，他将自身出面调停，挫败其野心。随后，他又立字据担保而强迫幕府同意。谈判委员是当时最积极的开国论者，所以心想“开国的良机已至”，便急速回幕府报告，反复重述哈利斯的话，要求幕府作出果断的决定。仍在踌躇并想拖延的井伊大老遂无计可施，才作了“万不得已时，亦只有不待敕准而签字”的许诺。签字是安政 5 年 6 月 1 日（1858 年 7 月 29 日）在“波瓦坦号”上进行的。随后，日荷、日俄、日英的通商条约在 7 月签了字，日法通商条约在 9 月签了字。

福地对此评论说：

> ……毋庸置疑，井伊氏就任大老之前，早已详知水户正在京都如何进行修好（修好[手入れ]一词为当时的用语，指在德川氏的制度下，严禁武门与公卿往来，但武门干犯此禁令密与公卿联系），所以井伊氏就任大老伊始，便认为遮断修好之路以安幕府为第一要策。他内心以为：（一）朝廷之事可畏，不得言，而见其他亲王、摄家、清华①之公卿时，更不得谈内外之国事，有见识敢谈开国锁国之事者无。今之喧嚣只出于尊攘家之煽动。（二）尊攘家之首为水户，而水户老公主张此论，其目的无非是煽动各方有志之士而最后影响京都。老公身为摄政，专于政务，必采取立其嫡出一桥刑部卿为将军储之策略。（三）故老公进京修好首先必导致干涉幕政之纠葛，立一桥卿为储君，由此完成解决京都与幕府之纠葛的密谋。

根据如上推测，幕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以英断治尊攘论之
75 本，而治京都为末，且容易治之。于是，第一着就是不待敕准而

① 摄家，指摄政、关白之家；清华，亦称清华家，指大臣及与其同资格者之家，其格位于摄政之下。——译者

于条约上签字。(《幕府衰亡论》第 87 页)

条约签字五天后，即 6 月 24 日，齐昭和尾张藩主德川庆恕(庆胜)突然来到江户城，当面指责井伊大老违敕签字，并建议拥立庆喜，但在第二天，幕府却公布了立家茂(庆福改名)为嗣子的决定。随后在 7 月 5 日，命令齐昭谨慎、庆永谨慎隐居、庆喜停止登城①。第二天，将军家定殁。在继嗣问题上失败的一桥派和改革派，以违敕问题攻击井伊。蜎集于京都的各藩的志士浪人，向朝廷进言。朝廷在 8 月 8 日向水户藩下达《戊午密敕》，责问幕府为何违敕签字和处罚齐昭等人。密敕的附件饬令水户藩向三家、三卿、一门以及列藩传达此密敕。获悉下达密敕的井伊大老大怒，从 9 月初开始逮捕志士浪人，从翌年 8 月到 10 月，先后将桥本左内、吉田松荫等人处决。1 月和 2 月，参与一桥派活动的青莲院宫朝彦亲王和摄家清华的公卿，受到辞官、谨慎、剃发等处分；8 月，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川路圣谟等一桥派优秀官僚，受到隐居、谨慎或左迁等处分。

但对于安政 5 年 8 月的《戊午密敕》，在水户藩内部因主张按密敕办理的激派与希望慎重行事的镇派的对立而发生纠纷；而在幕府方面，则于安政 6 年 12 月接到密敕的圣旨，于是命令水户藩将密敕上交给幕府。因此，在水户藩内部，认为应当上交的镇派与主张不可上交的激派的斗争激化，但会泽正志斋提出的不经幕府而由水户藩直接交回朝廷的直接交回论最后成为藩议。然而，幕府加强压迫，激派却不服，遂聚众反对上交，制造声势，结果遭藩兵镇压，纷纷逃亡。他们又与萨摩藩的激派搞水萨联合。在萨摩藩的激派当中，也有人主张与他们联合一起问鼎中原，但被大久保一藏 76
(利通)等镇派阻止。水户藩的激派获悉幕府限期上交密敕后，于万延元年(1860 年)3 月 3 日在樱田门外冲进井伊大老的护行队列，

---

① 谨慎、谨慎隐居、停止登城，均为行政处分。——译者

斩掉井伊的首级。在参与谋杀的 18 人中有一名萨摩藩士。

现对本节作一小结。条约签字和将军继嗣问题使幕阁两分，而一桥派与尊攘派志士浪人进京修好，则使朝廷政治化和政局扩大，以至发生朝幕两极化。这场斗争随井伊出任大老、条约签字和决定庆福为将军后嗣，而使南纪派获得胜利，但井伊因镇压尊攘派而被暗杀，又使幕阁失去其中枢。如将从 1853 年柏利来航至 1858 年算作幕末维新史的第一阶段，则从 1858 年条约签字至 1860 年樱田门外之变就为第二阶段。西南外样雄藩还没有动。他们闯进政局后使政界更加扩大和两极化，是第三阶段。（参阅大久保利谦编《日本历史体系》4，第一编第一章）

77

二　公武合体　尊王攘夷[1]

公武合体、朝幕修睦　井伊被刺杀后，安藤信睦老中（盘城平藩主）让久世广周（关宿藩主）与自己同为首席老中，继续推进朝幕关系的和好工作。他一方面请求朝廷将皇妹和宫下嫁给德川家茂（文久 2 年[1862 年]2 月实现），另一方面要求英国同幕府进行关于延期五年开放新潟、兵库为对外口岸与延期五年开放江户和大坂为对外城市的谈判。阿尔科克[2]公使所以答应了这项要求，是因

---

① 公武合体，是幕府末期企图利用朝廷的传统权威来改组和加强摇摇欲坠的幕藩体制的政治运动。公指朝廷，武指幕府或雄藩。因此，这个运动就形成了以幕府为中心和以雄藩为中心的两派互相对立和交错的争权夺利斗争。以幕府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运动，始于井伊老中掌握幕政时期，继由安藤、久世两老中推进，孝明天皇的妹妹下嫁德川家茂为其代表成果。以雄藩为中心的公武合体运动，由长州藩和萨摩藩相继推进。前者以"航海远略策"压迫幕府奉朝命实行开国政策，后者以奉敕命迫使幕府实行幕政改革。

与公武合体运动竞争并欲压倒它的是尊（王）攘（夷）运动。本章就是以这两项运动为主线来叙述幕末维新直至明治国家的成立的。——译者

② 阿尔科克（Sir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汉名阿礼国，曾在福州、厦门、上海、广州等地任领事，还担任过驻华公使。——译者

为他想使幕府历来的对美依存改为对英依存，叫幕府派使团去英考察以促进幕政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之乱结束后，英国的关心转向了日本。（另外，美国在1861年开始了南北战争。）安藤老中等人也对派遣使团很感兴趣，向朝廷提出了积极的开国意见。万延元年（1860年）4月幕府设立的国益主法司，就是以顺应贸易的发展奖励出口货生产、统一管理全国市场和增加贸易收益而强化幕势为目的的。还计划大规模改革军制以强化幕府陆海军。但是，文久2年1月安藤老中在坂下门外被水户浪士击伤，而于4月辞职。（关于延期开港与开市的《伦敦备忘录》，于文久2年6月签字。）

但是，各藩的尊攘激派互相联络和集结，群集于京都向朝廷献言，而他们在藩地的势力并不强大。水户藩的激派因内讧激烈而脱 78
离尊攘运动。齐昭已在万延元年（1860年）8月死去。在其他藩，掌握藩政的是门阀派和上级士族阶层，他们想在朝幕修睦（公武合体）中作出贡献，以使本藩在政局中掌握主导权。这只是尊皇，既不攘夷，又不讨幕。

长州藩的直目付①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公武合体的开国论），在文久元年（1861年）3月被决定为藩是（藩的基本政策）。他于5月携此方案进京向朝廷献言，并持公武修睦的密函转赴江户。正在苦思修复朝幕关系的幕阁（久世、安藤）接受了他带来的密函。后来，藩主毛利庆亲又于12月正式向老中提出此项建议。长井继续为公武修睦奔走，看来长州藩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

在萨摩藩方面，安政5(1858)年岛津齐彬逝世，岛津忠义继任藩主，但掌握藩政实权的是他的父亲岛津久光（齐彬之弟）。久光是一位坚决的公武合体论者，他虽然继续任用曾是齐彬亲信的西乡

---

① 直目付，藩内监督大名或旗本的官吏。——译者

吉之助(西乡隆盛)和大久保一藏(大久保利通),但对藩内的尊攘激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西乡、大久保等不能越过久光的公武合体路线的雷池,而策划拥立久光举藩问鼎中原。于是大久保在文久元年末进京,向近卫家[1]提出久光率兵上京的计划,请给予理解和支持。该计划请求朝廷下诏,敕令不日来京的500余名藩兵驻京守护(藩兵外调系禁制,故要求以诏敕的名分来京),派敕使下江户传达改革幕政的命令(由庆喜担任将军的监护人,由庆永担任大老);还称"关于德川家扶助朝廷与公武合体之圣旨"乃先君齐彬的遗志,从而排斥了长州藩的尊攘论,树起了公武合体的旗帜。

79 文久2年3月,久光率藩兵1 000余名由鹿儿岛出发。流放于大岛的西乡也被召回,使其先行至下关等待久光。但到达下关的西乡,获悉京师风云告急和天下志士浪人速请久光进京并在策划举兵后,没有等候久光便立即东行了。后来赶到下关的久光,见此情景很不高兴。而关于西乡勾结浪士的传闻,又损伤了久光的感情。随久光而来的大久保,自告奋勇去追西乡,遂由下关出发。详查他的日记,他于4月6日抵达京都见到西乡。西乡说:"我不诱浪士亦不嫌浪士,惟恐他们为无谋之举而误大事,故我至今以说服他们使之冷静为宗旨,乃在座诸君所皆知,亦我之所任也。一旦我举足离开此地,恐难保无事。"大久保听完后,终于安下了心。于是,两人高谈阔论,话如泉涌,及至鸡鸣。4月8日,大久保在兵库大藏谷迎接久光,向他报告了事实的经过。但久光根据其他情报,对西乡勾结浪士一事深信不疑,听不进大久保的解释,反而对大久保也起疑心,要把他斥出大厅。西乡不知此情,他得到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建议书后,于4月9日飘然来到兵库宿营。这个建议书主张幕主

① 近卫家为历史悠久的名门贵族,出过摄政、关白、太政大臣等高官。这时,近卫家的忠熙正受到孝明天皇的宠信。——译者

朝从的公武合体，要求镇压志士浪人。为与长州藩争霸而率兵东上的久光，是朝主幕从的公武合体论者。西乡是为劝说久光采纳尊王讨幕之策而来的。大久保的日记(4 月 9 日)说："与大岛风[西乡的化名]一起去，他心中十分难过。"大久保为了安慰西乡，便领他到月明海滨远方的一个荫蔽地方去了。

80 根据本田亲男的手记所载，大久保说："自伏见归来，向公禀述兄镇抚浪士之始末及心事之所在，但未见公之震怒心态有所变。我未归来之前，已闻命某小监察喜入率数名步卒擒拿兄。谒公之念乃消。陷入此等处境，我亦将被斥离君侧。多年尽瘁，及至大展宏图，竟化为泡影画饼，实无是非矣。此天命也。我认为，不能无缘无故被奸吏捕捉，应自尽而死。我不阻止兄自尽。我今在世生而无何可为，也只有死而已。死则必与兄相对共刺而死。此我志也。志已定。故伴吾兄来此无人之地。"西乡回答说："没有想到一藏能出此言！公之激怒与君侧形势既已如此，今后更将无是非矣。我非如君所想应自尽而死。纵令遭缧绁之辱，受任何申斥，亦忍耐从命，以期见到大计之前程。君亦应如此。如今我二人共刺而死，则天下之大事将去矣。迄今推行之原定划策何人继续？男儿当忍耐之事非此事呼。如我二人死去，皇室将如何？国家将如何？忍辱负重只此时也。勉之，勉之，勉之。"西乡被送回了鹿儿岛。次日(10 日)，本田去寻找西乡。据说在安治川。搜查数百只小船后已至初更，忽见一只小船驰来，西乡盘坐在上面，村田新八等同僚也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问他是否平安？西乡说："勤王乐道所得之果也"，然后哈哈大笑。(胜田孙弥《甲东逸话》第 31—43 页)

81 4 月 16 日进京的久光，23 日在伏见寺田屋大斩谋划举兵讨幕的激派藩士，5 月随敕使大原重德去了江户。敕使提出的"三事策"为：1)将军率诸大名进京，在朝廷议国事，这是采纳长州藩的将军进京论；2)以沿海五大藩主——岛津、毛利、山内、伊达(仙台藩)、

前田为“五大老”以咨问和决定国政，这是岩仓牵制萨摩藩独自行动的雄藩操纵策；3)以庆喜为将军的监护人，任庆永为大老，这是前述的萨摩藩主张。幕府被迫接受了这“三事策”。于是，借朝廷的权威而介入朝政的萨摩藩的意图得以实现，久光意气扬扬地由江户归京了(在归途中，8 月发生了萨摩藩士杀伤英国公使馆员的生麦事件)，但欢迎久光归来的京都的政治气候，一变为尊王攘夷。

攘夷亲征、八月十八日政变　京都的政治气候为何一变为尊王攘夷呢?一直激烈非难长井的航海远略策的长州藩激派，见久光率兵进京并去江户，心中产生疑虑，遂向朝廷献言。朝廷里尊攘论占居优势，5 月长井向朝廷献航海远略策时，朝廷以“似对朝廷之措置聊有谤词”为由将建议驳回。7 月，长州藩的藩是由公武合体变为“废约攘夷”(连和睦条约也废除而攘夷)。长井失势，翌年 2 月受命自刃。尊攘激派以“天诛”威吓公武合体派公卿，获得了不仅否认通商条约而且否认已被敕准的和睦条约的“睿虑”。回到京都的久光，对事情的变化出其意外表示惊奇，他向关白建议：勿随便采纳“匹夫”“激徒”的意见，也不要让公卿诸公同他们面谈。但是，建议未被采纳，久光愤然离京归藩。

82 久光归藩后，在京的激派把土佐、长州两藩的藩主抬出来做领袖。于是，土佐藩主山内丰范和长州藩嗣子毛利元德，护送敕使三条实美于 10 月去江户，向幕府传达督促共同攘夷的敕旨，幕府决定遵旨。在这前后，诸藩主相继进京接受洽商国事的朝命，京都成了对抗江户的政治中心。马场文英的《元治梦物语》(1905 年)说，从文久 2 年末至 3 年春，进京的藩达 70 余，还有旗本等也来到京都。“在京师无宅邸者，则暂以大寺院为本营，故京都内外各处大小寺院均成兵营，以致后进京的各藩只好在远处借用民房作为宅邸。还有在吉田、白川、山边边、御室、嵯峨、松尾、西岗边等处构筑阵地者。藩士们骑马在市内徘徊游荡，到处游览，熙熙攘攘，京师呈现的

热闹景象为前代所未闻。""于是，壬戌年[文久 2 年]过去，癸亥年[文久 3 年]春至。在京诸侯身着盛装，按官位等级列队，与众公卿一起参加元旦朝贺。下级官员身着布衣、素袍、白丁[①]，在宫门外面整齐列队，等待参朝。九门外，执仪仗、牽佩马的仆人群集，等待主人退出。入夜，彩灯高悬，排队成行，宫中宛如白昼。朝威之盛况，为由古至今所未闻。"（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1，第 45 页）

文久 3 年(1863 年)3 月，将军家茂进京。政局混乱是因为政出二门，所以要打破这个局面，不是幕府将政权上交，就是朝廷将政权委任于幕府。将军监护人庆喜要求天皇将政权委任于幕府，而敕答称："征夷将军，迄今由朝廷委任"，"而今国事，凡涉及诸藩的，宜交诸藩处理。"这是一种有限制的委任。尊攘派运动达到最高潮，长州藩掌握了主导权。

3 月，天皇采纳长州藩的建议行幸贺茂上社下社[②]祈求攘夷顺 83
利，将军家茂亦随行。4 月，又按长州藩的建议行幸石清水八幡[③]祈求攘夷成功，家茂以生病为由没有随行，由庆喜代理。于是，在朝廷的再三强制下，将军以 5 月 10 日(1863 年 6 月 25 日)为攘夷日期奏答，并向诸侯布达，令他们在这个日期以后，凡西洋诸国有攻击行为，可当即击退之。幕府并不希望诸藩进行积极的进攻，但 5 月 10 日长州藩在下关海峡攻打了美国商船，随后又攻打法国和荷兰的军舰。消息传到京都，传下"朕极高兴"的褒敕，并鼓励诸藩也照此办理。6 月，英法军舰进行报复，炮击长州藩炮台，陆战队上陆破坏炮台，并击沉长州藩军舰两只。幕府遣使斥责长州藩不该违反幕命积极攻打外国舰船，但长州藩斩了来使，对幕府采取公然反抗态

① 布衣、素袍、白丁、均服装名称。比如，在江户时代，布衣为武士的四等服装。——译者

② 贺茂上社，为今位于京都北区上贺茂的贺茂别雷神社；贺茂下社，为今位于京都左京区下鸭的贺茂御祖神社。——译者

③ 石清水八幡，指位于京都附近的八幡的石清水八幡宫(神社)。——译者

度。

7 月，爆发萨摩藩与英国战争（萨英战争）。为处理前年 8 月的生麦事件，英国同幕府进行交涉，但未获圆满解决，于是英国派 7 只军舰来鹿儿岛要求赔偿。由于未得到满意的答复，英舰便炮击萨摩藩炮台，火烧鹿儿岛市街，但因煤炭、炮弹和粮食不足，而中止战斗退去。对此也下达了“朕极高兴”的嘉奖。但是，经过这场战争，萨摩藩已痛感攘夷困难和急需引进西洋文明，不久便答应对生麦事件进行谢罪、赔款和捕获犯人后处死，以解决此次事件，向亲英开国政策转变。

但进入 8 月，朝廷却按长州藩建议请天皇在 8 月 28 日行幸大
84 和，参拜神武天皇陵和春日神社，以祈求攘夷顺利。随后又发表召开攘夷亲征军事会议后行幸伊势神宫的消息。这个攘夷亲征含有讨幕的意思。庆喜就此说道：

> 其实，逼得朝廷下定讨幕的决心，在组建御林军（文久 3 年设立，9 月解散）的时候就已见分晓。但在行幸贺茂的时候，只是以此打击一下将军的权威。以后，又为此行幸八幡。在行幸八幡的时候，是再进一步打击将军的权威，并欲达到有可能严重破裂朝幕关系的地步。其后，在行幸大和的时候，紧张关系的程度达到了极点。到大和行幸和召开军事会议就是讨幕。因此，讨幕是分贺茂行幸、八幡行幸、大和行幸三个阶段逐渐发展起来的。（《昔梦会笔记》第 205 页）

但在由长州藩掌握主导权的尊攘运动达到最高潮的瞬间，文久 3 年（1863 年）8 月 18 日突然发生了排除长州藩于运动之外的政变。对长州藩的操纵权一直不满的萨摩藩，联合中川宫（后封为贺阳宫）朝彦亲王以下的朝廷公武合体派，与当时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密谋，用萨摩、会津两藩的藩兵加强保护宫阙，阻止尊攘派的宫（亲王）、公卿进宫谒见，召开御前会议把这些

宫、公卿革职，由公武合体派的宫、公卿代而出任朝廷的要职。革职的理由是：勾结长州藩、“歪曲睿虑”、发布伪敕，是为不忠。庆喜的谈话说：

天皇认为，不管是把兵权委于萨摩还是委于长州，他们谁也治理不好。天皇告诉我，无论如何还是像以前那样，把兵权委于德川家为好，因为现今除此之外谁也治理不好。由此看来，这与公开的表态完全不同。但皇上告诉我，不得把他的话外传，叫我自己心里明白即可，决不可向他人说。可又不能不开口，说什么 85
好呢，真难办。

说到先帝的睿虑，真使我感到诚惶诚恐。他对外国事情向来一无所知。先帝说，至今他一直听说外国是禽兽之类的东西，但只是耳闻，所以一听说这些东西要来，就感到讨厌。先帝说，总而言之，同猫狗在一起，令人讨厌，别的倒没有什么。先帝又说，希望大家想个办法把这些东西撵走，但由此打仗也令人讨厌，还是想个办法把它们撵走为好。

这是因为那些向天皇进言的人什么也不懂。我最初进京时曾对鹰司关白说过，外国当时能造轮船、大炮等等。他说真的吗，好像大致明白了。但在他好像大致明白了以后，再进一步深入解释时，他却说决不要怕，因为日本有大和魂。真不知他明白了还是没有明白。然而，就是这样的人在向陛下奏报外国事情。因此，陛下不明白也就理所当然了。向这样的人垂询，他们也不可能正确奏答出来。（同上书第 162—163 页）

一直对长州藩和尊攘派的宫、公卿左右朝议甚为不满的孝明天皇，欢迎这次政变。过去的攘夷亲征钦命并非皇上的真的睿虑，因而声明亲征延期，公布了内称“迄今不明孰真孰伪，而 18 日以后所奏乃符朕之真实本意，故望诸藩一体周知勿违”的订正敕旨的宸翰。久光请求上京，10 月奉召进京，12 月拜受了内称“望各地公武

携手，和睦治国为盼”的宸翰。

文久 3 年（1864 年）12 月，任命将军监护人一桥庆喜、土佐前藩主内山丰信、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越前藩主松平庆永、会津藩主松平容保，稍后又加上萨摩藩主之父岛津久光等 6 人为朝议参
86 预，成立参预会议；文久 4 年（1864 年）1 月奉召进京的将军家茂，拜受了内称“有勇无谋之征夷实非朕之所好”的望朝幕同心协力以在将来成就攘夷大业的敕语和宸翰。

然而，幕府看到政变后取代长州藩而势力日增的萨摩藩以其朝主幕从的公武合体论支配朝廷的形势，便对亲萨摩藩的宫、公卿施加压力，诱导他们倾向幕主朝从的公武合体论，以期回复幕府的地位。另外，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幕府和萨摩藩也有对立：幕府想继续维持对外贸易垄断，而萨摩藩要求参加对外贸易。因此，参预会议只存在两个月就解体了。而且，3 月庆永辞去将军监护人职务，出任禁里御守卫总督兼摄海防御指挥；4 月朝廷对家茂下达大政委任的钦命，由此幕府加强其回复参勤交代制等挽回幕权的活动。在对抗幕府的这次卷土重来的萨摩藩，由亲英开国派五代才助（友厚）和松木安弘（寺岛宗则）主持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割据富国”（在藩内强化军备和殖产兴业）政策。这样，幕萨关系开始疏远，而萨英关系则增加了亲密度。

征伐长州、下关战争　被政变逐出京都的长州藩，以政变以前的攘夷才是真的睿虑，而以后的东西则是出自中川宫朝彦亲王和“萨贼会奸”[1]的私自伪造为由，于元治元年（1864 年）7 月 18 日举兵进京，直迫禁门，与幕军交战后败退。立即下达了讨伐长州的朝命。正值此时，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在 8 月 5 日出现于下关，要求赔偿前年 5 月的攘夷炮击和保证下关海峡通航安全。联合舰

① 会奸，指参预会议的六个人。——译者

队共有军舰 17 只(英 9,法 3,荷 4,美 1),大炮 288 门,官兵 5 000 余名。

根据阿尔科克公使作成的备忘录,他策划攻打下关的意图是: 87
破坏攘夷派中最强暴者之要塞;让"上自皇帝、大君[①]下至佩带两把刀的武士和浪人的全部支配势力"认知攘夷是不可能的;像萨英战争的实际教训使萨摩藩"改宗"开国论那样,以此次新的实际教训使长州藩"改宗"。阿尔科克希望召开"大名会议"改订条约,以要求提前开放新潟、兵库、大坂、江户(原定)和随即开放延期开港开市大名领内的口岸(鹿儿岛、下关),解除幕府的对外贸易垄断,使各大名参加对外贸易。(石井孝《明治维新舞台背后》第 18—24 页)

欧内斯特·萨托[②](文久 2 年即 1862 年到横滨出任英国公使馆翻译官),在其回忆录中说,这年春天授以很大权限而归任的阿尔科克公使,"已下决心要膺惩长州藩的敌对态度。我们可以说已经得到萨摩的善意对待,所以有充分理由期待,如果对另一个攘夷派首魁长州也使用对付萨摩那样的手段,将会得到同样的效果。"(《一个外交官所见的明治维新》上,第 115 页)

这时正在英国留学的伊藤俊辅(博文)和井上闻多(馨),偶然从《泰晤士报》上获悉长州藩攻打外国船只和萨英交战,便急速踏上归国之途,于这年 6 月到达横滨。但在横滨听说四国舰队计划炮轰下关后,便立即会晤阿尔科克,要求其等待藩转变态度,然后乘英舰归藩,以必死的决心力陈不可攘夷而应开国。然而,藩厅以攘夷乃睿虑和幕命为由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于是,四国舰队于 8 月 5
日开始炮击。只用三天,陆战队就占领了全部炮台,破坏后撤走。为 88
处理善后,藩厅起用了高杉晋作。于是,以高杉、伊藤、井上等人为

① 大君,对将军的尊称。——译者

② 欧内斯特·萨托(Sir Ernest Satow,1843—1929),汉名萨道义,日名佐藤爱之助。英国的日本通,曾任驻华公使,代表英国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他的回忆录的英文原名为"A Diplomat in Japan",日译本名为《一个外交官所见的明治维新》。——译者

委员，与英国缔结了载有下关自由通航、赔款等五条的讲和条约。

现在来谈谈征长军。征长军动员了35个藩的藩兵，好容易在11月才于广岛进入阵地，但总督德川庆胜一直期待在讨伐开始之前长州藩能够谢罪投降。接受这项授意的总督参谋西乡，劝告长州藩对三位家老处以死刑，以表示对幕府恭顺之意。长州藩因高杉等急进派（正论派）与保守派（俗论派）对立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保守派占有优势，所以接受了西乡的劝告而决定恭顺，交出三位家老的首级，提出藩主父子的认罪书，于是总督在12月27日下令各路追讨军撤兵。但在这个月的15日，高杉打起“人民安堵”的旗号举兵于下关，集结以奇兵队为首的各部队，使长州藩进入了内战状态。奇兵队是高杉等从攘夷炮击时期开始主要由下级藩士和农民组成的辅助藩正规军（正兵）的部队。被确认为奇兵队员的622人中，身分不明者占10%，藩士占44%，农民占38%，神社僧侣占4%。

正论派受到濑户内沿海地带的豪农、豪商支持，比以北部地带为根据地的俗论派藩政府强大，在元治2年（1866年）2月夺取了政权，于3月决定以“武备恭顺”为藩是。即采取在藩内实行“大割据”、加强战斗态势、对付幕府军进攻的战略。他们采用西洋战法，把支藩、高官家臣的军队以及杂牌部队和农兵队置于藩的统一指挥之下。随着军制改革，还简化了行政机构。这一派的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为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在他之下有高杉、井上、伊藤等人。

由此成为反幕的武力据点的长州藩，也同时转向开国路线。下
89 关受攻的实际教训，是使长州藩痛感必须购进武器，而攘夷和锁国都是没有意义的大义。但是，只要幕府仍垄断对外贸易，就只有通过走私购进武器。于是，下关成为走私基地，制造死亡的商人云集，形成下关——长崎——上海的走私路线。因此，为了增产国产出口

货，而加快了执行以设置藩营工厂、向民间出售藩产、培养政商等为内容的殖产兴业政策。

对这一节作一小结。萨长两藩竞相进入已经朝幕两极化的政界，企图通过朝幕修睦而掌握政局的主导权。但是，在竞争中急进化并在1863年掌握了主导权的长州藩，发展到攘夷炮击和策划攘夷亲征后，被八月政变逐出朝廷，第二年攻击禁门又遭失败，在第一次幕长战争后进入了藩内割据体制。而以八月政变掌握主导权的萨摩藩，则欲通过雄藩会议挤进幕府，参与幕政，但幕府的卷土重来使雄藩会议解体，也转向了藩内割据。可见，萨长两藩都是从1861年的朝幕融合转向1864年的藩内割据，同时又各自接受本身的实际教训（萨摩藩是1863年的英萨战争，长州藩是1864年的下关战争），放弃攘夷而采取了开国、亲英政策的。这是幕末维新史的第三阶段。萨长仍处于疏远对抗之中。法国还没有出来支援幕府。（参阅大久保利谦等编《日本历史体系》4，第一编第二章第1—3节）

三　萨长协约　尊王讨幕 90

罗歇、帕克斯　元治元年（1864年）3月作为法国公使到任的莱昂·罗歇[1]（在法国北非殖民地工作30余年，曾任驻突尼斯总领事），为与英国对抗而积极接近幕府，以实现幕法提携。在幕阁内，也于这一年11月罢免提倡雄藩联合论的军舰奉行胜麟太郎，而使取代他的小栗忠顺所领导的主张幕权振兴论的亲法派掌握了主导权。元治2年（1865年）1月为修造军舰而委托法国设计施工的横须贺制铁所，是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几个包括炼铁、机器制造、

① 莱昂·罗歇（Léon Roches，1808—?），此人曾为日本建设近代海军和陆军出力颇多。——译者

造船等生产部门的大联合企业。总投资 240 万美元，预定 1868 年底完工。这就是后来的横须贺海军工厂。为振兴幕法贸易，小栗勘定奉行等人又在这一年 8 月建议制定“日法组合商法”，以在日本设立商业航海大会社，在法国设立输出入会社，使日方的代表驻在巴黎和法方的代表驻在横滨。这是一个以向法国出口生丝和蚕种偿付武器等军需品的货款的组织。

但是，幕府看到如前所述的长州藩转向武备恭顺和大割据后，便于庆应元年(1865 年)4 月再次举兵征讨长州藩。随后，根据罗歇的建议，幕府要求英美荷三国禁止本国船与长州藩搞走私贸易，并
91 由罗歇发起，英美荷法四国代表共同议定，在日本发生内战时应采取严正中立、绝对不干涉等立场。也就是说，在国际法上承认幕府是日本的合法政府，但长州藩也不是叛军，而被视为“交战团体”。这个共同议定虽不一定对长州藩不利，但从不准走私这一点来说，却是对长州藩的打击。于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走私方式，在长州藩的木户、井上、伊藤，萨摩藩的西乡、小松带刀(清廉)，土佐藩的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以及长崎的英国商人格洛弗[1]之间，成立了一项协定：长州藩以萨摩藩的名义用萨摩藩的船只秘密购进和输入船舶武器，由坂本等设在长崎的龟山社中[2]负责运输。最初一批武器，是井上、伊藤等于 7 月在长崎购进的。互相反目的萨长，开始通过武器走私团结起来。这年 9 月，幕府得到再征长州的敕命，但大久保利通在 9 月 23 日致西乡隆盛的信里，却就此项敕命写道：“有正当的理由方可为天下万民所诚服，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敕命，而非义的敕命则不是敕命也，故不可遵奉。”(《大久保利通文书》

① 格洛弗(Thomas Blake Glover，1838—1911)，日名仓场，曾在日本经营铁路、煤矿等。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是由他资助去英国留学的。——译者

② 龟山社中设在长崎附近的龟山，由一些脱藩的海军修业生组成，从事海运和贸易活动，亦称龟山队。——译者

第一卷第311页）

而庆应元年（1865年）闰5月到任的英国公使帕克斯①（在中国工作20余年，在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中，他身为驻广东领事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则不对日本的内讧采取慎重地维持中立的态度，而是沿着阿尔科克的路线（雄藩联合）努力支持萨长。这年9月，根据帕克斯的提议，英法美荷四国公使为就条约敕准、兵库开港（从1866年1月1日开始）、降低进口税率（一律5%）三条款，同当时停留在大坂的将军进行交涉，而率领由9只军舰组成的联合舰队来到兵库附近海面。西乡、大久保等在京萨 92
摩藩士，筹划了利用这个机会使政权事实上由幕府转到雄藩联合手中的策略。

幕阁内部也有深刻的对立。面对主张不经敕准而立即承认兵库开港（幕议也暂时作了这样的决定）的老中当中的强硬派，庆喜等人持要求展期回答以在此期限获得敕准的慎重论，而要求召开朝议。但他没有想到，朝议在萨摩藩士进言的影响下，只是内定派遣敕使通知召开雄藩会议而已。庆喜坚决反对雄藩介入，迫使朝廷立即决定敕准条约。

庆喜的回忆录这样写道：

……拜谒主上，奏明不得不敕准条约和答应兵库开港的理由，请圣上允诺。当我又向国事掛②禀告细节时，于是请来全体国事掛出席，向他们恳切说明国家的利害，时而具体介绍外国舰炮的威力。我又是吓唬又是哄地说完"现在不敕准条约，国难就要临头"之后，关白以下各位都坚决反对，最后全体站起来要退

① 帕克斯（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5—1885），汉名巴夏礼，是英国侵华的老手。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不久就被调到日本。1884年又回中国任驻华公使。——译者

② 国事掛，亦称国事御用掛，系在尊攘运动最盛时期为使公卿在政治上有发言机会而设的官职，共29名，其中包括关白、左大臣等。——译者

席，我愤然作色说："鄙人虽然不肖，但也有不少人追随。对这样的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而竟然退席之事，岂能置之不理！"于是，关白也不得不坐下来。当时，小笠原壹岐守也在座，他信口说道："诸公如坚持到底，那就都要成为光吃斋不念佛的和尚。"我一面制止他的失言，一面又对关白以下各位说："我这样对大家说了，而诸公仍不答应，我只有引咎切腹自尽。我的生命本不足惜，如我舍了生命，也许我的家庭要对诸位采取某种行动。请诸位有此思想准备，好自为之。"说完，我便站起来，样子大概很令人害怕。关白带头退席，好像去研究什么。不久，两个传奏人入座，
93 交来敕准条约的钦命（关白等没有再回来入坐。钦命的文词还是我们事先商定后上奏的，没有改动）。但是，兵库开港是无论如何也难于获准的，而我也很难再就此问题提出讨论，而且没有想出首尾一贯的良好解决办法。幸亏钦命中有因"系批准条约，故应作最为妥善之措置"一语，而暂时对主上未准兵库开港的理由含糊其词。如果外国人追问钦命的文意，则辩解说："既然敕准条约后应作出最为妥善之措置，则兵库开港自不成问题。而暂不允许开港，说明尚未作出最为妥善之措置。但我方所以未准兵库开港，是因为期限尚未到来。"我们就这样暂时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这也是我一生三次决心一死中之一次。（《昔梦会笔记》第14—15页）

于是，外国舰队的威压和庆喜的强硬态度，使条约得以在10月5日敕准。是攘夷还是开国的政治斗争焦点，也由此消失。对帕克斯来说，他虽然希望幕府权力此时能够转到雄藩会议手里，但没有实现，而条约得到敕准则是他的重大收获。他向英国外交大臣是这样报告的：

威风凛凛的舰队出现于大坂附近海面，虽然不是为了威逼和胁迫，但对于条约反对派，可以说起到使他们明白缔约国只要

有必要，都会有手段迫使条约实施的作用。最后可以断言，此次如无联合舰队，大君就不会那样向天皇陈情，而无大君的陈情，天皇与大君之间就不会在条约问题上意见一致，也不会伴随条约的成立而实施必要的对外政策。（1865年11月25日，《帕克斯传》第46页）

萨长协约　萨摩藩企图利用条约敕准问题使幕府权力转到雄藩会议手里的策略失败后，便更加接近长州藩。庆应2年1月 94
（1866年），西乡、大久保、小松等人经坂本、中冈等人斡旋，请木户、品川弥二郎、山县狂介（有朋）等人到京都的萨摩藩邸，在这里缔结了藩长协约六条。木户以专函送给坂本签字证明的密约六条如下：

一、一旦开战，双方要迅即派兵两千余名进京，与现今在京之兵汇合，并在浪华①陈兵千名左右，以加强京坂两地之防卫。

一、当战况出现我必胜利之局面时，双方一定要立即向朝廷奏之。

一、万一战局不利于我，也决不会在一年或半年之内溃败，在这个期间双方一定要尽力而为之。

一、当幕兵由此而东归时，双方要立即向朝廷申冤，尽力请求酌情不予处分。

一、兵士进京之后，桥会桑[一桥、会津、桑名]等人即使像现在这样不知改悔，双方也要为拥护朝廷和伸张正义而尽力说服他们，而当此路行不通时，只有与之决战。

一、申冤而获赦免之后，双方要诚心合作，为皇国粉身碎骨而在所不惜。因此，不管通过什么途径，自今日起，双方就一定要为皇国尽诚心，出全力，以耀皇威，使之回复昔日之光辉。（《防长回天史》

---

① 浪华，亦可写作浪速、难波（日文的读音三者一样），系大阪的古称。——译者

第五编中、八，第 134—135 页）

这年 4 月，大久保向老中板仓胜静提出了萨摩藩不出兵再征长州的建白书。于是，萨长的提携加强了，但幕府与法国的提携也更加强了。经罗歇斡旋，法国经济使节库雷在 5、6 月间来到日本。小栗忠顺等人开始策划：法国的资金和军舰到来之后，即行追讨长
95 州藩，并根据情况也讨伐萨摩藩，然后乘胜削弱诸藩而实行郡县制。同库雷在 8 月签订了借款合同，在 9 月签订了购买武器合同，但都为时已晚。幕军与奉幕命出兵的藩军都缺乏资金，装备不齐，集结在大坂的第二次征长军的士气并不太高。

而且，庆应 2 年 4 月（1866 年）在西宫[①]爆发的打砸运动立即扩大到大坂近郊，5 月又燃烧到江户。在“大坂周围十里之内无一处没有暴动”的情况下，即使将军亲自坐镇，幕府也毫无办法。于是，暴动的反幕亲长色彩日益浓厚。其原因是米价猛涨。诸藩害怕发生战争而在领内储备粮食，而被动员参加征长军的诸藩和旗本，则大量收购粮食和生活必需品。6 月长州藩占领下关对岸，从西国和北国进米的道路随之断绝，而米价也马上无止境上涨。还由于战争而增收贡租，并征用助乡、军夫等徭役。这一年共发生城市骚乱 35 起，百姓暴动 106 起，起数是很惊人的。在江户、大坂及其周边和石见、丰前等战争地带发生的最多。自嘉永元年（1848 年）以来，一般每年只有数起城市骚乱，而百姓暴动超过 20 起时极少。

6 月 7 日，以幕府军舰炮击长州藩而开战端。长州藩的兵力虽劣，但兵员已在两年前装备上步枪，受过洋式训练，所以战局对幕军甚为不利。6 月末，帕克斯和罗歇为共同协助解决幕长纠纷而赶忙来到下关，但他们各怀鬼胎。帕克斯想以对等条件使幕长和解，以向成立雄藩联合政权方面推进；而罗歇打算使幕长暂时和解，以

① 西宫，在兵库县，今为西宫市。——译者

争取时间在此时间内加强幕府的军事力量。 96

7 月，广岛、冈山、德岛三藩主联署建议幕府和朝廷退兵。两天后，将军家茂暴卒于大坂城（8 月 20 日发丧）。同一天，萨摩藩主岛津茂久（忠义）与其父久光联名向朝廷提出建议，指出在暴动与骚乱频发时期“又启兵端，由此导致战乱旷日持久、率土分崩而不可收拾之局势，乃在意料之中”，而为挽救这个局势，请求朝廷赦免长州、改革政体以停战。幕府以将军家服丧为理由决定中止征长并撤兵，10 月末撤兵完毕。

萨摩藩策划在下诏任命新将军之前召开雄藩会议和讨论废止幕府（王政复古）问题，而被敕命隐退的岩仓具视又联合萨摩藩，说服反幕派公卿向孝明天皇陈请刷新朝廷，但天皇大怒，予以拒绝。于是，幕府联合公武合体派公卿处罚反幕派公卿，朝廷于 12 月 5 日下诏任命了新将军。25 日天皇驾崩。谣传是被毒死的。病情也确实反常。（ねづ.まさし《天皇家的历史》下卷，第二十八章。）

萨托这个时期同西国诸藩频仍接触，从中收集情报。他有时听说：“不会再有将军，天皇将回复其帝位的权威”，有时又听说：“一桥仍未被任命为将军，恐怕将来也不会被任命”。（《一个外交官所见的明治维新》上，第 210、218 页）有德川家参加的雄藩联合，是西国诸藩的目标和期望所在。英国也期望雄藩联合。帕克斯在他 10 月 14 日（旧历 9 月 6 日）写给驻长崎领事弗拉瓦兹的信里说：“现在天皇无疑是主权者，大君是其主要的最聪明的阁僚和顾问之一”；而在 97
他 10 月 31 日（旧历 9 月 23 日）写给弗拉瓦兹的信里又说：“现在正召集各大名，准备在京都（或者在大坂，或者在两地）开会。一桥说他不接受空头的[将军]称号。”（《帕克斯传》第 67 页和第 68 页）

12 月 6 日萨托在兵库会见了西乡。“我一直在猜测，而今天终于知道，原来在 1865 年 11 月向我介绍的那位叫作岛津左仲的人就是西乡。于是，我说他使用化名，西乡哈哈大笑。作过例行的寒

喧之后，我感到这个人物的反应不太敏锐，好像一向不爱说话，有点不好应付。但是，他有一双像黑钻石般闪闪发光的大眼睛，谈话时微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近味道。”(《一个外交官所见的明治维新》上，第226页。)

……[萨托]试探问道，一桥最近没有收到法国皇帝的来信吗？西乡点头表示“好像没有”，他接着回答说：头几天，一桥曾向天皇上奏，说法国皇帝给将军来了一封信，但已故大君当时因征讨长州正在京都而推迟了受理，据说他本想请现有的所有外国代表到大坂去，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受理这封信。一桥想在日本历17日(1月22日)无论如何去大坂，随后立即请各外国代表也去大坂。因此，我们(萨摩人)才通过吉井幸辅，将一桥的那份上奏的副本递给了哈里·帕克斯勋爵，但勋爵看过后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尚一无所闻，所以是否应大君之请还不能定。

98 “可是”，我问，“一桥怎么能受理致将军的信函呢？一桥还不是没有当上将军吗？怎么就这样了！”

“是这样。可他前天已受命出任将军了。”

我“啊！”地一声便把话收住。接着解释说：“真没有想到。我本以为解决长州事件是一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只有设法解决完了这个问题，他的势力才能特别强大起来呀！”

“不错，确是如此。(他提高嗓门说)昨天还不过是一个像要饭的浪人大名的人，今天竟成了征夷大将军。”

“这是谁把他抬上去的？”我问。

“是板仓[胜静]周防守(新任的老中)。一桥现在受宠于天皇。他将来还想当关白呢！他还想让水户家出身的他的弟弟去当无人接任的年轻的民部大辅的清水家的家主，然后派他出任驻法全权大使。”

“为什么?”

“我们也不完全清楚。”

“那么,一桥为什么要请外国代表去大坂呢?”

“那也一概不清楚。”西乡回答说。

“不经诸大名磋商就敢这么办,也太反常了!”

“这是应当同诸大名磋商的事情,但我们认为,以后,对一切政治问题是要磋商的。幕府最近的作法太蛮横,所以我的主君说,不能忍让坐视幕府擅专而亡这个日本。人们一直认为,天皇 99
把大名中的某些人召到京都,是让这些人参与政务。而现在终于明白,幕府根本就不想那样干。大名们也不愿意再被人愚弄。因此,这次一个人也没有去出席。越前[松平庆永]本来是尽可能长期驻在京都的,但他也终于离开了京都回藩。”

“那么说,现在一切都定下来了。”我说。

“是的,不过,大概三年以后,就能看到一桥的下场了。”

“三年太长了。……”(同上书第226—228页)

幕法同盟 幕府企图依靠幕法提携起死回生。庆喜于庆应3年(1867年)2月在大坂城接见了罗歇。罗歇建议的国政改革案的内容为:削减外样雄藩的势力,而将谱代大名的家臣、旗本、御家人中之有才能者选拔为将军的亲兵,精简其中的无才能者使他们从事农商;使天皇和公卿脱离政治,在幕府的严密监督下禁止他们与阴谋家接触;完备官僚机构,成立由6名分担行政事务的阁僚组成的责任内阁,任用有才能的专家;完备陆海军,用三万精兵和十五、六只军舰控制大藩;将谱代大名的军队调到江户,对他们进行与幕府陆军相同的训练,统一装备;把年贡米全部卖成现金,用货币支付俸禄,余款作为一般经费按一定比例分给各省,陆海军建设费的不足部分用借款弥补;除田赋之外,另课商人税和消费税,等等。这个宏大的设想,要依靠法国的援助来实现。新军队将由法国教官训

练，用法国制的兵器军需品加以装备。资金用法国的借款筹措。作为借款的担保，用法国的资本和技术开发国内资源，再通过御用商社向法国出口产品。

100 对幕府说来，当前的难关是迫在眉睫的兵库开港问题。帕克斯和萨摩藩，也想如敕准条约时那样，利用这个问题谋划将权力从幕府转到雄藩会议手里；而庆喜则要如罗歇所希望的那样，决心不经敕准也要强行对外开放兵库港口，并在 3 月于大坂城接见四国公使时明确地表示了这个决心。随后他出席朝议，表示即使讨论几天几夜，如不获得敕准他决不退席，并驳斥了反幕派公卿的开港反对论。经过一天一夜的朝议，5 月 24 日敕准了开港。

萨托就这个问题写道："我还记得我接受西乡及其一派的一些人的来访。他们对我们接近将军非常不满。我委婉地对西乡说，革命的机会并不是没有了。但是，兵库一旦开港，到那时候，大名就将失去革命的良机。"（同上书，第 255 页）这就是说，继庆应元年（1865 年）10 月敕准条约后再敕准开港，兵库开港问题便不再是政治斗争的焦点，反幕派也就失去讨幕的名义。

当时 30 岁的庆喜，夙以聪明知名，而反幕派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才干。精于王政复古策略的岩仓具视，在他的书信里写道："观今将军庆喜之举止，可谓果断、勇敢，且志望不小，乃一决不可轻视之劲敌。"（庆应 3 年 4 月）木户也说："今，关东政令一新，兵马之制亦颇可观。一桥之胆略决不可侮。若今失去挽回朝政之机，使幕府先发制人，则实如家康之再生。"（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I，第 66 页）

庆喜强行解决兵库开港后，大久保等立即决定武力讨幕。5 月
101 末，在京萨长两藩的藩士同意此举，随即着手准备迎接藩主进京和出动藩兵。5 月 21 日左右，土佐藩士乾（板垣）退助、谷干城等，经中冈慎太郎斡旋与小松、西乡等会见，订立武力讨幕盟约。在武力讨幕派这样开始集结时，幕府迎来了一个致命的打击，即法国政府

改变了对日政策。

1866年10月1日(庆应2年8月),支持罗歇的法国外交大臣下台。随后不久,在横滨发行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揭露了库雷借款,英国国会认为这是法国违约,英国驻巴黎大使就此向新上任的法国外相提出抗议。外交大臣接到抗议后,于1867年5月(庆应3年4月)向罗歇发出诘问训令。他认为英国的预计雄藩他日可能获胜,由此贸易上的利益将比现在大大增加的看法正确,要求罗歇解释借款协定,否定支援幕府的政策,暗示转向英法协调的政策。当时拿破仑三世的自由帝制,内政外交上均处于困境。特别是同普鲁士的战争迫在眉睫。法国这时认为,在远东只要保住交趾支那(越南南部)就不错了,而支援最后胜利未卜的幕府,从而使同英国的对立日益激化的冒险政策,是没有前途的。

接到这个训令后,罗歇便在7月13日(旧历6月12日)强调自己至今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声明在江户签订的协定得到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和农业大臣的承认与支持,把对政府根据同法国敌对的英国报纸来判断他的行动的激怒一股脑倾泻出来。他虽最后
也没有改变支援幕府的态度,但已失去本国政府的支持而成为无 102
根之草。

法国对日政策的改变,给借款的兑现投下巨大的阴影。根据罗歇的建议,外国奉行栗本鲲6月去法,以进行用虾夷地产开发权作抵押的借款谈判,但同库雷等人进行的谈判,很难有成功的希望。成立法国输出入会社的计划没有进展,借款的筹集也出现困难。尽管如此,库雷还是发送出价值72万美元的武器军需品,但在海上航行的途中幕府倒台,所以幕府实际到手的只有30万美元左右。(石井孝《明治维新的舞台后面》第157—160页)

总之,幕末维新的第四阶段,是英法两国介入日本政局和萨长两藩决定举兵讨幕。1865年到任的英国公使帕克斯,一方面支援

萨长两藩强兵割据，另一方面又期待成立雄藩会议使雄藩参与幕政。由秘密输入武器开始的萨长接近，在1866年发展成为萨长协约，而决定举兵讨幕方针则是在庆应3年(1867年)5月。另一方面，1864年到任的法国公使罗歇，为对抗英国而推进幕法提携，支援幕政改革，使幕府回复了威势，但在庆应3年(1867年)4月失去法国政府的支持，使幕府受到致命的打击。

于是，幕末维新史进入最后阶段。为对付正在准备举兵讨幕的萨长两藩和先发制人，庆喜接受土佐藩的建议在10月14日向朝廷提出大政奉还的上表。这样，庆喜辞去将军职，也极有可能在雄藩会议上掌握主导权。另一方面，萨长两藩在10月13日得到讨幕
103 密敕，决定在12月9日实行王政复古。其结局容在下节叙述。(参阅大久保利谦等编《日本历史大系》4，第一编第二章第四节)

104 四　大政奉还　王政复古

大政奉还　土佐藩于庆应2年(1866年)2月设立开成馆，着手殖产兴业，同时在长崎设立土佐商会，出口国产品，进口船舰与武器。后藤象二郎与岩崎弥太郎一起主持商会业务期间，感到需要反对幕府的贸易统制。他们与坂本龙马结识后，对坂本表示信任，于庆应3年(1867年)4月将坂本的“龟山社中”置于土佐藩的管辖下改组为海援队，而在这年1月，坂本与后藤在上京的船中，就曾定出第一“使天下之政权奉还于朝廷，政令宜出自朝廷”，第二“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参赞万机，万机宜决于公议”……等“船中八策”。后来，后藤根据不能与萨摩藩的武力讨幕论同流的前藩主山内丰信的意见，同在京的寺村左膳、福冈藤次(孝弟)、佐佐木三四郎(高行)等磋商，而决定大政奉还论(船中八策)为藩论。又在6月22日，土佐藩(后藤、寺村、福冈、坂本、中冈等)与萨摩藩(小松、西

乡、大久保等)之间缔结了以土佐藩论为骨架和以大政奉还、设置雄藩会议等为内容的萨土盟约。后藤立即回藩,向丰信进言拟出大政奉还建白书。9 月携丰信的建白书进京,10 月 3 日将建白书提交给幕府。

在萨摩藩方面,它一方面同长州藩缔结举兵讨幕盟约,另一方 105
面又与土佐藩缔结大政奉还盟约,脚踏两只船观察形势,但它又答应大久保增派藩兵的要求,派出藩兵一千余名于 10 月初到达大坂。大久保在这年 9 月为协商举兵讨幕的具体办法赴山口,同木户、广泽兵助(真臣)等缔结了出兵协定。长州、艺州①两藩之间也订了出兵协定,萨长艺三藩订出举兵讨幕的实施办法。但三藩内部都各有待决的复杂事情,因而很难立即实行。长州藩的藩论在讨幕上虽然一致,但禁门之变②的痛苦经验,又使藩内割据的自重论加强;萨摩藩也出现出兵反对论;至于艺州藩,它的态度更不明朗。政局陷于混沌状态。大政奉还路线与举兵讨幕路线交错,各藩内部的情况各异,各藩互相猜疑,大家都在觊觎主导权。在这虚虚实实的声东击西之中会产生什么结果,实难预料。

混乱的政局,被取代了前年猖獗一时的百姓暴动和打砸运动的"不亦善哉狂舞"③骚动所笼罩。以 8 月在三河的皇太神宫的祈祷讨签得到签语为开端,狂舞活动立即由大街小巷的住户和旅店

① 艺州藩亦称安芸藩,其管界大致相当于今广岛县。——译者

② 禁门之变,亦称"蛤御门之变"或"元治甲子之变"。长州藩为恢复其因八月十八日政变而失去的在京都的地位,于 1864 年(元治三年〈甲子〉)向京都进军。7 月 18 日,长州军与会津、萨摩两藩的军队在蛤御门交战,长州军败北,导致第一次长州征伐。——译者

③ "不亦善哉狂舞",1867 年(庆应 3 年)8 月至第二年 4 月发生于江户以西地区的群众狂舞运动。群众在伊势神宫(皇太神宫为其内宫)祈祷讨签,得到内载"不亦善哉"的签语,于是兴起一边唱着"不亦善哉"一边狂舞的运动。关于为何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这样的群众狂舞运动,至今在日本史学界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这是以宗教形式进行的群众要求改造社会的运动,而被讨幕派用于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译者

传向四面八方，东到横滨和江户，北到美浓、飞弹、信浓和甲斐，西到伊势和大和，并由此发展到大津、京都、大坂和西宫等近畿一带，又波及到安艺、讃岐和阿波。似乎没有达到北关东、奥羽、北陆和九州。奇装异服的男女老幼唱着“不亦善哉”卑俗歌曲，打着锣鼓，疯狂乱舞，闯进平素被认为心地不良的地主和富豪的屋里，穿着鞋坐在草席上，要酒要肉大嚼，拿走衣物和金钱。社会上充满了无视一切常规的、有反抗情绪的享乐气氛。其疯狂达到最高潮时，传来了10月14日庆喜奉还大政的消息。

106 接到大政奉还建白书的庆喜，10月14日（1867年11月9日）向朝廷提出大政奉还上表，第二天得到敕准奉还大政的钦命。上表中说“当今与外国之交往日盛，如朝权不出于一途，则纲纪难立”，兹将政权奉还于朝廷，而“如使天下得以广行公议，仰承圣断，同心协力保护皇国，则皇国必将与海外万国并列”。庆喜的回忆录说：

> 土州的后藤象二郎、福冈藤次（孝弟）等持松平容堂（山内丰信）的书简来劝我奉还政权时，我觉得这正是实现夙愿的良机，遂召板仓（胜静）、永井（尚志）等人前来，告以我想奉还政权，但二人均说：“现虽只好如此，但似应深思而后行。”我又说：“按说，奉还祖宗近三百年之政权本应召集谱代大名以下至旗本众议后决定，但如此只能徒招纷扰，无望作出一致之决议，故不如事先决定而后通知为好。”三人也同意如此处理，故除后藤和福冈外，又召集萨州的小松带刀以及各藩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作了传达。后藤和小松等说：“此乃前所未有的英断，实不胜佩服。”小松又对板仓说：“既已如此决定，则接着应直接晋谒天皇奏闻。”但因难于直接晋谒，而于翌日提出了上表。上表后我想，如此奉还政权后，朝廷将更缺乏人材，也不容易录用人材，而如直接效仿外国的制度，则更非易事，本以为为了国家终于将政权奉还，反而要对日本造成大害。正当我们为此而苦恼时，不久即奉到“朕

以为奏闻之旨甚是，钦许奉还政权。但国家大事与对外国之事宜经众议决定，而其他小事可暂如从前”之钦命……（《昔梦会笔记》第17页。）

在热海疗养所接到大政奉还快报的罗歇大吃一惊，立即返回江户同幕府要人接触。于是，他获悉大政奉还之举反而使庆喜的名 107
声大振，预定庆喜将出任天皇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会议的议长，而如果此举遭到敌对的诸侯的反对，庆喜将退据江户，以期以此为基地东山再起。罗歇在将这个情报报给本国外交大臣时，断言将军在同诸侯的斗争中必胜和主张支持将军。（石井孝《明治维新的舞台后面》第176页）

帕克斯在致驻长崎领事弗拉瓦兹的信中，也认为庆喜通过和平方式进行了革命，赞赏大政奉还。

政府机构将有重大改变。大君已不再是日本的主权者，而由天皇站在前面作为主权者执行任务。诸大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组成了全国议会。……大君这样大幅度地让出权限，对罗歇是一个沉痛打击。我认为这是事态好转的开始，日本有了建立合乎理性的和高效率的政治制度的机会。在怀有这个希望的同时，也觉得在建设新秩序当中会附带产生一些纠葛。（公历11月23日，于横滨。《帕克斯传》第75页。）

京都陆续传来的情报令人满意，看来现在日本人要用和平方式完成国家宪制的大改革——可以说是完全改变国家组织的革命。如果改革成功，则必将受到日本人的高度赞扬。大君以牺牲权力作出了很好的表率。诸大名也应效仿他的榜样。这样一来，就有望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管辖日本全国，而向诸大名转让正当的权利的同时，又可以制驭他们。（公历11月27日，于江户。《帕克斯传》第76—77页）

大政奉还击败了讨幕派的阴谋。因此，拥有巨大的领国和恩情 108

深厚的诸藩的德川本家，本来有望在大政奉还后的公议政体（诸侯会议）中占有压倒的优势。但是，在朝廷发出召集诸侯研究善后的命令后，德川一门、谱代诸侯宁愿作“忘恩之皇臣”而不肯作“公义之陪臣”，均辞退朝廷的召命，外样诸侯也对前途没有信心，以种种托词不应召命，以致辞退朝命的达七、八十藩。而且，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作为京都守护职，桑名藩主松平定敬作为京都所司代，是负责京都的治安工作的，但这两个藩却十分厌恶大政奉还，表示极为愤慨。于是，朝廷只好委任庆喜暂时处理日常政务，对其辞退征夷大将军的辞表（10 月 24 日）暂不作复，指示待诸侯上京后再作决定，以致时间白白在政局的迷离中浪费掉了。

武力讨幕　在政局迷离之际，又一个谋略在秘密进行。10 月 6 日，大久保与品川弥二郎去见岩仓具视和中御门经之，密谋王政复古。于是，在大政奉还上表前一日即 10 月 13 日夜向萨摩藩主父子、第二天即 14 日向长州藩主父子发出了讨幕的密敕。这两道密敕在手续上极为反常，既非天皇的亲笔，又无请求下敕的上奏者的公卿联名副署。《岩仓公实记》虽称“密奏经宸裁”（中卷，第 70 页），但无可以作证的史料。然而，密敕的真伪将由武力解决。17 日，小松、大久保、西乡、广泽、品川等人携密敕联袂出发，然后分赴各自的藩。从 11 月末开始，萨长的藩兵陆续开进京都。

庆应 3 年 12 月 8 日夜，就停止第二次征讨长州和处分长州藩
109 问题，在宫中召开有宫、公卿、在京诸侯参加的会议。会议从人心望和的立场出发，决定对禁门之变以来长州藩主父子的罪行免于处理，回复他们的官位，准许他们进京；决定赦免因 8 月 18 日政变而被朝廷放逐的三条实美以下诸公卿的罪行，解除对岩仓等若干公卿的蛰居处分。这个会议在 9 日拂晓刚一结束，早已策划好的政变便开始了。在萨摩、土佐、安艺、尾张、越前五藩警护宫阙之下，天皇亲自主持，有早已选定的宫、公卿、诸侯列席，颁布了王政复古的大

令。令中宣布：准许庆喜奉还大政和辞去将军职，废除摄政、关白与幕府，设置总裁、议定和参与三职，“诸事以神武创业之初为准”等等。于是，决定禁止公武合体派的宫、公卿进宫谒见，撤销京都守护职和京都所代司，免去会津、桑名两藩的宫门警护职务，令其归藩。随后决定出三职的人事，任五藩的前藩主、现藩主或嗣子为议定，任岩仓为参与。参与之中，有五藩的藩士各三名，西乡、大久保、后藤、福冈等人亦在其中。总之，这是参加12月9日政变的宫、公卿与五藩的联合政权。后来，又从长州藩追加了几名议定和参与。

此后，在宫中的小御所，有天皇亲自出席，前述的三职和五藩
的藩士等议定了王政复古的方针，尽管山内丰信和松平庆永强烈
反对，但会上仍对庆喜作出辞官纳地（将领地交给朝廷）的处分，指
定丰信和庆永就此事去说服庆喜。获悉这项决定的幕臣、会津和桑
名两藩以及佐幕派各藩表示愤慨，担心发生武力冲突的庆喜逃出
二条城躲在大坂城内，追随他的幕臣和藩士也向大坂移动。另一方
面，土佐藩、尾张藩、越前藩主张召开诸侯会议收拾时局，试图反击 110
讨幕派。在12月23日和24日的三职会议上，将辞官纳地处分由
处罚性措施改为宥和性措施，庆喜也接受了这样的处理，并内定在
庆喜正式上奏表示接受之前安排庆喜应召入宫接受出任议定的任
命。这样，越前藩、土佐藩等宥和派对岩仓、西乡、大久保等反幕派
的反击，终于出现行将奏效的形势。

但在另一方面，西乡为制造挑拨幕府而发生武力冲突的机会，着手进行了关东骚扰。他指使临时聚集在江户萨摩藩邸的浪人在江户市中和关东各地一再施暴，在江户城的中廓放火，炮击庄内藩屯所。激愤的幕府于12月25日攻打并烧毁了萨摩藩邸。这些情报传到大坂城，城中立即群情激昂，怒不可遏。庆喜制止不了，只好修表（讨萨表）上奏，内列萨摩藩的罪行，要求引渡与此有关的萨摩藩士，如朝廷不对此采取措施，即行讨伐萨摩藩。庆喜带着讨萨表，

声言清除君侧的萨摩藩奸，以会桑两藩兵为先锋，率15 000名大军，沿着去鸟羽、伏见的两条大道，向京都进发。接到这项情报后，朝廷出现主战主和之争，而主张开战的，只有萨长两藩的参与和数名公卿。

大久保和西乡说服岩仓，派萨长两藩之兵在鸟羽和伏见迎击。萨长军虽在数量居于劣势，只有对方的三分之一弱，但靠其强击战术和洋式装备的威力终于取胜。当初，胜败未卜，许多诸侯采取观望形势的态度，但不久接到旧幕方面败北，会桑两藩之兵向大坂城总退却的消息后，朝廷里的气氛为之一变，诸藩也倒向朝廷方面了。庆应4年1月7日，三职会议发出追讨庆喜令。萨长获得武力讨幕的名义，迫使在京诸侯表态。一直努力与庆喜搞妥协的德川庆
111 胜、松本庆永、山内丰信、伊达宗诚等公议政体派①，也不得不发誓对朝廷尽忠了。

戊辰战争②　庆喜在1月8日黑夜偷偷逃出大坂城，由海路奔向江户。他在回忆录中说：

……当时，越前的中根、雪江，尾州的某某四、五人自京都来大坂，劝我率兵进京，而我认为，如果进京，应当轻装前往，但从会桑两藩的主官开始下至旗本，均表示反对，主张说："现在时机既好，又有充分兵力，宜进京清君侧。"从老中开始下至大小目付，几乎处于半疯狂的状态，如我不答应讨萨，则不知会出什么

---

① 公议政体派，是庆应时期为改革幕藩政制而主张效法西方采取君主立宪制度的一派。庆应三年为避免讨幕派与幕府发生武装冲突而由土佐藩提出的大政奉还论，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西周的关于建立以德川庆喜为核心的议会政治构想，津田道真的关于建立民选议院的主张，均属于这一派的理论。——译者

② 戊辰战争，是对始于1868年（庆应4年——戊辰）1月3日的鸟羽、伏见之战的萨长讨幕军与旧幕府军之间的战争的总称。其间尚有江户无血开城、彰义队在上野东睿山抗战、北越战争、会津战争等战役，到1869年（明治2年）5月18日箱馆的五稜廓之战终止。本节未详述各次战役，只从政治方面叙述了各派之间的斗争和英法的幕后活动。——译者

事情，于是我只好表现出决心讨萨的样子……

这时，我正患感冒，穿着睡衣卧床，板仓伊贺守来，反复对我说，如不大力激励将士而这样下去，结果即使没有带兵进京，也不会有好下场。我把正在阅读的《孙子》拿给他看，指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一语问他，今幕府有可以与西乡吉之助匹敌的人物吗？伊贺守考虑一下回答说：“无”。我又问：“那么，有大久保一藏那样的人物吗？”伊贺守也答“无”。我又举出该藩的吉井幸辅以下数人，并依次问他：“有可以同这些人抗衡的人吗？”伊贺守亦未能答称有。于是，我制止说：“在这种情况下，战则不仅难期必胜，而且只能蒙受反对朝廷的污名，所以决不能由我挑起战争。”但是，板仓、永井等人一再说，将士均处于激愤状态，“如公始终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恐怕他们就要刺死公，而公也就逃不走了。”我心想：“他们未必要真刺死我，但我必须逃走。这样，国家就会更加动乱”，而只有为自己无力控制局势而叹息。想起在江户攻打萨邸后，没有制止城中将士的进一步妄动，以致他们以清除君侧之奸为由向外国公使发出通告，走上入京之途，而开始了 112
鸟羽、伏见之战，就心有余悸。当时，我始终在大坂城里，没有出城，也未着戎装，只有坐在城里叹息而已。将士的这些做法，我一开始就不认为得当，而今仍要这样尤其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确实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仍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结果。

我搭开阳丸归江户时，一上船就告诉板仓以下等人，现在只有向朝廷表示恭顺，别无其他办法。当然，这个决心早在从大坂出发之前就已下定，但出发前还不能稍有泄漏。（《昔梦会笔记》第20—21页）

庆喜回到江户后，江户城里立即乱作一团。福泽谕吉的自传说：

庆喜先生从京都回到江户，这在当时真是一件大事。朝野物

议沸腾，武家自不待言，就是那些衣冠楚楚的学者、医生与和尚，都在大谈政治，谈得如醉如狂。人们一见面，开口就是政治。幕府的城内一片混乱，既没有秩序，又没有礼仪。在大广间、溜间、雁间、柳间这些大小名停留的场所，总是乱乱哄哄，吵吵嚷嚷，简直像没有住持的寺庙，大家乱七八糟盘脚坐在那里，既有怒声大作的，又有悄悄从衣袖里拿出一小瓶白兰地畅饮的，紊乱到了极点。当时，我感到有必要观察一下形势，所以即使城中的外国人事务处那里没有翻译任务，我也一半是出于看热闹，每天都要到城中去看一看。现举当时政论盛行的一例。有一天，加藤弘之和一个今天我已想不起姓名的人，穿着当时的武士礼服，一同来到外国人事务处，他们正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我也去了。我问："喂，加藤君，有什么事要穿武士礼服来上班？"他回答说："哪有什么事，只是想来见一见上司"，这表明庆喜先生已经回来，现正在城中。城中有各种策士、说客、忠臣和义士在出谋划策，有的说，如果上面的贼军出发了，那就要把他们阻止在富士川；有的说，那不行，应据守箱根的险要，把贼歼灭在二子山。他们表示，东照神君[1]三百年的宏业不能弃之于一朝，我们身为臣子，与其作为知义的王臣而生，不如作为知恩的忠臣而死。他们献出各种奇计
113 妙策，悲愤慷慨地陈词者颇多。不用问就可以知道，加藤等人也是这一伙的，他无疑是想来见一见庆喜先生。于是，我问他："这次事件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是不是就要开战或者是打不起来？你们大概都会知道，所以请告诉我，我一定要听一听。"他回答说："听这个有什么用！"我说："你还不知道有什么用！如果决定开战，我就要收拾好东西带着逃跑。如果打不起来，我就安下心了。是和是战是一个很难断定的大问题，所以我请你告诉我。"加藤

---

① 指江户幕府的初代将军德川家康。——译者

瞪圆眼睛对我说："这不是谈论那些令人高兴的事情的时候，别那么发傻。"我说："当然不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而是要冒生命的危险。你们是战是和，那随你们的便，可我一开战就马上逃跑。"加藤不高兴了，怒气冲冲。(《福翁自传》第188—189页；《福泽谕吉全集》第7卷，第153页)

1月23日。罗歇向各国公使发出备忘录，极力主张支持"大君政府"。随后，他乘船急去江户观察幕府的动静。1月19、26、27日，他在江户接连会见庆喜，劝告庆喜再次崛起。庆喜在回忆录中说：

戊辰春，鸟羽、伏见之战失败我东归后不久，法国公使罗歇进江户城来访(我尚未进大慈院谨慎反省)，他十分热心地劝告说："这样拱手受敌之制裁，未免令人遗憾，也对不起您的祖先。我们法国愿奋起助一臂之力，故请一定要设法图新，恢复旧制。"我坚定地回答说："多谢好意，但日本的国体不同于他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向天子张弓。这似对不起祖先，但我死也不能反抗天子。"罗歇对我表示极为佩服，再没有往下说什么。(《昔梦会笔记》第29页)

官军虽挥舞锦旗，高唱《亲王们、亲王们》战歌，以正兵、奇兵、伏兵向江户进军，但新政府的资金已完全枯竭。负责新政府财政 114
工作的越前藩主三冈八郎(由利公正)，估计当前必需的资金为320万两，其中会计基金300万两，御驾亲征大坂行幸费5万两，关东镇抚费15万两。虽然呼吁京都和大坂的豪商献金可以换得"金谷出纳所御用"[1]等特权，但自大政奉还的大令发布后，两周内响应者只有三井、岛田、小野三家。与幕府勘定奉行小栗忠顺勾结专为三井谋利的三野村利左卫门，见到旧幕军在鸟羽、伏见败北后，立即转向采取支持官军的方针。官军既无军粮又无资金，很快

① 代理政府机构"金谷出纳所"的业务。——译者

便在大津附近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三井立即向这里的官军送去大量金银。三井在送钱到达江户之前，亦曾多次在途中陷入困境，甚至把库存的旧金银器也拿出卖成现金送去。这样，三井便成了新政府的会计事务所外汇科、御用帐房、商法管理局代办等，以后又代新政府存放现金，而发展成为最大的政商。

帕克斯到处为新政府奔走。庆应 4 年 1 月 2 日神户爆发备前藩兵攻击外国人事件时，他表面上极力与各国代表一致行动，态度强硬，但背地里示意新政府派遣敕使，给新政府创造与各国代表首次会见的机会。敕使请各国代表向本国政府转达天皇的敕书，敕书内称天皇已代将军执掌政权，以往条约上使用的大君称号改为天皇称号。各国代表接受了敕书。又根据帕克斯的示意，新政府于 1 月 21 日要求各国不在军事上支持幕府，各国代表随即宣布局外中立。因此，新政府在国际法上被承认为"交战团体"，与旧幕府处于了对等的地位。

新政府按照帕克斯的建议，决定在京都招待各国代表，以在 2
115 月 13 日请各国代表谒见天皇。最初，罗歇以新政府尚未安定，怀疑新政府没有控制排外活动的能力为由拒绝参加，美、意、普[鲁士]三国公使也以在横滨有公干为由回避谒见。但是，罗歇后来改变态度，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并于 2 月 30 日同英法荷三国公使一起拜谒了天皇。帕克斯在致其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

……此次访晤天皇如果成功，那将是我们三个月以来苦心经营的工作中的一件最卓越的活动。这项活动虽然使人讨厌且要辛苦一番，但会获得不辜负所付努力的结果。

……最有意思的是，在最后摊牌的时候罗歇改变了主意。他说不去，就能牵制我也不去。现在他所以改变了方针，是因为他知道牵制不了我，而且也不想自己留下而叫我去。我同新政府诸人的关系要比旧政府诸人的关系融洽得多。罗歇一定因为

自己的政策完全失败而惋惜不已。(公历3月19日,《帕克斯传》第82—83页)

再说西乡大总督府参谋。他预定在3月15日对江户发动总攻击,但在13、14日于江户萨摩藩邸同胜海舟旧幕府陆军总裁谈判后,达成停止进攻和江户开城的协议。萨托从3月9日开始就到江户去观察形势。他的主要情报来自胜海舟。

胜说,只要能救主君一命,保有足够养活人数众多的家臣的收入,就准备接受任何协定。他向西乡暗示,如条件比以上苛刻,将以武力抵抗。庆喜也不愿放弃轮船和军需品。关于这个问题,已向天皇提出请愿书。

西乡为向有栖川宫转达这个请愿书和胜的口头要求,由江 116
户返回了骏府。然后又由骏府去京都,预定18日[庆应4年3月26日]归来。

胜说,我虽表示为保护庆喜一命而不惜一战,但我也相信西乡的手可以制止那种不仅对天皇不光采而且将延长内战的苛刻要求。胜还请哈里·帕克斯勋爵利用他对天皇政府的影响力防此患于未然,勋爵也为此再三尽了力。特别是当西乡于4月28日[庆应4年4月6日]在横滨访晤帕克斯勋爵时,勋爵曾警告西乡说:如你们想苛刻处分庆喜及其一派,特别是要进行人身惩罚,那将使欧洲各国的舆论大哗,有损于新政府的名声。西乡说,既不拟要求杀掉前将军,就是对劝诱庆喜进军京都的那些人,我想也会同样得到宽大处理。(《一个外交官所见的明治维新》下,第192页)

胜对萨托说:“只要我和大久保一翁能够免遭想杀我们二人的德川家激情分子的毒手,事体就会圆满解决。”(同上书,第193页。)5月,继承了德川谱系的田安家达被封为年禄70万石的骏河府中。

对这一节作一小结。萨长两藩欲进行武力讨幕,但被帕克斯抑

止；而幕府则与罗歇的意图相反，没有进行抗战。但是，奥羽、北越诸藩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在 8 月被镇压下去。9 月改元为明治。翌年 5 月，旧幕军的最后据点箱馆（当时有法国军官在一起）陷落。

最后，我想引用曾经参加彰义队[①]、后来移居静冈并成为小说家的冢原渋柿园的一段精彩回忆。在这里也许可以看到旗本们的追悔。

117 因此，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当时心中只有"遗憾"两字，根本没有打算干扰一王化或违抗朝命这样的想法。何况他们的主家即将作出他要"恭顺"的明确无误的庄严决定，发出敌对官兵就等于拿我（庆喜公）的脑袋试刃等这样可怕的通知。然而，他们是在上述的"使他们感到委屈的"要挟之下，毫无秩序地前后跳了出来。跳出来以后方才晓得，朝廷当然把他们视为贼！而在主家的眼中，他们则是不忠之臣！可以说，胜利了也要受违背主命之咎，切腹也不会有人说一句好话；而如果败北，当然要受缚斩首！稍微安静下来仔细想一想，进行这种卖命的吃苦而讨不了好的战争有什么意思，又是为了谁？说是不知道吧，也真是没有这种令人难以知道的事了。在古今东西的历史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过进行这种愚蠢战争的人。就算是没有吧。其实，三河武士[②]首先应当使其至愚的耿直和名利两者一并消失，但他们失去的只是名利，而以至愚的傻气自安。这些为报答养士三百年之恩而舍命的人，其只知有我主而不知有其他的狭隘孤忠，能够受到世人的怜悯和赞扬吗！

……而且，已经决定由田安家的龟之助殿下（今德川家达公

---

① 彰义队是涩泽成一郎、天野八郎领导的拥护德川庆喜的反对政府军的部队。1868 年 2 月 23 日成立，5 月 14 日被政府军消灭。——译者

② 三河武士，指在德川家康创业时立过功的三河国出身的武士。三河国相当于今爱知县南部。——译者

爵）继承德川家的家业，给他静冈藩、骏远二国[①]和年禄70万石。于是，藩厅向藩士下达了指示。但人多禄寡，原来的臣下无法全部供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使他们去做朝臣，就是使他们归农归商，或强制一些人以没有俸禄的精神准备回藩地由藩供养。对于这后一批人来说，这等于为他们出具了与主人脱离关系的证明书。

于是，藩士们必须由三者中选择其一以安身。去做朝臣，年禄可以保持原来的水平——后来据说有所减少，地上的建筑等也原封不动交给他们。这种选择是最好的，但不知为什么去做朝臣的甚少。首先在旧臣当中，也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去做了朝臣。然而，年禄一千石以上的旗本进入仕途者很多，也是事实。这些可以作为将来统计的参考。其次是归农归商，但归农者也少，有些人仍然是年禄一千石以上的“知行取”，即仍在旧采邑领取禄米的居多。中等和下等藩士，即年禄30—40俵的人归商者相当 118
多，但最多的是无禄迁居藩地，由藩地供养。（《幕末的武家》第242—243页）（以上参阅大久保利谦等编《日本历史大系》4，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

① 骏远二国，指骏河、远江两国，均在今静冈县境内。——译者

119 # 第二章　维新政府　萨长土肥

一　中央集权　藩阀与旧藩

太政官制、版籍奉还　维新政府在戊辰战争中成长起来。战争的有利开端和进展，使萨长讨幕派压倒了诸侯会议派。庆应4年1月7日（1868年）发布追讨庆喜令的维新政府，17日修改三职制而设副总裁职，由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出任，设神祇、内国、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制度七科由参与层（诸藩士）分掌。江户总攻击预定日的前一天，即3月14日，发布阐明安抚万民和宣扬国威（宣扬朝廷对全国的权威）为讨幕亲征之目的的宸翰，天皇、公卿、诸侯在紫宸殿誓约对内诸事决定于公议舆论、对外实行开国和睦等国是五条，宣布讨幕并非为了树立萨长的霸权。江户总攻击以无血开城而告终，武力讨幕半途而废，萨长讨幕派的指导权没有确立，但闰四月的《政体书》和官制改革，却使讨幕派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

120 《政体书》第二条称，“天下之权力全归于太政官，则无政令出于二途之患”；第五条称，“各府、各藩、各县皆出贡士[①]为议员，议事制之设立是为了实行舆论公议”。按同时进行的官制改革，在中央政府（太政官下）设议政、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外国、刑部七官。拟议为立法机关的议政官，以从宫、公卿、诸侯中任命的议定（由原来的32名减为10名，其中公卿6名、藩主4名）和从诸藩士中任命的参与（由原来的102名减为11名，他们都是萨长土肥越

① 即代表，有时专指由武士当中选出的代表。——译者

五藩的领导人，即萨摩的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岩下方平，长州的木户孝允、广泽真臣，土肥的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肥前的副岛种臣、越前的由利公平、横井平四郎（小楠）组成上局（决议机关），以每府、县、藩各出一名贡士组成下局（咨询机关）。当时共有 9 府、21 县、273 藩，而府县原为旧幕府直辖领。其次，在行政官方面，设辅相 2 名（三条和岩仓），辅佐天皇和掌管宫中庶务。其余的五官分掌各自的部门。知事（或长官）由宫、公卿、藩主出任。刑法官负责司法。

在平定奥羽地方后不久的明治元年 10 月，制定了藩治职制，取消各藩原来的门阀世袭的家老，而设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体察朝权、辅佐藩主”的执政与参政代之，并为使藩的行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而设“承奉朝命、代表藩论”的公议人 1 名。随后，当明治 2 年 5 月戊辰战争一结束，大久保、木户、板垣等萨长土三藩士之间达成协议，加上肥前藩，由四藩提出版籍奉还建白书（将封土与人民还给朝廷）。接着，又有 231 名藩主上表奉还版籍，但其内容形形色色，对实质的奉还（废藩）暗怀强烈的反抗，而由各藩公议人组成的 121
公议所也十分保守。最后在 6 月，在批准 261 名藩主奉还版籍的同时任命他们为知藩事，而对其他 16 藩则下令奉还版籍。这就是说，藩主成了维新政府的名实相符的地方长官。同时，废除公卿、诸侯的称号，而改称华族。

翌年 7 月的官制改革（二官六省），改变《政体书》规定的三权分立体制，恢复大宝、养老[①]的古制与称谓。即神祇官居诸官之上，设左右大臣各为 1 名（右大臣为三条，左大臣暂缺）的太政官、大纳言为 3 名（岩仓等人）、参议为 4 名的三职，在三职之下置民部、大

① 指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 年）制定的日本最初法令集《大宝律令》或称《大宝令》，以及元正天皇养老 2 年（718 年）修订《大宝律令》而完成的《养老律令》。——译者。

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六省。神祇官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大臣、大纳言、省卿由宫、公卿、旧藩主出任，参议、省辅(宫内省除外)及以下由萨长土肥藩士出任。官员必须取源平藤橘四氏的名字。例如，大限称民部大辅兼大藏大辅从四位守菅原朝臣重信，伊藤称民部少辅兼大藏少辅从五位守越智宿弥博文①。

维新政府在频仍的制度改革和人事更迭中动荡不定。帕克斯在 1869 年 6 月 7 日(明治 2 年 4 月 27 日)写给他妻子的信里说："政府最需要的是团结。现在的政府像是用砂子做成的绳子捆起来的。但对政府官员来说，特别重要的是时间。如不分裂而经过一段时日，则会逐月加强团结力。"(《帕克斯传》第 117 页)

藩阀与旧藩　维新政府暴露出土崩瓦解的危机。首先，由于藩阀的对立，政府的意见很难统一。政策的制定和人事的安排往往拖而不决，而且最终不得不搞折衷妥协。在朝的领导者虽然经幕末维新的政治斗争已无旧藩意识，充分认识到要维持政权就必须互相携手，但他们与旧藩和旧藩出身者的社会关系依然很紧密，而以
122 此为基础进入中央政府的藩阀，则不断争权夺利，集团的对抗意识与猜疑心理妨碍了相互接触和沟通。主要的藩阀当然是萨长，而夹于两者之间的为土肥。萨长互相猜疑对抗，企图拉拢土肥以扩大自己的阵营，而土肥则想勾结萨长以加强自己的势力。担任调解角色的是三条和岩仓，但也由于幕末以来的局势的影响岩仓倾向于萨摩，三条倾向于长州。对由此产生的复杂的而且经常变动的联合关系，参议佐佐木高行(土佐藩出身)在其日记中有过如下的记述：

……萨长互有猜疑。而且，佐贺人大限成了长州帮、副岛成了萨摩帮，吾乡高知人后藤与木户最要好，板垣亦倾向于木户。

① 源平藤橘四氏，指源氏、平氏、藤原氏、橘氏。大限重信使用的朝臣来自藤原朝臣，伊藤博文使用的宿弥来自橘宿弥。——译者

广泽虽持公平之论，但对萨有些不快；大久保亦以公平为主，但因维料[新]前就有纠葛，而常对长持有戒心。在这种情况下，三条、岩仓二公自然甚为忧虑，不敢同萨长肥人直谈。有事他来找我密谈，而我同斋藤谈话时总不免露出一些马脚。（明治3年3月6日，《保古飞吕比》[①]第四卷，第298页）

……今日之党派，可认为木户、大隈、后藤、伊藤、井上等为一派，大久保、副岛、岩仓为另一派。但副岛稍有附和之嫌，而大久保决不屈从。总之，条、岩二公费尽了苦心，而我高行毕竟势单力薄，只有如[始]终效劳，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明治3年9月2日，《保古飞吕比》第四卷，第420页）

土崩瓦解危机的另一个表现，是藩阀政府脱离诸藩而孤立。戊辰战争后，被动员去讨幕的各藩，均回到本藩休养生息，采取了观望政局发展的态度。藩在财政上陷入破产状态，失去了应付时势的能力和气力而停滞不前，但又对萨长土肥所垄断的政府表示不满，以阳奉阴违的办法抵制政府的改革。政府也曾设法广招人材，但到 123
政府里做官者，却被故旧亲朋诽谤为叛逆。各藩推举的贡士和公议人，不得不彷徨于对旧藩和新政府的双重忠诚之间。不仅如此，讨幕派诸藩还为功勋被萨长夺去，自己失去功勋而遗憾；佐幕派诸藩对萨长政府怀有深仇大恨，伺机报复。双方都希望风云再变。鸟尾小弥太（长州藩出身）在其《国势因果论》（1875年）中对此描写道：

在此次争乱中获锦旗、以英勇奋战而奏大功的诸侯臣属，以及被称为有志的浪士一伙，以其武功自负，动辄傲视天下，意气扬扬，完全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反之，被其击败的幕府臣属，以及奥羽一带士民与其所豢养之浮浪分子，则甚为懊丧，望天下再变，欲待机雪此仇恨，暗中煽动离间有名的诸侯，唯望政府出现

---

① 《保古飞吕比》，日文读作ほごひろい，是拾废纸的意思。——译者

故障。再者，原来首鼠两端、观时就势、无功无罪的诸侯，对有功的诸侯夸耀自己的武勇而临天下，从而得到天下之人的敬畏而有所羡慕，希望在再一次战乱时必在天下得到强国之名，因而频频精练军伍，增加兵额，与那些强藩暗通气息。(《得庵全书》第 556 页)

但是，萨长两藩在本藩内的情况，彼此自然有很大的不同。萨摩藩被个性强烈的岛津久光和门阀守旧派所控制，而又有拥护西乡的戊辰凯旋兵盘踞在那里，两者对峙，但均对大久保和政府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反之，在长州藩，旧藩主毛利敬亲(庆亲)信赖木户并听从他的意见，对戊辰凯旋兵的处理，也在明治 3 年 2 月随镇压开小差骚动而基本结束。藩地情况的这种差异，大概与领导者的意见分歧有关。

再者，木户与大久保的性格，也是相当不同的。性格的差异不一定是不和的原因，反而会使彼此投缘。但在这里，性格的差异，则
124 令藩地的情况极为不同，藩阀有强烈的对抗意识和猜疑心，而导致如后所述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关于两者的性格，岩仓在明治 4 年 4 月 30 日对佐佐木这样说过："木户以有先见为其长处。而执拗、鸣不平、表面不争论、背地向局外人发泄不满，则是木户的短处。大久保无才，无史识，而巍然不动为其长处。"(《保古飞吕比》第五卷，第 90 页。)再者，大隈对他们的评语是：

木户为人正直认真，雄辩起来滔滔不绝，奇才纵横，且非常诚实。大久保忍耐心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沉默寡言，总是在听他人的话时答应"好吧"后就必然坚决执行，决不改变，排除万难干到底。本来英雄就应当忍耐心强。然而，世间也有将此批评为阴险的。大久保等人也往往受到这样的批评。

木户有洒脱之处，想到的事总要说出来，所以与大久保的沉默正好相反。木户能诗善唱，颇长于风流韵事，既好游玩，又好打

闹，显得十分快活；但大久保，一见面就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且粗鲁不够风雅。这也是两人完全相反的地方。木户是风流才子，因此遭到过意外的奇祸。这是指木户给一个艺妓写了一首歌，歌词写在包三弦琴拨子的包袱皮上，被一个好事的顽固党分子用高价买来交给了弹正台，当作弹劾木户的材料。大久保没有引人发笑的妙语，他是一个业余嗜好不多的人，只是最爱下围棋。到任何地方去，都带着一位名叫高的女围棋手。到我家来玩的时候，总是先让高同我来一盘。大久保下围棋一输，虽然有点不高兴，但决不当场发怒。据说一回家，就要向家人和书童发泄。125
有人说，他输了棋，回家进门的脚步声都不同了。(《大隈伯百话》第66—70页)

在停滞与不稳交融的气氛中，政府和诸藩所最注意的是萨摩藩。戊辰战争后回乡的西乡，在藩里进行大规模的藩制改革，排除门阀势力，为凯旋兵建立起备战的行政组织。凯旋兵对政府怀有强烈的不满。牧野伸显(大久保的次子)这样说过：

都成了官军到战场去打仗，而负伤者很多都回到鹿儿岛来了。土佐、佐贺、长州等藩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军人多数在战场上立过功，而平叛后进入和平管理时期，他们都没有能力出任官员，所以也不能被提拔，结果大部分人没有得到安排。当时，出于一扫旧有的风气而提出了迁都论，最初主张迁到大阪或其他近畿地方，后来定为迁都于东京。因此，当上官的人都到东京去了，而留在鹿儿岛的都是没有入仕的不平党。……最有战功的普通士族，未必通晓行政事务，战后多数回乡而苦于无事可做，而前述的中井[弘]虽未参加战争，但长于交际，却能每月领薪，安度帝都生活。这种不合理的不平现象并非只此一例，在参战诸藩的士族中，恐怕有相当多这种现象。维新后数年间各地发生的骚乱，似乎有不少是出于遭遇不佳的士族的发动。(《回顾

录》第1卷，第16—18页）

西乡也对政府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明治3年8月逗留于鹿儿岛的犬冢胜弥，在他的《萨州藩滞留中之大略》中，转述过西乡的批判言词。现引其一小部分：

——恕我直言，当今之世没有文明开化，但却听到有人
126 说，现在从上面进行政府改革，就可以自然出现文明开化的形势。

——方今郡县应革除封建的弊端，广招人材，按材授职，乃是理所当然，但却听到有人说，大纳言以下不以华族充任，则难以处理好政务。

——自去年以来，屡次蒙召进京，同藩的人士亦多方劝我参加政府，而我当时对他们说，你们劝我到朝廷里做官，是对我表示尊敬，但你们看一看，当今朝廷里的官员在做一些什么。大部分是贪图薪俸，住好房子，什么事也不做，往坏的方面说，是一帮偷盗。有一天，我对同藩的人士说，让我与偷盗们为伍，我甚感下贱，所以决不干，也不应召。他们听后，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以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多次戏言。

——似乎不肖的我如应朝廷之召，也能做点什么，本不该辞退。但实际上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被拉进以后，就要做一些坏事，并由此被政府用金链拴住，而且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亦违背我的宏愿。然而，他们却请我好好考虑考虑，不要断然拒绝。

——最近大久保来信，对庙堂表示叹息，说他昨夜不禁泪下。但我认为，庙堂之变成今日这样，不是始于今日，而在以前就已现其端倪，即使加倍努力纠正，亦无效果。时至今日哭泣有什么用处。然而，仍然有人对我说，你应当尽力而为，即使不被录用，亦应早日归京。

西南蜂起的消息频频传到东京[1]，庙堂大为震惊。长州藩凯旋兵的开小差骚动虽在明治 3 年 2 月被镇压下去，但其他各藩也有同样的问题，不过对讨伐持批判态度。一些开小差的士兵潜入邻近地区，依托苦于歉收和赋税的农民，伺机聚众暴动。南方一旦揭竿而起，各藩的大量不平士族当即暴动，而农民亦将挺身起义，政府也许马上崩溃。对维新立过大功的萨摩藩，现在成了维新政府的最大威胁。 127

当时，政局是大久保、木户、西乡的三杰构造。萨长在中央政府中的离合，萨摩军团对中央政府的亲疏，对政局来说，犹如围棋的"眼"。如三杰"同心合力"，则政府的"根基确立"就有可能；而如果互相分离疏远，则"土崩瓦解"的危机就会暴露出来。下述的三藩献兵和废藩置县，是三杰合力的最光辉成果。（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1 卷，第 5—61 页。）

三藩献兵　明治 3 年 8、9 两月，岩仓和大久保等人埋头于制定大规模改革政府以确立朝权的方案。这是因为获悉对政府的施政持有强烈批判态度的西乡及其军团很不稳定，这年 9 月警卫皇城的萨摩藩兵撤走所使然。土佐藩兵也撤走，保卫皇城只剩下两营长州藩兵。为了缓和萨摩藩兵的不满，争取他们再次协助，坚决进行政府的大改革已成为必要。在朝的萨摩藩士也对事态表示忧虑，决定全面协助大久保改革政府，开始对藩地进行说服工作。在这同时，另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是说服木户。木户疑心萨摩有政治野心，反对依靠萨摩来改革政府。大久保以萨摩决没有垄断政府的野心，为确立朝权只有萨长合作而别无他途，对木户进行了说服。大久保以为已经说服，但木户并未消其疑心，对改革表示冷淡。然而，大久保经过在参议间奔走，在 10 月 27 日的三职会议上使政府改

[1] 1869 年，日本首都由京都迁到江户，江户由此改称东京。——译者

128 革方案基本上按原案通过。

大久保认为西乡已对政府改革方案的通过、萨长合作不可缺少、定于来春实行改革等表示支持。因为早在9月初带着说服归藩活动使命的西乡从道，在其闰10月22日致大久保的信里说道：如果三条和岩仓作为敕史下来督促他们进京，久光父子和西乡以及军队，也许“不会拒绝效犬马之劳”。(《大久保利通关系文书》等3卷，第386—387页。)反政府的形势变为进京参加政府改革的气氛。西乡与部队的同人磋商之后，加强了断然进行改革的决心。在政府看来，萨兵进京是使南方的爆炸物移到东京并把它变为政府军的一箭双雕办法；而在难于维持凯旋兵给养的西乡看来，如将凯旋兵改为政府军，则给养问题可以解决。于是，木户知道这一情况后，也下定决心协助改革。《木户孝允日记》在11月15日载有“近日获悉吉报，不胜为天下欢欣”，第二天即16日在致大久保的信中说“实令人雀跃”。(《木户孝允日记》等4卷，第149页)

岩仓敕使和大久保、山县有朋等一行，于12月18日到达鹿儿岛。在没有发生所担心的障碍下安排西乡上京时，岩仓于20日以“至为欣喜”书告大久保。第二天即21日，他写信给在京的三条说：“特别是如西乡者，确实在为朝廷之事、天下之事担忧。必须长土等同心合力，否则百年之后必然后悔，而且也辜负当世之人杰。”(《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等4卷，第481、483页。)

明治4年1月初，岩仓、西乡、大久保等人赴山口。木户早已来到山口，他没有在这里提出问题。随后，西乡、木户和大久保又赴高知，试图说服县大参事板垣退助献兵。板垣也没有异议。于是，萨长土的三位首脑于2月2日到达东京，在9日的三职会议上决定设立亲兵。这样，在大久保、西乡、木户建立同心合力的体制时，就
129 实现了三藩献兵。

但是，木户并非没有疑虑。他在筹备建立亲兵时，于2月8日

在日记里写道："不觉潸然泪下"，而在26日写给三条和岩仓的密信里又说：

……此次萨长土之一致，实乃下策，而出于今日之不得已。本来并无上上之策。自古以来，上策依人而成，下策因势而出。知其弊而默视之，实为憾事。将来虽经努力而制止不了其余势，则将更为严重。谚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而在朝廷上公正之道受到挑战时，即使萨长土以力压服，诸藩也必誓不服从。再者，萨长土最终出现不合也是必然。万一在朝廷上出现群藩向萨长土阿谀奉承等情，则形势必然为之一变，因而下策破产之势实已无可挽救。故望条理应当明白并始终一贯，是所至盼(《木户孝允文书》第4卷，第196—197页)。(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62—72页)

废藩置县　明治4年6月，当萨摩兵4个营、长州兵3个营、土佐兵2个营外加炮兵队共约一万人基本上于东京集结完毕时，就作为三藩献兵的目的的政府改革问题，随着重新推敲前年10月三职会议所决定的改革方案而发生了争议。对于岩仓、大久保等兼任参议、省卿案，许多人一致同意，唯独木户反对，他认为政府改革不应由确定职制、权限和具体人选开始，而要求首先确定制度的基本原则，并提案设置议政官十数人和强化立法权，因而引起争议。在争议相持阶段，决定重新设置制度取调会，于是争议又向纵深发展，变成为是建立议会制还是建立君主制和立宪君主制的国体争论。

废藩置县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虽然迟早要实行废藩 130
置县，但这是确立朝权的最终阶段，而当前的问题是改革中央政府机构。这时突然提出废藩论，是出于山县陆军少辅、鸟尾小弥太、野村靖(长州藩出身)的书生见解。他们痛感要使全国兵制划一，就必须废止藩兵。山县私下探听西乡的意见，而意外地得到"这很好"的

回答。山县记述其经过时说："我很早就向他谈过此事，所以此次没有说只供您参考之类的客套话，而是再次论述目前的形势，并一再说明今日之问题实为重大事件，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流血，且必须有这种思想准备。说完之后，西乡的回答仍是'我们认为这很好'那句话。"(《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第 128—129 页。)另一方面，鸟尾和野村也向井上馨大藏大辅作过试探，但在他们未发言之前，井上就指出了他们前去的目的："是关于废藩置县的议论吧！"井上从财政的观点出发，也痛切感到有废藩的必要性。政府的财政依靠征自旧幕领和戊辰战争后没收的藩领的总数为 890.6 万石的田赋，其半数用于支付赏典禄和旧幕藩关系费，所以十分匮乏。为了打开这个局面，只有废藩使征税权集中于政府手中而别无他途。

井上将西乡赞成废藩一事通知给木户。听到这个消息的木户，停止在制度取调会上掀起高深的争论，而立即开始策划废藩的政变。木户 7 月 7 日的日记写道："时势之进展不可测，余近日之担心不能尽于笔端。今日聊有快愉之心情。"7 月 9 日晚 5 时，井上、山县、西乡兄弟、大久保、大山岩聚于木户邸，密议废藩的政变。据井
131 上说：

> 对于断然实行政变一事，大家终于没有异议。于是我问大家："此事之对象为公卿大名。任何时候或任何故障，均有可能终止此议之实行。其时大家有何决心？"答称："决定其时联袂退出朝廷。"吾又问："必须对可能发生某些动乱有思想准备，其时将有用兵之必要。有此思想准备吗？"西乡与山县答称："我们承担用兵之事。"西乡又面对我们反问："其时有钱吗？"我们本来没有筹款，但有胆量，答称："有大久保君在，我们总能筹到款。"这样，众议便一致决定下来(《防长回天史》第六编下，第 549 页)。

木户7月12日的日记写道："西乡与大久保密谈即将进行之事的安排。互相虽有异议，但如此重大事件甚难彼此十分如意。因而先决定其大略，细节待后日再定。"同一天，大久保的日记写道："木户子与西乡子和解。一切均已决定。概略按原议解决，其余虽尚有异议，但如纠缠于此会影响大局。因此，应当深思熟虑，与其今日因此而瓦解，不如当初在作大英断时瓦解。望大家同意仍以大事之成为目的，而不问小事。"这一天，西乡和木户向三条，木户和大久保向岩仓，分别通知了政变的计划。

废藩完全是不声不响地突然进行的。7月14日，在京的56藩的藩知事被召于御前，向他们下了"汝群臣宜体朕意"的诏书。在藩的藩知事接到"着即归京"的通知后，均目瞪口呆。第二天，大臣以下政府首脑集合于皇城中的舞台，静静地听着今后如何善后的不同议论的西乡，突然大声叫道："今后如各藩有异议，必将以兵击溃之而无他途"，议论立即随之停止。佐佐木对此评论说："西乡之权 132
力，使这些议论家面面相觑而无一言，实非凡之事而无他。"(《保古飞吕比》第5卷，第160—161页)

任何地方也没有出现激烈的反抗。在最令人担心的鹿儿岛，久光接到废藩的通知后，也只是"在邸中鸣放花炮，以泄愤气"而已(市米四郎《自叙传》，《西南记传》中卷一，第172—173页)。在已经破产的各藩，藩知事和藩士的俸禄由政府支给，藩债亦由政府负担，因而可以说是得救了。共有261个藩改为县，与以前设立的府县合在一起，现在共有3府302县，11月整顿为3府72县(1888年，改为3府43县)。从11月新任的府县最高官职(府知事、县令、权[1]令、参事、权参事)的出身地来看，大部分人不是本府县的人，但也不能说被萨长土肥出身的人所垄断。鹿儿岛9名，山口2名，高知6名，佐

---

① 权为副的意思。——译者

贺 3 名。[1]本县出身的人，大部分不是县令，而是出任参事或权参事。从府县官员的出身地来看，尤其没有藩阀色彩。中下级官员之所以本府县出身的特别多，大概是因为任用了本地士族。

废藩置县后进行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据明治 4 年 7 月的太政官职制，太政官分正院、左院和右院。正院由天皇亲临总理万机，在太政大臣、左右大臣辅弼、参议参与下执行一般政务。太政大臣为三条（公爵），右大臣为岩仓（公爵，10 月就任），参议为木户（长州藩）、西乡（萨摩藩）、大隈（肥前藩）、板垣（土佐藩）。右院会同八省的卿协议行政实务。外务卿为岩仓，10 月改为副岛（肥前藩），外务大辅为寺岛（萨摩藩），大藏卿为大久保（萨摩藩），大藏大辅为井上馨（长州藩），兵部卿暂缺，兵部大辅为山县（长州藩），司法卿暂缺，司法大辅为佐佐木（土佐藩），文部卿为大木（肥前藩），文部大
133 辅为江藤新平（肥前藩），工部卿暂缺，工部大辅为后藤象二郎（土佐藩），10 月改为伊藤（长州藩），宫内卿为德大寺实则（公爵），宫内大辅为万里小路博房（公爵），神祇（不设卿）大辅为福羽美静（津和野，国学者）。除三条、岩仓、宫内卿、宫内大辅、神祇大辅外，其余均为萨长土肥出身。一个旧藩主也没有。左院是正院的咨询机关，审议立法，10 月后藤就任该院议长。（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1 卷，第 73—112 页）

134

二　岩仓遣外使团　征韩论争

派遣事由　政变后 4 个月，明治 4 年 11 月，以岩仓右大臣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参议、大久保大藏卿、伊藤工部大辅、山口尚芳外务少辅为副使的约 50 名的大型使团，率领约 50 名留学生，由

① 鹿儿岛原属萨摩藩，山口原属长州藩，高知原属土佐藩，佐贺原属肥前藩。——译者

横滨港乘船出发。派遣使团一事由大隈倡议发起，他本应为使团的成员，但大久保和木户热望外游并积极奔走，挤进了岩仓使团，而使大隈未能参加，使团的规模由当初的 20 名扩大为二倍多。大隈这样写道：

> 派遣使节一事本由我倡议发起，我也希望进而出任使节，且认为当时内阁的大台柱、作为政治的原动力而负有重托的木户和大久保等宜留下来尽瘁于内政的整理，但世间的事情往往出现意外的结果，以为应当留下来的木户和大久保却没有留下来而外出，我虽想前往但未能去而留于内，以致在内留、外遣的冲突面前不得不承担起掌握实权实势的大任。(《大隈伯昔日谭》第 461 页)
>
> ……于是，尽快派遣使节去各外国说服它们同意修改条约，不仅是当时的紧急任务，而且从无论如何必须完成的内政改革来论，也需要如此。处理萨长的倾轧和解决官吏安置的冲突极为棘手，且要清除阻碍各项改革和革新的弊端。因此，尽量把那些
> 有碍于此的人派出去，即采取所谓"阎王不在小鬼当家"的办法，135
> 以在此期间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整顿。总之，要尽快地和尽量多地派出一些人。于是，派出了将近一百人。(同上书，第 457 页)

从当时那张有名的使团首脑照片看，岩仓居中，身着和服礼装，脚穿洋式皮鞋；簇拥着他的，是身着无尾夜礼服的萨长两藩的实力人物。其中出过国的，只有伊藤博文一人。另一方面，担任秘书的多为旧幕府官员；他们有的参加过幕末的遣外使团，有的作为留学生出过洋。因此，一踏上外国土地，大使和副使的权威立即掉价，常被知晓外国事务的、现在当上秘书的旧幕府官员愚弄，他们好像在报维新之仇。再从年龄上来说，年龄最大的岩仓 47 岁，大久保 42 岁，木户 39 岁，伊藤 31 岁，最年轻的 18 岁。平均年龄约 30 岁，非常年轻。

使团的目的，第一是就暂时延长第二年即将到期的条约修改协议期限和修改条约问题进行谈判。但在最初的访问国——美国，便已知道修改条约不易，所以在欧洲便没有进行积极的试探。另外，在这年 7 月废藩置县后由政府提出同中国政府签订的《日清修好条规》[①]，是基于同西洋列强对抗、与中国清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这种日中提携的设想而订立的平等条约。它与日中两国同西洋各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不同，承认日中两国互有治外法权，规定双方采取协定税率主义。使团亦想根据这个条规的原则与对方谈判。

派遣使团的第二个目的，是为改革和健全国内体制而调查欧美先进诸国的制度与设施。当初定为 6 个月而后延长为 1 年 9 个月的国外视察，给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米邦武编的《美欧回览实记》共 100 卷(1878 年)，按国别分：美国 20 卷，英国 20 卷，德国 10 卷，法国 9 卷，意大利 6 卷，俄国 5 卷，比利时、荷兰、奥地利、
136 瑞士各 3 卷，瑞典 2 卷，丹麦 1 卷，维也纳万国博览会 2 卷，欧洲总论 5 卷，西班牙和葡萄牙合为 1 卷，从马赛开始的归航日程 7 卷。从分量上看，使团所关心的可以说首先是美英，其次是德法，再次是意俄。对"四个小国"也写了 12 卷，不能说是轻视。然而，一个国家对日本的示范作用，不能以卷数来断定。使团在精心考察各国的制度时，并没有忘记这一点。现就英德俄三国，列举若干颇有意思的观察。

英国、德国、俄国　1872 年 8 月 17 日到达伦敦的岩仓一行，看到第一届格莱斯顿内阁和最盛时期的议会政治。临时回国的帕克斯公使为使团担当了向导。

[9 月 4 日晴]午后，到"西敏区"的巴力门[②]，巴力门为大英

① 中文名为《中日修好条规》。——译者

② 巴力门，为 parliament(议会)的音译。——译者

联合王国的国会议会厅……由人民公选议员而执立法之权，乃欧洲的一般通例，这在政治上是与中国、日本最为不同的。此例之行滥觞于罗马时代，并随时代而变化，但始终重视贸易，产生了合办公司的风俗。中国、日本的人民，历来有农耕自立的风习，以修身为政治的主义，而不重视财产，因而立法上无基准的主义，**更不知民权、物权为何物，反而压制民权、物权，并以此为移风易俗的良模**，故治国安邦的议论常忽视财产问题。又因君子小人截然有别，自成一类，而使国家逐渐陷入贫弱。因东西洋相距遥远而来的人民习惯差异，必然造成政治形式的不同。但方今世界舟楫相通，贸易往来，而欲维护国权、保全国益，则必须使国民上下全体一心，**首先重视财产、致富图强**。此不唯应须深切注意，且宜依此建立立法权。（第1卷，第80—83页） 137

木户在逗留美国期间就曾留意美国宪法的翻译和研究，而到伦敦以后，又把当时在普鲁士留学的青木周藏（长州藩）叫到英国，对由宪法开始到地方自治、土地制度、宗教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大久保在各地考察工厂，他在11月20日写信给大山岩说：“到任何地方参观，均不见有地上的产品，只有煤与铁而已。制成品皆由他国输入，然后再输往他国。工厂的盛况早有所闻，此次考察益信传闻不虚。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富强的原因了。”（《大久保利通文书》第4卷，第468页）

久米在考察英国的结论中说：“其形势、位置及人口，殆与我邦无异，故此国之人每称日本为东洋之英国。但以**营业力**而论，其悬殊亦甚。”因此，“欲学其营生利国之目的，尚不可。故考察英国使我所受之感触，亦不亲切。”再者，“内部的政治，国民的景况，尚不见对我有紧要之处。”（《美欧回览实记》第2卷，第22、384—385页。）

使团一行于1872年12月6日进入巴黎。从“经常阴雾濛濛而半似黑夜”的英国来到巴黎，“顿觉气象恢廓”。一年前巴黎公社的

历历在目的战迹，给使团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文明之国，其中等以下的人民，犹不免冥顽鸷悍。人谓西洋各国上下一致风俗美好，亦大谬也。"谒见梯也尔总统，他是"老练成熟的政治家"，"身体短小的老翁，言容温温，和气可掬"。(《第 3 卷，第 41、141、165 页)

138 在巴黎停留两个月，然后由此去比利时、荷兰考察，于 3 月 9 日到达柏林。11 月谒见威廉一世，"晚间，赴帝国剧场观剧(他们称此为 Opera，Opera 居诸剧种中之最上等，犹如我之猿乐)。"(第 3 卷，第 314 页。)对日本来说，使团感到德国比英法更有参考价值。

普国人民之生业重农牧，全国人口之半数 1 200 万人为以农为业之家。此国与英国之贸易已如人所知。农业生产自给有余，余者供出口，此为收益之本；亦兼营矿业与制造业，同外国通商，通航至海外之远处。但与英法两国从事海商之目的不同，英法两国常由远处输入原材料，经本国加工，再输往外国，以市侩之利富国。而德国则以通商增其武力，其武力虽在国外并不甚显，但已以此为国是。此点反而与我日本酷似。研究此国之政治与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第 3 卷，第 298 页)

3 月 15 日俾斯麦设宴招待使团。他关于德国已经实现统一的演说，给使团留下了强烈印象。使团是这样记录的：

……在本日盛大宴会上，俾侯亲述其幼年以来之经历曰："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予在幼时，我普国贫弱，此乃诸公所共知。当此时也，亲阅小国之处境，常怀愤懑，至今仍耿耿于心而不去。彼所谓公法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即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规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有越，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但遇对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自主。是以慷慨而起，努力振兴国力，为使国家在外交上获得

国与国之对等权力，而激起爱国之心。积数十年之努力，至近年方实现所望，此亦只是各国保全自主权之志愿而已。然而，时闻 139 世人非议各国皆陈兵于本国之四境，以此徒增仇恨，宣耀军略，掠人国权。我国之志与此完全相反，我国只重国权，故望各国自主，行对等之交，互不侵犯，相处不违公正。历次战争，亦皆为日耳曼之国权，不得已而用之，幸蒙世之识者所谅察。闻英法诸国于海外贪属地，争物产，擅用武力，诸国皆忧其所为。欧洲亲睦之交尚不足信，诸公亦应不放弃内顾自惧之念。予生于小国，深知小国之处境，故亦深明此理。予不顾世之非议而保全国权之本心，亦不外于此。故当今日本虽云亲睦相交之国甚多，但如日耳曼重国权自主者，可谓日本之亲睦国中之最亲睦国。"在宴请交际使臣之际发此言论，其意义甚为深远。此侯可谓娴于辞令，长于政略。对此应深刻认识与玩味。(《第3卷，第329—330页)

3月30日，使团一行由柏林乘火车驶向彼得格勒。"荒塞不毛之野"一望无际，"漠野茫茫"和"森林榛榛"的景观相间。在心里正想着这样如何使文明开花结果之间到达了彼得格勒，但见市街"整齐恢宏"，建筑"壮观，在欧陆亦属第一"，各国皆不可及的王宫官衙、贵族宅邸给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然而，久米却认为：

有人评曰：在英、法、比、荷，人物富豪出自平民者多于贵族，故全国繁昌，民权亦盛；在德国(包括奥地利)与意大利，贵族之富超过平民，故文化虽可观，但全国犹不免贫穷，因而君权胜于民权；俄国全为贵族之文明，人民全同奴隶，财物为上等人包揽，全国处于专制压迫之下，是以俄国之贸易不能自振，掌握于外国人之手，其利得为外国人所独占，观诸圣彼得堡之商店，触目皆大商号，但尽为日耳曼人所设。(第4卷，第53页)

在俄国卷的最后部分，有这样的评述： 140

在欧罗巴，最有势力国家当推英、法、日[原文有误，应为

德]、奥、俄五国。欧洲各国之能强弱相持、大小相制、自主独立，皆赖此五大国保持均势。其中最雄强者为英、法，最不开化者为俄国。西洋人仍不免视俄国只略高于土耳其之国家，俄国人亦不免面对英法之显国地位而感到委屈，唯欲奋勉，迈开国步，放出与此等显国同样之光辉。俄国在欧洲之如此境况，与东洋人之想像迥异。至今，日本人对俄国的畏惧，仍高于对英法之畏惧。在人人之心目中，英法者荷兰之类一般商国也，而日[原文有误，应为德]、奥则想在欧洲成为强国，唯俄国最大最强，总是狼视虎步，抱有吞并世界之志。对于俄国的此种说法，至今仍众口一词，未曾有所怀疑。而探究此臆说为何总是触动日本人之神经，盖有益也。

……各国自可寓权诈而施其政略，但我最亲者抑或英法、抑或俄国、抑或日[原文有误，应为德]奥，应以体察世界之真实形势而加以切实了解为定，而对历来之臆说与虚幻之论，应加痛斥而澄清自己之精神，乃识者之所望。（第4卷，第106—110页）

岩仓一行回到横滨，为1873年9月13日。庙堂一直在纠纷倾轧。早在1月13日，三条就“以方今国内多事之秋，政府中无人主政且彼此不睦”为由，要求大久保和木户迅速回国（《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第5卷，第223页）。大久保在柏林与使团一行告别，于5月26日回国；木户也在离开彼得格勒后，又漫游欧洲各地，于7月23日回国。①

141 留守政府　岩仓使团出发时，将留守政府委托于西乡、板垣

① 当时的日本是农民占八成社会，1872年第一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4.9%；而当时的英国，已将是农民只占一成社会，其1871年第一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5.3%。因为悬殊之大才不得不说“尚不见对我有紧要之处”。法德是农民占五成社会。1871年法国第一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48%左右，德国占53%左右。所说研究德国“比研究英国之事物得益尤多”，甚为正确。而正在使文明开花结果的俄国，当时大概是农民占八成社会。维特实行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80年代。（参阅本卷末所附表1）

和大隈，定下不得随便改变制度与人事的《约定十二条》。留守政府最初平安无事。据明治5年2月15日西乡致大久保的信称，废藩置县的善后措施实行得很顺利，西乡也好像在清闲自得之中等待大久保回国。“留守之中虽出现一些麻烦，但目前并无特别重要之事，闲得无聊。”(《大西乡全集》第2卷，第591—592页。)大隈由于木户、大久保不在，而西乡、板垣又不过问政治，所以想在“阎王不在小鬼当家”之中大显身手。但是，井上大藏大辅和山县陆军大辅，为排除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实施全国划一兵制，而想大力推进改革，因而惹起藩阀的反对，使留守政府陷于深刻的混乱。

国家的财政虽因废藩而一举达到5 000万日元的岁入，但依然 142
处于窘迫而恶化的状态。对从旧藩接管下来的士族的家禄支出，占岁入的30%以上，再加上偿还旧藩的内外债，便超过了岁入的一半以上。井上虽想削减各省的预算，但各省为进行改革反而要求增加预算，以致发生纠纷。江藤司法卿(明治5年4月上任)要求拨付(包括健全审判制度的费用在内)200万日元，但被削减为45万日元；大木文部卿提出的预算(包括因实行新学制而增设学校的费用)为2 000万日元，但被削减为130万日元。而山县陆军大辅要求的1 000万日元，尽管有山城屋事件等，却被削减为800万日元。另外，井上为压缩支出已把停发家禄等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但这不仅引起士族的不安和反抗，还被指责为大藏省越权。所以各省以及正院和地方官，把炮火集中射向井上。明治6年[①]1月22日，井上在致木户的信中说他“感到真正处于四面八方皆敌之状态”，“只欲实践使节一行与留守人员之间的约言，日日盼望使节归朝。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世外井上公传》第1卷，第524页)

① 旧历明治5年12月3日改为公历明治6年1月1日，从此采用公历。以下的年月日均为公历。

纷争因1月24日江藤司法卿提出辞呈而火上加油，正院支持司法省的预算要求，而大藏省则根据4月召开的地方官会议的决定，试图拨回司法部的请求，但正院否决了地方官会议规则。4月19日，后藤左院议长、江藤司法卿、大木文部卿被任命为参议，迎来了新参议的正院修改正院办事章程，而把岁入岁出、货币铸造、内外债等方面的权限从大藏省手中夺来，改为正院主管。在这当时被称为对前述的“约定”的正当“润饰”，但却是一项重大的制度改变。即权力向正院和参议集中。结果，井上5月辞职，回到山口去了，由大隈参议代之，大隈以大藏事务总裁的名义编制了预算。长肥抗争又发展为追究个人。江藤司法卿着手追查尾去泽铜山事件。这是指井上在清理旧盛冈藩的藩债时，以不正当方法将尾去泽铜山卖给了同乡的御用商人的事件，江藤在井上辞职后立即告发了井上。

143 另一方面，山县埋头于征兵制度的改革与实施。明治4年8月，设立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个镇台[1]，将旧藩常备兵配置于各镇台。翌年11月，实施严格的征兵令；1873年1月，把全国分为6个管区，设立6个镇台（东京、大阪、仙台、名古屋、广岛和熊本）。常备兵总数为30 000人。征兵制的整顿，引起士族的反感。特别是桐野利秋等率领的萨摩兵（亲兵于明治5年3月改编为近卫兵），反对强烈。因此，萨长抗争也发展为个人追究，即山城屋事件。横滨的贸易商山城屋和助，当过骑兵队的一个队长，与山县过往甚密。他作为陆军省的御用商人，广结官府，由陆军省预支总计65万日元，据说长州军人从他那里借过许多钱。和助在巴黎旅游挥金如土，使这一事件暴光。于是桐野等萨摩军人纠弹山县等长州军人，山县辞去兼任的近卫都督职，改由西乡兼任，萨摩兵的骚动方始平

① 镇台为军团之意。——译者

静下来。但是，江藤司法卿要彻底查明真相。和助被山县从巴黎召回，把有关证据材料烧毁消灭后，于陆军省客厅自杀身死。（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118—133页）

征韩问题　在长肥抗争与萨长抗争交织而纠纷日益激化的时候，1873年6月又发生征韩问题。外务省利用废藩置县而撤销对马藩的机会，将釜山的草梁倭馆的旧对马藩官员撤回，把草梁倭馆改称“大日本公馆”，由外务省派遣官员接管。这激怒了朝鲜方面，日韩关系开始恶化；又由于三井组的店员借用对马商人的名义试图推销商品，朝鲜官方于5月在公馆门前张贴告示，非难日本为“无法之国”。接到报告的外务省认为，这是“首关朝威、系国辱”的 144
事件，所以必须做出“断然出师之处置”，而向内阁会议提出如下议案：先派“陆军若干、军舰几只”以保护侨民，令九州镇台采取应战态势，再由政府派遣使节“以公理公道严正谈判”。

板垣建议急速派兵一个大队保护侨民，而西乡反对派兵，主张派遣全权使节；当三条发言要求率护卫兵搭军舰前往时，西乡主张应当“戴乌纱帽、着文官服装”而不带佩刀前往，并要求自己充当使节。西乡恳请板垣参议予以支援，说服7月27日由北京回国的副岛外务卿（为交涉台湾当地居民杀害琉球渔民事件和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问题，以及交换日清修好条规的批准换文，于3月间去中国），催促犹豫不定的三条，而使内阁会议于8月17日作出了派遣西乡的决定。于是，留守政府的态度确定下来，但上奏中加上了待岩仓归朝的条件。从这个期间西乡写给板垣的几封信中可知，西乡欲去朝鲜的热情是十分高的，而内定派遣他时所表现出的高兴样子更使人惊异。他在8月19日的信中说：“已无梗阻之忧，人生之乐事在此。”（《大西乡全集》第2卷，第758页。）西乡在想什么？他在致板垣的信中说：

［7月29日］如公然派遣使节前往，估计可能遭到残杀，但

请派我前去，是为至盼。我虽不能成为副岛君那样的优秀使节，但自我认为以身殉职之事尚能做到，敬希谅察(同上书，第 737 页)

[8 月 14 日]必将由此引起战争，但在采取此举之前如认为死得可怜或稍有姑息之心，则什么也办不成。虽只有先后之别，
145 但结果不同。如能以迄今之厚谊尽力相助，则死后亦难忘君之厚谊。特此奉闻。

[8 月 23 日]视死如归，决不后悔，但亦不会过激而早死，希对此放心。然而，如果有人说我是硬去找死，则必须请他们说明原因。我认为，朝方将回避战争乃是必然之事。今上书给先生，请谅察。(同上书，第 760 页)

原来，西乡想以遭到残杀来为开战寻找借口。进入 9 月，他已等得不耐烦，恨不得马上出航，思想已经飞到朝鲜的上空。9 月 1 日，他写信给别府晋介说："无论如何要在 20 日之前出航。"(同上书，第 772 页。)桐野利秋和篠原国幹等萨摩将校和近卫兵们，人人摩拳擦掌。各地的征韩派士族和不平士族，亦在盼望风云激荡。如要抑制这种激情，也许冲向政府爆发。西乡在 8 月 17 日写给板垣的信里，说他以"将希冀内战之祸心外移以兴国的远略"说服了三条(同上书，第 753 页)。西乡没有抑制萨摩兵的征韩热。

然而，令人不可解的是，日韩关系虽云险恶，但还不是已经紧张到即将破裂。派遣使节即将遭残杀云云，乃是过于轻佻之论。如必遭残杀，则参议和征韩派岂能赞成派遣西乡？或许是被西乡的气势压倒了吧！而且，即使不遭残杀，寻找开战的开口亦非难事。太容易了，何须派遣使节，满可以用"无法之国"的布告作借口嘛！

西乡的言行决非寻常。他为何非要往死处去呢？岛津久光以
146 激烈的言词对他的追究，或许使他感到了痛苦。他在明治 5 年 8 月 12 日写信给正在欧洲的大久保说："军队的分裂恐不会发生，但副城[久光]发来的炮弹力量过强，不可敌。请遥察是幸。"(同上书，第

660 页。)11 月久光叫他回去，但他不得不回鹿儿岛后，“罪状书”马上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在 12 月 1 日写信给黑田清隆说：“其责问实难言表，无理之言词令人厌烦。”(同上书，第 689 页。)翌年 4 月初西乡返京，久光也紧跟着来京。5 月 4 日西乡写信给正在德国的寺田平之进说：“我又遭人烦厌，而今开始之事亦甚[艰难]，颇受指责，只好隐退。”(同上书，第 708 页。)6 月，久光向三条提出洋洋 20 条的质问书，强烈攻击政府的开化政策。西乡对久光的言行洒以痛苦而激烈的嘲笑，这不是发泄其对旧主的难以消解的愤怒吗？大隈说，西乡终于从遣韩使节的决定中找到了摆脱苦恼的血路。西乡的表弟大山岩对牧野伸显说过：“大隈君的话决非出自想像，而是有具体根据的议论。”(牧野《回顾录》第 1 卷，第 161 页。)大隈说：

> 简而言之，西乡[关于征韩论]的心事，并非如多数人所想像的，以为他当初愤恨韩方倨傲无理，而一心想征服它以伸我之国威。他虽接受人们的劝告回到了朝廷里，但诸事不遂心，不能达到预期的志望，前有旧君对他的言行表示愤怒而痛加责难，后有群小不满之徒攻击内阁的施政，而他支持内阁的施政。他欲进而不能进，欲退而又不能退，但继续处于这种地位，使他更加痛苦。像西乡这样的人，也几乎陷入失望沉沦、完全抛开人事而决心遁世的地步。但不料产生对韩问题，他提议派使节去韩廷进行最后谈判，想由此使自己从千绕万围的重围中开出一条血路，由失望灰心的泥坑中跳出，而跳出之后就可排遣苦闷。因此，他极力主张派问罪之使，并切望自任其职。(《大隈伯昔日谭》第 559—560 页) 147
> (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1 卷，第 135—144 页；毛利彦《明治六年政变》第四章)

庙堂分裂　9 月 13 日岩仓回到日本。三条和岩仓认为首先必须做的事情，是让大久保大藏卿出任参议，令木户参议回朝视事。木户早在 7 月已经归国，据他的日记所载，他归国后好像连日到处

奔走。为井上被控(尾去泽铜山事件)问题而奔走的记事在日记中有二、三则,而专为遣使问题的记事,只见于 9 月 3 日访问三条一则。这天的日记写道:“以治内政为第一着”。但从 17、18 日以后,只记有他患怪病而不能自由起坐,卧床焦急。大久保早于木户在 5 月末回到日本,但于 8 月又到西部旅游,9 月 21 日才回到东京。一直到 10 月 15 日,他的日记全是空白,书信亦极少,但 8 月 13 日致在欧洲的村田新八、大山岩的信中说:

国内情况,谅已有所闻。实已达到难以收拾之地步。鄙人归国后,处于所谓蚊背负山之势,难有所为。迄今虚度时间,人人均在袖手等待。即使怀有有为之志,临此局面亦如蜘蛛张网后即被破坏,毫无效果。且人人存有私念,泰然傍观。国事不能靠一时之奋发而振兴,亦不能以此为快而歌颂。……久光公正在此时来京,提出了一些猛烈的批评。这不仅动摇了一般的人心,而且对圈内人也损害不小。然而鄙人归国后虽未立即受到严重威胁,但主要病根都很清楚,小生亦不能不以此忧为忧。现正忧虑之中。我认为这也是需要您挂念的。目前人马俱乏,可导致不可思议之事情。演员们亦临秋风白云季节,待恢复元气后便可开场。(《大久保利通文书》等 4 卷,第 521—522 页)

尽管有三条、岩仓、伊藤和黑田出面说服和请求,大久保仍坚
148 决不就参议职。不久以后,等得不耐烦的西乡迫使三条召开内阁会议。岩仓听说后于 30 日去访问西乡,他写给大久保的信中说:“今晚去了西乡处,反复讨论了朝鲜事件这个迫切问题。”(《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第 5 卷,第 330 页)大久保说,在三条与岩仓的面对面谈判中,两人的基本方针是:“使节之事已内定,决不改变,但要延期派遣。”只是以书面确认使节延期出发,大久保这才接受出任参议。另一方面,西乡于 11 日向三条上书,希望不要改变使节的派遣,说“如若改变,我亦没有办法,但愿以死谢国友,云云”(《大西乡全集》第 2 卷,

第 787 页）。三条把西乡的上书转给岩仓时附带说：

此事完全由于吾等之轻率而变成如此之难题，实无言以对国家。对尊公只能表示惭愧。实万悔不及之事。愚以为此事应依靠大久保之精忠，相互尽力而解决之。”（10 月 11 日）（《大久保利通文书》等 5 卷，第 36 页）

大久保之苦心孤诣是可以想像而知的。西乡亦确实下了决心。军队之动静亦将因此一举而几乎难于控制，且他日之变乱亦堪挂念。愚以为，军队失控乃不可挽救之大患。（10 月 12 日）（同上书，第 38 页）

14 日，召开岩仓归国后第一次内阁会议，出席者有三条、岩仓、西乡、大久保、大隈、板垣、后藤、江藤、大木和副岛。副岛满足了大久保的希望，已于 13 日出任参议。木户卧病在家。西乡主张遣使，岩仓和大久保反对，因而没有作出决定。在 15 日的内阁会议上，西乡没有参加，板垣和江藤主张遣使，大久保反对，决定由太政大臣三条裁决。三条裁定派遣使节。当晚三条致书岩仓 149
称：“完全由于吾等当初轻率，而使事情发展至今日。吾至今日改变主张实出于无奈。大久保亦愤愤不平。但西乡亦进退维谷，令人担忧。”（同上书，第 67 页）岩仓认为“彼此龃龉不少，且全因鄙人讲话疏忽使然，故深为恐怖。现进亦不是，退亦不是”，而以“持病困苦”为由闭户不出了。（10 月 17 日致三条）（《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第 5 卷，第 345—346 页）

在 17 日的内阁会议上，三条不顾西乡要求向天皇上奏，以岩仓和大久保缺席为由，决定再推迟一日上奏。这是一个关键性决定。三条在这天深夜去访问岩仓，因忧虑过重，谈到鸡鸣昏倒而生急病，意识一时不清。大久保劝黑田清隆、吉井友实（宫内少辅，萨摩藩人）向宫内卿进言，于是 20 日赐下指定岩仓代三条执行政务的敕语。21 日晚，大久保访问岩仓进行磋商。第二天大久保写信激

励岩仓说："愚以为明日[23 日]决定关系国家安危之大事，全靠以先生为主之一举。但吾毫不怀疑，先生之坚定不移的忠诚必将贯彻始终。熟忆往事，丁卯之冬[庆应三年王政复古]以先生振奋一臂之力而开基础，一直至今。不料生此难题，大任突降临，应谓全系天命。愚以为此乃令阁下全其始终。"(《大久保利通关系文书》第 5 卷，第 84—85 页。)另一方面，22 日晚，西乡、副岛、板垣、江藤诸参议访问岩仓，迫使岩仓立即奏闻三条的决定，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岩仓说"只要予一息尚存，即不能令卿等为所欲为"，而没有让步。(《阁议因向朝鲜国遣使问题而分裂》，载《明治文化全集》第 22 卷，第 415—416 页)

150 23 日，岩仓在奏闻三条的决定(派遣使节)的同时，完全破例地奏上自己的"臣以为不可"的意见。第二天下达了中止派遣使节的宸裁。西乡提出内称"有痛心之烦"的辞表后，当天早晨便离开东京回鹿儿岛去了。萨摩兵也都随西乡归里了。谷干城(土佐藩人)从西乡从道处听说："萨兵瓦解时颇凶暴，均称只要西乡离去吾等亦离开归里。其实事情很简单，但营中却发生暴乱，一片狼藉。"(《子爵谷干城传》第 353—354 页)大部分土佐藩出身的将校，也随板垣一起辞职了。木户 10 月 29 日致信伊藤说："他们说，任何时候萨均先行，故此次也可以说没有落后。然而，不管他们以何理由和以何名义去行事，今后均不欲与他们共事和相见，而只以捧腹和浩叹对之。"(《木户孝允文书》第 5 卷，第 71 页)木户卧病在床感到痛心，对西乡表示愤懑。他的日记在 11 月 12 日写道："西乡参议此举，虽说其本人无心，但因萨州形势而曾使人心屡变方向。前年辛未之岁，议定同心合力辅佐朝廷，并终于完成废藩等事。此前之苦衷诚不可忘，然西乡今日之举则属乱法破律，其毒不浅。前约皆归泡影。余亦人也，岂能不满腹不平。"

征韩争论原本是以对外问题为争论点的国内问题。它的最重

要结果，是留守政府崩溃和归国派重新掌握政权。西乡与大久保疏远了。土佐与肥前也自相分裂了。三杰合力体制瓦解，强大的反政府派再次被逐于野。（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144—151页；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变》第五章）

三　大久保政权 151

征韩派、民权派　征韩派下野后第二个月，即1873年11月，大久保参议兼任新设的内务省的省卿。他根据美欧考察的见闻，开始完善国内设施和殖产兴业。支持他的有岩仓右大臣、大隈参议兼大藏卿和伊藤参议兼工部卿。但是，政府在内外方面均面临激烈的抵制。第一，是下野的征韩派。这一派同民权派混杂在一起，彼此尚未分化。他们都是政府的反对派，受到各地不平不满士族的支持。第二，木户激烈批判大久保的急进的中央集权化，同民权派携手要求改革政府。解体了的三杰合力，由此变成三杰对峙的形势。

1873年10月下野的征韩派和土肥领导者板垣、副岛、江藤等人，于翌年1月建立爱国公党，向左院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建白书。这里所说的民选议院，“不外是整顿与完善原来由各藩推选议员的议院体制，试图扩大解释[五条]誓言的内容而已”。“既非由此建立新的议院，又非立即普及人民直接选举代表的权利，而只是使士族与豪农、豪商暂时单享此项权利而已”。（宇田友猪等编《自由党史》上卷，第108、112页）

民权论与征韩论处于没有分离的状态，双方都可成为不平士族的反政府运动和挤进政府运动的旗帜。归乡后的江藤，在佐贺士 152
族的征韩党的拥立下于2月揭竿而起，联合忧国人士形成3 000余人的队伍，占据了佐贺县厅。但是，九州各县和高知士族的呼应

活动被政府制止，孤立的起义被镇台兵镇压下去。受命镇压而西下的大久保内务卿，对江藤处了枭刑。

然而，在佐贺士族2月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内阁会议便根据大久保和大隈的提议，以膺惩台湾原住居民这种小小的名义，作出征讨台湾的决定，并于4月任命西乡从道陆军大辅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为了使军部与鹿儿岛士族和好，是需要对外战争的。帕克斯公使看到此种情景，害怕日清开战将扰乱远东贸易和日本将占领台湾，而出面干预；木户也反对征台而辞去参议职。后来，政府虽决定中止征台，但西乡总督拒绝执行，而大久保也不得不容许出兵。大久保、大隈和西乡三人盟约而强行出兵。军人中间盛行开战论，征韩派又开始摩拳擦掌。这年4月成立的立志社，提出组织义勇兵请愿书，计划动员5 000名兵员。西乡从道从鹿儿岛募集了800人，黑田清隆开拓使长官和川村纯义海军大辅拟议由西乡隆盛担任征台最高指挥官。私学校于这年6月开始设立。石川县的士族也提出2 000人从军志愿书，这就是金泽忠告社的起源。以志愿从军为契机，各地的士族纷纷结社。

5月下旬征台军在台湾登陆。清政府抗议侵占领土，要求日本撤兵，但内阁会议对此却决定不惜对清政府开战。8月，大久保作
153 为全权办理大使前往北京。国内外局势，要求务必避免开战。而善后的工作，便由提议和容许征台的他来担任。然而，在北京的谈判没有进展，几乎就要破裂，经过害怕爆发战争的英国驻清朝公使韦德[①]幕后协助，才达成妥协。清政府承认征讨台湾为“义举”，赔款50万两白银，答应今后管束台湾原住居民。11月1日离开北京的大久保，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9月10日到北京后，逗留凡五十余日，受任艰难，苦不堪言。幸事已成功，离开北京时自觉心中

① 韦德(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汉名威妥玛，是臭名昭著的侵华分子。——译者

愉快。呜呼，处理如此大事乃古今所稀有，亦本人一生所未有。舟中无事。此日天气特别晴朗，秋高气爽，四望浩浩如海。思往事，志将来，心有所期。”帕克斯公使在致其在北京的同僚的信中说：“幸运降于日本，但日本没有资格受领。我深感遗憾，本来大海彼岸的老大国家是有理的，但却要向这个黄嘴丫未退的国家屈服。没有发生值得庆幸的事，但日本即使一文不得，它也是喜欢和平解决的。日本人十分清楚，他们没有索取的权利。”（《帕克斯传》第192页）

在终于迎来了对清谈判结束的11月，木户派和土佐派联合要求政府改革，大久保也接受了要求。翌年（1875年）2月，经伊藤和井上斡旋，大久保于大阪同木户、板垣会谈，双方定出“决议四件”（设置元老院、大审院和地方官会议，参议与省卿分离），决定木户和板垣出任参议（大阪会议）。4月的诏书把这些内容补充到“五条御誓文”里，敕设元老院以掌立法，设大审院以掌司法，设地方官会议以作征求民意的机关，宣布“逐渐建立立宪体制”（明治八年圣诏）。大久保在各方的反对和声讨中陷入孤立，于是需要把木户和板垣拉进来以强化政府。木户派和板垣派也在盼望利用这个机会 154
挤进政府而回复失去的地位。萨长土根据各自的不同意图和需要，开始运用拉进来挤进去的机制。同时，逐渐引进立宪政体的方针也被定了下来。

1875年9月发生了江华岛事件。日本政府为迫使朝鲜对外开放，派遣军舰到朝鲜海面示威，但因军舰云扬号在江华湾被朝鲜炮击，而引起双方交战。日军登陆破坏炮台和烧毁民房，卤获大炮38门撤退。征韩论再次沸腾，开战论在军人中间甚嚣尘上，但政府力避战争，而试图利用这个事件的外交交涉使朝鲜对外开放。10月，征韩派的岛津久光左大臣和板垣参议被罢官；12月，黑田参议（萨摩藩人）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大臣，井上（长州藩人）被任命副大

臣，以出使朝鲜。木户积极支持这项任命。在任命黑田的当天，寺岛宗则外务卿(萨摩藩人)在向美国公使说明派遣使节的缘由时，公使问道："此次派出的使节是不是乘军舰渡海?"寺岛答称："是。就像贵国派柏利舰队司令来下田[应为浦贺]一样。此次遣使是以和平宗旨缔结条约。"(《日本外交文书》;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第1卷，第186页)

黑田特使率领由6只军舰和舷侧涂成军舰样子的数只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开赴江华湾，要求朝鲜赔款和缔结修好条约。朝鲜经宗主国清政府的劝告接受了要求。《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高唱"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与日本持有平等之权"。而实际上，"自主之邦"一语具有在中国清政府的宗主权上打进一个楔子，使日本可以在朝鲜155同清政府对抗的含意。"平等之权"只是玩弄修词而已。第10条规定日本有治外法权。帕克斯在其致本国的报告中说："总之，是把1858年英日修友通商条约几乎照抄一遍。比较一下两个条约，即可看出两者实际上非常相似。不同之处是，英日条约中关于货币兑换、税关管理等条款差不多全被省略。"(《帕克斯传》第201页。)6个月后缔约的修好条约附件，规定两国的进出口货互相免税。因为日本的出口占有压倒的优势，所以这项规定对日本极为有利。

清理秩禄、改革田赋　废藩后，政府的岁入达3，230.5万余石，即为废藩前的3.6倍;田赋收入激增，占岁入总额的59.3%。但是，从旧藩方面接受下来的士族家禄支出和清还藩债支出，却占岁出总额的35.2%。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清理秩禄以削减支出，改革田赋以增加和稳定岁入。

1873年，征韩派曾反对大藏省的清理家禄案，但他们于10月下野后，清理家禄问题在11月又成为正院的议题，并于12月决定开征家禄税和实行家禄奉还制度。前者规定对禄米超过5石者(占全华族的94.4%)课收累进税，使禄税总额(51万石)达到家禄总

额(468 万石)的 11%弱。后者主要以家禄不满 100 石者为对象,对希望奉还者分六年付以现金和发给秩禄公债券(年利八分),同时低价出售土地(主要是山林荒芜地)给将来想作自耕农的人,其数量要能保证自耕者自食其力。这并不强制,但全国共有约 24%的士族希望购地自耕,因而约有 109 万石家禄即约占总数四分之一的家禄,得到清理。但是,各县的志望者的比重悬殊,三重县为 156
43%,新潟县、北条县各为 42%,而山口县只为 5%,佐贺县为 3%,鹿儿岛县几乎等于零(只有 25 人)。高知县为 26%。可以认为,在萨长土肥四藩中,土佐以外的三藩的下级士族享有家禄制度比其他藩的士族固定得多。

关于清理家禄的最后决定,是 1876 年 8 月公布的《金禄公债证书发行条例》。根据前年 8 月确定的田赋改革方针,国库的田赋收入改为用现金交纳,并规定了定额,于是家禄的支付也由实物改为现金(金禄化)。大致向领主层发给年利五分的公债券(券面金额为 5—7.75 年份的收入),向上中士层发给年利六分的公债券(券面金额为 7.75—11.5 年份的收入),向下士层发给年利七分的公债券(券面金额为 11.5—14 年份的收入)。本金放置 5 年不还本,从第 6 年开始抽签,每年抽出三十分之一,向中签者还本,30 年后还清。正如木户所评,这项办法看来对上苛刻,对下宽大,而且除上层中的极小部分外,支付的金额尚不足维持生活。全年得款 375 日元以上者(现金家禄 1 000 日元以上者,实物家禄 200 石以上者),全国共有 519 人,占士族的 0.2%。当时的少尉年俸为 480 日元,而所得利息多于这个数额的人,大概也不到士族的 0.1%。不仅如此,当时米价年年上涨,所以以现金支付的家禄,其实际价值只能下降。这是当年 10 月西南频发士族反叛的重要原因。(《丹羽邦男《明治维新的土地变革》第 189—200、228—236 页)

再说田赋改革。1873 年经井上大藏大辅审议和他辞职后继续

157 由大藏省事务总裁审议的税法改革，7月以上谕和太政官布告(田赋改正法)公布。它的基本内容是：①丈量土地，定出每段①的地价，发放地照；②地价以自报为前提，然后由地方官检查可否；③田赋为地价的百分之三，以现金交纳；④将来货物税收入增加时，田赋随之下降，但降到地价的百分之一为止。

至1874年末，已有约占府县总数半数的36个县开始了田赋改革，但完成者只有两县一郡；按照这样进行下去，新田赋预计将比原来减收590万日元(15.8%)。而且，贸易入超使财政状况恶化，大藏省再三要求改订海关税率，但外务省对此不积极。因此，为促进田赋改革工作，在1875年3月设立了田赋改正事务局，由大久保内务卿任总裁，大隈大藏卿任御用挂②，松方正义任三等出仕③。通过他们三人组成的强有力体制(不是以农民的自报为定地价前提，再汇总算定管内的总地价)，首先算出管内的土地总段数，然后为每个村、每个农户强制规定“押付反米”④。

农民起来反抗。这年11月末，茨城县发生农民暴动，接着三重县内的暴动扩大到爱知、岐阜、滋贺和堺县。1873年以来以现金代实物制度在1875年又经补充，前一年度的正赋在年内只收进60%，而1876年歉收和米价下跌，使农民陷于困境。县令召募士族，请求镇台出兵，将暴动镇压下去，但暴动又向其他地方蔓延，出现不平士族与暴动合流的危险。政府为安抚农民，按大久保的建议，在翌年1月4日将田赋率由地价的3%降为2.5%，并将民费(地方税)的上限由田赋的三分之一减为五分之一。这是一次两者
158 合起来高达1 500万日元的大减税。(田赋改革工作在1879年完成。)

① 段是土地面积，1段约等于9.92公亩。——译者
② 这里的御用挂，相当于总顾问。——译者
③ 出仕，系编制外官员。在这里，指临时负责人。——译者
④ 押付反米，是强制规定每段土地的产量。——译者

木户与大久保　木户是对大久保统治权的最严厉批判者。1875年大阪会议后就任参议的木户，翌年3月因脑病辞去参议职，出任内阁顾问。他在致田中不二麻吕的信(4月25日)中说：“岂非福泽一时之谋略欤！据说，福泽日前至某家，极赞专制，而某家认为实无专制，即使有之，亦不能成事，但福泽益赞专制不止。此乃学者之大罪也。”(《木户孝允文书》第7卷，第432—433页。)这里的某家是指大久保。大久保于2月27日见过福泽。他的日记载称：“福泽子来访，发表种种高论。很有意思，真不愧为名人。”*

*木户在征韩派下野后于1873年11月21日接到伊藤来信说：“不管怎么说，根据此次调查，可以认为大久保之言论掺有福泽谕吉等人之观点。”(《伊藤博文传》上卷，第798页。)22日木户给伊藤回信说：“对福泽的论点，弟亦无不同意之处，然而学者之所见常与实际情况不乏龃龉，故骤然采纳之似有不当。欧美政府之体制，西洋学者已有全面介绍，但终究是否适于我国人民尚须略加斟酌，而且务实的诸贤亦在深思研究。故正如前日来书所述，问题全在现居要职而管理人民的诸公之诚心及其施政。至于此等事情是否专制还很难说。学者之说确不乏高论，但总有欧美学者之气味，而研究其是否适用于人民时，当即发现难于应用之处不少。一旦与其人认真讨论，其人又会因不用其说而多少有些失望表现。结果，不仅给公事而且给私事带来不少妨碍。故在今日，似应广泛征集学者之意见，但要加以研究而后取舍。”(《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第4卷，第218页。)这不就是说，搞政治如不专制就很困难，但大久保搞专制却不好吗！。 159

福泽还在《藩阀寡人政治论》中这样说过，无论是君主还是共和，“都要最终能以其国之惯例使社会全面安宁。我国之新政治虽时日尚浅，但已以惯例实行十年，故应暂时以此惯例实行下去，而不必改革体制”，即这样维持十年二十年，其间实行富

国强兵，然后再改革政体亦不迟。"实行此事的最紧要问题是：不仅要将政权集中于政府一处，而且要拥戴政府中之一人，使他成为在政府掌握实权之首领，以将政令之方向统一于一途。""政府中之一人"，无疑是指大久保。"此方案是某夜读书疲倦之余，独坐孤灯之下苦思出来的，尔后决未向他人说过。"但考察大久保死后"明治十一年十二年以后之政情"，此方案的实施似乎并不容易。（《福泽谕吉全集》第 8 卷，第 123—124 页）

木户猛烈批判大久保的急进的中央集权化。他在 1876 年 5 月上奏的意见书中，一开始就说，"政府为人民所设，而人民并非供政府之使役者"。置县后，"事无巨细，均竞相求新，故海内靡费成俗，政府似有失去其所以为人民之政府的宗旨，一意孤行，不遑问人民将来生活如何"，而且"不推究轻举急进之原因，徒论表面之条理，使人民备受生活失落之实害"。他所期望的是"渐次整顿"。接着，他论述了两点。

第一，全国人民的"生活之路"，"似有不如封建诸藩之旧时，其故为何？"因为政府掌握了地方的财政和人材，而任凭地方人民的生活颓废下去。木户建议：让地方的财政与中央政府分离，地方官
160 由当地人士出任。第二，关于民选议院，"臣并非不欲此"，但"出于一时之妄设，决无其利"。可先设町村会、府县会，由它们审议地方财政，然后再设国会。在根据大阪会议的决议而召开的第一回地方官会议上（1875 年 6—7 月），木户作为议长作出了由户长组成区会、由区长组成府县会的决议，但在 1876 年 9 月被元老院扼杀。

木户反对"金禄公债"之类的急进措施，因而他提议，如要发行"金禄公债"，应同时"钦定华士族制度"。其理由是：这样，"当士族认为随着家禄的废除而变为无偿之物，自弃其荣誉心时，不会损害君主国之体面"。但是，首脑部的人都反对这个提议，而只有木户一个人主张提出，结果华士族制度悬而未决，而只决定发行"金禄公

债”。木户在 8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人民厌烦急进论，对政府施加压力。然而在行政事务方面，政府之急进措施依然不少。我因此为国浩叹。”

木户对大久保的另一批评，是指责大久保一方面强制推行急进政策，但另一方面却对鹿儿岛实行例外的特权措施，即批判大久保有失“措施公平”。木户在前述的意见书中，虽建议任用地方人士担当地方官，但他又主张当初对“藉强藩之余威”而任用“土著人”为地方官的县不在此例，而要求这样的县任用“他乡人”。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以鹿儿岛的情况特殊为由，要求政府对鹿儿岛实行特例措施，而且违反政府的指示擅自采取独断措施，以既成事实为由要求特例。特别是在禄制、税制方面不断与中央发生纠纷。于是，随着政府推行全国划一的措施，鹿儿岛就越来越成为明显的例外。大久保于 7 月将鹿儿岛县令大山叫到东京，令其“应黜陟参事以下 161
官员”。大山同林友幸内务少辅商谈后，林友幸说："鹿儿岛士族人数多，故一旦物议纷纭，就很难实行，但友幸亦要向卿(大久保)陈述实情。”数日后，大久保对大山说："按你的要求办吧”。这就是说，鹿儿岛没有进行人事更迭。看来，东京对南方一隅是难于制御的。如果强制执行，则有暴乱的危险。(1877 年 3 月大山口述记录，《西南记传》中卷 1，第 14—15 页)

另外，这年 8 月罢免岩崎(长武)高知权令，任命小池(渡边)国武(长野县人)为权令，似乎也与鹿儿岛县厅改革具有同样的性质。高知虽然实行了人事更迭，但县厅官员讨厌外县人而集体辞职。于是，小池只好与片冈健吉立志社社长磋商而确定后任人选，结果县厅的重要职位，差不多全被立志社社员占据。由此可见，实际上没有产生人事更迭的效果。

关于秩禄清理，也准予鹿儿岛实行特例措施。在计算纳贡米的价格时给予鹿儿岛以特别优惠，对于 1876 年 12 月的“金禄公债”，

太政官们也出面要求给予鹿儿岛以特典。一直为长州藩士族的救济授产而苦心奔走的木户，看到这些措施后愤愤不满，申请辞去内阁顾问职。岩仓、大久保、伊藤安慰木户，答应改革政府，请木户再次出任参议，但木户没有应允。他在致鸟尾小弥太的信（1877 年 1 月 13 日）中说：

数年前我就说过，政府诸子与芳梅[伊藤]在政府工作中绝不和谐，绝不彼此满意。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彼此之性格向来不同，一方过于武断，一方过于因循。鄙人对行政上之武断感到毛
162 骨悚然。察诸数年来之行迹，可一目了然。然而政府强拉鄙人入伙的主意我一向不明，当是他们的权宜之计。鄙人亦人也，实感毛骨悚然。在浪华[大阪会议]上，以大久保为首的一派，讲话极其恳切，急得满身是汗。然而一旦主掌政府，则全如无钱的乡下老登上豪华的青楼。我由此感到受辱，心中不快，非一言半句所能表达，且知表达亦无益处。其行迹难尽笔端。……本来水油之性质不同，而强使其为国而调和，决不宜也。（《木户孝允文书》第 7 卷，第 257—259 页）（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1 卷，第 161—167 页）

163 四　西南战争

私学校蜂起　西乡为对跟随他回到鹿儿岛的军人和警官进行教育和授产，同桐野利秋、篠原国幹等人在 1874 年 6 月开设私学校，并着手开垦事业。他在鹿儿岛拥有办学和开垦的力量。废藩置县出任权令、县令的大山纲良是西乡的旧部，利用县财政援助了私学校。1875 年末田赋改革工作一开始，他就任命了一些与私学校有关系的人出任区长或副区长，以便于创办私学校。只就查明的，他们就占区长、副区长的半数以上，而且几乎全是原来的将校。

县里的警官和学校教员，绝大多数与私学校有关系，县里的官员也有加入私学校的。当然，私学校里出现了门阀派和退校组，但私学校仍是盘踞于县的行政和教育部门，成为反抗大久保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强大地方势力。退校组的川上亲晴的回忆录，对私学校和鹿儿岛的实况作过如下的描写：

> 私学校完全不是一哄而上发展起来的，而是逐渐完善起来的。我们在校期间是创办初期，还没有井井有条的秩序。当时被人们称为鹿儿岛的大学者的今藤[勇]先生和久木田泰藏先生，轮流讲授《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等所谓七书，以及《论语》、《春秋左氏传》等。另外，时而有篠原国幹先生和渊边群平先生的治学讲义和精神训话。每天只有300来人听课，这些人被分成若干小组，我所在的 164
> 组为第22小组……
>
> 我在永吉小藤次新建的房舍住宿上私学校期间，学校本部没有一项正式规则，只是在教室的门上方挂着西乡先生书写的匾额……但经过一段时间，定出了各种繁杂的规则，开始限制学员的自由。特别严格的是，学员去外县时，必须向学校请假，而且要经县厅许可。违者要受严肃处分。谷山的一个姓池田的青年，想乘船出走，当即从船上将他抓回来，痛打一顿。加治木的违反这项禁令的鸟居监助、牧利兵卫和进了海军兵学校的中摩顺藏，都被叫回学校。在熊本镇台当过中士的川上助七，被强制留下来不让他回家。听说他在蛤良郡的沟边村被拷打，受尽私刑后致死，以致人心惶惶，极为不安……
>
> 其实，我们之所以违背先辈的意向退出私学校，是因为要摆脱私学校的清规戒律的束缚，早日恢复自由的立场，打破宿弊，也可以说是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当初加入退校组的有70余人，但实际退校的只有20余人，而且这20多人中后来又有回去

的。而学校方面却日益巩固，十四、五岁乃至五十岁上下的男子一般都到私学校去学习，学校的横暴也日甚一日。另外，我们一旦退出学校，便受到歧视，往日的亲友变成今日的敌人，真是四面楚歌，几乎一出家门就得倍加小心，但所见所闻并未使我们感到不快。后来感到我们的真意日益被误解，人身也有危险，所以认为在这种非常时期无论如何要接受有力的先辈的庇护和指导，于是有一天我去访问小滨氏，随后又到吉田的桐野先生府上去拜访。桐野先生到底不愧是桐野先生。我本以为会受到申斥，可是先生以笑脸相迎，极其亲切地安慰我，并让我今后也带其他人来玩，不要有顾虑。我们像盲龟碰上一块漂浮的木头，心情极为愉快。从此以后，我便经常去拜访，请教各种问题。当时正是桐野先生的开垦工作逐渐就绪的时候，我们每人领了一件衬衣，扛着土篮和耙子，奋力打石头，或刨树根，帮助桐野先生开垦……

我们慕名去见先生，但终究不外是钦佩他的雄心壮志和任
165 侠好义。不过，我们也被桐野先生申斥过两次。其中一次是：我早就想进京，而现在又要经县厅许可。……[进京的同志]一起到桐野先生面前去报告此事，先生非常不高兴，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狠狠地申斥了我们一顿。接着，桐野先生志气昂然地说："自古英雄举事往往失败，是因为没有人指明机会。我们只要一振臂，不鸣金击鼓，也会把天下的志士集合起来。"……另一次是在前原之乱时。当时，鹿儿岛各地自然从东到西到处都出现了险恶的气氛，首先在加治木等地，每家都把祖传的刀拿出来磨锐，或购买火枪准备参加暴动，局势非常不稳。因此，一旦有事，退校组都要与桐野先生一起行动，加治木的先辈与后进经数日协商，编出一册名为"连判帐"的名簿，小滨氏、兴氏的弟弟山上七之助君带着名簿去见桐野先生。他们也曾劝我加盟，但我以

有背退校组的宗旨为由，同伊丹亲恒、野田亲昌商量后，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我觉得此事首先必须得到桐野先生的谅解，所以只身去了鹿儿岛……点灯时分终于到达桐野宅邸。桐野先生十分高兴地接待了我，可是他却说："看到今天山上君带来的名簿，上面没有你的名字，为什么？"我说："其实我已经参加了，昨天和今天还到前滨的海军的船上去过。县内各地都在骚动。您对形势怎样看法？我总觉得，青年此时盲目卷入世间的风潮而轻举妄动，是害身误世的祸根。"我这样叙述自己的信念后，不知他出于什么想法，马上改变一直保持的温和态度，好像烈火中烧，大怒说："你们都是一些因循姑息，不了解时局的东西，不要口出狂言。一个政府，不管怎样没有能力，也不会坐视天下的动乱而置之不理。但政府一动，我自有我的想法。"他说话的口气已经完全是鸣金击鼓的样子，气焰万丈。像往常一样，把红铜制的烟袋嘴放在口里咬得喀嚓喀嚓直响，发出一连串不堪入耳的骂声。(《川上亲晴翁》第59—108页)

板垣也为救济失业士族和向他们授产，而在1874年4月成立了立志社，并于同年6月向岩崎长武县令申请，将白发山等16座官山拨给"士族中无产之人"。还由山内家[1]和立志社出资开设了 166
一些学校。8月，片冈健吉被任命为县七等出仕，林有造被任命为户长。岩崎与板垣有旧交，对立志社进行了援助。他这样做，是出于维持县治安定的需要。因此，在鹿儿岛和高知，才得以有人拥护西乡和板垣这样的维新功劳者成立私学校和立志社，依靠县行政机构开始救济失业和向失业者授产。但是，在其他地方以同样的宗旨成立的无数结社，好像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存在不久便消失了。

---

① 山内家，是以藤原秀乡为始祖的日本名门，因其后裔首藤俊通领有相模国镰仓郡山内庄而称为山内氏。这里指第15代土佐藩(相当于今高知县)主山内丰信一家。——译者

1876 年 10 月，秋月、萩的士族，为呼应熊本神风连袭击熊本镇台而叛乱。这些叛乱虽被熊本、小仓、广岛镇台出兵很快镇压下去，但叛乱的领导者们仍企图东山再起，谋求各地的同志响应，而向各地派出了使者。各地的不平士族得到叛乱的情报后，也立即活跃起来。显示出同志响应的形势。他们和政府所最注视的，均是作为反政府势力的最大据点的私学校的动静。

大久保在致大山岩的信（11 月 17 日）中写道："据说，鹿儿岛并未参与其事，这自然与老西[乡]有关。我深知他的性格，他一旦在名义上和言行上表态，就不会背着人举事，所以不必特别担心。唯有他的部下以区区一己之见互相串通并非不可能，但目前形势尚好，有幸之至。"（《大久保利通文书》第 7 卷，第 364 页。）即使如此，大久保利通也并不乐观。他在 12 月 23 日致函税所笃说："在九州地方，必然出现蔓延之势。至于其如何发展，结局难以逆料。"（同上书，第 431 页。）

在鹿儿岛点起战火的是抢夺武器弹药事件。在鹿儿岛，有旧藩
167 时代设立的陆军火药局和海军造船所可以制造枪炮弹药，但政府为防范私学校党举事，从 1 月开始就秘密将设备和枪炮弹药运往大阪造兵厂。获悉此事的私学校党，在 1 月 29 日夜间出动约 30 人。这些人喝得酩酊大醉，闯入火药局，抢走数万发子弹，运回私学校。随后连日抢夺，从 2 月 2 日傍晚开始，有一千来人拥向火药局，用人力车和马车等运走枪炮弹药。因为县厅和警察也是私学校党，所以火药局处于无援的状态。

使私学校党愤怒的另一件事，是传闻政府要刺杀西乡。大警视川路利良（萨摩出身）定出计划，派鹿儿岛出身的警部、巡查、学生等 23 人回乡，对私学校进行卧底侦探和离间活动。这些人原来都是因为与私学校不和而上京的，其中大部分是居住在鹿儿岛乡下的所谓"外城士族"。他们在 12 月 26 日开过最后一次会议后，便从

来年1月上旬开始直到下旬，陆续潜回鹿儿岛。他们随身携带的《说服鹿儿岛士族书》的论点和方法计有35项，其中首先提到蜂起没有胜利的希望，指望各地士族响应只是妄想等等。（《大警视川路利良君传》第149—154页）

一名侦探在1月30日被私学校党捉拿。由此开始，至2月上旬，数十名侦探被警察一网打尽。私学校党审讯他们之后，确信他们是被派来刺杀西乡的。据说是听错了，把视察听为刺杀[①]，但这种误会或传闻造成了一触即发的险恶形势。私学校的干部抑止不了学生的激昂情绪。于是，听到消息后感到吃惊的西乡，在2月3日由静养地回来后，便申斥赶来看望他的私学校学生，谴责他们的抢夺行为，但他还是决定率兵进京诘问大久保为什么下达刺杀他的命令。

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派出厅吏30余人到进京沿途的府县和 168
镇台去通知西乡率军进京，用公款补贴私学校，筹集武器弹药，在县厅为军队设立伙房。从2月中旬相继由鹿儿岛出发的西乡军，号称23 000人。津岛久光的亲信市来四郎的日记称：13日（旧历正月初一），“进入正月，家家户户门上的新年装饰等物，虽然看上去还像往年一样，但因适逢乱世，而现出怏怏不乐的样子”。17日，“在鹿儿岛全境，这十来天，真是人心惶惶，但今天开始平静下来。”22日，“由于师范学校、小学校的老师都参军了，所以学校形同停校……在鹿儿岛全境，自西乡党出发后，确实平静下来，出现了四、五年来未见的安宁。该党多为酗酒暴乱之徒。世人大喜。”（《西南记传》中卷，第1、84、148页）（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153—161、168—180、219—225页）

政府派出讨伐军　抢夺鹿儿岛火药局弹药的情报，于2月3

---

① 视察和刺杀，日文均读为しさつ。——译者

日传到东京。大久保在给当时在京都的伊藤博文的信(2 月 7 日)中说:"决不能追随西乡而同意此举,即使身死,也不能与他同流合污而重蹈江藤、前原之覆辙。万一破坏迄今之名节而贻误终身,那只有遗恨万年。实不得已,至此只能对此事表示无望。"不管西乡出面不出面,"该县一旦有事,只能是其影响及于全国,天下马上大乱,与戊辰东北战争之时宛然无异。"(《大久保利通文书》等 7 卷,第 488—491 页)2 月 16 日夜,在三条公馆(京都)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大久保提出他只身赴鹿儿岛说服西乡。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前数日,回忆内阁会议的情形时说道:

> 这是明治 10 年政府得到鹿儿岛私学校党举兵情报时的事
> 169 情。大久保君有一天在内阁会议上突然说,对于这次局势不稳的情报,自己特别深有所感。我希望内阁一定给予我时间,让我回县面会西乡,这或许能防患于未然。但大臣和参议彼此相顾,表示惊异,暂时谁也没有发言。这是因为当时政府的局势一时一刻也不允许大久保君离开庙堂。于是,我首先发言打开僵局……明确表示反对大久保君去鹿儿岛。大臣带头同意我的意见,大久保君的请求未被内阁会议采纳……细想起来,我觉得大久保君这个人一旦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决心,要为绥靖叛乱而千里迢迢回县去说服西乡,并得到内阁会议批准,是不会达不到目的而灰溜溜地空手回来的。我与他多年朝夕相处,深知大久保君的性格,所以觉得他当时的发言可以代表大久保君的心声。但是,如果让大久保君去说服西乡,而他去之后事与愿违,两人的意见不一,则此时不是只会出现你和我互相对刺而死的局面吗?而如果两人都死了,问题就能由此而解决吗?如果这样,事情会更糟。同时失去两人,天下会马上大乱,土崩瓦解,乃是洞若观火的事情。在我心中,这是反对他去鹿儿岛的理由。在兵乱之初,川村纯义中将和林少辅以御使身份去鹿儿岛时,据说西乡

都表示要会见他们二人。如果大久保不远千里去见他，西乡也许欢迎大久保去，或者释然达成谅解。从这一立场来说，如果当时不反对他，也许不会发生西南战乱。（《大久保利通文书》第8卷，第399—402页）

2月18日批准了征讨令，但尚不知西乡是否在贼军中。确知西乡在贼军中的消息，大概来自长崎县令22日的电报。24日，得到大山县令关于西乡率兵上京的报告。因此，25日下令剥夺了西乡等人的官职。

政府在依靠旧藩主和居官的旧藩士阻止私学校蜂起向其他地方波及的同时，还必须募集壮兵（义勇兵）来镇压叛乱。岩仓在2月 170
17日写给三条、木户、大久保的信中说："此次事件非佐贺、萩的事件可比。我认为必然要大费周折，但又感到兵力不足，因而应即日开始召募预备兵。"（《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第7卷第10页）木户反对募兵。3月1日，他给岩仓回信说："今日，除士族以外，决不可召募无用之兵。当此之际，必须事先好好考虑后患。讨了萨摩之后，又出来一个小萨摩。"（同上书第17页）

但是，兵力就是不足。大阪城在3月下旬只有一个中队。要求增援的电报，从九州方面不断飞来。政府于4月4日下令募集壮兵。于是，大阪和东京大举募集壮兵。各地均有两种动向：既有与叛乱呼应者，又有志愿从军者。这两种人都不满现状，持有观望风云变化之心。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这些人当中募来的壮兵，据说达到6 700人，也有人说达到9 000人。其中怨恨戊辰战争的东北士族特别多。他们不反对征兵令，所以让他们去执行巡查的职务。在西乡军方面，它虽然包围了熊本城，但久攻不下。到4月14日，官军使熊本城解围了。在战斗中，百姓兵和一直被人瞧不起的镇台兵显示了威力。

木户听说西乡"带头出来"，感到惊异，但他对西乡又表示同情。

岩仓不胜愤慨，他 3 月 1 日致函木户说："自维新之前迄今蒙骗天下，愚弄众人，真可谓过甚"，木户用红笔回答说："西乡之所为固甚可恶，然而朝廷亦应反省。孝允居于京师，常与政府之人接触，但不解之处仍然不少，何况外地之人。西乡决不像尊氏[1]那样奸恶。可惜认识缺欠，不知时务。为泄一时之怒而以己之所长亡身，且害国
171 家。……西乡虽可恶，但并非没有可怜之处。"(同上书第 19—20 页。)

木户对西乡的怜惜，似乎是以对大久保的愤懑为表里的。在木户看来，尽管他迄今多次忠告，但大久保依然处置不公，给予鹿儿岛以特殊待遇。而且，缺乏同鹿儿岛沟通思想，不管是刺杀还是别的什么，只要召集几个人磋商一下即可解决，但没有这样做，以致人民受了大害。木户 5 月 4 日写给吉富简一的信(这大概是现存的最后一封信)中说："究其原因，实出于三、五人之私怨，本来几个人同聚一起，满可以辨明是非曲直。这真是愚蠢至极的事，而且在明治的历史上，亦无如此家丑外扬之事，日本人的中上等人士对此亦不胜浩叹。"(《木户孝允文书》第 7 卷，第 429 页)

木户自去冬以来患了据说是风湿病之类的病，但由 4 月末开始"胸部剧痛"，不能进食，5 月 26 日死去。指原安三编《明治政史》说："他在卧病期间，每觉醒来便呓语：不是说见到了某某，就是说某某来了。可以说鹿儿岛、山口、熊本和东京皆入梦，梦见相识的故旧，不以离开人世为憾。但在清醒时候，总不忘为天下忧，自知不能复起，遗言多关国家的后事。"大久保和五代友厚去探视他时，他微微睁开眼睛说："西乡吗，谢谢你来看我。"大久保贴着他的耳朵说："我是大久保，请振作起来"时，木户"突然大呼，西乡也有人冒充。过了两天，便逝世了。"(《明治文化全集》第 9 卷，第 300 页)(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1 卷，第 182—204 页)

---

① 室町幕府的初代将军足利尊氏。——译者

立志社动向　回到故乡高知的佐佐木高行元老院议官，在 172
(1876年)12月下旬的日记里写道：

……立志社主张板垣退助首倡的征韩论，依靠归乡的士官，言行颇为激进，坚持必欲打倒政府的主义。中立社注视今日之时局，主张渐进，力戒突飞，亦以必欲清除顽迷固陋的积弊为主义。靖俭社最为顽固，反对改革今日的政府等，持所谓守旧主义。立志社与靖俭社虽有云泥之别，但对政府表示不满则是一致的。中立派向来不喜欢立宪政体，但自去年以来已逐渐谈论起立宪政体问题。当然它仍遵奉其原来的宗旨，而激烈反对突飞的民权论破坏秩序和有污国体。至于反对中立派的，则是把中立社视为官权党的其他派。但在政府中，长州派有暗地里勾结民权派（高知县的一派）的迹象，中立社对此也表示不满。在这三派当中，立志社立论激进，倡导平民主义，被不平的年轻士族以下的人属以重望。它的社员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反抗力量尚未达到压倒的优势，如仍像今日这样下去，则恐难得势以树起反抗政府的大旗。如我高知县真有树旗反抗之意，则会得到全国不平之徒响应。前年佐贺之举、本年熊本和长州之变，可以为鉴。当士族普遍贫困、激昂慷慨之士思乱之时，特别是像在萨摩拥戴西乡和在西隅养势之时，一旦起事，就有造成大乱之虞。今日已不同于昔日，与外国发生关系虽不能说危险，但亦确实可忧。在今天的形势下，早晚要在某处破裂。到那个时候，努力设法使其不出现大破裂，实为至要。(《保古飞吕比》第7卷，第90—91页)

在私学校蜂起之时，立志社立即做出反应。据政府的密探上报给大臣和参议的"探索书"(2月9日)称，板垣认为："此次战斗是西乡、桐野、篠原等敌视大久保、川路等的私斗。他们一定要依靠萨摩的暴徒与敢死之士统一西隅。说实在的，我们的宿愿即大展民权的宏图之日到来了。……机不可失。西乡愤怒，以兵冲击政府。而

173 我们则要以民权冲击政府。我们要先礼后兵，先以建言冲击。”（《片冈健吉先生传》第 361 页）

林有造“说真像变成了大雁[十分高兴]，欢欣雀跃到处奔走”。后藤象二郎认为，“乘此时机施行拉拢同人[木户]，离间大久保之策，必将瓦解政府”。（同上书）他们于 2 月 14 日从东京出发，与大久保同船到达神户。后藤又去京都走访木户，进言征讨鹿儿岛；木户劝说后藤镇压土佐。两者一拍即合，达成一致意见。而林有造，则在东京委托外国商人购进武器，让大江卓在大阪着手准备暗杀高官，随后同板垣一起回县，3 月 1 日与立志社干部秘密会议，初步作出举兵的决定。林的作战计划，似乎是一方面从德岛渡海去和歌山，然后攻打大阪；另一方面从爱媛出中国东上。

当听到官军已使熊本城解围的消息时，林有造怏怏不乐了，但他又认为：“我既已决心举大事，岂能因一伙人的妨害而徒然中止。且西乡常独力击倒政府，而敢置他国人于不顾，但今因熊本城被官军解围而使其势顿时受挫。他必将向土佐求援。这正是土佐唾手而起之时。这样，他日有幸战胜政府，可以保持萨土的均势。（《旧梦谈》，见《明治文化全集》等 25 卷，第 70—71 页）

林所说的东奔西走并不轻松。他既要把购买白发山的 15 000 日元新公债换成现金以供军需，又要设法把在上海的数千只施奈德步枪运回日本，还要养活大阪的那帮刺客，并要立志社相信举兵论。但是，他是在天罗地网里东奔西走的。政府的密探跟踪他的行
174 动，将探知的结果一一上报了。大久保 4 月 1 日通知大隈大藏相，请他中止出售白发山，说“该县[高知]即使发生叛乱，并且得到某些成功，也会因没有海路之便，没有器械，而只是一场儿戏。但又不能不特别注意”。（《大久保利通文书》等 8 卷，第 101—102 页）

当西乡军的颓势已经明显时，高知提出了建白论，片冈等人携带要求设立民选议院的建白书，于 5 月 13 日去京都。反对建白的

林有造，于6月1日回到高知。他以800名决死队不失时机地夺取平安丸，以冲击大阪城说服立志社，但没有办到，在等待施奈德步枪运到期间，他改为举办政谈演说会。6月9日，片冈等人也携带被驳回的建白书回来参加演说会。大久保在写信出差于熊本的品川的信中说道：

此地（京都）与东京均很平静，各县亦如从前平安无事，值得同庆。但是，唯有高知内部相当不稳。正如您所悉，那里没有实力，故不必担心突然出事。当政府因西南事变而遇到困难之际，他们乘隙提出建白书，采取以议论进行对抗之策。已把建白暂时置于一旁，政府不怕高知县全面举兵叛乱。何况这是利用时弊以建白使政府为难，间接搅乱天下人心的卑鄙行径。我将采取令其胆战心寒的措施，务请放心。（同上书，第241页）

佐佐木元老院议官和北村重赖中佐，于6月14日开始逮捕立志社干部。林有造8月8日于东京被捕。8月17日拘留片冈等人，社内大哗，但蜂起的机会已经过去。据侦探报告称，板垣说"我们立志的民权不如走由一町到一区，由一区到一县，由各县到全国，再经众力团结一致走向大政府的道路"，社内同意了他的主张。（《大隈文书》第1卷第130—138页）立志社使民权的旗帜鲜明化了。从这年 175
的夏季6月到9月，就有福岛的河野广中，三重的栗原亮一，冈山的竹内正志，福井的杉田定一，福冈的头山满，大分的永田一二等人，前后访问过高知。第二年春天，各地的士族开始集体访问高知。于是，在士族叛乱的最终归宿已被大家认清时，高知变成了民权运动的据点。（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225—234页）

大久保与西乡　372名败军踏破千山万岳，越过可爱岳的隘口，于9月1日返回鹿儿岛，据守于城山①。西乡战死于24日。数

① 城山，在今鹿儿岛市，西乡隆盛自刃于此。——译者

月之后，大久保把旧友重野安绎请来，向他讲述了文久2年4月发生在月明海滨的故事(见本册第79—80页)，委托他为西乡编写传记。另外，又向内务少辅前岛密回忆了他与西乡最后别离时的情景。

我在与西乡别离时，已别无所言，亦无事可争。他只是说“什么都不想干了”，我也只好惜别说“那就随你便吧”！自从相识以来，他既是我的畏友，又是我的信友。因此，就私情来说，也不想同他有隔阂。我以此尽力劝说西乡，不让他西归。但他总是说不想干了，然后离去。于是演出了去年的惨剧，真是太遗憾了。啊，西乡当年的那句不想干了的话，使我现在也产生不想干了之感……虽说是片言，但终究是不想干了！(前岛密《鸿爪痕》第4部第65—66页)

在说这些话时，大久保语声呜咽，忽然想起他昨晚做的一个梦。“昨晚梦见我同西乡在断崖上搏斗，打得不可开交，忽然失脚跌倒，二人相抱坠入崖下。而且我看见我的头盖骨破裂，脑浆还在微微颤动。可谓奇事。”(同上)

176 1878年5月14日晨6时，福岛县令山本盛典前去访问大久保。这大概是第二次地方官会议结束后，山本在归任前去辞行。在此次地方会议的议题中，有关于地方制度的三个新法令。大久保在西南战争的归宿已定的去年8月已着手制定地方制度，又在今年3月向三条上报了地方体制等改革方案。在快要到八点而山本即将辞去时，大久保说“某某出仕尚不迟。暂缓办。还有事相告”。接着他说道：

……今晨有幸会面，愿将全部想法相告。自皇政维新以来，虽已经过十年星霜，但至去年仍是兵荒马乱，不肖利通有辱于内务卿之职，毫未能尽其责。又因东西奔走，被派赴海外等，而未尽职守。虽深感惭愧，但亦时势所迫，不得已也。现在，局势总算安

定下来。因此，想趁这个时机自勉，贯彻维新的宗旨。贯彻这个宗旨，是利通为期30年的夙志。如将这30年分为三期，则由明治元年至10年为第一期。一期兵事多，是创业时期。由明治11年至20年为第二期。第二期是最重要时期，治理内务和增加人民财富，即在这个时期。利通虽不肖，但决心尽内务卿之职。由明治21年至30年为第三期。三期之守成，有待后进诸贤的继承和改进。利通的夙志就是如此。因此，在第二期工作中要慎而又慎，为将来打下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基础。(《大久保利通文书》第9卷，第168—169页)

大久保自1873年11月就任内务卿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殖产兴业和整顿完善国内体制。但是，对外事件、士族叛乱和农民暴动相继发生，使事业受到影响而停顿下来。现在，西南蜂起已被镇压下去，他还想再执政10年，以便"治理内务和增加人民财富"。大久保向山本说完这些话，便乘马车去太政官。这日元老院有会议。前岛在等待大久保来厅。"时间已过，可车还没有来。忽传纪尾井町有贼。我一听，便应声跑了出去，想马上就跑到，终于到了现场。 177
情况惨不忍睹。我茫然不知所措，呆立数分钟，欲哭而无泪。我终于恢复了常态，默默地查看公的遗体。但见肉飞骨摧，而且恰恰是头盖骨裂开，脑浆还在微动。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啊！"(《鸿爪痕》第4部第16页)刺客是金泽忠社社员、原近卫兵大尉岛田一良和另外5人。他们是替西乡报仇而刺死大久保的。

第三天，狱中在押的林有造见到了岛田。他在《旧梦谈》里说：

16日午后2时左右，狱卒领一位胖胖的男子来到五号监门前，他突然问狱卒：听说林有造氏也在此监，他在何处。狱卒大惊，答称不知。该男子说：我是岛田一郎[良]，行刺后就到皇宫去自首，当然无越狱等心，故应以不同于一般犯人的办法对待。我们是国事犯，亦可称为所谓国士！他的这种作法，似乎是暗自

向我自我介绍。……后来，我向大江[卓]氏打听此人。据说，岛田氏以开玩笑的语气，洋洋自得地对大江氏说：你们想演一出划时代的大戏，但中途受挫，而我们干净利落，只让人们看了一场即兴小戏。又据称，岛田氏等6人于同年7月27日被斩处，而岛田氏在将要赴刑场时，一出监房便高呼：爱国的诸君，我先去了！这是向大江氏等表示永诀之意。他的声音很高，所有的监房都被震动。（《明治文化全集》等25卷，第95—96页）

三杰就这样未能和解而相继离开了人世。使明治政府受到威胁的反政府派的军事据点溃灭了，而中央集权的最强大推动力也转瞬之间消失了。（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等1卷，第205—210页）

第三章　自由民权运动 178

一　自由党的成立

爱国社复兴　在1877年政府把最强大的反政府军团荡平而确立起其军事的统治权时，迄今一直在呼应蜂起和建白运动之间摇摆的立志社，于第二年4月决定复兴爱国社，接着开始了栉风沐雨的西日本游说。《自由党史》记述说，响应号召的“没有富豪缙绅，而尽是一剑短身、以赤诚许国的士族之徒”。（上卷第178—181页）9月召开的爱国社复兴大会（在大阪）有数十人参加，他们大部分是旧爱国社的有关人员。复兴协议书也与旧爱国社①协议书基本一样，完全没有要求开设国会和自由民权的字样。1879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大会（在大阪），有来自18个县21个社的80余名代表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九州和四国的士族结社的代表。

士族结社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对旧藩士的授产和旧藩士的求职，志愿从军，呼应蜂起，爱国社的复兴，都是结社的起因。许多结社是弱小而短命的，成立得快解散也快，而且未必始终属于爱国社或自由党系统。现就有据可查的士族结社，列出它们的成立年份和一名领导人：盛冈的求我社（1873年，铃木舍定），山形的东英社（1880年，重野谦次郎），高崎的有信社（1879年，宫部襄），金泽的忠告社（1874年，杉村宽正），金泽的精义社（1878年，高岛伸二郎），金泽的盈进社（1881年，远藤秀景），三河的交亲社（1879年，

① 爱国社是1875年大阪会议后以立志社为中心在大阪成立的。它的协议书说：“今召开此次会议，经过互相研究和磋商，欲以伸张各自的自主权利，尽人类应尽的义务，小则保全一身一家，大则维护天下国家之道，增进天皇陛下的尊荣与福祉，使我帝 179
国与欧美列国并峙屹立。”

内藤鲁一)，鸟取的共立社(1876 年，冈崎平内)，福冈的向阳社(1879 年，平冈浩太郎)，玄洋社(1881 年，平冈浩太郎)等等。

爱国社第三次大会于1879年9月在大阪召开，有19个社的代表参加；决定在第四次大会前拟出开设国会请愿书和设立东京支社。在参加者的名单里，出现石阳社、三师社的河野广中等豪农结社领导者的名字。河野是三春藩的乡士，他因家产诉讼在江户打过一年多官司，在戊辰战争时组织过一支数十人的义勇队参加会津追讨军，战后便进京了解维新后的政情。他也做过郡和县的官吏。1875 年又为傍听地方官会议进京，由京归乡后便成立了石阳社。后来，在西南战争结束的 1877 年 9 月，为探听立志社的活动，千里迢迢来到高知。据他的回忆录称(也有溢美的地方)，他曾向板垣进言：在呼应西南时要自重，应复兴爱国社，由此开展要求开设国会
180 的全国运动。他回三春后，便于第二年(1878 年)4 月成立三师社，随即忙于统一县内的各政治结社和联合东北地方的各政治结社。1879 年 9 月，他再次赴高知，向板垣提出开设国会请愿书，建议把爱国社移到东京。结果，决定在东京设立支社，河野承担了支社的开设和运营工作。东京支社的管辖范围，为静冈、长野和新潟以东。

豪农结社的目的，多数是通过豪农子弟到东都游历等活动，使他们吸进新时代的空气，归乡后再联合当地的豪农、豪商阶层的子弟，以开展地方启蒙和政治评论活动。他们把文明的思潮引进了当地社会的统治阶层。可以视为豪农结社的，除石阳社和三师社外，尚有秋田的立志会(1880 年，柴田浅五郎)，北羽的联合会(1880 年，山本庄司)，埼玉的通见社(1879 年，堀越宽介)，神奈川的融贯社(1881 年，石坂昌孝)，松本的奖匡社(1880 年，松泽求策)，信阳的自由党(1881 年，石塚重平)，新潟的明十社(1877 年，铃木昌司)，佐越的共致会(1882 年，山际七司)，高冈的北立社(1880 年，稻垣示)，福井的自乡社(1879 年，杉田定一)，岳南的自由党(1882

年，前岛丰太郎），等等。这些结社也是成立得快解散也快，并且不是始终属于爱国社或自由党系统的。（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236—288页。）

农民占八成社会、文明开化　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农民占八成的社会。在产业人口中，农林渔业人口1872年占84.9%（日本的首次统计），1880年占82.3%，1890年占76.2%。农民人口的比重下降速度在19世纪80年代虽比70年代锐减二分之一强，但仍占全产业人口的八成左右。另外，与福冈、广岛、鹿儿岛、仙台、静冈等旧藩的城下町人口缓慢增加相比，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增加速度非常快。东京的人口1880年为82万，1890年增到116万；大阪的人口1880年为29万，1890年增到47万。开始由大城市向 181
四外铺设铁路。1872年，东京至横滨的29公里长的铁路开通；到1880年，大阪至神户、京都至大阪、京都至大津的总长158公里的铁路相继开通；1889年，东海线全线开通；1890年，已共有铁路2 349公里。年客运量1872年为50万人次，1880年为533万人次，1890年激增到2 577万人次。普通信函的邮递量也逐年增加：1873年为1 700万件，1880年增到7 900万件，1890年激增到22 200万件。日本的"起飞"期开始了。①

在农民占八成的这种社会里，新闻情报网开始扩大。西南战争以后，新闻事业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据末广重恭的《新闻经历

① 农民占八成社会，在法国大致相当于18世纪末期，在德国大致相当于19世纪初叶，英国要早半个世纪，大致相当于18世纪中期。这些年代都是无统计时代。另外，与1880年日本农林渔业人口占产业人口的82.3%相比，同时代的英国（1881年）为13.2%，法国（1886年）为47%，德国（1882年）为47.3%。（参看本册第246页注）

铁路营业公里数的激增（1880年为158公里，1890年为2 349公里），日本是由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英国则是由30年代（1830年为157公里，1840年为2 390公里）开始的，法国是由19世纪40年代（1840年为410公里，1850年为2 915公里）开始的，德国也是由19世纪40年代（1840年为469公里，1850年为5 856公里）开始的。俄国是从19世纪60年代（1860年为1 620公里，1870年为10 731公里）开始的。（参看本册末附表1、2。）

谈》(1894年)载称：

> 放我出狱的时候(1876年8月),《朝野新闻》发行份数不到一个月就由6千左右达到7千,不久就超过8、9千,到第二年1、2月,遂达到1.8万有余。这真正是极盛时期。报社主人的得
182 意自然可知。现在(1894年),大小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一万份者虽然不少,但与往年相比,其利润的多寡,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的《朝野新闻》用四号字排印,新闻记事仅占3页,字数不到现今普通报纸的一半。因此不需要太多的记者,而且作为专访记者到官署请求官方许可的也不过两三人。至于地方通讯,几乎没有一个专人。但是,报费每月6角钱,加上发行制度不发达,所以在京师和地方均直接送报到户,从而打折扣等优惠也很少。当时,日日新闻每月售价8角,其他报6角或5角,各报社之间的竞争也不像今天这样激烈。因此,各报社的卖报收入,扣除成本费,莫不有很多盈余。(《明治文化全集》第4卷,第62—63页)

《帝国统计年鉴》虽然只从1883年才收有府县级的报社数,但从所列材料来看,东京的报社数最多,其次是大阪、新潟(再次是京都)。其他地方都很少。然而,1883年东京、大阪、新潟三个府县共有报社111家,全国共有报社199家,而到1890年,东京、大阪、京都三个府的报社已达228家,全国已达716家,这表明全国的地方报社在逐渐增加。报纸的发行份数,把东京和地方的大小报纸加在一起,在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潮时期(1881—1882年),一年才约为6 000万份。而且,登载时事评论的报纸,在其中也为数甚少。即使如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效果,这是因为当时的政界根底浅狭。读者不过是由官员、代用教员[①]、律师、豪农、豪商、名人、望族等知识

① 代用教员。按日本战前的教育制度,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经文部省认可并发给许可证的人,始可出任中小学教员。但学有所长的人,亦可由学校当局聘为教员,这样的教员被称为代用教员。——译者

层构成的一小圈人。这些人是国民舆论的实体，容易为从东京的中心向地方城市的据点四射的新闻网所震动。执笔者是以汉文格调简要论述天下国家大事的评论记者，看报者是有充分的时间谈论政治的知识人。因为评论短小精悍，所以内容高尚，反响也敏感。东京评论的问题，在全国引起千波万浪，随即使国民舆论沸腾起来。

福泽谕吉从1879年5月末到7月初写成的《民情一新》(8月 183
刊行)，在第3章中说"蒸汽船车、电信、印刷、邮政四者为[西欧]19世纪80年代的发明成果，是推动社会人心变化的利器"；在第4章中说"利用此等利器得力大的是有进取精神的人"。福泽说：

……打个比方吧，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其走向文明的情况，都像顺风扬帆航行的船，但政府这条船在航行当中，由于要查看船内的事情和研究与外界的关系，得时时进港停泊或故意放慢速度，甚至可以逆风而进。与此相反，人民这条急速前进的船，只是一直向前走，前后无所顾，不能像政府那条船那样自行调节快慢，在通常的顺风条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今天，蒸汽、电信、印刷等是这种顺风中最强者，得力于这个风势的当然是一往直前的人民，其理甚明。然而，考察一下人民方面得此便利的结果如何，可以看到当今世界各国在这种风势中必然有许多事情使官民产生不和。比如，现在如有一位名望高的有学识论客发行一个杂志或开一场演说会，提出一种新说，这种新说立即会在社会广泛流传，使人心一时活跃起来。人们热心直奔其所指的方向，这本是人民的常态，但政府就不能骤然与之同往。这也是自然的现象，官民地位的不同所使然。(《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第30—31页)

他接着说，既然文明开化一直向前，所以欲使社会逐渐静谧乃是妄想，其实社会的骚动才最能有益。人民掌握了使其一往直前进取的利器而对政府施加压力时，"政府如忍受不了这种压制，就不

得不大力抵抗。其抵抗之术唯有专制抑压这一手段。这叫执政者
的英断”。考察以前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政绩和近来俄、德两国的国
势，见“其政略恰是逐渐走向专制。今究其原因，不外是人民的见闻
184 忽然扩大了领域，使心情思想的运动一时加强”。但是，“即使政府
十分强大，想依其专制去敌对蒸汽、电信、印刷、邮政之力，也不会
产生直接的效果。今日世界各国政府的施政，并非只面对人民，还
必须认识到要对付蒸汽等利器”。（同上书，第31—32页）于是，福谕
在第五章作出结论说：“当今之世，维护国家的方法，在于以平稳的
办法受授政权。考察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风，即可知如此。”“在此
长足进步时期，欲使国势更加一新，毫无疑问迟早必须开设国会。
但在那时，取得政权的人不能谋求永世不变，而要想到事情开始之
后，经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交班。这正是为了避免长坐政权席上可
能产生的弊端而所企望的。本章的宗旨只在这一点。”（同上书，第61
页）

国会开设请愿运动　福泽写完《民情一新》后，立即撰写《国会论》，将其连载于《邮便报知新闻》（7、8月号）。这就是他身体力行“一位名望高的有学识论客发行一个杂志”的主张。《福翁自传》说：

……在明治10年西南战争结束后，国内逐渐安定，而人们
苦于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忽然产生一个想法：如果这时写一篇国
会论，也许能应天下之需要。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于是起草这篇
论文。但因当时没有时事新报之类的报刊，所以我在让《邮便报
知新闻》的主笔藤田茂吉、箕浦胜人看原稿时，向他们说：“请把
这篇论文作为报纸的社论发出去，一定会使世人喜欢。但按原
稿发排，人们一看笔调，就会知道这是出于福泽之手，所以你们
185 可以在保持原文的精神的原则下，甚至一些词句亦可照抄原稿，
只对一些没有重要意义和无关宏旨的地方随意修改，然后发排。

你们试试看，看世间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觉得有意思。”藤田和箕浦年轻气盛，大为欢喜，携草稿回报社后，很快就发表于《邮便报知新闻》的社论栏。当时在国内，还不是国会论占有优势时候，所以没有设想这个社论最后会受到欢迎，或丝毫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大概有一个星期，每天都在社论栏里连载，藤田和箕浦还加上一些评语，以煽动东京的同行。正在观察世间有什么变化期间，真是不可思议，大约过了两三个月，东京市内的一些报纸带头，接着又有地方的报纸，逐渐展开讨论而造成了声势。于是，又是地方的一些有志之士闹腾起来，要来东京请愿，要求政府开设国会。这虽然很有意思，可是仔细一想，觉得在宣传文明进步的方针时，立即提出既非自身的需要又必然被人视为猎奇的新奇政治观点，会无意之中引起天下大乱，而又无法制止，岂不等于在满是枯草的秋天的荒野点火烧身。越想越困惑，有点害怕起来。（第302—303页，见《福泽谕吉全集》第7卷，第247—248页）

这也许是木户所说的“学者之大罪”吧。1879年9月，爱国社第四次大会决议着手开展国会开设请愿运动；第二年3月，有114名有志之士作为总代表集会于大阪，他们代表着爱国社同盟的27个社和盟外的5、6个社。这些社分布在2府22个县，共有社员87 000人。他们在会上决议起草请愿书，并结成了“国会促成同盟”。土佐派占出席者的三分之一以上，掌握着主导权，但地域广大，人数众多，开始流露出针对土佐派的“地方感情”。《自由党史》说：

尽管大会的场面颇为壮观，但参加会议的人来自各方，参差不齐，对议事尚不熟练。加上有人怀有地方感情，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几乎未能抑制住喧嚣。为此让议长片冈暂时休息，由副议长西山出来代替。会场依然混乱。西山发起火来，由议长席上大声喊道：“不管怎样，今天的大会总要做出些什么。你们看，为了

186 达到我党早已追求的开设国会的目的，大家不是千里迢迢汇合到这里来了吗！现在，萨长人控制的政府欲挟战胜之威，行压制之政，使志士无容身之地。因而冲击这个政府的唯一出路，只有要求开设国会之策。这要怎么办呢？……”本来去年11月的大会一经决议要求开设国会，全国的政治空气立即活跃起来。今春的大会，自告奋勇出任委员的人多于以前数倍，人人当先，唯恐落于人后。而特别是伊予松山的委员小岛忠里，一马当先，捐款百元。竞争的形势已经如此。而且，当时在土佐，各政社的势力也很强，除立志社外，其他社出席大会的委员也很多，其人数或许比同盟政社还多。片冈等人私下对其他地方有所谦让。对这些人即使进行甄审，也依然有出任正式委员的资格，他们每人都代表着百名内外的同情者，所以没有理由加以拒绝。因此，这些人往往不免有壮士飞扬得志的表现。在各县的委员当中，有人鸣不平，甚至点名道姓指出土佐人，提议把他们开除。这些人虽然极力讳言他们要抑制土佐人的多数，但看到正副议长均选的是立志社的人，很多人便更加不快。终于在讨论议案的时候，大吵大闹起来，想把秩序搞乱……河野广中、内藤鲁一等人为此担忧，痛斥不满的人说：“凡天下大事，功劳多的人，都随着得势而益强。这是情势发展的必然，不可避免。如各位委员因为自己的势力不如土佐人士而感到遗憾，那就应当设法使自己的功劳多起来……”这段权宜之言，竟堵住了大家的嘴。接着，向大会传达集会条例即将公布，会员感到内讧不对，议事的秩序终于变好，直到大会闭幕。(《自由党史》上卷，第339—340页)

由2府22县的96名总代表签名的《国会开设请愿书》，经片冈和河野于1880年4月提交给元老院，但被驳回。这一年，全国各地又向元老院提出了总数达85件的建白书或请愿书。这些建白书或请愿书的共同内容有二。第一，要求根据庆应4(1868)年的五条

誓文和1875年关于逐渐建立立宪政体的诏书开设国会，接着评述开设府县会的好处，进而论述开设国会的必要性，最后责难政府自圣上1875年下诏以来6年之间无所作为和束手无策。其中的论点，都是引证政府公开表明的政策，指责政府食言，而要求立即开设国会。第二，作为要求开设国会的具体根据，提到大限的积极财政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和寺岛的收复税权外交所指望的修正条约工作受挫。就是说，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开设国会，以建立“官民一致”、“上下协和”的体制。许多处都是以英国的君民共治为范本的。（御厨贵编《日本历史体系》4第515—518页） 187

但是，请愿书被驳回，而为了讨论善后措施，便于11月由东京爱国社召集了2府22县的64名代表开会。从地区来说，东京也召开过此种集会，有关东、东北、甲信越①的代表40人参加，高知只有二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议长河野（福岛人）、副议长郡利（福冈人）以下共11人，其中高知只有一名。在请愿书上签名的94人中，士族占62名，平民占29名，出身不明者5人，可见士族占了绝大多数(2/3)。而在善后大会的64名代表中，士族占28名，平民占34名，出身不明者2人，就是说平民占了过半数。再拿国会促成同盟第一次大会（1880年3月）的出席者名单与善后集会（1880年11月）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运动正由日本西部向日本东部移转，由士族向平民移转。这次善后集会的参加者，有不少人不是经同盟各社的游说而前来的，所以未把集会称为同盟第二次大会，而称为大日本有志公会。（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290—298页）

自由党的成立　在善后集会上，松泽求策（长野人）曾提案建立自由党，但以几票之差被否决。于是，在同一时期召开的爱国社

① 甲信越，指甲斐（今山梨）、信浓（今长野）、越后（今新潟）。——译者

关系者会议上，代表们提议解散爱国社而成立新党；进入 12 月，制
188 定出《自由党建立盟约》四条。可以认为这是自由党的起步。但是，各派对立和竞争，使党首和组织都没有确定下来。名副其实的正式建立，应该说是在第二年 10 月。

1881 年，发生了向民间出售开拓使国有财产事件。这一年的 7 月 30 日，政府决定把由 1869 年至 1880 年投入 1 410 万日元资金建设的开拓使经营事业的全部，按时价评估为 39 万日元左右，卖给五代友厚（萨摩人）等人经营的关西贸易商会，价款分 30 年支付，而且不计利息。但是，在这之前不久，《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就相继登出了攻击藩阀政府的评论（参阅后述第 237 页以下）。在国会开设请愿运动中受挫而欲设法打开局面的民权派看来，这是奇货可居，便立即宣传和论证政府自行决定向民间出售国有财产，正好证明必须开设国会和推翻藩阀政府。他们痛击政府，国民舆论对政府的责难沸腾起来。《明治政史》说："维新以来日本全国人民不分智愚起来非议政府的措施，尚无甚于今日者。"（《明治文化全集》第 9 卷第 369 页）

事件的原委容在后面叙述，但在这里首先告诉读者：陷于孤立的政府于 10 月 11 日决定停止出售开拓使国有财产和罢免大隈，并于第二天发布了关于在明治 23 年开设国会的诏书。为参加有志公会到京的委员们，于 10 月 1 日开会，会上决议成立自由党，随后着手起草组织条例。在诏书公布之后，他们马上奏起凯歌，于 18 日在浅草的井生村楼召开自由党成立大会，由后藤象二郎（土佐人）担任大会议长，马场辰猪（土佐人）担当副议长，会上通过了《自由党盟约》和《自由党党章》。出席大会的约有 90 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东人。选出的党工作人员，大部分出身于土佐。大会进行当中出现纷争，九州派宣布退席，接着东北派也离开了会场。板垣（土佐人）当选为党的总理，中岛信行（土佐人）为副总理，后藤象二郎（土

佐人)、马场辰猪(土佐人)、末广重恭(爱媛人)、竹内纲(土佐人)为 189
常务议员,林包明(土佐人)、山际七司(新潟人)、内藤鲁一(爱知人)和大石正已(土佐人)为干事。

而大隈派则于事件发展到高潮的9月,以“反对政党的团结,全力以赴解决出售开拓使国有财产问题,必先进行改造政府”为条件向板垣求援,但板垣答称:“只依托一部分官吏而攻击另一部分官吏,不仅使我不屑一顾,而且亦非我辈走向目的地所由之路”,随后他便到东北去游说了。(《自由党史》上卷第500—502页)10月大隈一下台,他所重用的一些人也联袂辞职了。这些人在第二年3月组织了立宪改进党。为了同这个党对抗,伊藤、井上等人则在同月指使福地源一郎等人成立了立宪帝政党。(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298—304页)

二　新闻与游说　府县会形势 190

党干部与党员　自由党自正式成立起,至1884年10月29日于大阪宣布解散止,正好存在了三年。党的总理始终是板垣。初期的党干部大多数是土佐派(立志社系和国友会系),1882年9月因板垣外游问题国友会系脱离土佐派,而立志社系一直到党解散都占居着党的中枢部。但在党大会的出席者中,关东的代表占有压倒的多数。在成立大会上,约89名出席者中有34人(其中6人为土佐派),占总数的38%;在1883年11月临时大会(东京)上,76名出席者中有59人,占总数的78%;在1884年4月大会(东京)上,61名出席者中有43人,占总数的70%。党员人数,1881年10月为101人,其中关东45人,占总数的45%;1882年11月为768人(士族148人,平民620人),其中关东449人(士族44人,平民405人),占总数的58%;1884年2月为2 147人,其中关东981人,占

总数的46%。总之，在上层，立志社只剩下了板垣等最初发起人；在下层，关东人占压倒的多数，士族极少。

党的干部，按出身可分为士族领导者和豪农领导者。前者有立志社的板垣、片冈等人，以及高崎有信社的宫部襄、三河交亲社的内藤鲁一，盛冈求我社的铃木舍定等人。后者有福井自乡社的杉田定一，越佐共致会的山际七司，神奈川融贯社的石坂昌孝、高冈北
191 立社的稻垣示等人。他们多数是县会议员，担任过议长的也不少。

从职业上看，最引人注目的是律师。大井宪太郎，1882年和1883年为东京律师协会副会长，1882年为自由党常务议员。据伊藤痴游说："由于他爱读书人和喜欢散财，所以在壮士[①]中间很有人缘"，他加入自由党后，立即被关八州的党员拥戴为他们的领袖，"在党内，除了板垣，谁的势力也超不过大井"。（《国会开设政党秘话》第136、226、264页）但在党的中枢部，同板垣联合的星亨的势力，看来是强大的。

星也当过律师。伊藤痴游说，他留学英国，是日本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的人，回国后主要通过办理外商的案件而置了家业，在加入自由党时已有财产20万日元。入党后，经过对党的财务的了解，得知党没有一分钱收入和基金，有需要时由板垣一人出钱。他感到这样不行，于是制定出《自由党捐款规则》，首先由板垣、后藤、星各捐1 000日元，竹内纲捐500日元。星还同自由党内的其他律师一起创办厚德馆，无偿为自由民权运动的有关人员和财力匮乏者的诉讼案件辩护。在福岛事件[②]中，河野的辩护人就是星，田母野秀显的辩护人是大井。

律师是城市的新兴职业。日本司法省首次经考试指定律师是

① 壮士，在明治时代，指搞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译者
② 福岛县镇压自由党员和农民的事件，详见本章第三节。——译者

在1876年。律师在城市设立事务所，承办案件获取收入，社会关系广泛，可以依靠事务所和收入进行各地方结社。不仅党的干部，就是地方结社的领导人，身为律师的都多得惊人。例如，盛冈求我社的伊东奎介、宫杜孝一，山形东英社的重野谦次郎、山下千代雄，北羽联合会的狩野元吉，埼玉通见社的高桥安尔，松本奖匡社的江桥 192
厚，岳南自由党的前岛丰太郎等人，都是律师。（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306—317页）

新闻与游说　当时，扩大党的势力的社会条件，是前述的农民占八成的文明开化社会。新闻是开展运动的主要武器。《自由新闻》创刊于1882年6月，最初的责任编辑马场辰猪，因反对板垣外游而于9月去职，由《大阪立宪政党新闻》的吉泽滋担任主笔。《自由新闻》的年发行量和年售报收入，第一年度（由1882年6月起）为675 000份和16 000日元，第二年度为1 471 000份和33 000日元，第三年度（至1884年10月）为1 019 000份和24 000日元。作为政党的报纸，这样的发行量是相当可观的。当时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年发行量才五百万份左右，年售报收入只47 000日元。虽然如此，《自由新闻》的经营也是困难的，以致星把自己的财产都用上了。1884年5月，又出一份名为《自由之灯》的通俗报纸，星每月也要为这份报资助数百日元，据说，为办报他负债达数千日元。

地方结社的主要工作也是出版发行报纸。比如，盛冈求我社办过《盛冈新志》，山形东英社办过《山形新闻》，福岛石阳社办过《福岛新闻》，松本奖匡社办过《松本新闻》，岳南自由党办过《东海晓钟新闻》，福冈向阳社办过《福冈日日新闻》，等等。地方结社的领导人都筹划和经营报纸的出版发行工作，似乎没有同报纸没有关系的领导人。他们都招聘大城市的报社记者来担任主笔或评论记者。但地方报纸多数经营不善和亏本，所以出现了许多浪迹于地方报纸的游历记者。地方报社的记者多数是外地人。如果县会议员里出

现了外地人,那你首先就要把他看成是记者出身或是干过律师的。

193 “善辩”也是重要的武器。中央的领导者或游说员到地方巡视结社的情况,同地方的大人物套近乎,发表演说,以扩大党的势力。游说是一项既费时间又费精力的工作。例如,东海、北陆方面的巡视员植木盛枝,曾于1884年4月到7月在东海、北陆游说。据他的《东海北陆纪行》称,乘火车到神奈川,再乘人力车去汤元,在汤元住一宿,第二天坐轿由汤元出发至三岛,再改乘人力车去静冈,在静冈住一宿……由京都乘火车去大津,由大津坐轮船去长滨,再由长滨乘火车到柳濑,在柳濑住一宿……开过演说会和座谈会的地方,依次有静冈、松滨、丰桥、田原、冈崎、西尾、知立、名古屋、大垣(京阪游说)、武生、鲭江、福井、山代、金泽、高冈、轮岛、宇出津、七尾、富山、高冈、放生津、伏木、高冈、富山、东岩濑、高冈、石动、高冈、富山、高田、柏崎、高田、小诸。“凡93日,经国凡18,会见者不计其数。”他说,开过9次演说会,座谈会和与此类似的“见面会”共61次。真可以说是辛风苦雨的游说旅行。(《植木枝盛日记》第249—258页)

可以认为,地方游说、演说会、座谈会之所以有效,其原因也与报纸相同。这就是说,同地方的名流、知识分子接触,可以建立地方势力的据点。如果地方社会城市化了,交通和邮电便利,地方名流阶层的影响力减弱,外来名士的物以稀为贵的价值下降,地方的娱乐设施完备,则只靠巡回游说之类的活动,恐怕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轻易地扩大党的势力的。换言之,人们的交际面窄而少时,可以容易动员名流、知识分子,而一旦把他们动员起来,党的势力就可以扩大,使国民舆论沸腾起来。(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317—338页)

194 **府县会、地方政治** 加快扩大党的势力的,是当时新设的府县会。大久保死后两个月,政府为实现他的遗志,在1878年7月制定

了三个新法(《府县会规则》、《郡区町村编成法》和《地方税规则》),于是从 1879 到 1881 年,相继在全国 41 个府县成立了府会或县会。这个时期正是田赋改革工作的结尾时期。府县会的设立宗旨,是便于“征收民费”。(1878 年 5 月)政府委员在元老院作了说明:

> 现就必须设立府县会的诸原因,陈述其最重要几点。自设置府县以来,虽百事已大致就绪,但因民费征收尚无确定之法,往往引起民间的物议。当然,物议的产生不一定来自府知事、县令的专断暴行,亦非因区长、户长的滥用和浪费。因全无确定之法,故百姓常生疑团,以致在某些地方酿成骚乱。因此,必须制定一定之法。此其一。虽已援明治 8 年设立区户长会的办法在各地设立府县会,但无一定之法,各地不免出现各自为政的状况。而现在各地在根据当地的情况决定本地之事时,均希望由会议决定。此其二。征收民费,征收地方税,如无一定的办法,地方官亦几乎难于施行。如定出征收办法,不仅特别便于地方官征收,而且不会有人民生疑、物议纷起的麻烦。此其三。(《元老院会议笔记》第 5 卷,第 108 页)

选举法的要点,是按郡区的大小,以记名投票的方式,每郡公选 1—5 名议员。候选人资格是:年满 25 岁或以上的男性,原籍在本府县并居住三年或三年以上,在本府县交纳田赋 10 日元或以上者。选民资格是:年满 20 岁或以上的男性,原籍在本郡区,在本府县交纳田赋 5 日元或以上者。官吏和神职人员,既无选举权又无被选举权。议员任期 4 年,每 2 年改选半数。原案所以规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格要交纳田赋 10 日元或 5 日元以上,是为了排除律 195
师和民权论者的影响。政府委员就此解释说:

> ……没有财产的人多半无心经营土地。现在渴望进入议会的人日益增加,但在民智不开的当今让财产匮乏的人当选,会使

人们误认议员是以专门议论政事为主，即将使现今当律师的人或高唱民权的人当选。如果这样，他们就会误认抵抗地方官是民权，在议会上喋喋不休地议论地方官的施政，也可以说他们在搅乱民心。如产生这样的弊端，则那有工夫去研究本府县的公益和谋求人民的幸福安宁。因此，应当选举老成持重的人。(同上书，第148页)

从1880到1888年，府县会的议员数年平均约2 000人，有候选资格的人约80万到88万(占全国人口的2%强)，有选举资格的人数约150万到180万(占全国人口的4—5%)。因府县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在这九年间，有选举资格的占人口之比，最高者为9.4%(1882年茨城县)，最低者为1%(1882年东京府)。因田赋被定为财产资格，所以在城市，有选举资格的占人口之比就普遍低。再从议员的所属阶层来看，从1881到1890年，士族平均占22%，平民基本上保持在78%的水平。士族比重最大的县会，均在西南地方。即在鹿儿岛为91—93%，熊本为84—86%，长崎为85—86%，高知为85—63%，福冈为56—41%，山口为42—40%，等等。而议员中没有一名士族或只有一名士族的县会，则有新潟、岐阜、埼玉、山梨、千叶、静冈、岛根等。(《帝国统计年鉴》)

《议事法》要求议长和副议长由议员互选，并经府知事或县令认可。府知事和县令有权召开或停止会议，会期原则上定为30天以内。法定人数为半数。议决须过半数通过，如赞成票和反对票相
196 等，则由议长作最后决定。议事的内容，为审议和决定由地方税支付的经费的预算及地方税的征收办法。议案均由府知事、县令提出。如果会议的议论被认为有害本地的安宁，违反法律或条例，府知事、县令可中止会议，并须以书面上报内务卿，请求指示。内务卿可以下令休会和解散议会。

初期府县会议员的选举，与其说非常平静，不如说处于假寐状

态。地方名流不关心府县会，不愿意当选议员，府县会常为议员的辞职、改选、补选而忙得焦头烂额。在地方名流看来，担任府县会的议员，不会再增加名利，所以府县会对他们没有魅力。他们宁愿担任须经公选、但由府知事、县令任命的户长，这个时期的户长相当于以前的名主、庄屋①。

但在两三年之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大森钟一在其《地方制度沿革》中回顾说：到 1880—1881 年左右为止的第一期，是非常幼稚的时代，会议一般平静无争议，所有的原案都未遇到反对而通过。但从 1880—1881 年左右到 1884—1885 年的第二期，可以称为生气勃勃的壮年时代，以在一切事情上都反抗政府为能事，经常出现攻击的举动，往往酿成纠纷。议员们寻找议案的缺欠，在会场上竞相发言。他们当中，有很多是从东都游学归来的少壮知识分子。也有民权活动家。但是，当时还没有党派联合的现象。因此，出面来反抗的主要是个人，而不是党派。甲议员发言后，乙议员发言，一个议员坐下来，另一个议员又起来；他们各说各的，喋喋不休，会场鼎沸。决议立即将议案退回时，激怒了县令便解散县会，但改选之后， 197
议员仍然是原班人马，于是县令又得重新提案(据 1881 年府县会规则修改法)执行原案。

原来设置府县会的目的在于征收民费，所以名流当选的议员常以“休养民力”为名要求削减预算或否决预算。政府虽能把“无恒心的无产者”排挤出府县会，但名流当选的议员感到自己是直接受害的“有产者”时，也极力反对政府的措施。因此，在府县会上，反府知事、反县令的风潮迭起，对县令、县官提出不信任案，决议提出公选郡长的建议，甚至发展到向元老院陈情的地步。关于一个县的决议和陈情，很快便波及邻县，然后再波及全国。这不外是自由民权

① 江户时代的村长，在关东地方称为“名主”，在关西地方称为“庄屋”。——译者

运动在地方的扩大和沸腾。

参事院议官补大森钟一在巡视大阪、静冈等8府县后，在其向山县参事院议长提出的意见书中提出建议说：

今春以来考察府县的运作时看到，府县会不分析府知事、县令之所为和是非得失，而妄求节减府县的经费，从而不顾地方政务的好坏，总是抵抗地方官，以轻浮过激为得意。偶有笃厚诚挚的议员，亦遭谩骂和诽谤，被视为卑鄙屈从。会议上吵吵嚷嚷，争相驳斥和攻击原案，以在会议表决时占多数自励，甚至不顾行政上必要的正当措施而废毁原案。

广泛考察国内的时局和世风发现，去春以来世人谈论政治者骤增，而自去冬发布大诏[关于开设国会的诏敕]以来东西各地竞相建立政党，讨论各种主义的异同，出现相互敌视之风。其最严重的表现，是青年人几乎达到如狂如颠的地步。最甚者，是高唱自由，抗拒官府，以此为伸张民权的办法，不管正义在何方，

198 只想采取抗拒的手段。这就是使今天的府县会产生弊端的原因。但这个弊端不过是一时的歪风，但不能说是社会的真实面貌。今天的形势虽走入这个极端，但不久又会一变，乃是必然的趋势。犹如病人的康复，不可根据这种康复推论其人平时的强弱。为应变而立一时之策是不得已，但不能用在决定永久计划之时。（龟挂川浩《明治地方自治制度的成立过程》第82—83页）（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第56—68页）

福泽在其《藩阀寡人政府论》第10（1882年6月）中，对府县会作过如下评论：

……例如，府县厅在举办一项地方事业而把预算的议案交付府县会审议时，府县会总是一味削减预算，我行我素作出决议；而回过头来看看府县的实际情况，府县会也看到，地方有道路、堤防的修筑事情，有警察的事情，有学校的事情，这些事情都

一年比一年缩小规模。更有甚者，不久以前，某县会竟作出过不得开支一切地方费的决议。这可谓过分的极端。县会并非不知道这样办不妥，但明知不妥也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只是人民不服县政的证据。有的要求撤换县令，有的要求公选郡区长。其理由虽有根有据，但实际做起来还不是以事实为根据，而是因为有可议论的言词而议论之。我可以在这里开玩笑打个比喻，这就像因为人的腋下有空隙，所以才去胳肢它。实际上虽然无罪，而地方的行政机关亦非人的腋下，但就是要去胳肢它。这不仅影响一个地方机关的声望，而且扩而大之，亦与中央政权的尊严有关，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不管有无事实，一只狗叫起来，一万只狗也随着叫起来。此风如波及全国，则各府县的工作将日益难办，一所学校的创建或关闭，一处堤防的修筑，都将不能如愿以行。官民相视有如楚越，可以说毫无交往的至诚。（《福泽谕吉全集》第8卷，第137页）

福泽在其《时事大势论》里，指出府县会的开设是自由民权运动扩大的第一原因时这样说道： 199

……由此民情为之一变。其实，府县会的开设决非人民所促成，亦非政府所主动促成，而是为了便于施政而利用民议的妙算。但观其成果，与所期大不相同。府县会的开设，一举大开人民的眼界，人民开始得到品尝政权的真味的机会，但政府的企图并不在此，真可以说是偶然事变。从前见到府县的小吏都不敢抬头看的农民商贾之辈，现在坐在庄严的会堂审查地方税议案，讨论预算的多寡，而当要通过一府一县的法案时，府知事、县令也难于左右他们。从前农家的年贡由领主的地头[①]课收，其轻重多寡被认为是由上天之手规定之后按严格的命令从天上

① 地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意：在镰仓时代，是由幕府指派的庄官；在室町时代是在乡领主；这里是指江户时代的领主管家。——译者

下达的，岂料今天我们的年贡（用老眼光来看，地方税也就是年贡）由我们自己来审议，真是上下颠倒，用俗话来说，这等于老百姓办起老爷的事情。民情怎么能不变！（同上书第5卷第239页）

运动扩大的第二原因，是废藩置县、田赋改革后米价连续二、三年上涨使农家富裕起来。

……加上，两三年以来，纸币贬值，米价上涨，土地的卖买价格也随之大涨，而农民每年把收获的米谷存在家里，从而家底富裕起来。不仅如此，他们看到土地的价格上涨后，觉得即使不把土地出卖换成现金（他们自信可以卖几百或几千日元），自己也会表现出富有的样子。即成为名实俱富的人，不再是往昔的穷光蛋了。正好在这个时期，一些政坛演说之客各地乱窜，破坏旧有的陋习；政论性报刊每天在诱导人心，每月在给人心加温，使一直冷漠不好说话的农民有不少人变成了热情奔放而又性急的政治家。在饥寒交迫的气氛中，不管演说的雄辩家提出什么高论，政论性报刊发表什么奇谈，谁也不会洗耳恭听和泪如雨注。（同上书第240页）

200 福泽所举的第三原因，是学校教育。1873年实行新学制。如今（1882年）小学已不下3万所，学生人数在200万以上。当初七、八岁入学的学生，今已十七、八岁了。如果是十岁入学，今已成丁。这种教育缺乏道德风气的薰陶，“学生所学唯习字、数学和背书而已”。

……本来务农而今忘了耕作之法，本来经商而今不屑在柜台前答对顾客，这种因读书识字而造成的忧患真是在全国到处可见。故现在向这些人谈论政治以活跃政坛，那他们既可以向西跑又可以向东奔。其容易程度无异于一张白纸既可以涂成红色又可以涂成黑色。他们今天所以缄默不言不是因为无嘴，而

> 只是因为尚未得到张口的机会，没有碰到教给他们张口之法的人。一但得到这个机会，碰到这样的人，他们会发出什么声音不可逆料。他们无异于尚未弹用的有弦琴……这样的少年今后只有岁岁增加，而不会减少。从今开始设置什么方法来挽救，都已为时晚矣。民情只有日益沸腾。（同上书，第 242 页）

结合前述的《民情一新》的论述，可以说因文明开化而发达起来的全国大众传媒，正在弹起因小学教育的推广而激增起来的“尚未弹用的有弦琴”。报刊的弹弦力大大增强了。福泽说，因以上三项原因所扩大起来的自由民权运动是“气数”。“这三项原因的结果均出于偶然，而当初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够预知。”“凡天下之事，都是没有预知而发生的，这就是气数。气数一来，就推进天下之事而不可挽回”。（同上书，第 243 页）

三　自由党解散　府县会党派 201

镇压与怀柔　政府对沸腾的自由民权运动进行了镇压。最轰动世人耳目的是福岛事件。1882 年 2 月到任的福岛县令三岛通庸（萨摩人）对他的心腹说：“我是从政府秉承三项密令来赴任的，扑灭自由党为其一，援助帝政党为其二，修筑道路为其三。”随后，他立即变动县厅的人事，努力扶植帝政党，而无视县会，一次县会也未出席。河野广中县会议长以否决每项议案来对付之。自由党议员在 62 名议员中只占 10 余名，其中也有态度坚定程度的不同。但每项议案都能被否决，这在当时反对县令的风潮甚强的府县会中也是没有类似例子的胜利。自由党员的运动日益激进，而镇压也一天比一天严厉。有要暗杀河野的谣言流传起来，县厅动员了帝政党的壮士。在这样的形势下，8 月间河野等数人共同写了扬言“颠覆专制政府”的血盟书。

另外，三岛县令到任后在会津6郡开始的三方道路修筑工程
中，因征集民工和代役金而引起纠纷，但郡的行政机关没有重视，
于11月强行征集，结果引起数千名农民不满，他们聚众包围了警
202 察。自由党会津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裂，急进派被逮捕，稳健派
向官方陈情，要求“官民调和”。河野等人虽未直接参与会津骚动，
但12月1日在福岛自由党的无名馆被捕。密探以他们搜到的上述
血盟书中的“颠覆”云云为证据，告发他们企图发动内乱，并以此惩
治了他们。其实，河野的目标更为远大，他想问鼎中原。多年以后，
他曾这样说道：“那时，我们如不涉嫌福岛的冤狱，继续进行我们预
定的运动，我想我们会掀起天下的风云，造成可喜的局面，使政局
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会津骚动竟导致福岛全县的冤狱，使我们的
计划一夜之间化为泡影。”(《河野磐州传》上卷，第527页)

政府在1882年6月对集会条例作了修改，加重了惩罚的条款。现在，府知事、县令(东京是警视总监)可以命令演说者一年之内不得在本辖区内“公开议论政治”，下令解散政党社团，并视情况可以命令政党社团一年之内不得在全国“公开议论政治”。另外，警察官对各种名义的“群众集会”，如认为在治安上有必要，还可以临场监督；内务卿对任何集会和结社，如认为是有碍治安，都可以下令禁止。

1883年4月修改的新闻报纸条例，命令报纸的发行人交纳保证金，其金额在东京府为1 000日元，在京都、大阪、横滨、兵库、神户、长崎为700日元，在其余地方为350日元。内务卿命令报刊停止发行或停刊时，最严重者可没收其印刷设备。条例还规定，因报刊的报道而犯罪时，对报刊的出资人、社长、编辑、印刷者、笔者、译者均作共犯处理。

203 政府还迫害自由民权运动有关人员的人身，威胁他们的生存，或者为他们提供一些便利而怀柔之。例如，政府曾通过大隈的故旧

和银行断绝大隈的资金来源，使大隈陷入不得不依靠高利贷的困境。接着，政府又劝大隈到国外去旅行，但以失败告终。另外，为压迫资助立宪改进党的三菱，与三井有密切关系的井上外务卿(长州人)唆使品川弥二郎农商务大辅(长州人)，让他叫浅野总一郎等人创办共同海运会社(1882 年 7 月)，并对这个会社给予保护，以便打破三菱在海运方面的垄断。品川安放在三菱会社里的坐探，通过古泽滋把情报卖给星亨，星不惜重金把材料弄到手后，便开始攻击立宪改进党。《自由新闻》在 12 月以《论三菱会社之弊》开始，至第二年 5 月相继发表了《打倒海上霸王》、《扑灭伪党》等评论。自由党虽然站在非议政府的保护政策的立场攻击了三菱，但却没有对政府对共同海运会社的保护开刀。

对于自由党，政府也是采取类似办法，除让板垣和后藤外游以减弱其党的势力外，还命令驻外的外交官，揭露自由党员所一直憧憬的法兰西的内幕，让他们的幻想破灭。外游费用由三井提供，而三井则得到延长它与陆军省所订的承包合同期限的好处。政府让后藤说服了板垣出国旅游。据说，后藤谎称旅费系由大和的富豪土仓佐三郎所出，而板垣信以为真，完全不知道叫他出洋是政府的圈套。但在 1882 年 11 月一发表两人访欧，立即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党刚刚建立不久，总理外游是不适宜的；也有人对出游费用的来源表示怀疑，甚至有人退了党。立宪改进党也觉得板垣二人访欧似用政府的钱，而对自由党进行了攻击。

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者究竟同政府斗争了没有呢？无论是板 204
垣和后藤，还是大隈，自维新以来，都曾长期同萨长的领导人一起在政府任要职，其间虽有争执和隔阂，但随情况的变化而进行妥协交易并非难事。当拥戴他们的自由党员和改进党员攻击政府、互相对骂、舌攻笔战，从而引起国民舆论沸腾的时候，台前的挂幕一放下幕后就开始了交易。攻击政府，引起国民舆论沸腾，不是产生了

提高同政府的妥协条件的效果吗！从整体来看，不是土肥挤进萨长联合或萨长把土肥拉进自己的怀抱的运动吗！对突然进行的妥协表示愤慨或惊讶的党员或观众是很多的。但被领导人亲信的策士们，并不是看不清形势的头脑简单之辈。萨长的领导者对其中的奥妙也是心领神会的。这是19世纪80年代挤进去拉进来运动的自由民权版，后述的大同团结运动，大隈、后藤的入阁，初期议会中的政界合纵，也是这种挤进去拉进来运动的机制。

资金枯竭　1883年6月归国的板垣，提出解散党的主张，使党员们大吃一惊。随伊藤博文在欧洲考察宪法的西园寺公望，5月10日由巴黎写信向岩仓报告板垣、后藤的情况时说："我看出此人[板垣]的心事是回国后欲辞去自由党总理之职，行退隐之下策。"（前田蓮山《自由民权时代》第224—225页）这是隐退论，但马场辰猪的《自叙传》却说，板垣在欢迎他回国的大会上讲的是解散论。"板垣突然发表了劝大家解散自由党的演说。他说他在乘法国客轮归国途中忽然产生了这种想法，并请党员考虑这个问题"。（《明治文化全
205 集》第14卷，第347页）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土阳新闻》10月27日，《邮便报知新闻》11月5日，都有关于板垣的解散论的记事。从《自由党史》所收的他的《西洋见闻一斑》和《欧洲观光感想》来看，他对法国的幻想破灭了，但他对日本的幻想破灭得比法国还利害。不管怎样，反正他的解散论使寄望于他归国的党内部动摇了，遭到地方党员的反对，于是决定在11月召开临时党大会。

临时党大会不同意解散党，而决定募款10万日元，并为检查募款的结果，而"议定于明治17年2月再召开临时会，以讨论所募款项的使用和我党将来的方向问题"。板垣的解散论当然与党的经费问题是不可分的。当时，党的经费已经枯竭。明治14年政变（1881年10月）后就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实行的整顿纸币、通货收缩政策，使物价大跌，导致经济萧条，特别是米价从1880年的峰

顶下跌，到 1883 和 1884 年跌到谷底，1885 和 1886 年虽略有回升，但以后又暴跌，到 1888 年跌到谷底。以 1878—1882 年为 100，1883—1887 年的指数为 62，1888—1892 年的指数为 77。趁米价上升而高涨的运动，又随米价的下降而低沉了。《邮便报知新闻》1884 年 10 月 28 日的社论这样写道："二、三年前，因自己的家业丰裕，能将力量与金钱用于公益事业，所以基于每个人的志向，有的去兴办学校以育英才，有的发行报纸以传播思想，有的集会结社等。他们都以十分旺盛的精力去从事这些事业。然而在今天，情况已经大大不如往昔。这完全不是由于意志消沉了，而是迫于自家的生计，心身无暇他顾，所以也就没有时间去办公共事业。"于是，府县会反对政府的风潮也消退了。（参阅后述第 209 页以下）

至于经费问题是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但一个月以后召开的 206
1884 年 3 月党大会（各地的总代表共 61 人，议长为片冈）的决议为：

第一，设咨问若干名充任总理的参赞，其选任委托总理提名。（星［东京］、大井［东京］和片冈［土佐］等三人被提名为咨问。）

第二，赋予总理以特权，由其专断独裁党务。（似乎是为了挽留板垣。）

第三，设文武馆以培训活跃有为之士。（似乎是为了管束激进的青年党员。6 月份落成，命名为有一馆。馆长初为片冈，后为内藤鲁一。入馆条件是：各府县每捐款 1 000 日元送一名。高知 8 名，新潟 7 名，东京和神奈川各 6 名，栃木、茨城和群马各 3 名［以下略］，共计 56 名。"在馆期间的费用全部自理"。）

第四，向各地派巡视员。（似乎是为了游说和募款。）

第五，规定选举会议总代表的区域和人数。（总代表人数是：群马、神奈川各 8 名，茨城 7 名，新潟、栃木各 6 名，埼玉、爱知、兵库、

高知、岛根、东京各5名。[以下略]九州和大阪没有总代表。)(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341—345页)

过激举动、解散党 从1884年春开始,由群马、秩父、武相发展到中山道①沿路的农民不稳动向开始扩大。这也是经济萧条和米价下降的余波。因田赋过重而穷困和卖掉土地的地主以及自耕农增加,但也出现了利用这个机会聚集土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而成为人们怨恨的目标。佃租的土地在全部耕地中的比重,1878年为28.9%,1883年为35.5%,1887年增加到39.5%;而自耕农在总农户中的比重则从1883到1888五年间,由38.7%减少到
207 33.3%。农村社会的这种结构变化,使作为自由党的社会基础的豪农商层陷入决堤灭顶之灾,从他们当中产生出了困民党和借钱党。赌徒、地痞、草寇、流匪、讼棍、被登记为外地人而暂住在农村的流浪者,对农村的骚动发生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场合还受自由党的领导而拥护自由党员。自由党对由此而急进化的地方党员,完全失去了控制的力量。

另一方面,在农民骚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青年党员也越来越急进化了。他们在应否采取直接行动的问题上与党干部对立,1884年2月,约有30名青年党员占据党本部宁静馆两天,使党干部狼狈不堪。于是,在3月党大会上决定设立文武馆,并且很快就在8月开馆了(正式命名为有一馆)。在青年党员中间,秘密进行着暗杀高官的计划。现举其一例。刺杀1883年10月兼任枥木县令的三岛通庸的暗杀团,听说大臣、参议等要参加枥木县办公楼的落成典礼,便筹划暗杀和举兵,但被发觉和追捕,于9月23日在加波山投降。虽然只有16人,但都是自由党员,当党员干部获悉本来是受命围捕他们的有一馆竟是暗杀团的据点后,而大吃一惊。《自由新闻》

① 江户时代的五条大道之一,由江户(东京)的日本桥开始,经上野(群马)、信浓(长野)、美浓(岐阜)诸国至草津(在今滋贺县境内)。——译者

10月11和12日连载的社论《告诸位自由党员》，以及10月19、20、21和22日连载的社论《论志士的责任》，悲叹破坏党的决议的党员如此之多，使党不能再继续存在了。

于是，党的干部决心解散党。板垣专断独行，急于解散党。10月29日的定期大会，是避开东京而在大阪召开的。出席者均知道事情的内情，不得不赞成解散党。"丹波人法贵发到大阪后，反对解散党，提出不同的意见，而板垣向他晓之以理说，你不了解时势，请你现在到各地准备闹事者之处打听一下内部消息。法贵发按照板 208
垣所言，首先来到大井宪太郎处，他发现大井的部下正忙于准备举事。名古屋和静冈等地的同志也在准备起事，情况十分险恶。于是，据说法贵大有所悟，完全放弃原先的意见，主张赶快解散党。"(《自由党史》下卷，第278页)在各地反对解散党的电报虽如雪片般飞来，但党大会(议长片冈)毅然根据板垣的提案作出解散党的决定。出席者100余人，反对者只有五、六个人。

大井的观点是很复杂的。在青年党员2月占据宁静馆时，向他们送食物和寝具的党干部只是他一人。2月在秩父游说时发起组织困民党的也是他。加波山的恐怖分子，农民骚动的领导者们，都对他寄予希望，依靠他的指示。但他所能做到的是辞去咨问之职，而赞成解散党。他第二年同自由党激进派一起，为朝鲜的改革而试图去韩。这就是大阪事件。(见后述第225页以下)

星亨在9月下旬因发表攻击政府的演说而被指控犯有侮辱官吏罪于新潟被捕，但他给大会打去了反对解散党的电报，而却接到了内称"花钱打胡说八道的电报无益"的回电。由他发起的回复自由民权运动势力的运动，是1887年的反对修改条约的大同团结运动。(见后述第271页以下)

对自由党系统的直接行动大加批判的改进党，也因严重的经济萧条和政府取缔而使解党论抬头，经过是否应当解散党的争论

之后，大限总理和河野敏镰副总理等人在1884年12月退党。从此以后改进党虽然还存在，但已名存实亡。另外，在自由党、改进党的势力陷于不振期间，立宪帝政党也在1883年9月解散了。（以上参
209 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1卷，第345—351页）

府县会党派、企业勃兴　在1881年以后数年松方紧缩财政之下不断加重的经济萧条和米价下跌，虽使豪农民权家的运动低沉，自由党的运动资金匮乏，但另一方面，也产生出利用这个机会聚集土地的改组了的豪农层。他们的关心和活动所向，与其说是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如说是各自地区的利益和府县会的活动。也就是说，府县会作为利益和职位的争夺场所，对他们具有魅力。这大概与有为的青年们的志向在这个时期由试图驾御风云的天下国家热转向期望在现有秩序下的立身出世热有关。（见第256页培训官僚、任用制度）

在地区的利害方面，府县会议员最初只有按地区联合的倾向，比如在同一县内，有县南派和县北派等。但只是这样，地区还构不成团结的重要原因。随着府县预算的编制与选举区的利害更有关系，议员们为使预算的制定有利于本选举区而积极活起来，地区才成了重要的纷争单位。举例来说。根据1880年4月全文修订的府县会规则，地方税的税额由“不超过田赋的五分之一”，改为“不超过田赋的三分之一”，府县厅舍建筑修缮费、府县监狱费、府县监狱建设费改由地方费支付，上级向府县下拨的土木工程费也从翌年停拨。根据1882年1月的修正案，警察厅舍建筑修缮费、区町村土木工程补助费和区町村教育补助费也改为由地方费支付。这些措施不外是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的反映，但不管怎样，府县会对地方财政的额定和作用开始扩大了。府县的岁出总额，从1880年的1 200万日元（占国府县区町村岁出总额的14%）增加到1886年的
210 2 100万日元（占国府县区町村岁出总额的18%）。于是，以前在府

县会中一般借以制造风潮的“休养民力”论，现在改为重视地方税的征收方法（户数的比例，田赋的比例等）或府县预算的分配（治山、治水、办学、官署经费等）的地区利害论了。府县会内部日益发生纷争。实际上，地区的划分并不是固定的。岐阜、茨城或宫城的山岳派与水场派等的地区对立，与灌溉治水、造林和林区修路有关，且具有比较长的持续性；而与学校、官署的设立以及铁路、公路的建设和改建等有关的议案，其利害关系的地域便是不固定的。因此，按照持续的和不固定的选区利益形成了府县会党派，在各派之间展开了斗争。

府县会党派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府县会内部的职位分配。一般说来，从 19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府县会议员的选举变成了激战，这表明议员的地位开始具有值得争夺的社会性权威。同时，从府县会议长开始到副议长、常务委员（根据 1880 年 11 月修正的府县会规则设置）的职位分配，也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大森钟一的《关于地方会议的意见书》（1882 年）中，对此有如下的叙述：

> 考察设置常务委员以来的情况，发现许多议员希望担任此职，以参与行政事务为荣，而在逐渐熟悉行政事务后能够协助地方官施政时，又得到相当多的好处；但再深入观察，也发现有人希望担任此职，但未当选，因而感到不快。还有人以憎恨的眼光看待委员协助行政官的行为。如果委员与议会之间有不协调之处，则委员发表的议论就不能在会上发挥作用。即使不是如此，议会有时也不信任委员，怀疑他们的报道，使它不得不去亲自调查。（龟挂川浩《明治地方自治制的成立过程》第 95 页）

从此产生了府县会党派。即对职位的分配表示不满便引起分 211
裂，而以职位的分配为条件又出现合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派不外是为获得和分配职位而形成的团体。在府县会史和地方政治史的话题中，几乎没有不谈与上述的利益和职位的分配问题有关

的事件的。

大森在前述的《地方制度沿革》中，认为在从1884—1885年开始的"第三期"，议员们也已大体通晓议会的性质，养成议事的习惯，所以认识到如不协调一致，就不能增进全体的利益。他说这个"第三期"是议员完全想使自己处于协助当局地位的"成熟时代"。这大概也是表明知事派（由1885年开始，县令改称县知事）的产生吧！府县会议员开始试图接近因府县会规则、地方税规则的修改而掌握更加广泛权限的府县知事，以形成自己的党派，在府县会里执牛耳，把地方自治导向有利于本派。做知事的，也希望与府县会的多数派勾结，或尽力扶植多数派，以制定对付府县会的策略。两者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形成了知事派。其实，知事并不喜欢知事派颐指气使，而知事派也不甘心屈服，所以两者早晚得决裂。于是，既出现了知事派，又产生了反知事派。这不外是挤进去拉进来把戏的府县会版。

知事派与反知事派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不得其详，但在这个时期，府县会议员里已开始出现自由、改进两个政党派别。在15个县的县政史中，举出1885和1886年县会议员的政党派别的，只有新
212 潟、富山、福岛、枥木、埼玉5个县。自由党当时虽已解散，但其称呼依然存在。岩手、静冈、山形、石川、岛取、秋田、茨城、大分、长野、群马等10县，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记载。石川从1889年起，大分从1891年起，其余各县从1895年或1896年起即从日清战争后，才开始有此项记录。《区町村会法》（1880年）在1884年5月全文修改，区町村会的职务和权限，从此只限于审议和决定应以区町村费支付的事项及其经费的支出征收方法。对于滞纳或拒不交纳者，规定强制征收。这是因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而区町村的行政事务费增加，但农村贫困又难于征收民费所采取的措施。议员的候选资格，为满20岁或以上的男性，在本区町村居住，向本区町村交纳田赋

者（有若干例外）。当选议员的阶层分类，按 1882 年 12 月底的数字，平民占区会议员的 76%，占町会议员的 80%，占村会议员的 96%，占町村联合会议员的 89%，全体平均占 94%。（《帝国统计年鉴》）议长均为区长、户长，有召开会议、停止开会、提出议案等权限。

根据 1884 年 5 月公布的户长改为官选（也吸收民选的一些办法）的太政官令，户长公所的管辖户数要在 500 户以上，但辖区不得超过五个町村，户长"要选任在其町村长期居住且有名望的资产者"。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清除民选户长时难于适材、户长人数过多时薪俸（由民费支出）不高等缺点，而将小公所合并为大公所，配备工作精干的官选户长，给予较高的薪俸，以提高町村行政的办事效率。町村数自 1878 年以来几乎没有增减，总在 72 000 个左右。而户长公所数则从改革前的 3 万个锐减为 1885—1886 年的不到 213
12 000个。但士族出身的户长的比重，却从改革前的 11%增到 1885 年的 30%，并且以后继续有所增加。（《帝国统计年鉴》）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使以往的听凭町村习惯处理的町村行政，通过户长公所和町村联合会置于府县厅的统制之下。

但是，因松方的紧缩财政引起的深重经济萧条，也在 1886 年前后开始转向繁荣。又值日本铁道、阪堺铁道、大阪纺织等的股息看好，使股票的交易活跃起来，大大超过公债，投资者纷纷设立新的会社。企业热首先出现于铁路方面，随后波及纺织业。《东京经济杂志》（1890 年 2 月 15 日）刊载的《眼下的金融如何》一文这样写道：

当两毛铁道[1]停止募集资本，将其面值 50 钱的认购证明以

---

① 这条铁路由日本现在的东北本线小山站至上越线的新前桥站，因地处上毛野国（相当于今群马县）和下毛野国（相当于今栃木县）而得名。今已改为国有铁道。——译者

40日元以上的价格发售时，海内筹建私营铁道者几乎如狂；又，当大坂三轩家的纺织事业(大阪纺织会社)出现兴旺气象时，各地创办纺织会社者靡然从之。盖自明治19年(1886年)以来直到去年(1889年)，我国各地纷纷兴办新事业之势，已达到使识者悄然生畏、肃然起戒的地步。其种类之多和兴废之快，几乎无法查其端倪。当此之际，最有持重之心的人亦不免或多或少感染会社热，又何况轻躁者之流。因此，新事业吸收游动资本之势几不可挡。

因为尚无关于股票认购等方面的法规，所以会社的创设极为容易。金融事业一再缩短放款期限，但至1889年中期，企业热仍不消减，投机性的泡沫会社层出不穷。从1885到1889年，纺织会社由11家(资本91万日元)激增到41家(资本1 261万日元)，缫丝会社由136家(资本99万日元)激增到711家(资本544万日元)。这些会社的出经资者都是豪农豪商。他们被卷进企业热，大概对地
214 方企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于是，因米价暴跌而低沉的自由民权运动，又随地方企业的兴起而恢复了势力。后述的自由民权派的复兴(大同团结运动)的背景，可认为就是如此。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矿业、造船、贸易等部门的出资者都是政治商人。殖产兴业政策，就是为这些人而实施的。(高村直助《日本历史大系》4第772—775页)(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第68—79页)

215

四　朝鲜问题

壬午军乱　在自由党因受加波山事件的冲击而解散后的第二个月，又相继发生了秩父事件、饭田事件和名古屋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策划这些袭击官署和暗杀高官的活动的同一时期，党的首脑还曾试图向朝鲜输出自由党的壮士。后藤象二郎订出计划，依

靠法国的资助，让不好驾御的自由党壮士渡韩，同韩鲜的独立派结合，以坚决实行朝鲜改革。在叙述这个问题之前，应简单地回顾一下朝鲜的局势。

在《日朝修好条规》签定（1876 年）后，朝鲜从日本的进口由 1878 年的 24 万日元增到 1880 年的 98 万日元，增加 3 倍多。进驻釜山（1877 年开放港口）、元山津（1880 年开放港口）的特别居留地的协同商会、大仓组、三菱会社等，利用免征关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向朝鲜出口日用品，带去日本通货，大搞投机倒把。朝鲜对日本的出口更加旺盛，由 1878 年的 18 万日元增到 1880 年的 126 万日元，增加了约 6 倍。在出口额中，大米约占八成。因日本商人收购大米，米价猛涨一两倍；但朝鲜政府向军队供给的大米，有时竟迟发 10 个月，而且发给的数量不足。1882 年 7 月，因军队饷米舞弊而发生暴乱，杀死了被朝鲜聘为军事教官的日本人将校。对闵妃派篡夺政权表示不满的大院君（国王的父亲）昰应，坐视军队暴乱扩 216
大并暗中教唆，指使军队杀死闵妃派的大臣和袭击日本公使馆。花房义质公使等人放火烧掉公使馆后逃至仁川，乘英国轮船回到长崎。

日本政府在山县参议的强硬论的指导下，企图借此机会采取强硬手段，一举解决割让巨济岛和郁陵岛以及对仁川的保障占领等悬案。但在中国方面，直隶总督李鸿章先发制人，立即出兵，逮捕大院君，将他押到中国软禁于保定，把军乱镇压下去，使闵妃派再掌政权，1882 年 8 月同井上外务卿缔结了《济物浦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获得了要求惩罚肇事者、赔偿损失、在京城（即汉城）驻兵以保护日本公使馆的权利。（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使》第五章。）

朝鲜的变乱，使西南的征韩派高兴起来。这时，玄洋社（1881 年 2 月由向阳社改组）的干部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还曾组织征韩义勇军，把其先锋 80 人化装为商人、官吏和百姓，由博多乘开往大

阪的"此花丸",在途中劫持轮船,强迫船长将船开往对马,但在对马被官宪解散。

壬午事变后,中国清政府除在朝鲜驻留了大大超过日本公使馆护卫兵 1 000 人的 3 000 名军队外,还与朝鲜缔结了《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章程中记明朝鲜为中国的属国,并向朝鲜派遣顾问以掌握朝鲜的通商与外交,向朝鲜供给武器以将军队改编为中国式的。中国的支配权这样强化之后,闵妃派的政权便逐渐变成反日的,而金玉均、朴泳孝等亲日派则开始受到压制。

1883 年夏,金玉均再次来日请求日本政府支援朝鲜的改革派
217 (独立党),探听井上外务卿的反应,但当时的政府惧怕中国,采取支持事大党(闵妃派)的方针,所以未能支援。于是,金又通过福泽[①]会见后藤,要求援助。当时,后藤刚同板垣一起从欧洲旅游回来。后藤希望得到朝鲜国王"将朝鲜改革一事完全委托于后藤象二

---

① 福泽曾热衷于援助金玉均和朝鲜留学生。1881 年 6 月 17 日他写给小泉信吉的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本月初旬,有数名朝鲜人来日考察,其中二名壮士进入本塾。他们先被我安置在我的家里,对他们进行了精心的诱导。想起 20 余年前我国的情况,确实不能不有同情相怜之感。朝鲜人初到外国留学,正值本塾接收外国学员的开端,真可谓奇遇。由于有这种缘分,朝鲜人每次来我家访问,我都不分贵贱,倾听他们的诉说。而他们所问的无非是 30 年前的日本。请今后多多配合,是为至盼。"(《福泽谕吉全集》第 17 卷,第 454 页)

关于朝鲜改革,他在《时事小言》里这样说道:"今西洋各国以其威势进逼东洋,其势无异于大火的蔓延。而东洋各国,特别是我们的近邻支那和朝鲜迟钝,挡不住此进逼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烧。故应当明白,我们日本以武力应援它们,不单是为了他人,而且也是为了自己。应以武力保护它们,以文化诱导它们,使它们赶快仿我之例,进入近时的文明。在万不得已时,也可以强力迫使它们进步。辅车相依和唇齿相助之谓,用于同等的国家之间虽可,但欲同今日之支那与朝鲜互相依赖,可谓迂阔之极。何况它们不足为辅为唇。今日之要务,只是使用某种方便办法对它们进行诱导,使它们具有可
218 以同我们一起运动的国力,以产生作为辅和作为唇的实效而已。"(同上书,第 5 卷,第 187 页)

另在《时事小言》的绪言(7 月 29 日)末尾,他说:"谈时事尚且不是学者的本分,更何况是行时事了。这不是说的记者。我身为记者,毫无不平。唯得同道之人发动社会舆论,并见到有人将舆论施于事实,便达到我的宿志了。君不见射乌鸦者,他并非为了吃肉而射,而只是以射落为目的。记者亦是如此。他的目的只在谈时事而使其发生变化。取时事而代行之,并非他的本意。"(同上书,第 98—99 页)

郎"的宸翰。他对金说："如阁下真相信我，那就赶快持宸翰来。我提供一百万日元资金和有志之士前赶贵国，一举清除捣乱之辈，以安八道之人民，使贵国稳如泰山。"后藤曾四方奔走，向地方的富豪筹集资金，但只有三、四万日元有了着落。如前所述，这时正值松方的紧缩财政使自由党资金来源匮乏的时期。(《伯爵后藤象二郎传》第543页)

渡韩计划 后藤对朝鲜独立党的援助虽然无声无息了，但在自由党内，国权扩张论却似乎抬头了。1884年4月《自由新闻》分五次连载的《论对朝鲜的政略》，可以说是《自由新闻》的社论中最初提出侵略的国权扩张论的文章。此文的基本观点是："东洋政略"首先要以我国的利益为基础，而"东洋的利益只是末之末"。中国现在使朝鲜从属于它，随意施暴发威。"我们在东洋政略上要使朝鲜成为纯粹的独立国，实为最重要的问题。"这时，虽说是使朝鲜独立，与其缔结"友好同盟"，但并不排除"使我国参与对方的政务"。(《自由民权思想》下卷，第49—66页)

1884年8月中法战争开始，清军连战连败。于是，九州的国权论者觉得要想合并朝鲜，就得设法夺取中国，因而在上海设立了"东洋学馆"。头山满和平冈浩太郎积极支持，奔走筹款；玄洋社有90余名社员和熊本相爱社有50余名社员到了上海。自由党的杉田定一、中山笃介、栗原亮一等人也参加了。杉田在离日前去拜访 219
板垣时，板垣认为应先解决日本的自由而后解决东洋的自由，对于对外活动表示消极(这时的《自由新闻》的社论也采取局外中立论)，但在拜访后藤时，后藤身穿中国服装出现于客厅，气焰万丈，不可一世。他说：

我们由此也应去占领朝鲜。以前，朝鲜来人请我们去为他们充当改革运动的顾问，我们也立即答应了，但在那时，财政方面的一切事情又不得不交给我办。最重的是钱，有了钱，就能大量

买来武器弹药，随后制造一种事件，把支那兵撵到鸭绿江以北去。到那时候，只靠几支步枪是不行的。对此，大炮最有用。其实，我正在计划向法国订购大炮。你不是要去支那吗？这太好了。要努力干，可不能失败。我们准备把朝鲜弄到手，就立即去取支那。（《杉田鹑山翁》第567页）

后藤通过小林樟雄开始同法国公使馆接触。板垣和后藤在9月9日密访了法国公使桑克维奇。公使在其送交本国的意见书中说：

……现将板垣、后藤的意图简述如下：日本眼睁睁地放过了1873年到来的可在朝鲜树立支配权的良机，致使中国在朝鲜日益扩大其势力；现在的朝鲜国王和数名大臣虽对中国人持有敌意，但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必须获得购入武器和组建小军团所需的资金，所以与日本利害关系相同的法国应提供必要的资金，同时负起全面管理朝鲜的责任。以上是计划的概要。（彭泽周《自由党和法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联合》，载《历史学研究》第265号第20页，1962年6月）

220 后藤在9月下旬又去拜访法国公使。据公使向本国提出的报告，后藤当时说：

如果法国能够提供必要的资金援助朝鲜，我立即向金玉均和朴泳孝派遣使者。这两位将向国王陈述他们关于此事的意见。这样的话，我们将立即起草我们的计划，完稿后请国王批准，随后我们就实行。这项计划的要点如下：我们组建一支朝鲜人的军团，由这个军团将长期留在京城[汉城]的清兵赶走；我们把支持中国清政府的大臣们排斥出去，在朝鲜建立正规的行政组织，这个行政组织的细节正在拟定之中。（彭泽周《费里内阁与日本》，载《史林》第45卷第3号第50—51页，1962年5月）

据《自由党史》称，后藤当时向法国提出借款100万日元。法国

公使说："从职权上我虽不够代表法国政府参与此事，但我可以以一个法国人的资格将此事知照我在巴黎的银行家亲友。""板垣和后藤深表谢意后辞去，等待成否的消息。几天后，法国公使馆秘书多特梅尔带着巴黎的回电，乘马车来到小林樟雄的寓所芝兼房町的金虎馆，在门外就喊叫'这回好了，太好了'。他首先报告好消息已到，然后说：100 万日元的汇款随时可以由银行汇来，请大家着手准备行事。后藤高兴得手舞足蹈，预定由竹内纲担任出纳，密令部下纠集壮士，日日夜夜为出航做准备。"(《自由党史》下卷，第 347—348 页)

后藤等人开始募集壮士。从 9 月 30 日到 10 月 5 日《自由新闻》发表的"国权扩张论"社论是这样说的：考察我国现今的局势，发现人们的热心都集中于国内的事件，而血气方刚的壮年往往有违法的举动，政府也因此多劳心于内事；官民这样均专心于内事，221
使对我国具有重大关系的国权扩张放慢了；不仅如此，官民互相倾轧，又使我国遭到很重的大害；如果政府能使这些壮年有志之士的热心由内事转向外事，并由此大力筹划扩张国权的措施，那就内则可以巩固社会的安定，外则可以博得国利，云云。(《自由民权思想》下卷，第 155—165 页)《片冈健吉先生传》说得更露骨。其中说："今若能使韩国脱离羁绊，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其国民享得我们所信奉的自由，则将使因刑戮而白白死去的壮士长留其义勇之名于青史；即使举事不成，亦必耸动中外的视听，产生促进内政改革的效果。"(第 497—500 页)①

---

① 输出壮士的计划，同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1887 年)中"豪杰客"所述的思想有些类似。"因此，我如能同二、三十万癌患者一起到那个国家去，在事业上做出成就，就要夺取土地，在其上巩固地建立根据地，重新建立一个也可以叫做癌社会的社会。如果事业失败，我也甘心曝尸于战场，留名于异国。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一定产生使国家消灭癌的效果。所谓一举两得之策是也。"(第 85、185—186 页)这位"豪杰客"太聪明了，但不像豪杰，而是豪杰的解说者。

渡韩计划被后藤自己无意之中泄漏给伊藤博文，因而归于泡影。据《自由党史》说，在党解散后的某一天晚上，伊藤去找后藤，劝说后藤入阁，两人在饮酒之中话题转到朝鲜，“后藤不知不觉促膝
222 对伊藤说，如政府肯将此事交给我办，必期奏功，而根绝多年的祸根。伊藤说，君果能担当此任，真是太好不过了。后藤听了之后又进一步说，政府真有此心乎？伊藤说，何必过虑，我一定设法推举君充此大任。于是，后藤便敞开心怀，无所顾忌，把他与金、朴密约之事全盘泄漏出去。并且说，君是加富尔，我只当加里波第[①]好了。伊藤暗自吃惊，且未形于色。随后，伊藤将此事告诉给外务卿井上馨。井上说，这决不可，如此大事岂能托付给在野之士。”（《自由党史》）下卷，第 349 页）（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1 卷，第 352—361 页）

甲申事变　日本政府不得不避开对中交战的危险。比中国海军远处于劣势的日本海军，虽强烈要求政府扩充海军，但在松方的紧缩财政之下，大规模扩充海军终究是不可能的。壬午军乱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减弱了，对韩政策不得不以日中协调为基调。但在今天，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军力大大减弱，正是在朝鲜扶植亲日政权的良机。竹添进一郎驻韩公使，为击退清国在朝鲜的势力，在 11 月 12 日以甲乙两案请示伊藤、井上两参议。甲案是煽动亲日派挑起内乱。“如庙议认为我日本与支那政府的政治方针不同，而无法达到亲睦的目的，不如同支那一战，消其虚傲之心，反而能达到真正的交往亦未可知，则于今日煽动日本党使朝鲜发生内乱，乃是上策。”乙案是只限于保护亲日派。“如庙议认为今天以保持东洋的和局为主，不与支那生事，让朝鲜听其自然发展为上策，则鄙职只能
223 止于设法照顾日本党，保护其不受大祸。”（《日本历史大系》4 第 600

① 这是加藤以意大利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在 1860 年利用加里波第远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胜利，再次将意大利南部并入撒丁王国，并于次年建立意大利王国的故事，以加里波第自居，来表明他要效劳于伊藤。——译者

—601页，坂野润治）

政府11月28日的回训说："甲案的意见不妥，以乙案为好。"但在京城，已着手实行政变计划。11月4日，金、朴等人与日本公使馆秘书达成了发动政变的协议。于是，到11月下旬，后藤就已得到关于竹添公使在京城公使馆庆祝11月3日天长节（天皇诞辰）的宴会上公开表示支持独立派，以及日本公使馆的态度已经改变的情报。另外，还有人告诉后藤，金玉均等独立派与日本公使馆合作，事情会很容易成功。后藤不得不中止自己的计划了。12月4日法国公使在写给本国的意见书中说：

> 到10月中旬，我一直同后藤氏保持着联系。但是，在我要求他们送情报或请他们来解释情报的时候，绝对没有做过任何保证，并始终表示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方法我们均不负责。这样的间接关系，至板垣和后藤两氏为了专门去解决自由党的进步主义的问题而离开东京时（大概是去大阪参加解散党的大会），就完全停止了。
>
> 关于他们以前向我提出的计划，我认为已经没有报告的东西了，但两天前来了两个通知：一个是外务大臣的代理人发来的，其中说板垣、后藤两氏完全是轻薄的人，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根据；另一个是回到东京的后藤发来的，其中说想同公使馆的代表谈话。
>
> ……我接受了外务大臣提出的忠告。即使如此，我也不想不听后藤氏打算向我透露的新的心里话……后藤氏首先向公使馆的代表明确指出，自竹添氏回到朝鲜以后，局势就完全变了…… 224
> "想同法国公使对话而不久以前对中国还有点惧怕的日本政府，现在也终于下决心同这个强国交战了，所以我以前委托公使阁下办理的事情，请不要实行了……"（彭泽周《费里内阁与日本》第56页以下）

2月4日举行政变。虽然发生一些差错，但终于杀死事大党的高官，暂时建立起独立党政权。然而，200人的一中队日本军，被1 500人的三个营清国军打败，竹添公使和日本军死里逃生，跑到仁川，由那里回到日本。独立党的领导者有的被杀害，有的亡命日本。为处理善后，井上外务卿赶赴京城，尽管是出师无名，却迫使朝鲜在开战还是签字两者之间抉择其一，结果签订了《汉城条约》(1885年1月)。同中国的交涉，是4月间赴天津的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与李鸿章进行的。结果签订《天津条约》①(1885年4月)，共三款，其内容为：一、中日同时从京城撤兵；二、今后两国均不派顾问去教练朝鲜军；三、将来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事息后立即撤兵。

清国派新进气锐的袁世凯去朝鲜任驻在京城的代表(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企图扩大支配权，而朝鲜国王和闵妃派则想依靠俄国进行对抗。井上外务卿担心俄国的影响及于朝鲜，便向中国提出将朝鲜置于日清共同保护之下的《朝鲜办法八条》(1885年6月)，但李鸿章没有同意。以后，日本便处于既要避免与中国发生纠
225 纷，又要维持在朝鲜的既有势力的防卫立场②。(参阅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第四章。)

大阪事件 京城政变的真相完全被掩盖起来，所以在国内出现了对中国和朝鲜的强硬论，舆论对政府的对韩政策的有始无终表示愤激，到处出现示威运动、自愿参加义勇军运动或捐款运动。

---

① 在中国文献中，正式名称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亦称《朝鲜撤兵条约》或《天津条约》。——译者

② 一直支持朝鲜改革派的福泽，自甲申事变后便把手从朝鲜抽回。1885年3月他在寄给《时事新报》的《脱亚论》里说："我国与其孜孜于等待邻国开化而共同兴亚，不如脱离它们的队伍，与西洋的文明国共进退。而同支那、朝鲜的交往方式，也不应因为它们是邻国而予以特别客气，只仿效西洋人同它们交往的方式即可。亲近恶友的，不免要与其共享恶名。我们要在心中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40页)

对于《天津条约》，也非难政府的外交软弱。在这种声势中，还在进行一项新的向朝鲜输出壮士的计划。即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矶山清兵卫（有一馆干事）等人，动员原在自由党中最为活跃的关东及其周边地方的壮士，拟把他们送到京城去发动政变。板垣对此表示反对，后藤不久也不热心了。头山满没有让玄洋社的壮士参加。

据《自由党史》说，小林樟雄的意图是：

> 欲扶掖孤弱的朝鲜，保全其独立，就必须彻底清除中国干涉的痕迹。而欲做到这一点，就得先把掌握大权的事大党首领等杀
> 掉，努力将他们一扫而光，让朴、金一派的独立党立于要冲。到这 226
> 时候，一可以一雪我国旗和国民遭受的耻辱，二可以惹起日中韩三国的纠纷，使世局大变，促我人心自奋，而政府在狼狈之余，便不得遇事听听舆论的意见。内治改良之举，可以唾手而行。外则足以仗义辅助朝鲜独立，内则足以扫荡政弊而开创立宪责任制的政治。实是一举两全之策。（《自由党史》下卷，第 356 页）

这是比前年后藤所想的还更加明确的朝鲜改革与国内改革的结合。但它的实施计划，并不像后藤那样从法国借款 1 000 万日元，募集 700—800 名壮士、亡命徒，把他们送到朝鲜作为客卿而实行的妄想的大计划。这是一个把“大井、小林留在日本从事筹款，并等待渡韩后的举事，以推进我国的改革运动；而矶山则为渡韩实行者的首领，新井章吾同志为副首领，由他们率领有一馆生和其他壮士 30 余人，到朝鲜去屠杀事大党”（同上书第 356—357 页）的规模非常小的计划，而大井、小林、景山英等人筹集到的资金，大概也不出数千元。为了筹集资金，还干过行抢的勾当。另外，还在有一馆、稻垣示和石塚重平的家里制造和隐藏过刀剑与炸弹，准备用中国皮箱和送饭提盒来搬运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像那么一回事，但完全没有渡韩以后的行动计划。11 月下旬被政府发觉，至第二年共逮捕 130 余人，其中 58 人被起诉。

壮士输出的名义，简单说来，是援助朝鲜改革，并由此促进日本的国内改革。但这只是名义而已。即使有援助朝鲜改革的意图，但由日本援助的改革，与侵略无异。转变为自由民权运动并扩大了的不平士族的征韩能量，在运动受阻的时候就完全用到征韩上去了。因此，向大陆扩大国权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不管是国权派还是民权派，他们都非难政府对外软弱，要求实行强硬政策，企图
227 渡韩渡清。政府虽然也曾苦心设法加以抑制，但有时也随波逐流。不过，政府还是在为侵略大陆而实行富国强兵之策。因此，当政府开始采取强硬政策时，希望这样做的国权派和民权派，自然要高声欢呼而加入侵略的行列。（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1 卷，第 361—366 页）

第四章　完善体制　制定宪法 228

一　明治十四年政变

积极财政、紧缩财政　1878年大久保之死使政府受到极大冲击，但政府把参议兼工部卿伊藤改任参议兼内务卿，将在国外出游的井上召回就任参议兼工部卿，并从考虑萨长均衡的目的出发任命西乡从道为参议兼文部卿和任命川村纯义为参议兼海军卿，而得以维持局面。加上，参议兼大藏卿为大隈重信，参议兼司法卿为大木乔任，参议兼外务卿为寺岛宗则，参议兼陆军卿为山县有朋，参议兼开拓使长官为黑田清隆，从而形成长州三、萨摩四、肥前二的分配格局。

作为大久保的遗志的殖产兴业政策，以大隈大藏卿和黑田开拓使长官为中心，用1 000万日元起业公债作财源，得到进一步实施，但减轻田赋、内战开支和增发国立银行券等产生了不良影响，结果贸易收支恶化，物价飞涨，而依靠现金交付的定额田赋的政府财政日益窘迫，则使1880年度的预算都难以编制了。1880年2月开始实行的参议与省卿的分离，与修改大隈的积极财政有关。即大
限反对参议与省卿分离，但由他推荐的佐野常民（肥前人）出任大 229
藏卿，从而达成妥协；一直同大隈联手的黑田也反对分离，但以开拓使长官可以例外依然兼任参议为条件，黑田也才同意分离了。后来，伊藤也随出任会计部分掌参议，而与大隈一起同意分离。通过这次改革，大隈（肥前人）、伊藤（长州人）、寺岛（萨摩人）、西乡（萨摩人）、川村（萨摩人）、山田显义（长州人）为专任参议；作为例外，黑田（萨摩人）为参议兼开拓使长官，井上（长州人）为参议兼外务

卿，山县（长州人）为参议兼参谋本部长，大木（肥前人）为参议兼元老院议长。陆军卿为大山岩（萨摩人），海军卿为榎木武扬（幕府旧臣），山尾庸三（长州人）为工部卿，河野敏镰（土佐人）为文部卿，佐野（肥前人）为大藏卿，松方正义（萨摩人）为内务卿，田中不二麻吕（尾张人）为司法卿。

大隈在这年5月建议政府在整顿行政财政和抑制劝业的同时募集5 000万日元外债，以即时全部收回不兑换纸币，实行可兑换货币流通制度，维持至今实行的积极财政和殖产兴业政策，但因阁议分裂而未能实行。赞成募集外债的，有大隈、黑田、西乡、川村、山田、榎本、大山和田中；反对的，有伊藤、井上、山县、大木、松方、佐野、河野和山尾；寺岛是“对此尚无定见”。萨派的政商五代友厚在8月提出的“地租米纳论”（以米交纳田赋），也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作出决定。即黑田、西乡、川村、寺岛、大木、山田、大山、榎本、田中赞成，而大隈、伊藤、井上、山县、佐野、山尾、松方反对。于是，政府在9月只好赞成大隈、伊藤制定的紧缩财政方针。一直与黑田携手推行积极财政的大隈现在摇身一变，协同伊藤、井上制定紧缩方针的方案，虽然值得注意，但如后述，大隈并没有放弃积极政策。井上和松方原来是紧缩论者。但他们还没有定出紧缩的具体方案。各
230 省强烈反对削减它们的预算，调整预算的工作极难进行。

大隈和伊藤在11月联名提出“设立农商务省的建议”。建议说，为节省经费和简化工作，“将各省分管的事务中关于农商的事务集中于一省”是当务之急，应当把主要目标放在“农商管理”上面，而不要放在“劝农劝商”上面。

> 作为劝农劝商的实务或者说是作为农商事务局的第一要务的农商管理事务，是制定广泛奖励和保护农商的法制，而按一定的规则完全公平和不偏不倚地诱导农商，现已是次要之事，因为如政府稍稍逾越奖励和保护的范围而自办各项事业，或向农商

> 贷款而随即干涉农商的经营，或仅仅庇护几名农商并以其成绩作为他人的模范，均不免不知不觉地要遭到欲与一般农商争利的嫌疑。因此，应当一变过去的办法，以农商管理的事务为主（梅村又次、中村隆英编《松方财政与殖产兴业政策》第 243 页）。

明治 14 年(1881 年)4 月，设立了农商务省。而在 1880 年 11 月，就制定了关于因废止官营和向民间出售官产而向民间出售官营工厂的通则。本来官营产业在引进西洋先进技术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在经营上一般都亏本，所以成为紧缩政策点名批评的对象。

于是在 1880 年 10 月，五代就同大藏省书记局的前田正名(萨摩人)一起，为扩大直接出口而着手计划召集大阪财界人士成立关西贸易会社，并得到大隈和佐野的支持。翌年 1 月下旬，伊藤、井上、黑田联合起来，后来又加上西乡、五代、前田等人，他们好说歹说终于说服坚持保存开拓使的黑田，使黑田答应了将开拓使的官产出售给五代等人。五代是大久保的亲戚，又是黑田的先辈。6 月， 231
五代等关西贸易会社的干部赴北海道视察。在札幌得到黑田的默契，将政府投了 1 400 万日元资金的开拓使经营事业，共折价 38 万日元卖给民间，民间分 30 年付款，不计利息。后来，黑田和五代等人在东京香雪轩聚会，写成了向民间出售官产的请愿书。简而言之，是关西贸易社会取代开拓使进行殖产兴业和扩大贸易的工作。萨派的主导观点也是这样的。在 7 月 30 日天皇出发巡幸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向民间出售官产的决定。

宪法问题、大隈密奏　在政府面临走投无路的积极财政而陷入混乱时期，1880 年 4 月又遇到国会促成同盟提出设立国会的请愿书，所以政府也需要就设立国会问题确定自己的态度。岩仓的《座右日历记录》这样写道：“关于宪法问题，此时三大臣正在磋商。原来在圣上即位之初，就曾以五事誓于神明；在明治 8 年，又颁布了关于实行立宪政体的圣诏。因此，开设了府县会，使人民得到参

加本地政务的权利。然而，国会论日益盛行，如再拖下去，皇室的安危亦难逆料。三大臣约定，应根据国体迅速制定宪法。”(《岩仓具视关系文书》第1卷，第94—95页)这里的论点，同自由民权运动的请愿书所说的一样。

232 早在1879年12月，就随山县的意见书的提出，而要求各参议提出各自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黑田和井上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黑田在第二年即1880年2月提出了《开设国会尚早意见案》，认为“谋国益在于兴物产，而兴物产在于劝诱农工商卖各业”。他主张设立专管的省以完善殖产兴业政策，坚持实行依靠增发纸币和发行公债的积极财政。殖产兴业是对民权家的除虫剂。“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竟相开发产业的时候，让无赖不平之徒空发无用之论，从事不急之务的人慢慢消耗他们的势力，而使实用的人材去发迹吧。”井上7月提出的意见书与此相反，他认为维新以来实行的殖产兴业政策已以失败而告终，而为了打开财政恶化的局面，必须“顺应舆论之所向开设国会，以使政府的组织一新，确立政府之所据”。“认为世人的知识迟迟不进、人民幼稚、开设国会尚早等怨言，其实是迂腐之论。今日之人民已非(明治)六、七年之人民，而人民舆论之所向早已敢于冒犯权威，故不可逆舆论而行。”他还暗示，开设国会之后，就会出现像英美两国那样的“在更迭为政者时两政党轮流交替、一进一退、主客相安地交代政权的”政党内阁。这是针对黑田的积极财政、国会开设尚早论提出的紧缩财政、早日开设国会论，同民权论者的主张十分接近。还有12月提出的伊藤意见书，它没有说开设国会。具体的提案只有三点：“请改革元老院，选华族、士族为元老议官”；“请设公选的检查官”；“请由圣断来定天下的大事”。

据福泽致井上和伊藤的书信载，大隈、伊藤、井上这三位实力者，在前年12月下旬曾一起在大隈家里同福泽会谈，委托福泽发

行政府新闻。福泽说等以后再定而离去，但第二年即1881年1月，福泽想拒绝委托而去访问井上，当他谈到“如果不是出于政府的决心，而是您特意来找我商量，那我就只有拒绝”时，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井上立即改变面容，严肃地回答说：“既然这样，我就明告诉你，政府有意开设国会。”福泽不胜赞赏，随即问其主要精神，井上答复的同民权论者的主张一样。井上说：

> 国会绝对得设立，不设立不行。在今天看来，明治初年之有 233
> 五条誓文，决非偶然，即誓文符合了当时的形势，而后至今，明治政府也以会议主义组成，先辈木户、大久保诸氏为国尽瘁，其目的也只在于此。而且我早就说过，我并非完全反对萨长藩阀，但它不可能存在于任何时候，如硬要它存在下去，则政府的更迭难免使用刀枪。这是最可悲的局面，所以我们现在决心设立国会，而且毫无爱惜本身地位的念头。不管哪个政党进入政府，只要它得到多数民心的拥护，我们就一定把政府让给它。请按这种精神在这次办的报纸上正大光明地挥笔立论。本来政府无须有国会亦可很好施政，所以也未必硬要开设国会。但是，请你看看现今政府的内情，不管是计划一项事业，还是实行一项事业，都靠我们三个人（指大隈、伊藤、井上），鹿儿岛出身的参议们无异于傍观者。只作为傍观者也好，但事关他们的利害时，他们就不跟着你走了，站在那里屹然不动。他们的势力决不弱小，所以拖延施政之事不胜枚举，而让他们同意开设国会亦非易事。比如，某参议说，开设国会是一百年以后的事，另一参议说，那是30年以后的事。他们真是把话说绝了，但你早晨去跟他们谈谈，晚上又去跟他们说说，得到同意之日亦非太远……总之，这件事情是我同伊藤、大隈两氏策划之后定下的信守不逾的诺言，所以万万不能更动。把如此大事向外公开之后，三参议决不会出卖你福泽，而你福泽也不应欺骗我们三人。这完全是道义上的诺言，比写出书

面证据还可靠。如对此仍有怀疑，你可找大隈去打听，以进一步证实此言不假。我生来就对如此大事从不违约，等等。（《福泽谕吉全集》第17卷，第473—474页）

福泽听到这里非常感动，说他至今不知道三位有这样的决心，而今知道了，真想高呼明治政府和日本国万岁、万万岁，而他福泽也本来就想为国尽一臂之力。于是，当即答应为政府办报。随后，
234 两人畅谈起来。福泽说，如果自由民权派主掌政府，谁会当外务卿呢？谁会出任内务卿呢？那时，你井上君会怎样呢？你就要成为落第之人了，没有当上国会议员去出席会议，也不能在国外交际方面发言了。总之，什么好事也没有了。福泽最后说："如您早就知道的，谕吉向来对政治没有兴趣，而今可以从远处看上一场活报剧了，等等。两人畅谈很久，欢尽而别。"在转年1月中旬，井上在去参加热海会议前两天，前去拜访福泽，嘱咐他办报。福泽欣然答应，随后问井上：

……接着，由谕吉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大、伊、井三君之交如漆似胶，但争权乃是人类不可免的常情，如今后有朝一日开设国会，其时某一位升为首相，而另外两位有了俗话所说的大材小用的感觉，这就令人十分担心了。于是我问三君之间的关系如何，井上君笑着说：福泽君，你太多疑了，我们三人是立誓共谋大事的人呀，三人之间始终没有可以引起不满的多疑，虽说我们的誓言已如此坚固，但在经济观点上，我多年以来就与大隈不同，所以我们两人过去就当面约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各走各的路，不必强求一致；另外，我们三人还特别约定，对同一观点表示同意之后，也可以随时改变，所以我们三人之间有时不免发生不和，何况也有使人发烦的大材小用之感等呢！我这个人，自壮年时起，可以说是各种小事都能做，所以不管叫我担任什么职务，我都接受，而现在当任大书记之职也不觉得苦。唉，说这些干

什么呢！现在，我正忙于说服鹿儿岛帮。已经是大年三十，我那天还几乎终日在川村家说法，政治家也够忙的呀！等等。（同上书，第474--475页）

大隈与伊藤、井上之间的隔阂，始自大隈的密奏问题。大隈的意见书迟迟没有提出，于是左大臣有栖川宫前去催促。大隈希望用口头叙述，而有栖川宫要求用书面写出，结果以不向他人传阅为条件，大隈提出了意见书。意见书是由福泽的门下矢野文雄太政官大书记官执笔的，其内容是主张大胆采用英国的政党内阁制，提出过 235
两年（1883年）就设立国会的激进论。有栖川宫把这份意见书拿给三条、岩仓看了。这大概是5月下旬的事。岩仓对意见书的激进内容感到吃惊，于是秘密叫来井上毅太政官大书记官，让他看完意见书后下令研究。井上毅在6月中把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意见书和对大隈意见书的反驳书送给了岩仓。6月下旬，又为岩仓起草了一份“大纲领”。岩仓据此确定了自己关于宪法的意见，打算委任伊藤起草宪法，并让伊藤看了大隈的意见书。

伊藤“内借一读”大隈的意见书而开始写自己的意见书，是在6月27日。第二天，岩仓将几天来三大臣秘密商议的结果告诉给伊藤，说他已命令井上毅收集宪法方面的资料，过些天就传阅收集来的资料。经井上毅一再要求，伊藤在7月2日写信给岩仓说，“熟览了大隈的意见书，但对他的急进论甚感意外，而鲁纯的博文之辈亦无力随其骥尾，并且观察现在和将来形势的着眼点也大不相同”，从而表明了辞意。伊藤所以明确了他的强硬态度，大概是因为他决心要起草一部普鲁士式宪法。岩仓劝伊藤息怒，并于4日去拜访大隈，谈完伊藤激愤之事后告诉大隈，如在意见上没有太大的不同，可以向伊藤解释一下。同一天，大隈便到伊藤处去道了歉。伊藤谴责大隈辜负了多年来的友谊，想要自己拔尖。但在5日，伊藤又当面怒斥了大隈，说他主张从各省卿到宫内官一律实行民选（成

为"政党官")是将君权交给人民,向左大臣密奏大事是极轻率之举,身在参议的重职而当福泽的代理人实在可笑,等等。伊藤把他要说的话都说了。但他们还没有到决裂的地步。岩仓在伊藤和大
236 限之间斡旋,认为两者已经冰释,于是在7月6日到京都休假去了。

这期间谁也没有想要把大隈逐出内阁。不但如此,大隈还从3月到4月初再次提出发行5 000万日元内外债的建议,企图再回到积极财政的轨道上来;进入6月又成功地说服了伊藤,在1881年度预算执行的末日(7月末),大隈和伊藤联名向内阁会议提出发行公债的建议,并在8月1日被通过。大隈的这种卷土重来做法之所以能被内阁会议接受,是因为主张紧缩财政的井上馨3月以后离开东京去养病了。

井上馨在宫岛(广岛)休养,洗海水浴。井上毅到那里去进行说服。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井上馨关于宪法的意见,才突然由英国型改变为普鲁士型。他在7月27日写给伊藤的信里说:

> ……其实,英国的政体也未冠以 constitutional(立宪的)字样,但它实际上比美国的共和政体更适合于英国,它的其他不可仿效的习惯法亦然。实际上,今日的洋学者以学习英、法之学的居多,所以认为英制最好,而不知其不可移用于他处的理由。福泽等亦然。故愚以为,赶快学习德国之法以定我国的宪法,乃当今不可失的良机。(《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等1卷,第165页)

于是,岩仓、伊藤、井上三人便定了采用普鲁士型宪法的方针。另一方面,福泽开始了大隈、井上、伊藤委托他办的报纸的出版发行准备工作。于是,福泽的门生们忙了起来,东奔西走,展开声势浩大的游说开设国会的运动,弹起了"尚有开弹的有弦琴"。福泽在写
237 给小泉信吉、日原昌造的信里这样说道:

> 到处演说,一些所谓初出茅庐的书生,作法甚不妥当。近来,

他们走过县厅前辱骂县官,最严重的是有人发言时以老子自居。实际上,演说也只是发号施令,这是一个很坏的征兆。这样下去,事情将很难收拾,希望同你们好好商量商量。还是废除条令吧,否则,又得大费周折。以上,不知是否有当,尚希谅察。(6月17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7卷,第454页)

据说,前几天,波多野、高木、高岛三位去京都与摄津一带,须田、津田兴二、矢田绩三位去三尾州一带演说,真是盛况空前,场场爆满。高木喜一郎等在大阪演说时,人们称赞他们真是好样的。又,当他们去伊势的津时,经在津的酒井良明、堀省三、永田一茂安排,开了演说会。在演说的头一天,一个帮忙的人发表公告。他穿着麻布上衣和下衣,站在人们面前敲打木板,告诉人们现有东京交询社的大人物高木喜一郎先生、波多的承主郎先生、高岛小金次[治]先生联袂屈驾来我处,拟于明天何时在何地举行大演说会,等等。他的声音洪亮的话语一落,立即敲起大鼓,到津的所有大街小巷去宣传。世间就有这样荒唐而又有意思的人。(7月8日。同上书,第457页)

向民间出售官产问题、舆论沸腾　这样,在1881年8月初,三个重要问题有的已经落实,有的正在落实。这就是:第一,大隈由紧缩财政向积极财政的再转变建议,在8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第二,岩仓、伊藤、井上三人联合反对大隈和福泽,基本上确定了采用普鲁士型宪法的方向;第三,黑田、五代向民间出售北海道官产的计划,在7月30日的内阁会议上正式通过。

然而,从7月26日开始,《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和《邮便报知新闻》对向关西贸易会社出售开拓使官产一事进行揭露和攻击;8月中旬,《朝野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又使这一揭露和攻击与要求开设国会的运动结合起来,于是舆论立即沸腾起来,进而向批判积

极财政方面发展。8 月末,政府已不得不考虑中止向民间出售官产
238 的问题。西乡、川村、大山等一再说服像被集中的炮火打伤了的狮子而猛吼的黑田,才得以在 10 月初使他说出了无论是出售还是取消均听从圣断的话。

让黑田这样说,是为了要搞垮大限。尽管积极财政的失败责任在于大限,但炮弹并没有打他。而且,他是尽快开设国会论者,因反对向民间出售官产而受到过舆论的表扬。黑田、伊藤、井上对大限、福泽、三菱在互相勾结,一直深信不疑。大限在出任大藏卿时期就与三菱亲近,而如果向关西贸易会社出售开拓使的官产,三菱在北海道的贸易就要受打击。再有,福泽创办的庆应义塾向三菱会社、新闻界、大限的部下输送了很多人材。最后,三菱出钱资助反对出售官产运动,福泽的门下到北海道、东北地方奔走游说。

岩仓和有栖川宫都怀疑,搞掉大限是萨长的计谋。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也发出过同样的疑问。但是,只要萨长团结,那被搞垮的只能是大限。10 月 12 日大限被罢免。当时,他一面喊着大久保的名字,一面擦着眼泪。“由于问题变成好像我(大限)要同福泽一起造反,所以伊藤和井上挺起腰板,神气起来,而岩仓等人也没有仗义执言,于是事件的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上卷,第 515 页)

福泽在前引的致井上、伊藤的信(10 月 14 日)中说:“老生不知他失败的原因,只是在今天想起过去 10 月的情形,犹觉得昔日三位之交如漆似胶,而今天却成了政敌,其变化之快何其速也。神出鬼没是政治家的常态,非我老朽书生所能测也。”虽然如此,他还是追问:你们原来是怎样叫我准备出版和发行报纸的啊?另一方
239 面,他对于门下的弹弦活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说:

还有比这更麻烦的事情。近日世间传说福泽与大限联合教唆民间,违背政府的主张,妄唱国会开设论。而更为无稽之极的

是，有人说福泽支援土佐的立志社等，最终要搞颠覆也未可知。这些流言如果是愚俗民间的流言，则无异于犬吠，无须介意。但由于也常流行于宦海，所以几天以来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寒舍投书问询……

再者，从鄙塾出去的人，有的在报刊上或演说中也许发表过诡谲激烈的言论。请对此事详加调查。本塾的学生内外有 500 多人，其中毕业后或就官职，或归商工，或在东京和地方出没奔走而胡说八道的也不少。其中既有善良君子，又有无恶不作之徒，但把这些人的言行的责任都归于谕吉一身，岂非十分无理！……然而，这里有人演说，那里有人出杂志，就说演说的是福泽的学生，出杂志的也是福泽的弟子，而把他们的责任都推到老生的身上，这实在叫人困惑不解。请察知之……（《福泽谕吉全集》第 17 卷，第 477 页）

另在 12 月 25 日致井上的信里说：

最近您请小浦準[鉾]三郎转来的口信，以及以前小泉信吉拜访您时您所说的一切，均已知悉。据两氏称去年 12 月以来，谕吉曾与大隈、井上、伊藤三君多次密谈，但谕吉违背他向井上、伊藤两君所作的诺言。至于违背了什么，据说是两君向来认为应当开设国会和出版发行报纸，但主张渐进实行，岂料谕吉反之，走上急进的道路。其根据是：大隈关于开设国会的奏议，可能是出于谕吉的手笔；三田（须田、津田、矢田）合伙编制的私拟宪法草案，也可能是谕吉之作；三田壮年之辈在京师和外地大放厥词，也可能是出于谕吉的指示；这些活动需要用钱，而出钱的可能是三菱；因此，大隈、三菱、谕吉可能是同穴的狐狸。总之，我以为您是想以可能是三字树立证据……至于大隈的奏议、三田一伙的私拟宪法和他们的大放厥词究竟是对是错，可待他日讨论。你们说谕吉曾参与其事，这有什么真凭实据呢？其 340

所据之处只是可能是三字而已……其实，谕吉出于其浩癖性急，本欲辩解此事的是非，且已自己想出办法，但这样办又有失大人气派，加之我本心祝愿：如果不去辩论是非，即使能为社会带来一日安宁亦好。因此，还是保持沉默吧！……（同上书，第491页）

在把大限排斥出内阁的同时，颁布了关于在明治23年开设国会的诏书。岩仓对定下宪法的制定方针非常赞同，但对颁布关于开设国会的敕谕感到危惧。伊藤在说服10月6日返京的岩仓的信（10月8日）中说：

……关于国会的争论早晚必有结局，但在没有结束之前，明治政府的艰难自然不会消除，而且萨长的中兴辅翼不只归于泡影，并将为后世留下遗患而对不起后世。因此，经过瞻前顾后，拟奏请圣上决定。再者，从现状来看，如无圣上的英断，而由我们磋商办理，即使想出某些良策，亦将如在阴天未能使太阳放出光辉。各方均希望，莫如由圣上颁布一道大令，让威令在晴天白日之下发挥作用。当然，不要在期限的长短上进行争论，如强行争论一、二年，则会失去收揽人心的效果，而且也是失策。愚以为，先由圣上规定在明治23年开设国会，其后既宜缓又宜急。（《伊藤博文传》中卷，第223—224页）

明治14(1881)年政变，产生了三个结果。第一，决定了在9年后开设国会，萨长控制的政府一方面对抗利用这个时机形成的板垣、自由党以及大限、改进党的土肥运动①，一方面又忙于如期制定宪法和完善体制。第二，新就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是与井上外务卿同样出名的紧缩财政论者，他甘冒经济萧条的风险，强行整理

① 板垣是土佐人，他的自由党即是土佐帮；大限是肥前人，他的改进党即是肥前帮。故名土肥运动。——译者

货币。结果米价急遽下跌，自由民权运动的资金来源枯竭；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导致自由党解散的重要原因。第三，停止向民间出售开 241 拓使官产，但并没有废止出售官产的政策。1884 年以后，向民间出售官产成为政府的常规工作，这就是以三井、三菱为首的政商后来发展成财阀的基础。（参阅《日本历史大系》4 第 538--582 页，御厨贵）

政商、三井与三菱 政府的扶植政策，使政商成长起来而发展为财阀。政商虽有三井、三菱、佳友、安田、古河、浅野等几大家，但我在这里只想谈一谈三井和三菱。三井始于德川时代的豪商，三菱兴于明治初年土佐藩士的海运业，两者都是由明治政府的保护扶植和出售官产而成长为政商的。自那时起，三井就与井上，三菱就与大久保和大限，有了密切的关系；引起舆论沸腾的政治斗争，一直是同背后的三井、三菱两者竞争对立结合在一起的。

三井在江户时代经营越后屋吴服店（布匹绸缎庄）和幕府御用两替店（钱庄），王政复古政府设立金谷出纳所（大藏省的前身）向东京、大阪的豪商发行御用金（公债）时，三井率先认购。1868 年 2 月，三井与小野组、岛田组同时被指定为会计事务局的汇兑代理人，受托募集 300 万两会计基金和发行 3 000 万日元太政官札①。在 1873 年币制改革时，成为替座（钱庄）三井组，独自承揽了收购铸币金属和兑换新旧币的业务。这样，三井就起了新政府的财政执行机关的作用，在此期间大捞了一把。在募集会计基金时，三井以说服大阪的 10 家为替店合作为条件，从政府获得向东京汇兑大阪收入的官款并在汇款上交政府期间（2—5个月）无息运用汇款的权利。另外，对币制改革发行的大藏省正金兑换券（可兑换纸币）和开拓使正金兑换券，三井可以自己运用发行额的 20%。 242

1873 年开设的三井银行，资本为 200 万日元，共分两万股，1

① 太政官札是明治元年发行的全国流通纸币。——译者

万股为旧三井组所有，5千股分给三井的9家同族，其余由旧三井组的员工认购。三井银行将本店设于东京，在大阪、京都、横滨、神户设有分店，在其他地方共设26个办事处。虽说是私立银行，但当时也是仅次于第十五国立银行(华族银行，资本1 783万日元)的巨大银行。它们的业务是代管中央和地方的官款以及一般银行业务，但前者的比重特别高。其中也包括纳税贷款组发放的农民贷款。在米谷尚未完全商品化的当时，这是一种为解决多数农民难于用现金交纳田赋，由三井物产协助以米谷为抵押向农民发放的纳税贷款。

1876年设立的三井物产，是井上馨在大阪会议后重新回到政界时，三井接收井上设立的贸易会社先收社改组而成的。新成立的三井物产的交易商品绝大部分为米谷，再加上蚕种纸和茶叶，共占交易额的一半以上。使三井物产日益财源茂盛的，是设立后即从政府获得独家出口官有三池煤矿生产的煤炭的权利。虽然它只按出口额收取2.5%的佣金和分得利润的一半，但出口量却从1877年的27 000吨猛增到1886年的1 830 000吨，即10年间增加了67倍。输往的地点也由上海扩大到天津、香港和新加坡。此外，还向欧美出口生丝和茶叶，往英国出口大米。从1877年到1880年(横滨正金银行开业)间，政府为便于贸易结算和蓄积在外的硬通货，还指定三井物产办理跟单承兑业务，让它无息或低利使用外汇借款的担保金。客商在申请跟单承兑时，也委托三井物产代售其几乎全部的货物，所以也从这里得到了收益。

243 三井还收购官产新町纺织所(1887年)、三池煤矿(1888年)、富冈缫丝厂(1893年)，特别是其中的三池煤矿是官营企业中成绩特别好的，所以在投标时同三菱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另外，在银行业务方面，经井上的推荐，请中上川彦次郎进入三井银行兼任三井组参事，他对三井银行的坏帐进行了清理；在1893年修改商法后

改革组织时，三井银行接受涩泽荣一的建议，采取了合名会社(无限公司)的形式，以使业务向现代化迈进，而成为三井系统企业的后台银行。于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便建立起后来的三井财阀的主要部门：银行、物产和矿山。

再来说三菱。三菱由 1870 年土佐藩将藩营商社大阪西长堀商会连带地面建筑物和 3 艘轮船租给岩崎弥太郎起家。最初只经营海运业，后来逐渐扩大经营范围，到 1873 年命名为三菱商会时，已以东京、大阪、土佐、纪州为据点，特别是在海运业方面，比三井系统的半官半民的邮便蒸汽船会社名气还高。1875 年虽改称三菱汽船会社，采用了公司的形式，但实质上仍是社长(公司经理)岩崎的纯个人事业。

三菱的政商活动，始于承办政府的军事运输。在 1874 年征讨台湾时，政府由外国购进 13 艘轮船，交由与大久保、大隈有关系的三菱运营。只是有记录可查的，三菱在此时期就为政府向台湾运送了 5 600 延人、3 个大队、44 614 包大米、一些货币和其他武器。因此，在政府中的信誉提高，战后用政府托管的 4 艘船开辟了上海航线。后来，政府决定实行以大久保内务卿所建议的“保护与监督民有民营海运”为骨子的海运政策，将征讨台湾时委托三菱运营的 244
13 艘轮船无偿拨给三菱，并每年发给三菱 25 万日元经营补助费。第二年，政府又保证继续发放补助金 14 年，并收购三井系统的因营业不振而倒闭的上述邮便蒸汽船会社的轮船 15 艘，将它们无偿拨给三菱使用。于是，三菱拥有的轮船数，加上原有的 9 艘，已达 37 艘，共 23 000 余吨。当时日本的大型轮船，几乎全被三菱垄断。

然而，开通上海航线的三菱，一开始就遇到了竞争对手：起初是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后来是英国的伊比利亚半岛东方航海公司(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两者都采用降低运费的办法，竞争十分激烈。但

是，政府公布了乘坐外国轮船规则，对三菱进行了援助。结果在1876年，三菱终于在上海航线上确立了主导权，在翌年西南战争期间，除上海航线上使用的船舶外，政府租用了三菱的所有船舶。租来的44艘船同11艘军舰，共输送了兵员58 000人以及马匹、武器、粮秣等。1877年，三菱会社的出租船收入达300万日元，去掉各项费用，估计纯收益为140万日元。因营业用船不足，又购进8艘轮船，总吨数达13 000吨，但购船总支出的110万美元，有80万美元是由政府低利贷给的。

三菱的近海航线，有京滨—阪神线、京滨—函馆线、京滨—新潟沿岸诸港线、京滨—四日市线、长崎—五岛—对州—釜山线、琉球航线、北陆航线、经日本海去大阪—函馆线、小笠原航线等，运输的货物以大米、茶叶、豆类、棉花、油饼等农产品为大宗。从这一点说，三菱起到了促进地方物产的商品化和流通以及形成全国市场圈的作用。

245 然而，对三菱的发展，特别是它的垄断海运，三井进行了反抗。据称每年要向三菱支付70多万日元运费的三井物产，在1880年纠合地方的批发业和船运业，创办了资本为30万日元的东京风帆船会社，但遭三菱反击而失败了。然而，第二年突然发生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使三菱的后台大隈参议下台，以此为契机开始"征伐三菱"。于是，1882年对三菱实行了种种限制，规定它除海运之外不得兼营其他营业，并由政府与三井合作成立共同运输会社（资本600万日元，其中政府占260万日元），与三菱开始了激烈竞争。前面说过，《自由新闻》曾以《打倒海上霸王》等社论大肆攻击三菱。神户—横滨间的统舱客运票价，由当初的5.5日元降到0.55日元。殊死搏斗之后两者必将俱伤，于是在1885年，经政府调停，两者合并为日本邮船会社。会社的资本为1 100万日元（三菱方面500万日元，共同运输会社600万日元），政府保证以后15年内年股息率

不低于8%，不足时由政府贴补。新会社由两个旧会社共接受船舶29艘，总吨位达68 000吨。当时全国注册的轮船共228艘，总吨位为89 000吨，所以新会社是占有全国总吨位四分之三的巨大会社。三菱虽因此使海运从直接经营分离出去，但据说在合并的当时，共同运输会社的股票已有一多半被三菱买去。在这年末，三菱趁会社主要负责人发生内部纠纷在会社里确立了支配权，而日本邮船会社实际上便成为三菱的傍系会社。

向民间出售官产，也为三菱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高岛煤矿 246
（1881年）、长崎造船厂（1887年）、佐渡金矿（1896年）、生野银矿（1896年）之向民间出售，使三菱也把经营范围扩大到工矿业。此外，1895年在三菱合资会社（两合公司）内设立的银行部（资本100万日元），起了三菱辖下的矿山、造船业的后台银行的作用。兼营航运、矿业、造船业的三菱财阀的基础，就是这样构筑起来的。在19世纪90年代，三井和三菱各为自身发展成财阀打下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治政府是扶植财阀成长的装置①。（参阅紫垣和夫《三井、三菱的一百年》第一章）

---

① 幕藩体制是闭关锁国的经济发展的容器，而明治国家则是引进西洋文明与扶植产业化（工业化）的装置。产业的先进与后进的差距越大，而政府又不进行强有力的介入，则在后进国同先进国对抗的过程中就不能缩短差距。在既有的议会君主制下从1780年前后开始由“中产阶级”推进产业革命的英国，成了当时最突出的先进国。在其后的法国，1830年7月革命中成立的“资产阶级君主国”，可以说是其产业革命的扶植装置。一些被圣西门主义的情热驱使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出任路易·菲力浦的大臣，促进了法国的产业化。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在“绝对官僚制”下推行产业化，似乎是在19世纪40年代。在日本，这大致相当于明治政府由19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殖产兴业政策。各国都有自己的“起飞”装置。因此，日本的“起飞”期可以说比英国晚了大约一个世纪，而同法国、普鲁士则大约有50年的落后差距。

顺便提一下，W.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几个阶段》（1960年）认为，由75%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农业型社会开始向工业型社会转变的“起飞”期，在英国是1783—1802年，在法国是1830—1860年，在美国是1843—1860年，在德国是1850—1873年，在日本是1878—1900年，在俄国是1890—1914年。本书只是借用了“起飞”这个富有魅力的术语。

247 二 内阁制度 培训官僚

内阁职权、内阁官制 1883年3月，伊藤博文去欧洲考察各国的宪法。他会晤了柏林大学教授鲁道夫·冯·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去听司法官阿尔贝特·毛瑟(Albert Mauser)、维也纳大学教授洛林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讲课。他在欧停留13个月，有8个月是在德、奥度过的，其间形成了仿效将君主专制与议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普鲁士宪法在日本制宪的构想。1883年8月，伊藤由维也纳写信给岩仓说：

> ……简函难以尽述博文来欧以来的考察细节，但在德国师从格奈斯特、施泰因两位先生学习国家组织的基本知识后，深信巩固皇室的基础和大权不坠至为重要，特此奉报。而今我国的现状，是国人只读英美法过激论者的著作，误信它们为金科玉律，以致几乎倾覆国家，但现在已有了挽回这种局面的理论和手段。愚以为，在贯彻报国的赤心时使其显示效果的最重要方法，是持有使私心没有存在余地的心地。我面向未来十分乐观。(《伊藤博文传》中卷，第296—297页)

1884年归国的伊藤博文，从1886年秋开始正式起草宪法。在
248 这期间进行的重要制度改革，是1885年的内阁制度。以前，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之际，伊藤和井上毅曾考虑实行大规模的行政改革，以引进“近似西欧内阁制度的制度”，但佐佐木高行(土佐人)等宫中派反对，经岩仓调停，暂不引进内阁制度而复活参议省卿兼任制，废除太政官六部而新设参议院，伊藤担任了参议院院长。但是，大臣和参议兼省卿的体制，对处理各省间的纠纷有困难，所以觉得有必要设一持有统御权的总理大臣，以使政务统一和简便。说穿了，就是觉得三条太政大臣虽为人做事诚心诚意，但没有统率能力，特

别是在 1883 年 7 月岩仓右大臣死后政务统一更加困难，所以这时想把三条太政大臣和有栖川宫左大臣一脚踢开，而由萨长藩阀组织政府。

井上馨参议兼外务卿想在这时实行内阁制度。于是与西乡参议兼农商务卿磋商而提出了方案。但是，天皇、三条、宫中派反对全面改革，主张由参议中选出一人出任右大臣以辅佐三条，始终不同意创设内阁制度和反对三条引退。因此，伊藤和井上不得不研究右大臣的补任人选，经研究后推荐黑田。黑田也在私下答应了，但天皇和宫中派从“德望”观点出发，对黑田出任右大臣有异议，黑田也就没有去就任。于是，把球踢给伊藤，但伊藤固辞不就。最后，向天皇上奏了包括废止三大臣制的内阁制度案。进入 12 月，三条、伊藤、井上之间就创设内阁制度达成了协议。特为三条设立了内大臣职。撤销工部省，新设递信省。最初的内阁，有长派 4 人：伊藤博文任总理大臣兼内大臣，井上馨任外务大臣，山县有朋任内务大臣，山田显义任司法大臣；萨派也有 4 人：松方正义任大藏大臣，大山岩任陆军大臣，西乡从道任海军大臣，森有礼任文部大臣；此外，出任农商务大臣的谷干城是土佐人，出任递信大臣的榎本武扬是旧 249
幕臣。（御厨贵《明治国家的形成与地方管理》第一章）

至于这时制定的内阁职权七条，据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称，是以普鲁士的 1810 年 10 月 27 日敕令，即所谓海登堡官制为蓝本的。其中的第一条总理大臣作为大臣的首脑，有上奏机要、承旨后统督行政各部之权；第二条总理大臣有考核行政各部的成绩、要求其作出说明并进行检查之权；第三条认为有必要时，总理大臣有权停止执行行政各部所作的处分和下达的命令，然后亲自作出裁定；第五条属于各省主管的工作的法律命令，也要有总理大臣副署；第六条各省大臣要随时向总理大臣报告各自主管的工作情况，军机虽由参谋本部长直接上奏，但陆军大臣亦要将此事报告

总理大臣。这是抄自海登堡官制的。(上卷第 745 页)

据德国顾问罗耶斯勒解释说,1810 年德国的首相制,在海登堡逝世的 1822 年即行废止,其后由各部的长官独自处理主管的政务,只对国王负责。普鲁士没有采用议会政府主义(议会内阁制),所以各部的长官不能方向一致,而且没有人对此加以统辖。俾斯麦也曾叹息自己不能实行各部的长官所不愿意的措施。

另一位德国顾问鲁道夫也作了同样的解释,但他作了两条很有意思的注释。

250 第一、首相虽然无权向直接隶属于国王的各部大臣下达命令,但实际上可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影响。

> ……因此,首相俾斯麦侯爵常对议会发牢骚,说他的职权太小。但是,首相在他的内阁里自有其影响力乃是常理。实际上,内阁大臣是内阁精神的代表者。内阁完全是按照首相的奏议组织起来的,所以首相在遴选各部的大臣时,自然要选任与自己的政见一致的人。本来出任首相的人应该受到国王的特别信任,又对国王具有特别的影响力,也是常理。因此,首相虽然没有向其他大臣下达命令的权限,但对他们具有特别强大的威力。另外,首相的职务所在,全在于统一各部大臣的行动,防止他们倾轧。(上卷第 752 页)

第二、普鲁士国王是能动者,亲自指挥政务,所以他不必为了维持各大臣的政务统一而赋予首相以巨大的权限,但英国的国王只是一个牌位,不是能动者,所以为了维持各大臣的政务统一而必须赋予首相以优越的权限,或者使内阁采取合议制以抑制各部大臣的各自为政。另外,在像普鲁士这样的王国,当国王是庸碌之辈而无能力管理政务时,也不得不赋予首相以优越的权限,或者使内阁采取合议制以抑制各部大臣的各自为政。在励行改革时或出现对外危机时,也需要扩大首相的权限或强化内阁合议制。

> ……在1810—1822年间普国的首相海登堡氏为什么被赋予高等地位，法国拿破仑大帝的国务秘书为什么占居高等地位，而现今日本的总理大臣为什么没有高等地位，以及为什么不允 251
> 许日本的各大臣占有独立的地位而让内阁使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鄙人要注意研究的问题。（上卷第755页）

是实行君主专制呢？还是设置强有力的首相呢？或是实行内阁合议制呢？关于内阁的职权，后来是仿效海登堡官制规定了很强大的首相权限。这是不是受了德国顾问的意见的影响，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对于一个因藩阀之间倾轧和各省不断要求增加预算而陷入慢性的调整困难的政府来说，很大的首相权限也许是有吸引力的。然而，规定了很大的权限，并不等于可以产生强有力的领导能力。

因此，井上毅就似乎对于内阁权限中规定很大的首相权限有疑问。1887年，他对罗耶斯勒和毛瑟提出质疑说："要使普国保持1810年的制度并由首相支配内阁，这个内阁就必然同英国一样将要采取共同责任制，而其结果则是走向议会内阁。现就上述这一点向您请教。"为什么提出这种质疑呢？大概是因为他觉得如果海登堡与格莱斯顿在某个地方结合起来，就将产生理论上的混乱。但对井上来说，恐怕还是因为他认为，如要维持一个超然于帝国议会之上的内阁，从因果关系的考虑出发，就必须既排除受制于议会内阁制的那种首相，又排除共同责任制。那末，结果怎样了呢？在1889年规定的官制中，首相对各省的统制权大为减弱，而且也没有采用共同责任制。

明治宪法上连内阁的字样也没有。第55条只规定"各国务大臣辅弼天皇，向天皇负责"，也没有区分总理大臣和各省大臣。于是，伊藤的《宪法义解》（原案由井上毅执笔）解释说，各大臣各自辅弼天皇，他们之间"没有连带责任"。"盖总理大臣、各省大臣均由天 252

皇选任，故各相的进退亦全出于圣断，首相既不能左右各相，各相亦不得系属于首相。”其理由是：“它（连带责任）的弊端将会因结党相援的力量，而最终发展到左右天皇大权的地步。此为我国宪法所不取。”但接着又说：“至于国内外大事，皆关系到政府的全局，非各部所专任。但谋猷划策必由各大臣协同办理，不得相互推诿。此时，必须使各大臣处于全体负责的地位，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本分。”（第88页）一方面是首相没有特别的权限，另一方面是各大臣没有连带责任，但却说要全体负责。这种暧昧的权限关系能不能维持内阁的运作呢？这大概只会使意见对立而相煎。而且相煎下去，不但不能维持运作，反而也许愈煎愈烈。内阁的实际状态，是保持了藩阀的力量均衡。不管怎样对立，萨长的共存都是不可少的；不管发生什么纠纷，除了调整以外另无办法。只要相互认识到这一点，政权就会维持下去。宪法的起草人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对付将要进入议会的自由民权派。（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等5卷，第19—30页）

官员与藩阀　藩阀支配的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也逐渐使官僚制完备起来。据《帝国统计年鉴》资料，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总数，由1876年的23 000人增加到1885年的99 000人。1885年建立内阁制，第二年的官员总数锐减为55 000人，随后又渐渐增加，到1890年达到66 000人。增减的原因，无法知其详。任用制度经
253 常改变，统计的方法也有变动，所以这些数字不一定能反映人员的实际增减。

官僚体系的轴心是内务省，它的官员人数增减幅度极大。在中央机关的官员（判任［荐任］以上）总数中，内务省官员的比重由1880年的11%锐减为1881年的4%，这恐怕是新设农商务省的结果。以后内务省官员的增加，是因为增设了集治监（重刑犯监狱）和假留监（轻刑犯监狱），这大概是为了对付自由民权运动。警视厅的官员由1880年的1 775人增加到1882年的5 118人，约增

加两倍。这是顶峰。如把内务省和它统辖下的府县厅加在一起，其官员总数在1880—1885年间占全国官员总数的一半强，在1886—1890年间占三分之一左右。

府县厅(地方官厅)的官员数，1876年约为7 000人(占全国官员数的30%)，1880年为11 000人(占31%)，1881年增加到38 000人(占51%)。但1886年又锐减为17 000人(占31%，可能是由于不再把巡查统计在内)，1890年为20 000人(占30%)。原来为数1 500个前后的警察署(所)，1884年增加为3 000个，1890年激增到13 000个。这是因为设立了派出所和车站检查所，并把它们统计在内所使然。但巡查的人数只从1880年的20 000人增加到1890年的26 000人。

根据《官员录》中的官员出身府县统计，1872年的486名敕任官和奏任官(包括武官)，山口出身者占13%，东京和鹿儿岛出身者各占11%，长崎(包括佐贺)出身者占10%，其他府县出身者均不到10%。3 727名判任官中，东京出身者占22%，静冈出身者占11%，鹿儿岛出身者占6%，山口出身者占5%。1877年，461名敕任官和奏任官中，东京出身者占19%，鹿儿岛出身者占13%，山口 254
出身者占12%，长崎出身者占10%，其他府县出身者均不到10%；4 754名判任官中，东京出身者占23%，静冈出身者占11%，鹿儿岛出身者占8%，山口出身者占5%。东京出身的官员所以多，大概是因为旧幕府的关系和由其他府县迁来改籍所致。静冈大概是因为旧幕臣所致。

19世纪80年代官员的原籍分布资料，可从《帝国统计年鉴》找到很大一部分。敕任、奏任、判任合计(包括武官)，1881年为20 264人。1890年为30 443人，其中东京出身者的比重，由16%直线下降到13%。在这个期间，经常保持在1 000人以上的，只有山口(由6%减少到4%)和鹿儿岛(由5%减少到4%)两县。静冈

由原来的6%减少到1889年的3%,1890年减少到1 000人以下。只按敕任官统计,1881年为129人,其中东京出身者占24%,鹿儿岛出身者占19%,山口出身者占14%,高知出身者占8%,其他府县出身者均不到10人。1890年为239人,其中东京出身者占35%,山口出身者占10%,鹿儿岛出身者占6%,其他府县出身者均不到10人。

从1880年到1885年的《官员录》来看内务省和若干府县的官员原籍分布,一般可以说几乎没有藩阀的色彩。出任地方高官的人,均以乡党或其他故旧和在当地发现的人才为心腹。这是与藩阀领导人的心腹网性质相同但规模小的心腹网。一些高官带着这样的心腹网,而历任省、司和3府40县的首长以后,就把这种关系网扩散到各地,使官吏的原籍分布呈现离散性分布。但不管在哪一府县,七等属(文官)或七等警部以下的官员,原籍为本府县者占压倒的多数。他们都是府县厅在当地任用的。

从全体来看,在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央官僚(文武官)的
255 上层(敕任官)原籍为山口和鹿儿岛的有三、四十名,占总数的10%。加上迁到东京改籍的,原籍属于东京的也不过70人,占总数的30%左右。再把高知的和佐贺的加上,也不足100人,还不到总数的40%。虽然在最高层还有藩阀的色彩,但越往下这种色彩越薄(就是内务省本省也是如此)。中央机关约30 000人的判任、奏任官员的出身原籍,呈离散性分布。地方机关的官员人数(判任以上),各府县虽有不同,但平均计算,1880年每府县有100人,全国总数不到5 000人;1885年每府县有300人,全国总数为12 300人,1890年也大致如此。他们上半部的原籍分布是离散性分布;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之间虽有人员交流,但他们下半部的原籍多为本地,而且比较固定。中央机关的约30 000人和地方机关上半部的6 000人,是为数约36 000人的浮草官僚层。这个浮草层的上

层，不断加入藩阀集团而进入藩阀系列。

官僚制最上层的藩阀出身者的人数，虽然可以计算出来，但居压倒优势的情况并不多。然而他们可以团结联合起来垄断政权。萨长联合是他们的中心，而土肥参加进来使中心加强，占据政权的中枢后，便使藩阀可以再生产了。但这个再生产却使藩阀的分布日益离散。就是说，藩阀的领导者虽然热心扶植同乡，但也不拘出身原籍广招人材，而非藩阀出身的人也就有了投靠藩阀而发迹的机会。这些非藩阀出身的人加入藩阀系列，只会使藩阀的原籍分布离散化。这样继续下去，不久以后藩阀就将消灭。特别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后面将要叙述的法律系大学毕业生，通过高等文官考试陆续进入了政界。他们是一个按毕业届次和成绩好坏划分的集团。由此而产生的原籍分布离散化，也大概为制度化所促进。

其次，也可以根据《帝国统计年鉴》，对官员的阶层属性作简单 256
分析。从1884到1899年，官员人数从36 000人增加到54 000人（其间有很大起伏），但华族所占的比例一直在1%以下（在90年代为0.3%上下）。士族的比重由71%降到58%，而平民则由29%升到42%。按敕任、奏任、判任划分来观察，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判任层占压倒多数的平民，逐渐升入了奏任敕任层。（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第20—29页）

培训官僚、任用制度　除少数到外国留过学的以外，19世纪70年代的官僚，都是经历过藩制改革或通过地方官和警部等实地训练而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术，而成为能干的人的。任何部门还没有培训能干的官僚的专门教育设施，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相继出现一些乘洋学热的浪头教授洋学的私塾。最早的是福泽塾，它在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据文部省的调查，在1881年有教英国学的私塾54处，教德国学的私塾8处，教法国学的私塾3处，它们全都集中于东京。最大的私塾庆应义塾有学生632名。法律学校，1882

年在东京有 6 所，共有学生 1 000 余人；1887 年依然 6 所，学生总数达到 5 千几百人。（《帝国统计年鉴》）

没落士族和豪农豪商的子弟负笈进京，到私塾和官立各种学校去学习。他们当中出了一些律师和新闻记者，产生了一批地方民权运动家。这些私塾和学校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摇篮，而这些摇篮也同时向官场输送了人材。报刊既是民权记者的据点，又是求职当官者的渊薮。末广重恭的《新闻经历谈》说："当时的书生要想早点发
257 迹，不是去当新闻记者，就是当不成记者而几乎都去投考官吏。"（《明治文化全集》第 14 卷，第 66 页）福地源一郎的《新闻实历史》则说："从明治七、八年到十二、十三年前后，凡是在仕途或世路攀援不成的俊才，都基本上寄身于各报社，以报刊为他们向世间显示才学和发表议论的场所，所以当新闻记者实际上也被视为一种登龙门。于是，一些想向当世发表意见的评论家，也希望报刊成为自己的地盘。这也是报刊在数年之间得到非常发展的一个原因吧！"（同上书，第 12 页）在 1875 年大阪会议后，许多新闻记者进入了政府。但后来在明治 14 年政变时，他们许多人也跟着大隈下台了。

在动乱和无秩序中燃烧起来并促进动乱和无秩序的青云大志，当动乱平息和秩序得到恢复时，又立即为建立秩序而燃烧起来，并在促进秩序的建立。比起大张旗鼓议论天下国家大事的民权家，还是乘坐马车驱驰于大道的官员对人们更有吸引力。于是，天下国家热转变为立身发迹热。这个转换期，即两种热对抗而又混淆的时期，大概相当于从 1873 年的征韩论争、庙堂分裂开始到 1884 年自由党解散这 10 年间。看一看传记或自传中所记的生年，确实感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有一个断层。在这个断层里，有诸如 1855 年出生的田健治郎和犬养毅，1856 年出生的原敬和大森钟一，1857 年出生的伊东已代治和后藤新平。在这以后，经历的模式发生变化，基本上都属东京大学法学部或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毕业型。

例如，1860 年出生的加藤高明（外务省）和 1861 年出生的中桥德五郎（农商务省）。

关于培训官僚的机关，由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而成的东京大学，开设于 1877 年。后来，又把司法省法学校、外国语学校、258
工部大学校合并进来，而在 1886 年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其法、理、文、医四个学部，修业年限为 3 年。法学科（法科大学）的初期毕业生，1878 年为 6 名，1887 年为 11 名，1888 年猛增到 59 名。一直到日中甲午战争，每年毕业生均在数十人左右。

关于官员的录用，按 1887 年文官考试、试用、见习规则，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文科大学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而被任命为试补（奏任官候补）。经文部大臣批准成立的私立学校（特别认可学校）的毕业生，须经文官高等考试合格方可出任试补。1893 年废止上述规则，代此而制定了文官任用令和文官考试规则。前者规定奏任官原则上任用文官高等考试的合格者，从而剥夺了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和文科大学的特权。由此而来的高等文官僚辈出，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后者将文官高等考试分为预考和正式考试，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的毕业生和有同等学力者可以不经预考，但私立法律学校等的毕业生，必须经过预考而后参加正式考试。于是，官僚的培训和录用体系便建立起来了。

登进这个新建的龙门的人们的传记和自传，没有见于前代人的那种经历过维新草创时期的动乱的直接痕迹。其中都是追述考试的及格和落第、成绩的名次和学生生活，而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他们的努力和热情所追求的，不是无秩序当中的机会，而是秩序当中的机会。他们按照确立的官僚制一级一级地晋升了。于是，在明治末期，他们升到了顶峰。（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2 卷，第 30—54 页）

259 ## 三　帝国议会　地方自治制

帝国议会　政府正式着手起草宪法，是在 1886 年秋。井上毅和罗耶斯勒首先各起草案一份。第二年夏，伊藤又在神奈川夏岛参照两份草案，同伊东巳代治和金子坚太郎一起作成《夏岛草案》，后经多次修改和增补，在 1888 年 4 月将最终草案呈给天皇，6 月交枢密院（4 月设立）审议。第二年 2 月审议终了，2 月 11 日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

明治宪法，从其以后的发展来看，有三个值得注目之处。第一，在幕末维新的动乱中政治化了的天皇，作为立宪君主又被“冻结”起来。被神权君主的神话所恭维的天皇大权虽是强大的，但必须有藩阀政府“辅弼”。于是，在政权由藩阀移到政党时，天皇就得对政党保持立宪的态度。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内外危机，又使天皇解冻了。第二，明治宪法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还是设立了对预算、法律有“协赞”权的帝国议会。尽管对藩阀的领导者作了慎重的考虑和适当的安排，但还是慢慢地开辟了由藩阀政治进入政党政治的道路。第三，由于统帅权属于天皇，而保障了军部对内阁和帝国议会的自主性。这样的军部在本世纪 30 年代成了使政党政治凋落
260 和天皇政治化的推动力。

在立法者看来，当前最重要的是帝国议会。本来国会的开设是对付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潮的“大令一发”。立法者最关心的事，是如何抑制想要进入帝国议会并因大同团结运动而恢复了势力的自由民权派，如何对付他们的挑战。帝国议会虽被赋予法律审查权、法律提案权、预算审议权，但初期议会上争执最多的是宪法的第 67 条。这一条规定：“以宪法上的大权为基础的既定岁出，以及由法律的结果产生的岁出或法律上属于政府的义务的岁出，不经政府同

意帝国会议不得取消或削减。”据伊藤的《宪法义解》解释：

> 以宪法上的大权为基础的岁出，为以第一章所载的天皇大权为依据的支出，即行政各部门的官制和陆海军的编制所需的费用，文武官的薪俸及依据与外国签订的条约而发生的费用，也就是指不论在宪法实施之前或之后，已在预算提出之前就已定下来的构成为经常费的费用而言。由法律的结果产生的岁出，指议院的费用、议员的年俸补贴、各种恩赐养老金、依法规定的官制的费用及薪俸之类而言。法律上属于政府的义务的岁出，指国债的利息和还本费、会社的经营补助费或贴损费、政府依民法所负的义务或各种赔偿之类而言。
>
> ……所谓既定岁出，尽管它是以宪法上的大权为基础的，但对它的新设或增设，议会仍有议论的自由。而且一经政府同意，即使是宪法上的既定岁出或由法律的结果和义务的必要产生的岁出，亦可在法律和时宜允许的限度内取消和修改。（第112—113页）

也就是说，如经“政府同意”，宪法上的既定岁出，由法律和义务而产生的岁出亦可修改。因政府不同意而无法议决时，如在审议
的途中议会解散，则施行前一年度的预算。宪法等71条说：“帝国 261
议会没有对预算作出决议或预算不能成立时，政府可施行前一年度的预算。”《宪法义解》以1877年美国国会推迟批准陆军预算而未能发放士兵的三个月粮饷为例，说“这是架构在民主主义之上的国家的事态，固非我之国体所可取”。他又以普鲁士从1862到1866年政府不经议会议决而强行执行预算以致引起宪法争议为例，说这是“反常的例子，非宪法之当然。我国的宪法基于国体，酌情度势，而规定在遇到这种变故时以施行前年的预算作为最后的处理”。（第118页）

在追求富国强兵的藩阀政府与主张节减政费和休养民力的民

党互相冲突的初期议会里，宪法的第67条成了争论的焦点，常有预算不能成立和施行前年度预算的事态发生，使政府陷入困境。这种事态的出现，恐怕是立法者没有预料到的。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在1884—1885年制度取调局时代立案的最初的国会规则草案，采取了一种由府县会选举国会议员的复选方法；后来，国会议员复选法案和国会规则案，采取了先由全体有选举权者在郡区选出5名以内的代议人，然后代议人集会再选举民选议员的复选方法。最初伊藤在旅欧期间接受了格奈斯特的建议，所以他的日本适用复选方法的想法相当强。于是在1887年初好像是委托格奈斯特的高足、正要起草当时的市町村制草案的毛瑟，让他起草了一部复选制的选举法。所以说**好像是**，是因为这个草案已经遗失，无法确言。

262 井上毅反对毛瑟草拟的选举法案。其理由是，根据这项法案，似乎会产生如下的弊端：1）地方议会将成为党派在政事上倾轧的场所；2）有压制少数的危险；3）准许国会议员兼任县会议员，将使中央的政争波及地方。这份档案已经遗失，现在只有毛瑟答井上的档案，其中毛瑟列举的复选方法的优点是：为将政治体制的基础置于“熟悉本地方的利害和需要、参加过公共事务并或多或少通晓政务、”“热心谋求经济上的利益”的“可以维护国家的那部分国民”，所以复选方法为好。而且，由此可以不用“世人嫌恶的有限制的（选举）方法”，就能够抑制“贱民的势力”，还可以防止直接选举时产生的“党争”和“煽动”，节省政府和个人的“花费”与“支出”，将节省的钱用于实业，等等。（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下卷，第1074—1075页）

但是，罗耶斯勒在回答井上毅时，却与毛瑟相反，支持有限制的直选方法。他说：

> ……日本国必须实行君主政治，为此需要强大的独立君主

制。因此，国王必须与全体国民相依相辅，以防止可能出现的特权社会的牵制……本来多数日本国民都抱有忠贞勤王的思想。而只是在某些社会、特别是在中等社会，才存有破坏主义或非君主制主义。如让这个中等社会将来滋蔓增长，它就必然使全国人参与国会以抑制国会。经验已经证明，中等社会专汲汲于营利，所以有以自由主义反对国王的倾向，而上等社会和下等社会却自然归向于国王。它们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除指望得到国王的保护和奖励而无所依靠。以财产为基础的选举方法，历来就有弊端。为什么？因为采用这种方法选举时，通常只会使富裕的中等阶级获得巨大的势力。然而，我向来认为法国和德国所实行的无限制的普选办法不当。为什么？因为这种选举办法也要使一点责任也没有的无产的不能自立的贱民参加选举。我要推荐的举选方法，是只限于不霸道的独立的人参加的有限制的 263
普选方法。(同上书，第 1076 页)

为把国会的基础置于坚实可靠的阶层，排除“贱民”或“煽动”的影响，采取复选制为宜，而为抑制自由主义的中等阶级且排除“贱民”的影响，则应采取有限制的直选制。对于这些德国顾问考虑欧洲的情况提出的意见，立案者们最担心的是，中央政界的党争倾轧渗入地方社会。也就是说，他们把着眼的重点放在使议会制度与地方自治分离，把地方置于中央政界圈之外。至于复选制，则有使中央与地方连结起来的危险。从前年秋开始，旧自由党就展开了它的大同团结运动。金子坚太郎的《关于下院议员选举法的意见》，在反对复选制时提到其中的以下几条：

第八，如建立由郡会或町村会复选下院议员的制度而开设国会，则在国会中成为政府的反对党并给予政府的工作以妨碍的人，必与选出议员的各郡村的议会往复通信，互相结为一个党派，在国会会议上反对政府，在郡村的会议上妨害地方事务，在

大小政务的各个方面逞其奸计。这不仅有害于国政，而且必然对全体国民造成妨害。早在明治15年，东京府会议员就曾联络全国府县会的议员，彼此呼应，试图大力逼迫政府。因此，政府在同年曾以第70号布告禁止府县会议员互相往复通信。然而，一旦开设国会，就恐怕难以施行不让国会议员与地方会议员往来之类的禁令了。

第九，就这样的选举对政党提供的便利而言，笼络少数几名郡会议员或村町会议员，使他们按照自己一方的意愿办事，比笼络全国一般人民，使他们按照自己一方的意愿办事要容易得多。
264 因此，如以郡会或村町会为复选的场所，则郡村会可以成为政党在国会一决胜败的场所……最后忘却郡村会的本职而成为选举国会议员的战场。（同上书，第1083页）

于是，在1887年春起草了实行有限制的直选制选举法。其要点如下。

1）选举人资格："第一，日本的男性臣民，年龄满25岁以上者。第二，在编制选举人名册时已把本府县定为原籍，且定居满一年以上并仍继续居住下去者。第三，在选举人名册编成时已在本府县交纳15日元以上直接国税一年以上并将继续交纳者，但对于所得税，要限于在选举人名册编成时已交纳三年以上并将继续交纳者。"但是，华族本人、现役军人、疯癫白痴，还有一定的破产者、犯罪人，均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交纳15日元直接国税为资格，并无特别的理由。选举法立案人之一的林田龟太郎说："为什么要定为15日元呢？除了因为300名议员要有约45万选举人外，另无其他用意。伊藤公何时何处都是渐进主义者。"（林田龟太郎《明治大正政界幕后史》上卷，第175页。）总之，由于有这个资格条件，有选举权者才只有约45万人，相当于人口总数的1%。

2）被选举人资格为"日本的男性臣民，年满30岁以上者"。财

产条件与选举人资格同。对于原籍、现住所未作限制。但是，宫内官、法官、会计检查官、收税官、警察官、神官、僧侣、教师，均无被选举资格。府县郡的官吏，在其管辖区域内没有被选举资格。府县会议员不得兼职。

3)选区的划分，原则上是小选区制。林田龟太郎说：

> 在这次制定选举法时，使我们绞尽脑汁的是选区制。当初，265
> 并不像今天这样全国到处都有政党，所以没有必要考虑地盘关系等。另外，比例代表学说当时也没有确立，所以只要研究一下大选区联记制和小选区制哪一种能适于民意代表，就可以了。当时维新还开始不久，300年诸侯割据的遗风尚严重存在，不仅民俗风习因地而大有不同，就是利害关系各地之间亦有不能相容之处，所以要能真正代表民意，无论如何得用小选区制。于是，我们主张采用小选区制。(同上书，第172页)

规定每18万人选出一名议员，超过18万人时选出两名议员。全国大小716个郡分成257个选区，其中一人区214个，二人区43个。共计300人。从1890年的最初大选来看，有选举权者共453 000人，占全国人口的1.1%，但在东京占全府人口的0.5%，在大阪和冈山均1.3%，在岩手占0.7%，在鹿儿岛占0.4%。议员的人均选民人数在全国为1 515人，在东京为489人，在大阪为1 517人，在冈山为1 802人，在岩手为953人，在鹿儿岛为704人。

4)投票，在一人区为一名单记，记名投票；在二人区为二人连记，记名投票。

此外，为帝国议会将来设立的上院(贵族院)作好遴选准备，而根据1884年华族令规定了爵位制。除随1869年版籍奉还而得到华族称号的公卿诸侯外，对维新以来有功的下级士族出身者也授予了爵位。在旧公卿中，五摄家的家主定为公爵，九清华家的家主定为侯爵，以下的公卿定为伯爵。在旧藩主中，只有德川的宗家(正

房）定为公爵，年禄15万石以上者定为侯爵，5万石以上者定为伯爵，5万石以下者定为子爵，1万石以上旧大藩家老定为男爵。三
266 条、岩仓、岛津、毛利因功勋卓著授以公爵。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的后嗣列为侯爵，伊藤、山县、黑田、西乡、井上、松方、大山等列为伯爵。1887年，板垣、大隈、后藤、胜海舟被授以伯爵。明治宪法的贵族院，除皇族议员和华族议员外，还有敕选议员和多额纳税者议员。

此外，还预定将来把为审议宪法草案而设的枢密院（议长伊藤）改为常设机关，以答复天皇就国务所作的咨询，在国会与政府发生冲突时根据天皇对枢密院的咨询而采取善后措施。被任命的枢密顾问官，大多数为萨长土肥出身。1888年末共有顾问官17名，其中萨摩出身者4名，长州出身者3名，土佐出身者4名，肥前出身者3名，旧公卿1名，旧幕臣1名，肥后出身者1名。（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第149—155页）

地方自治制 政府在筹备开设国会的同时，就忙于建立地方自治制。建立这个制度的荫蔽目的，是对付复活了势力而涌进帝国议会的自由民权派，即政府设计了一种“使民众发扬其公共心并获得参助行政的知识与经验”，同时“不让中央政局变动的余波及于地方行政”的制度。（山县有朋《征兵制度与自治制度的成立沿革》，载《明治宪政经济史论》第24页）1890年2月，山县首相（兼任内相）召集地方官下达了如下的训令。

> ……市町村是国家行政组织的最下级团体，实质上属于国家的基础，而市町村制则是使这种团体在法律的范围内自己治理其内部事务。因此，正确地设立完全自治的团体，发扬自治精
> 267 神，使人民熟练市町村制的公务，逐渐养成从事国事的实力，就会完善立宪政治的根本，巩固国家的基础……
>
> 反之，如果市町村制的实施一旦弄错了方针，则自治制度就

会适得其反，成为党派纷争的工具，紊乱市町村的人心，以至不得不再来收拾。如果真陷入这种境地，则岂能指望切实增进国家的幸福和收到立宪的美果！市町村制实施的效果如何，实有关国家的永远利害得失。不能不慎重对待。据闻，在某些地方，政事党派的倾轧正渐渐波及社会各界的一切事务，交际上、营业上、经济上、教育上几乎很少没有受到影响的，其弊实际上已波及市町村制的实施。该制的实施现已受到政事党派的严重妨碍，不仅没有得到良好的效果，反而被政论狂奔者之流实际上用作竞争的工具，现在正被各派用于互斗。(《公爵山县有朋传》中卷，第1098—1099页)

市制和町村制公布于1888年，并在第二年实施于全国，但为了便于事务自治，以及节省受托管理的征税、户籍等事务的经费，而在全国实行町村合并，将五、六个町村合并为一个町村，于是全国的町村数由1888年末的70 439个减少到第二年末的13 347个。合并的最终目的，是用町村的基本财产收入偿付全部经费而使町村成为“不要公课町村”，但为避免合并时造成纠纷，而设立了财产区，将部落所有财产留给财产区。因此，町村几乎不可能再形成町村财产，结果町村财政不得不大部分依靠町村税。再者，因为允许部落设区和区长，町村会议员实际上都是各自部落的代表，所以新町村不过是以前的部落联合体的扩大。

有权选举町村会议员的，是现在本町村居住二年，交纳田赋或直接国税2日元以上的男子。以纳税作资格的理由是：“不欲将市町村放任给与市町村的兴衰利害没有关系的无知无产的小民”。采用二级选举(市为三级选举)办法，是为“防止出现被穷人的多数控 268
制的弊端”。另外，町村长、助役等町村吏员均由町村会选派，但原则上是无报酬的名誉职。无报酬虽有节省经费的意义，但也发生不是有产者就当不上町村吏员的作用。

至于随后在1890年公布的府县制和郡制，虽然采用了复选制和参事会制，但也是为了把府县会与市町村的名望家族、有产者阶层结合起来，不让中央政界的影响余波及于地方。然而，作为实施的前提的郡合并，进行得并不顺利，在1891年只有10个县对郡进行了合并，3个府和4个县一直没有实施，直到1899年改制（第二次山县内阁）。改制的重点是废除复选制。由于复选制容易把町村会、市会、郡会的纷争同府县会连结起来，使纷争越来越激化，所以改用了使纷争与府县会隔离开的、由交纳国税3日元以上的有选举权者直接选举的办法。但是，改制并没有缓和纷争。（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2卷，第79—83页）

269

四　修改条约问题　大同团结运动

井上修改案　明治政府的外交，是二正面外交，即有对欧美列强和对东亚两面。在对东亚这一面，1873年的征韩论争、1874年的台湾征讨、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1882年的壬午战乱、1884年的甲申事变等，引起了政府的分裂和纠纷，使不平士族、民权派和国权派的大陆挺进论鼓噪起来。结果，1885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使朝鲜的局势处于日中两国争夺而日本的势力一直劣于中国的胶着状态。

在对欧美列强的一面，一直试图通过修改1858年的《安政条约》，使日本获得与欧美列强对等的地位。岩仓遣外使团的任务也是交涉修改条约，但交涉没有成功而只得停顿下来。以后的正式交涉是在1876年进行的。寺岛外务卿着手交涉“收回海关税”权，是直接出于大藏省的强列要求。早在1874年，松方租税头（税务总长）就开始向大隈大藏卿提出必须尽快收回税权。其理由有三项：1)由于失去关税的自主权，我国的贸易经常出现入超；2)平均进口

税率只是从价计征3—4%，关税收入太少，以致岁入完全依靠国内税，财政发生困难；3)实施保护关税以振兴国内产业，减少外国货进口，并有必要完全废除出口税以增进出口。1877年1月，在农 270
民暴动的压力下，将田赋由地价的3%降到2.5%，结果财政更加困难。

交涉首先同美国开始，《安政条约》的部分修改于1878年在华盛顿签字。但是，美国的对日出口每年不过300万日元，数额太小，而且修改时还附有一个条件：如与其他国家的交涉没有成功，则修改暂不生效。同欧洲各国的交涉(因西南战争而推迟)开始于1878年，但英国联合其他国家带头反对。另一方面，由于发生哈特利事件(1877年，鸦片走私问题)和希斯培里亚号事件(1878年，拒绝检疫问题)，认识到只要存在治外法权，就无法得到收回税权的实效。于是出现应首先收回治外法权的议论，而寺岛则于1879年9月辞去了外务卿职。

继任外务卿的井上，从1880年开始以提高关税税率和收回一部分治外法权的修改案分别与各国谈判，但仍因英国的强烈反对而搁浅。后来改变方式，从1882年开始同外国公使团进行修改条约的预备会议(在东京)。于是，在自由民权运动低潮和朝鲜问题胶着的时期，在东京召开了1886年修改条约会议，并于第二年4月拟成了裁判管辖条约草案。这个草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批准交换条约后二年以内，日本开放其内地准许西洋人通商与居住(在内地杂居)，并给以土地所有权、矿山开采权等；亦在这二年以内，日本以“泰西主义”制定刑法、治罪法、民法、商法、诉讼法，且在实施前译成英文送交西洋各国以获得承认；日本的主要裁判所任命西洋人为判事(法官)，由他们参与审理涉及西洋人的一切案件，而在西洋人为被告的案件中，要由有西洋人判事过半数的合议 271
庭审理。

6月下旬回国的谷干城农商务相（土佐人），就这个草案向伊藤首相提出一份意见书，其中说：政府事事"定出适合外人的法律规则以求换取外人的欢心"，乃是连立法权都准许外人干涉的"亡国之兆"。而且，将修改条约这样重大的事情只交由外务省的几个人秘密办理，最为不可。关于修改条约之事，他认为应该是："在立宪政体既已设立的条件下，应由外交官禀承天皇陛下的圣意，根据立法官（议会）的决议，并考虑天下人民的舆论，来开始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后来，谷干城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能被采纳，遂辞官而去。

井上外相大发雷霆，在内阁会议上说："啊，哪个国家有这样奇怪的办理外交之道！"谷这样的人，不是想使外务省的条约缔结权"由皇室取消而移交给立法官（议会）吗"！但内阁会议意见不一，决定无限期延期批准7月末的条约修正案。9月，井上外相饮泣辞职。同时黑田入阁就任农相，这是为了加强伊藤内阁。（参阅井上清《修改条约》第三章）

大同团结运动　对自由党的解散始终表示遗憾的星亨，一直寻找依靠原自由党关东俱乐部复兴自由民权运动的机会。1886年10月在浅草井生村楼召开的全国有志大恳亲会，由于改进党拒绝参加，而使与会者大部分是原自由党员，但出席者仍达204名，成为党解散以来的一次盛会。星以发起人代表的身份发表讲话说："从那以后（自由党解散以来），人们闭口无语，有如沉睡。明治23
272 年开设国会之日已经迫近，但无起来复兴之兆。回顾既往，皆热心于因小事而互相倾轧，但这样下去最后一点好处也得不到，所以只有去小异存大同。这是此次开会的两大原因。"这段话的主要精神，是面临国会的开设实行大同团结。第二年（1887年）5月，在大阪中之岛自由亭召开第二回恳亲会，正值公判大井宪太郎等人的大阪事件国事犯，与会者共203人。星在会上讲述大同团结的意义，并

为会议的参加者以非原自由党员占多数而高兴。板垣也强调必须为“异想之友”的团结和国会的开设做好准备。

由伊藤首相扮演威尼斯商人，井上外相演出三河万岁[1]，一直闹到凌晨四点的首相官邸化装舞蹈会，举行于1887年4月20日。在大臣官邸和鹿鸣馆为修改条约而多次进行的社交活动的狂态，受到政府内外的非难和谴责，而内阁法律顾问博阿松纳德和农相谷干城的反对意见书一经泄漏，便立即引起巨大的骚动。7月末修改条约虽被迫决定无限期延期，但得到反对意见书的星亨秘密加以翻印，向原自由党分发，号召大家在9月初于井生村楼召开全国有志恳谈会，要求开展以“革新外交政策”、“减轻田赋”和“言论集会自由”为三大目标的建白运动。“革新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革新外交政策”获得关税自主权，向西洋各国的商品课收关税，抑制西洋商品的流入以保护日本的商品；再依靠关税收入的增加来“减轻田赋”。“言论集会自由”，是要求撤销加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各种禁令。

主要从关东、东北、北陆来的会议参加者约100人，回乡后立即发起了建白运动。根据太政官布告的要求，建白书应通过府县厅提给元老院。于是，府县厅连日来门前若市，元老院为整理各府县厅转来的建白书，甚至设立了专任职员。后来，又以向元老院议官直接说明建白书的主旨为由，还组织起代表敢死队上京。到9月中旬，这样的代表据说达到数百人。其中以东日本的代表居多。 273

星亨还把后藤象二郎请了出来。后藤在前年把高岛煤矿卖给三菱，在高轮购置3万坪土地，建起阔绰的宅邸，正居家观测风云。他从9月开始，到东北各地游说，鼓吹大同团结，受到地方有志者的欢迎。他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一语，一举纠合起民间各派以试

---

① 三河万岁，一种类似相声的表演。因最初出现于三河而得名。三河相当于今爱知县南部。——译者

图威胁政府，并于10月3日将各界有名人士70余人请到芝公园三绿亭聚会，不久以后就成立了丁亥俱乐部。后藤出马之后，林有造、片冈健吉、竹内纲等土佐派也大举进京；在京的各府县委员40余人也于10月29日在京桥开化亭集会，约定各地在11月10日以前上书建白；11月15日，又有3府35县和北海道的委员341人在浅草鸥游馆召开了有志大恳亲会。大会的出席者以关东的192人（包括东京的55人）为最多，其次为甲越信①（50人），再次为九州（21人）和东北（20人），等等。改进党的出席者，仅尾崎行雄一人而已。

情势与1879—1880年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相似。领导班子也几乎相同，运动方法也没有改变。但是，以前见于府县府会的反政府气氛减少了。以前，府县会议员和豪农豪商层均卷入了地方政治的纠葛，感染了地方企业热。那么，大同团结运动是怎样把他们动员起来的呢？是把他们的关心引向了三年后即将进行的国会选举。运动的领导者们认为，这个上升气流会把运动托起来。板垣、后藤、星的演说，也曾确实求助于这种关心。

声势浩大的运动进行了三个多月，连日进行部署，历访了大臣、元老院议官和其他官员，向他们陈情，后来作为最后手段，决定
274 要求会见伊藤首相并在他面前静坐。12月26日，星和片冈提出要求会见伊藤。这一天突然"大令一发"，在官报上以号外公布了保安条例，把星等573人驱逐到离皇宫3里②以外的地方。《明治政史》这样写道："壮士的举动越来越活跃，一天比一天过激，有的到宫内省要求大臣接见，有的到元老院向议官提出要求，有的要上书建白而叩有司的大门，而屡屡求见和屡屡叩门而尤未达到目的者，则是热上加热，毫不气馁，其势一天比一天旺盛，以致招来了保安

① 指甲斐（今山梨）、越中（今富山）、信浓（今长野）。——译者

② 日本的一里等于3 927米。——译者

条例的实施。后来京师变为壮士经常横行之所，其源流实来自当年。”（《明治文化全集》第9卷，第530页）

在地方代表中，经常混有数百名壮士，他们手持训练用的木枪到处横行。放火和谋杀高官的计划，埋设地雷之类的侦探报告堆积如山。政府的所为形同戒严。警视厅令半数厅员彻夜值班，陆军省立即增加值宿人员，全东京各主要地点均架起军用电线，陆军医院召集医官为救治伤员作准备。“在夜里11时左右突然派近卫二大队去警卫赤坂离宫，皇宫警察令其警士加强严守皇宫的各门。在京师的各处，无不有宪兵、巡查严加戒备，其中麴町区内警备特别森严，各大臣的官邸不断有护卫巡查和宪兵巡逻，大藏省除有宪兵和巡查外又加派一小队士兵警戒意外，陆海军省的弹药库自不待言，就是武器库也比平时加强十倍护卫，夜间派士兵在周围巡逻。”（同上书，第544—545页）真是如临大敌

大令一发，公布保安条例的政府，又设法强化自己的阵营。275
伊藤首相接受井上的建议，并与黑田农相协商，而请自己的政敌大隈出任外相，让大隈负责修改条约的工作。大隈本来就极想使修改条约达到目的，并以此自负。政府擢任大隈为外相，恐怕还有以此削弱大同团结运动的势力的意图。这也是挤进去拉进来的机制在发生作用。但是，改进党系统根本不是大同团结运动的主力。

继伊藤之后的黑田内阁。在1889年3月又请被称为大同团结运动的眼目的后藤出任递相。板垣也希望后藤入阁。既然大隈入阁了，原自由党的人不是也应当入阁吗！这也是挤进去拉进来的机制在发生作用。但是，大同团结派对后藤表示轻视，起来造反。据《明治政史》称，3月13日，大同团结派的俱乐部火曜会在江东中村楼召开成立大会，出席者50—60人，在表决后藤应否入阁时，以30票对2票否决。随后，后藤来到会场发表演说：“象二郎为承禀

今上陛下的圣意与贯彻大同精神，才自已入了内阁。呜呼，诸君！这其实是象二郎对陛下的义务。这其实是象二郎对诸君的义务。”他希望以此得到大家了解，但“与会的会员怒形于色，没有人鼓掌”。这表明反对者占多数，“所以后藤伯丢下党员们，自己立即回家了。在走出会场回家时，一个人也没有出来送他”。（同上书第 10 卷，第 49—50 页）大同团结运动失去它的“眼目”而解体了。这是拉进来的机制发生了效果。（以上参阅拙著《日本政党史论》第 2 卷，第 95—101 页）

大限修改案　大限外相举全力去解决修改条约问题。他与井
276 上外相不同，拟用一项条约来解决税权和治外法权问题。在关税问题上，他沿袭井上时已接近谈妥的协定即提高税率案；在废除治外法权方面，他对井上案中的任用外人法官和预约编纂法典作了一定的修改，但还没有达到废除的地步。1888 年 11 月定出成案，随后分别与各国公使开始谈判。1889 年 2 月，与美国的谈判达成协议并签字，但与英国的谈判一再搁浅。在此期间，《泰晤士报》公布了 4 月修改案的内容，从外务省翻译局长小村寿太郎处得知这个消息的《日本》杂志，从 5 月开始加以译载。

反对的急先锋，是以《日本》为据点的国权派。6 月 5 日《日本》登出社论《大限伯的政略》，首先评说大限案与井上案相同，说它们都是想以任用外人法官、预约编制法典、开放内地来换取五年后废除治外法权，随后列举事实警告新条约的危险所在。这篇社论在《日本》杂志上连载了数期。进入 7 月，大同团结的一派大井宪太郎的大同协和会向元老院提出中止谈判的建议，接着大同团结的另一派河野广中的大同俱乐部也加入中止论。8 月，大同俱乐部、大同协和会、保守中正派（鸟尾中将等反山县派）、政教社与《日本》社友、九州团体联合（熊本紫溟会、福冈玄洋社）等五个团体联合起来动员有关的报社，在全国各地举行了演说会。改进党虽开展了支持大限和新条约案的运动，但没有造成气候。

还有一个阻止修改的强大势力，这就是萨长藩阀。8 月，英国已表示原则上谅解，10 月政府也以为最近可以谈判完结，但萨长的领导者们除黑田首相以外，却警惕起来，认为大隈修改条约成功会使萨长的势力蒙受打击，大隈和改进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会 277 占居优势。另外，《邮便报知新闻》在为大隈案辩护时曾批判井上案，所以井上农相很恨大隈，并且发了火。于是，他想以拥立 10 月间回国的山县内相为首相的办法粉碎大隈案。黑田首相和大隈外相虽已决心断然实行定案，但 10 月 15 日的御前会议未作出决定，17 和 18 两天的内阁会议也没有作出议决。18 日内阁会议完了后大隈的马车刚到外务省的大门，玄洋社员投了炸弹，随后面向皇宫切腹自杀。大隈被炸掉一条腿。事态急转直下，政府总辞职了。作为善后措施，由三条内大臣兼任首相组阁。新内阁确认修改条约的谈判应以回复对外平等为目的，不应作出与此目的不符的决定，随后向有关国家通知中止修改条约。

大隈的修改案，就这样被把原自由党卷进去的国权派的报纸、害怕大隈成功的萨长藩阀、玄洋社壮士的恐怖活动葬送了。条约的修改是在 5 年后日中开战前不久实现的。对西洋对等化和对东亚强国化这两条路线，从此互相交叉和结合在一起了。就是说，英国为对抗俄国南下，认为必须接近日本。这也是东亚国际政治的结构转换。关于这个问题，容在下一册叙述。（参阅井上清《修改条约》第四章）

参考文献

绪论　幕藩体制

《封建社会の再編と日本的社会の確立》水林彪、一九八七年、山川出版社
《江戸時代》北島正元、一九五八年、岩波文庫
《德川幕閣》藤野保、一九六五年、中公新書
《幕藩体制》山口啓二・佐々木潤之介、一九七一年、日本評論社
《政談》荻生徂徠（尾藤正英訳、《日本の名著》第一六巻、一九七四年、中央公論社）
《増補・ユートピアと權力》二巻、升味準之輔、一九八六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幕末江戸社会の研究》南和男、一九七八年、吉川弘文館
《幕末の藩制改革》田中彰、一九六五年、塙書房
《幕末の長州》田中彰、一九六五年、中公新書
《幕末の薩摩》原口虎雄、一九六六年、中公新書
《幕藩体制と明治維新》大谷瑞郎、一九七三年、亜紀書房

第一部　明治国家之成立

一、通史及び研究書

《日本歴史体系》4、井上光貞・永原慶二・児玉幸多・大久保利謙編、一九八七年、山川出版社
《近代日本政治史》1、岡義武、一九六二年、創文社
《学説批判・明治維新》石井孝、一九六一年、吉川弘文館
《明治維新》遠山茂樹、一九五一年、岩波書店
《明治維新の舞台裏》第二版、石井孝、一九七五年、岩波新書
《黒船前後の世界》加藤祐三、一九八六年、岩波書店
《ペリーは、なぜ日本に来たか》曽村保信、一九八七年、新潮社
《天皇家の歴史》下巻、わづ・まさし、一九七三年、三一書房
《世直し》佐々木潤之介、一九七九年、岩波新書

《日本近代史における転換期の研究》坂野潤治・宮地正人編、一九八五年、山川出版社
《日本政党史論》第一、二巻、升味準之輔、一九六五、六六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岩倉使節の研究》大久保利謙編、一九八一年、宗高書房
《明治維新の土地変革》丹羽邦男、一九六二年、御茶の水書房
《明治六年政変》毛利敏彦、一九七九年、中公新書
《"自由民権"時代》前田蓮山、一九六一年、時事通信出版局
《明治地方自治制の成立過程》亀掛川浩、一九五五年、東京市政調査会
《明治国家形成と地方経営》御厨貴、一九八〇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松方財政と殖産興業政策》梅村又次・中村隆英編、一九八三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明治憲法成立史》二巻、稲田正次、一九六〇、六二年、有斐閣
《明治立憲政と伊藤博文》ジョージ・リアキタ、一九六七年(荒井孝太郎・坂野潤治訳、一九七一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明治国家と井上毅》坂井雄吉、一九八三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条約改正》井上清、一九五五年、岩波新書
《日韓併合小史》山辺健太郎、一九六六年、岩波新書
《三井・三菱の百年》柴垣和夫、一九六八年、中公新書
《日本経済》中村隆英、一九七八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経済発展の諸段階》W.W.ロストウ、一九六〇年(木村健康ほか訳、一九六一年、ダイヤモンド社)

二、伝記・回想録・日記・書簡等

《ペルリ提督日本遠征記》一八五六年(土屋喬雄・玉城肇訳、四巻、一九四八—五五年、岩波文庫)
《ハリス日本滞在記》一九三〇年(坂田精一訳、三巻、一九五三—五四年、岩波文庫)
《パークス伝》F.V.ディキンズ、一八九四年(高梨健吉訳、一九八四年、平凡社)
《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アーネスト・サトウ、一九二一年(坂田精一訳、二巻、一九六〇年、岩波文庫)
《昔夢会筆記——徳川慶喜公回想録》大久保利謙校訂、一九六六年、平凡社
《幕末の武家》柴田宵曲編、一九六五年、青蛙房
《幕府衰亡論》福地源一郎、一九二六年、民友社(石塚裕道校注、一九六七年、

平凡社）
《岩倉公実記》三巻、岩倉公旧蹟保存会、一九〇六年（一九八一年、原書房）
《岩倉具視関係文書》八巻、日本史籍協会叢書、一九二七—三五年（一九八三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大西郷全集》三巻、大西郷全集刊行会、一九二六—二七年、平凡社
《大久保利通伝》三巻、勝田孫弥、一九一〇——一一年、同文館
《大久保利通日記》二巻、日本史籍協会叢書、一九二七年（一九八三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大久保利通文書》一〇巻、日本史籍協会叢書、一九二七—二九年（一九八三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五巻、立教大学日本史研究会、一九六五—七一年、吉川弘文館
《甲東逸話》勝田孫弥、一九二八年、富山房
《木戸孝允日記》三巻、日本史籍協会叢書、一九三二—三三年（一九八五—八六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木戸孝允文書》八巻、日本史籍協会叢書、一九二九—三一年（一九八五—八六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大警視川路利良君伝》鈴木高重、一九一二年、東陽堂
《大隈文書》五巻、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一九五八—六二年、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大隈伯昔日譚》円城寺清、京口元吉校註、一九三八年、富山房（一九六九年、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大隈伯百話》江森泰吉、一九〇九年、実業之日本社
《明治聖上と臣高行》津田茂麿、一九二八年、自笑会（一九七〇年、原書房）
《保古飛呂比——佐佐木高行日記》一一巻、一九七〇—七九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伊藤博文伝》三巻、春畝公追頌会編、一九四三年、統正社（一九七〇年、原書房）
《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九巻、伊藤博文関係文書研究会、一九七三—八一年、塙書房
《憲法義解》伊藤博文、一八八九年（宮沢俊義校註、一九四〇年、岩波文庫）
《公爵山県有朋伝》二巻、徳富猪一郎、一九三三年、山県有朋公記念事業会
《世外井上公伝》五巻、井上馨伝記編纂会、一九三三—三四年（一九六八年、原書房）
《子爵谷干城伝》平尾道雄、一九三五年、富山房

《鴻爪痕》前島密、一九二〇年、前島弥（一九八一年、平凡社）
《川上親晴翁》小原騮馬、一九四二年
《明治大正政界側面史》林田亀太郎、一九二六年、大日本雄弁会
《回顧録》三巻、牧野伸顕、一九四八—四九年、文芸春秋新社
《伯爵後藤象二郎伝》大町桂月、一九一四年、富山房
《旧夢談》林有造、一八九一年（《明治文化全集》第二五巻所収）
《片岡健吉先生伝》川田瑞穂、一九三九年、立命館出版部
《植木枝盛日記》高知新聞社編、一九五五年、高知新聞社
《馬場辰猪自叙伝》馬場辰猪、一八八五—八七年（《明治文化全集》第一四巻所収）
《河野磐州伝》二巻、河野磐州伝編纂会、一九二三年
《杉田鶉山翁》雑賀博愛、一九二八年、鶉山会
《国会開設政党秘話》（《伊藤痴遊全集》第一五巻）一九三〇年、平凡社
《三酔人経綸問答》中江兆民、一八八一年、東京集成社（桑原武夫・島田虔次訳・校注、一九六五年、岩波文庫）
《新聞経歴談》末広重恭、一八八七年（《明治文化全集》第一四巻所収）
《新聞紙実歴》福地源一郎、一八九四年（《明治文化全集》第一四巻所収）
《福翁自伝》福沢諭吉、一八九九年、時事新報社（一九七八年、岩波文庫、《福沢諭吉全集》第七巻所収）
《福沢諭吉全集》二二巻、慶応義塾編、一九五八—六四年、岩波書店

三、记録编纂類、其他

《防長回天史》末松謙澄、一九二一年、国文社
《明治政史》指原安三編、一八九二年、富山房（《明治文化全集》第九、一〇巻所収）
《特命全権大使米欧回覧実記》五巻、久米邦武編、一八七八年（田中彰校注、一九七七—八二年、岩波文庫）
《西南記伝》三巻六冊、黒龍会編、一九〇八年、黒龍会
《元老院会議筆記》三一巻、一九六五—八六年、元老院会議筆記刊行会
《自由党史》二巻、宇田友猪他編、一九一〇年、五車楼
《自由民権思想》三巻、下山三郎ほか編、一九六一年、青木文庫
《明治憲政経済史論》国家学会編、一九一九年、国家学会
《明治文化全集》二九巻、明治文化研究会編、一九六八—六九年、日本評論社
《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二巻、外務省編、一九六五年、原書房

《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戦前期日本官僚制研究会編・秦郁彦、一九八一年、東京大学出版会
《日本帝国統計年鑑》一八八二——九三六年、内閣統計局
《マクミラン世界歴史統計》二巻、B.R.ミッチエル、一九八〇、八二年(中村宏・北村甫監訳、一九八三、八四年、原書房)
《近代日本総合年表》岩波書店編集部、一九六八年、岩波書店
以上所列以本册中所引者为主,没有列出报刊类文献。

附　录

表 1　产业人口中农林水产人口比率(1841—1971)

(%)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	
1841*	22.3						
1851	22.0						
		1856*	51.7				
1861	18.8						
		1866	49.8				
1871	15.3	1871	48.0	1871	53.0	1872*	84.9
1881	13.2			1882*	47.3	1880	82.3
		1886	47.0				
1891	10.7			1895	39.9	1890	76.2
		1896	44.9				
1901	9.1	1901	41.4			1900	70.0
		1906	42.7	1907	36.8		
1911	8.8	1911	41.0			1910	63.0
1921	7.1	1921	41.5	1925	30.5	1920	53.6
		1926	38.3				
1931	6.0	1931	35.6	1933	29.0	1930	49.4
		1936	35.6	1939	26.0		
				[西	德]	1940	44.7
		1946	36.0	1946	29.2	1947	52.6
1951	5.1	1954	27.0	1950	18.7	1950	48.3
1961	3.6	1962	20.0	1961	13.3	1960	32.6
		1968	15.7				
1971	2.9			1970	7.5	1970	19.4

*　首次统计。

根据《麦克米伦世界历史统计》算出。

表 2　铁路营业公里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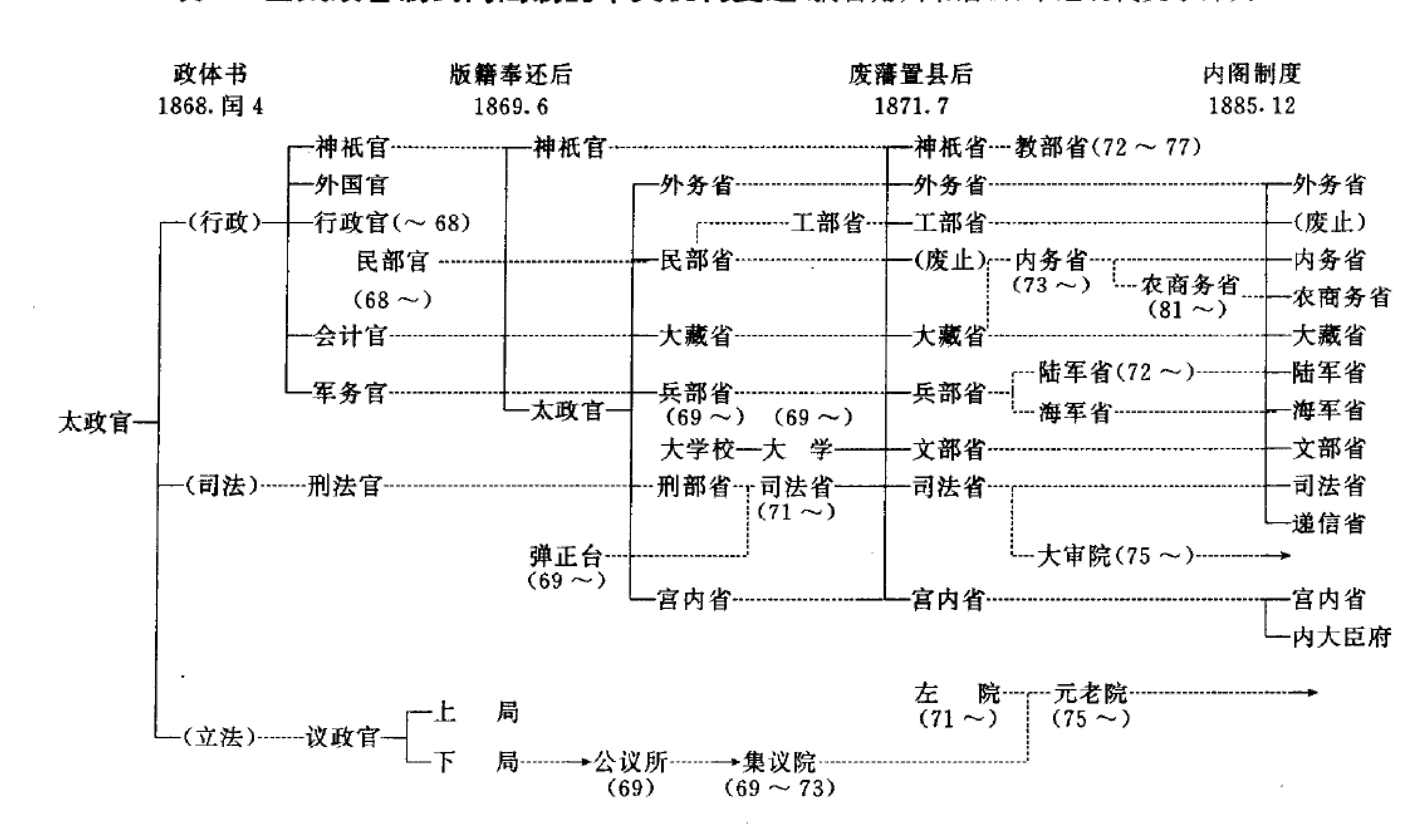
（单位：公里）

	日　本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俄国（苏联）
		1825* 43	1828* 17		
1830		157	31	1835* 6	1838* 27
1840		2 390	410	469	?
1850		9 797	2 915	5 856	501
1860		14 603	9 167	11 089	1 620
1870	1872* 29	1871 21 558	15 544	18 876	10 731
1880	158	25 060	23 089	33 838	22 865
1890	2 349	27 827	33 280	42 869	30 596
1900	6 300	30 079	38 109	51 678	53 234
1910	8 661	32 184	40 484	61 209	66 581
1920	13 645	32 707	38 200	57 545	71 600
1930	21 593	32 632	42 400	58 176	77 900
1940	25 126	32 094	40 600	61 940	106 100
				［西　德］	
1950	27 401	31 336	41 300	36 930	116 900
1960	27 902	29 562	39 000	36 019	125 800
1970	27 104	18 969	36 532	33 010	135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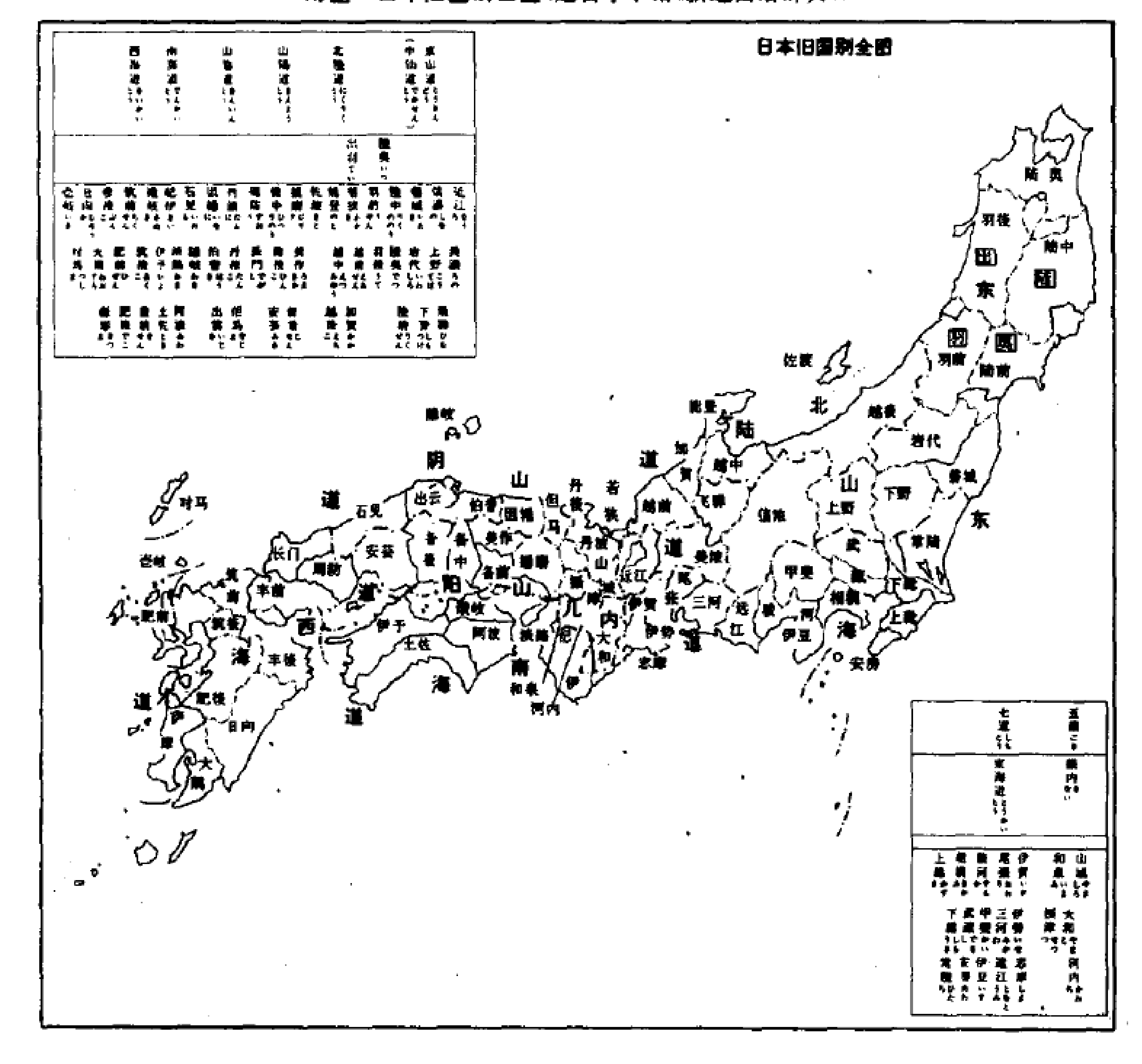
*　首次统计。

根据《麦克米伦世界历史统计》算出。

表 3　由太政官制到内阁制的中央机构变迁(摘自角川书店《日本近现代史小辞典》)



附图　日本旧国别全图(选自小学馆《新选国语辞典》)



人名索引

1. 本索引为原著所附，按日文的五十音顺排列，只将汉字改为简体。

2. 页码为原文页码，本书标在边口。

3. 西方人名，除在索引内该人员项下译出外，另在最后以汉语标音顺序列出。

ア 行

会泽正志斋 75
青木周藏 137
浅野总一郎 203
阿部正弘 43,46,61-4,66,71,72
新井章吾 226
新井白石 17,30,32
有栖川宫炽仁亲王 116,234,235,238,248
安藤信睦 77,78
井伊直弼 70,71,73-7
石坂昌孝 180,190
石塚重平 180,226
矶山清兵卫 225,226
板垣（乾）退助 51,52,54,101,120,122,128,132,141,144,145,148-51,153,154,165,166,172-4,179,189-92,203-8,217,219,220,223,225,240,266,272,273,275
板仓胜静 94,98,106,111,112
伊丹亲恒 165
市来四郎 168
伊东奎介 191
伊藤痴游 191
伊藤博文（俊辅） 55,87,88,91,121,122,133-5,147,150,151,153,158,161,168,189,204,221,222,224,228-30,232-40,247,248,252,259,261,264,266,271,272,274,275
伊东已代治 257,259
稻垣示 180,190,226
犬养毅 257
犬冢胜弥 125
井上馨（闻多） 55,56,87,88,91,122,130-2,141,142,147,153,154,156,189,203,216,217,222,224,228-32,234,236-43,248,266,270-2,275-7
井上毅 235,236,248,251,252,259,262
岩仓具视 51,56,81,96,100,108-10,119-22,124,127-9,131-6,140,141,147-51,161,170,204,231,235-8,240,247,248,265
岩崎长武 161,165,166
岩崎弥太郎 104,243
岩下方平 120
岩濑忠震 66,75
ウィッテ，セルゲイY.（维特） 141
ヴイルヘルム一世（威廉一世） 138
ウェード，トーマスF.（韦德） 153
植木枝盛 193
江川太郎左卫门 45
江藤新平 133,141-3,148,149,151,152,168
榎本武扬 229,249
江桥厚 192
袁世凯 224
远藤秀景 179
オールコック，ラザフォード（阿尔科克） 77,87,91
小浦鉎三郎 239

大井宪太郎　191,206,208,225,226,272,276
大石正巳　189
大江卓　173,177
大木乔任　133,142,148,228,229
大久保一翁　116
大久保利通(一藏)　44,50-4,76,78-80,91,94,100,104,105,108-11,120,122-4,126-32,134,135,137,140,141,145,147-53,157-63,166-77,194,228,230,233,238,241,243,266
大隈重信　53-6,121,122,124,132,134,141,142,146,148,151,152,156,157,173,187-9,203,204,208,228-30,232-41,243,245,257,266,269,275-7
大盐平八郎　37
大原重德　81
大森钟一　196,197,210,211,257,
大山岩　130,137,146,147,166,229,238,248,266
大山纲良　160,161,163,168,169
冈崎平内　179
小笠原长行　92
荻生徂徕　8,24,29,30
荻原重秀　17
小栗忠显　90,94,114
尾崎行雄　273
织田信长　5,6,18

カ　行

景山英　226
和宫　77
片冈健吉　161,166,174,185,186,190,206,208,273,274
胜麟太郎　66,90,115,116,266
加藤高明　257
加藤弘之　112,113
金子坚太郎　259,263
狩野元吉　192
川上亲晴　163
川路圣谟　45,66,75
川路利良　167,172
川村纯义　152,169,228,229,234,238
北村重赖　174
木户孝允(桂小五郎)　50-2,88,91,94,100,105,120,122-4,127-32,134,135,137,140-2,147,148,150-4,156,158-61,170,171,173,185,233,266
桐野利秋　143,145,163-5,172
金玉均　216,217,220,222,223,225
グナイスト,ルドルフ・フォン(格奈斯特)　247,261
グラッドストン,ウィリアムE.(格莱斯顿)　136,251
グラバー,トマスB.(格洛弗)　91
クーレー(库雷)　94,95,101,102
久木田泰藏　163
久世广周　77,78
久米邦武　135,137,139
栗原亮一　175,219
栗本鲲　102
黑田清隆　146,147,149,152,154,228-32,237,238,248,266,271,275-7
桂昌院　17
小池(渡辺)国武　161
小泉信吉　217,236,239
河野敏镰　208,229
河野广中　175,179,180,186,187,191,201,202,276
孝明天皇　82,83,85,96
郡利　187
小岛忠里　186
五代友厚(才助)　86,171,188,229-31,237
后藤象二郎　104,106,109,120,122,133,142,148,151,173,188,189,191,203,204,215,217-23,225,226,273,275
后藤新平　257,266
小滨氏兴　165
小林樟雄　219,220,225,226
小松带刀(清廉)　91,94,101,104,106,108,120
小村寿太郎　276
今藤勇　163

サ 行

サトウ,アーネスト(萨托) 87,96,97,100,115,116
サンクウィッチ,J.A.(桑克维奇) 219
西园寺公望 204
西乡隆盛(吉之助) 44,51,52,78-80,88,91,94,97,98,100,101,104,108-11,115,116,120,123,125,127-32,141-6,148-50,152,163,164,166-75,177
西乡从道 128,150,152,224,228-30,237,248,266
税所笃 166
斋藤利行 122
酒井忠清 15
坂本龙马 91,94,104
佐佐木高行(三四郎)104,122,124,132,133,171,174,248
指原安三 171
佐野常民 229,230
三条实美 51,82,109,119-22,128-33,140,144-50,169,170,176,235,248,265,277
シュタイン,ロレンツ・フォン(施泰因) 247
重野谦次郎 179,191
重野安绎 175
品川弥二郎 94,108,174,203
篠原国幹 145,163,164,172
柴田浅五郎 180
涩泽荣一 243
岛田一良 177
岛津重豪 42,43
岛津忠义(茂久) 78,96
岛津齐彬 43,44,66,72,78
岛津齐兴 43,44
岛津久光 43,44,78,79,81,82,85,96,123,128,132,145-7,154,168
青蓮院宫朝彦亲王 75,84
崇传 13
末广重恭 181,189,256
杉田定一 175,180,190,218,219
杉村宽正 179
调所笑左卫门 42-4
铃木舍定 179,190
铃木昌司 180
周布政之助 41
副岛种臣 120,122,132,144,148,149,151

タ 行

大院君 215,216
高島秋帆 45
高岛伸二郎 179
高杉晋作 88
鹰司政通 85,92
高桥安尔 192
竹内纲 189,191,220,273
竹内正志 175
竹添进一郎 222-4
伊达宗城 85,111
田中不二麿 158,229
田边太一 62
谷干城 101,150,249,271,272
田沼意次 33-6
田沼意知 33
田母野秀显 191
冢原涩柿园 116
土仓庄三郎 203
筒井政庆 66
坪井九右卫门 41
ティエール,ルイA.(梯也尔) 137
寺岛宗则(松木弘安) 56,86,132,154,187,228,229,269,270
寺田平之进 146
寺村左膳 104
天海 13
田健治郎 257
ドートルメール(多特梅尔) 220
头山满 175,216,218,225
德川家定 72,75
德川(田安)家达 116,117
德川家重 33
德川家继 17,18
德川家纲 7,9,14-6
德川家齐 35,36,38,42
德川家宣 17

德川家治　33,35
德川家光　6,9,14
德川家茂　(庆福)73,75,76,82,83,86,96
德川家康　5,6,9-13,19,29,64,100
德川家庆　38
德川纲吉　15-7
德川齐昭　64,66,70-5,78
德川秀忠　9,10,13
德川光圀　71
德川庆胜(庆恕)　75,88,111
德川(一桥)庆喜　61,72-5,78,81-6,92,93,96-100,102,105-13,115-7,119
德川吉宗　18,24,29-31
德大寺実则　133
丰臣秀吉　5,6,10,11,18,19,21
鸟居坚助　164
鸟尾小弥太　123,130,161,276

ナ　行

ナポレオン一世(拿破仑一世)　250
ナポレオン三世(拿破仑三世)　97,101,183
内藤鲁一　179,186,189,190,206
长井雅乐　78,79,81
永井尚志　66,75,106,111
中井弘　125
中江兆民(笃介)　218,221
中冈慎太郎　91,94,101,104
中川宫(贺陽宫)朝彦亲王　84,86
中岛信行　189
永田一二　175
中根雪江　111
中桥德五郎　257
中摩顺藏　164
中御门经之　108
中上川彦次郎　243
永吉小藤次　164
野田亲昌　165
野村靖　130

ハ　行

パークス,ハリー(帕克斯)　91,93,95-7,100,102,107,114-6,121,136,152,153,155
ハリス,タウンゼント(哈利斯)　66-70,73,74
ハルデンベルク,カールA.(海登堡)　249-51
桥本左内　75
花房义质　216
马场辰猪　188,189,192,204
马场文英　82
林田龟太郎　264
林友幸　161,169
林包明　189
林有造　166,173-5,177,273
林罗山　13
原敬　257
ピアス,フランクリン(皮尔斯)　66
ビスマルク,オットー(俾斯麦)　138,249,250
日原昌造　236
平冈浩太郎　179,216,218
広泽真臣(兵助)　105,108,120,122
闵妃　215-7,224
プチャチン,E.V.(普嘉廷)　64-6
フラワーズ(弗拉瓦兹)　96,107
福冈孝弟(藤次)　104,106,109,120
福泽谕吉　112,158,159,183,184,198,200,217,225,232-40
福地樱痴(源一郎)　63,64,71,74,189,257
福羽美静　133
藤田茂吉　184,185
渊辺群平　163
古泽滋　192,203
ペリー,マシュー(柏利)3,49,58-61,63-5,76,154
别府晋介　145
ボアソナード,G.E.(博阿松纳德)　272
法贵发　207,208
朴泳孝　216,220,222,223,225
星亨　191,192,203,206,208,271-4
堀田正俊　16
堀田正睦　70,72,73
堀越宽介　180

本田亲男　80

マ　行

前岛丰太郎　180,192
前岛密　175,176
前田正名　230
前原一诚　168
牧野成贞　16
牧野伸显　125,146
牧利兵卫　164
松方正义　54,157,205,229,240,248,266,269
松泽求策　180,187
松平容保　84,85,108
松平定敬　108
松平定信　35,36,44
松平忠优(忠固)　73
松平庆永　66,70,72,73,75,78,81,85,99,109,111
间部诠房　17,30
万里小路博房　133
三浦按针(アダムズ,ウィリアム)　12,13
三岛通庸　201,207
水野忠邦　38,39,41,45
箕浦胜人　184,185
三野村利左卫门　114
宫部襄　179,190
宫杜孝一　191
椋梨藤太　41
村田新八　80,147
村田清风　40,41
村山镇　61
明治天皇　109,114-6,119,132,231,237,238,248,259
モッセ,アルベルト(毛瑟)　247,251,261,262
毛利敬亲(庆亲)　78,123
毛利元德　82
森有礼　249

ヤ　行

柳泽吉保　16,17
矢野文雄　234
山尾庸三　229
山县有明(狂介)　94,128,130-2,141-3,197,216,228,229,231,248,266,277
山上七之助　165
山际七司　180,189,190
山口尚芳　134
山下千代雄　191
山城屋和助　143
山田显义　229,248
山内丰信(松平容堂)　85,104,106,109,111
山内丰范　82
山本庄司　180
山本盛典　176
由利公正(三冈八郎)　114,120
ヨーステン,ヤン(约斯丁)　12
横井平四郎(小楠)　120
吉井友实(幸辅)　97,111,149
吉田松荫　75
吉富简一　171

ラ　行

ラクスマン,アダムK.(拉克斯曼)　36,44
李鸿章　216,224
ルイ・フィリップ(路易・菲力浦)　246
ルドルフ,オットー(鲁道夫)　249
レザノフ,ニコライP.R.(烈扎诺夫)　44
ロエスレル,カールF.H.(罗耶斯勒)　249,251,259,262
ロッシュ,レオン(罗歇)　90,91,94,95,99-102,106,107,113,115,116

西方人名汉译表

阿尔科克 77,87,91
柏利 3,49,58-61,63-65,76,154
俾斯麦 138,249,250
博阿松纳德 272
多特梅尔 220
弗拉瓦兹 96,107
格莱斯顿 136,251
格洛弗 91
格奈斯特 247,261
哈利斯 66-70,73,74
海登堡 249-251
库雷 94,95,101,102
拉克斯曼 36,44
烈扎诺夫 44
鲁道夫 249
路易·菲力浦 246
罗歇 90,91,94,95,99-102,106,107,113,115,116
罗耶斯勒 249,251,259,262
毛瑟 247,251,261,262
拿破仑一世 250
拿破仑三世 97,101,183
帕克斯 91,93,95-97,100,102,107,114-116,121,136,152,153,155
皮尔斯 66
普嘉廷 64-66
萨托 87,96,97,100,115,116
桑克维奇 219
施泰因 247
梯也尔 137
威廉一世 138
维特 141
韦德 153
约斯丁 12